2049 百年馬拉松

中國稱霸全球的祕密戰略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MICHAEL PILLSBURY

白邦瑞——著　林添貴——譯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赞词

“本书从历史当中挖掘出中国想要独霸全球的大战略，令人大开眼界。”

——葛拉汉·艾利森（Graham Alison，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主任，《决策的本质：古巴导弹危机释义》作者）

“本书无疑是近年来关于中国战略与外交政策最重要的著作。白邦瑞在五角大楼与 CIA 工作超过四十年，其间不断与中国的“强硬派”对话交流，而这群人在习近平时代可能主导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在严谨的学术考证基础之上，本书以生动、紧凑的文风提出了发人省思的针砭，批判认为美中合作可以共创美好未来的主流看法。”

——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布鲁金斯中心资深研究员、希拉里外交政策幕僚）

“在过去四十年里，白邦瑞与中国军事、情报单位中的“鹰派”进行无数的会议、对话，与学习。在这本大胆、耸动的新书里，他清楚呈现了中国鹰派如何看待美国，以及打算如何在二十一世纪中叶推翻美国，试图以此纠正华盛顿以为中国正在逐渐改革的错误判断。”

——孟捷慕（James Mann，前《洛杉矶时报》北京分社主任）

“一本令人大开眼界、鞭辟入里的杰作。我推荐给所有想要了解中国的未来的读者。”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前美国国防部长）

“白邦瑞先生为 CIA 进行的调查研究为他赢得了“杰出贡献局长奖”，本书正是根据这份研究写成。在书里他精采地回顾了他如何从一位“拥抱猫熊派”觉醒过来，进而以审慎的态度孤军奋战，警告我们中国图谋称霸的长期战略。他再三强调，美国面对的是一个手段高明、立场坚定、野心勃勃的敌人。在《孙子兵法》的指引下，中国人处心积虑地寻找切断美国的阿基里斯腱的窍门。美国已经有了燃眉之急。”

——詹姆斯·伍尔西（James Woolsey），前 CIA 局长）

“个人与白邦瑞先生曾有数面之缘，对他的中文能力非常佩服——他的中文好到能以中国菜菜名开玩笑的程度。在本书中，他认为中国制订了一项针对美国、长达百年的“战略欺骗计划”，目标是“扮猪吃老虎”，在二〇四九年前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个人认为北京当局若有成为¬全球霸主”的机会，自然不会拱手相让；但是其战略的重中之重，还是在维持

现有体制和中国共产赏的统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绝对没有认为这个目标是不会面临任何挑战，也不会出现任何危机的。北京当局的一切政策，不管对内对外，都会绝对服从这个原则。但无论如何，作者的论证还是非常值得参考的，这可以一窥现实主义者和美国国安工作者的思维模式。大力推荐。”

——张国城（台北医学大学通识中心副教授，《东亚海权论》作者）

“西元 2049 年 10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将庆祝建国一百周年。今日的中、美、台领导人届时如果还在世，奥巴马已八十八岁，习近平九十六岁，马英九则九十九岁。他们将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自己的百岁生日送上一份大礼：成为主宰世界的霸权，台湾也已完全臣服在北京脚下。这是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的预言，或许不幸而言中，或许柳暗花明另生波澜。无论如何，白邦端的百年预言值得一看。”

——阎纪宇（《风传媒》执行副总编辑）

“中国从来就想颠覆美国、称霸全球，但美国却被蒙骗了六十载，还帮助中国实现“强国梦”。习近平藏不住“问鼎”的饥渴，但美国并未警觉中国加速崛起，一个重要原因是台海关系缓和，让美国误判中国鹰派已式微。作者以其亲身经历描绘近半世纪来中国“骗”美国的精采过程，这是重要的历史教训。不过，把中国菁英高明骗术归功于两千多年前老祖宗的智慧（或华人常识），就过于简化了。”

——顾尔德（《新新闻》周刊总主笔）

目录

赞词

推荐序（一）　解析中国称霸天下　张旭成

推荐序（二）　观察中国的警钟丁树木范

推荐序（三）　国强必霸的规律？黄介正

致台湾读者序　　一本北京领导人不愿台湾看到的书白邦端

作者声明

导言　　一相情愿的想法

黑色圣诞树

五大错误假设

亡羊补牢为晚否？

第一章　中国梦——洗刷百年屈辱

习近平的复兴之路

《天演论》与《资治通鉴》

谋对谍

进入中央情报局

刘明福论“百年马拉松”

第二章　战国时代——中国人究竟怎么想？

消失的战国

九大战略元素

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天下大势

赤壁之战

小结

第三章　唯有中国才能走向尼克松——中美建交与美国的秘密援助

毛泽东与四大元帅的密会

打动尼克松

秘密援助
“饥则为用，饱则飏去”
“正欲使操知我无大志”
借力使力
中美建交
里根的秘密战略伙伴
小结

第四章　白先生与绿小姐——美国误判天安门局势
天安门事件
编织幻觉
真假改革派
克林顿大逆转
误炸大使馆
高层看不到的档案

第五章　万恶的美国——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美国
新美中关系史
美帝恶行
《较量无声》
抹黑战

第六章　网路警察——滴水不漏的言论统战
从勾践复国到中央统战部
孔子学院
惩罚批评中国的人士

第七章　杀手锏——解放军的秘密武器
小不忍则乱大谋
以小搏大
避重就轻

七大恐惧
美国的阿基里斯之腱

第八章　资本主义迷雾——阳奉阴违的经济战略
早期美国的经济战略
从“打麻雀运动”到“四个现代化”
世界银行与邓小平的密谋
国营企业的成与败
鸡鸣狗盗

第九章　2049 年，当中国统治世界
一、中国价值将取代美国价值
二、中国将“和谐化”网路上的异议人士
三、中国将继续反对民主化
四、中国将与美国的敌人组成同盟
五、中国将出口空气污染末日
六、中国的增长策略将带来重大污染
七、癌症村
八、诚信崩坏，诡诈当道
九、中国将日益破坏联合国及世界贸易组织
十、中国将为牟利扩散武器
小结

第十章　警钟响起
从《地心引力》谈起
天秤已经倾斜？
中国与邻国的紧张关系
美国误判中国对台湾的立场

第十一章　美国需师法战国思想
第一步、承认问题

第二步、明确计算美国已经送出多少援助
第三步、精确评估竞争力
第四步、发展竞争策略
第五步、团结美国内部阵营
第六步、建立反制联盟
第七步、保护政治异议人士
第八步、坚决面对反美的竞争行为
第九步、查缉并惩罚污染分子
第十步、揭发贪渎及新闻检查
第十一步、支持民主改革派
第十二步、密切观察中国鹰派和改革派之间的角力
三个陷阱
注释
谢词

推荐序（一）

解析中国称霸天下

张旭成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政治系荣誉教授，曾任立委与国安会副秘书长

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所著《2049 百年马拉松》是一本少见的好书，值得郑重推介。白邦瑞对美中关系解冻、和解及北京千方百计争取和利用美国经济、科技、军事与外交援助而走向富国强兵之路，有独到的分析和见解。本书主旨直接明了指出中共领导人隐藏野心，企图在 2049 年前打败美国，称霸世界。

如果习近平所标榜的中国梦在 2049 年实现，白邦瑞担心中国将独霸天下，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强。届时中国将向全世界推销其污染地球的开发模式，中国国营垄断企业和中国经济盟友将主宰全球经济市场，北京也可能控制一个全球最强大的军事联盟。经中国重塑的世界将滋养专制政府，把现有国际组织边缘化，限制其规范国际秩序的角色与功能。

本书不是政治小说。白邦瑞是一流的中国通，他综合三十年的学术研究、政策分析与政府工作的经验而提出他的论述，可读性甚高。白邦瑞是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弟，以往在学术界曾有甚多互动。笔者担任立委任内曾邀请他到立法院参加听证会和与我政府官员切磋台美及美中关系。

白邦瑞曾在“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担任分析工作，和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任教。他更长时间是在国会，尤其是五角大厦和中央情报局从事政策分析和建议，对美国的外交策略产生实际的影响力。

一九七五年春天白邦瑞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发表的一篇文章主张美国给中国军援曾引起美国媒体和外交界广泛的讨论。《新闻周刊》（Newsweek）并刊载一长文＜给北京枪炮？＞（Guns for Peking）讨论美国提供武器给北京的得失。白邦瑞不讳言美中建立军事关系以制衡苏联的主意来自中共驻联合国鹰派武官的建议。

前加州州长雷根读过白邦瑞的文章，并与这位年轻的中国通长谈。1979 年 5 月里根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公开赞成军售中国牵制苏联，但对美国可能弃台的方案表示保留。1980 年里根角逐总统，聘白邦瑞为顾问，协助他起草第一次外交政策讲稿。

里根当选后指派白邦瑞为总统交接小组成员，嗣后正式任命他为政府官员，参赞机要。

白邦瑞在里根阵营中有不少“志同道合”官员，都支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以牵制苏联。出身国防部，曾在国安会担任基辛格副手的国务卿黑格（Alexander Haig）就是最突出的，他在一九八一年访问北京时公开倡议军售中国。

里根 1981 年所签署的第 11 号“国家安全决定指示”（National Security DesionDirective 11）准许国防部出售先进的空中、地面、海上和导弹技术给中国以改造人民解放军为世界级的作战部队。次年里根的第 12 号“国家安全决定指示”启动美中核子合作与开放扩大中国军事及民用核子计划。

1985 年里根政府军售六大武器系统给中国，总价超过 10 亿美元，目标是要强化中国的陆、海、空军，甚至协助扩张中国的海军陆战队。翌年里根政府并提供高科技援助，协助中国发展八个国家研究中心，包括基因工程、智能机器人、激光、超级电脑和太空科技的高深研究。

里根 1984 年第 140 号“国家安全决定指示”的战略论述指出，“协助中国现代化是基于强大安全和稳定的中国可以是增进亚洲及世界和平的力量。”里根团队视中国为一完全战略伙伴，和误信中国正朝向自由化迈进，却未能洞悉养虎为患的危险。

尽管北京与美国合作，但绝不放弃其核心利益，并且对里根政府强力施压，要求美国断绝对台军售，甚至威胁召回驻美大使及降低双方外交层级，以迫美就范。抗压力不强，一面倒亲北京的国务卿黑格无奈做出重大让步，在美中“八一七公报”同意减少对台军售和限制军售的质与量。

里根对此非常生气，把黑格罢官，并对台湾提出“六大保证”以平衡和淡化该公报的冲击。为规避该公报的限制，里根政府并采取各种补偿措施，包括透过技术转移协助台湾生产“经国号”战机，和利用租借方式提供台湾战舰以强化台湾海防。很遗憾的，白邦瑞在书中对黑格被罢官及“八一七公报”这一段台美中斗智、斗力的插曲只字未提，不知是疏忽或刻意不谈。

白邦瑞在美中秘密合作对付苏联的政策制定和实际执行过程扮演关键角色。从 1984 年后，他已被调升为相当于三颗星将军的文官职位，在五角大厦主管政策规划和秘密行动。他负责推动秘密与中国合作，提供武器和军需物资给反苏联的阿富汗反抗军，武装五万红色高棉游击队对抗占领柬埔寨的越南军队（苏联傀儡），和军援安哥拉游击队对抗古巴占领军。

白邦瑞最突出和关键的角色是，倡议使用可打败苏联占领军的杀手锏，并居间说服美国各政府部门和获得北京同意，由美国提供阿富汗游击队毒刺导弹（Stinger Missile），击落了数百架苏联直升机和军机，扭转了阿富汗战局，最后把苏军赶出阿富汗。

中国也积极协助反苏阿富汗游击队，其提供的第一批武器包括 AK－47 攻击步枪、机关

枪、反坦克火箭弹和地雷。在美中秘密合作期间，中国提供武器总价超过 20 亿美元，由美国买单，但迄今中方仍不承认他们供应了武器。

中国为何竭力与美国合作？白邦瑞指出这是北京马拉松策略的一部分，首先是利用美国的力量和先进技术强化中国。其次是“借力使力”，借助美国的援助达成反包围，打破苏联包围中国的两把“钳子”——阿富汗和越南。1989 年 2 月邓小平在北京与老布什总统的谈话中承认苏联包围中国曾是致命的威胁。

本书的一大突出重要贡献是指出美国各界被中方误导而一相情愿，犯了五大错误的假设：

（一）美中交往能带来完全的合作；

（二）中国会走向民主之路；

（三）中国是脆弱的小花；

（四）中国希望和美国一样，而且正如美国一样；

（五）中国的鹰派力量薄弱。

中国领导人从毛泽东以降都具有民族复兴和取代美国为世界超强的雄心壮志。为实现此一大国梦，他们活用孙子兵法“诡道”的欺敌策略“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投其所好，指鹿为马，把美国人骗得团团转；作者并列举许多实例为佐证。

白邦瑞自认，和许多美国官员与学者一样，曾是一群亲中的“拥抱猫熊”（Panda-Huggers）人士，强烈主张和积极推动援助中国及美中合作的政策。有别于过去和目前这些中国通的是，白邦瑞觉醒了，承认被高明的中国领导人欺瞒，痛悟前非，也认清了“养虎为患”的错失，对美国、台湾和日本等盟友造成危害。他的深入调查研究得到中央情报局“杰出贡献局长奖”——本书许多章节就是出自该研究报告。

二十多年前冷战结束，苏联共产党阵营的崩溃表示美国打败了另一世界超强的挑战。为赢得与中国“百年马拉松”的竞赛，白邦瑞在本书最后一章提出对美国本身、中国及国际社会共十二个因应步骤。他建议美国必须诚实面对问题，知己知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操控中国政局，支持改革派制约鹰派，和师法战国策，在国际间合纵连横围堵中国。

近年美国正竭力执行重返亚太（再平衡）策略，加强与盟友伙伴如日、菲、越的军事合作。这个策略最大的缺憾是华府忽视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及其可扮演的促进区域安全的角色。某些智库人士曾有“弃台”谬论，或主张为安抚北京，未来民进党政府应寻求与中国和解。

吾人认为美国政府应正视太阳花运动、九合一选举、反课纲，和民意所呈现的台湾社会强烈自主意识。一个民主、自由、独立，不受北京控制的台湾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也是亚太的和平与安全的柱石。吾人建议美国应根据《台湾关系法》的条文和精神，表达防卫台湾

的决心；国会应考虑，如 1955 年的“福尔摩沙决议”，通过协防台湾的决议，授权总统动用包括武力的各种力量，防卫民主和自由的台湾，以吓阻中共并吞台湾的野心。

白邦瑞的杰作引人深思，富有敌发性，是未来总统与国安团队必读的兵书。我也推荐给政府负责处理国安、国防和外交的官员，及所有想了解国际关系、美国和中国政治与军事的知识份子、学者及学生。

本书译者林添贵，是专业的翻译高手。他所翻译的美中台关系书籍八十九册，包括《李洁明回忆录》，卜睿哲《台湾的未来》，名记者孟捷慕《转向》，崔普烈《买通白宫》。他不但熟悉外交政治和经济事务，而且文字优美，译笔生花，值得称赞。

推荐序（二）

观察中国的警钟

丁树范

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顾名思义，这本书试图从中国历史的深度，综览过去六十年的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发展。并以中国的典故和概念提纲挈领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发展关系的战略，而企图成为一家之言。

作者白邦瑞认为，过去六十年美国完全被中国欺骗了。之所以被骗是因为美国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中国人的思维和文化，更不要说中国复杂难懂的文字。因此，美国对中国的基本假设完全错误。

作者指出美国错误的假设包括：和中国交往带来中国完全和美国的合作；中国发展起来后会走向民主之路；中国是脆弱的小花，不必担心中国会挑战美国；中国希望和美国一样；及中国的鹰派力量薄弱，温和派才是中国主张的主流。作者明确指出，自 1949 年建立政权以后，中国始终是被企图中国强大，以民族主义为号召的鹰派所控制。

白邦瑞表示，许多美国人低估中国鹰派的影响力，以为他们是疯子。毛泽东于 1969 年召集高级将领讨论对付苏联的战略，他们向毛提出打“美国牌”以牵制苏联的建议，陈毅甚至建议台湾问题暂时搁置，以后在高层谈判中慢慢解决。北京因此秘密传达讯息给尼克松及基辛格，欢迎他们访问北京，但当时中国仍视美国为霸权，内部文件甚至将美国与希特勒相

比，与美国交往纯粹是把美国当工具。

白邦瑞说，从尼克松以降，美国历任政府在科技、教育、研发、军事和经济等层面，对中国提供援助的质和量都十分惊人，美国不肯给的，中国就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掌权前似乎以改革派自居，但掌权后又与鹰派的思路相近。习近平基本上也是延续毛泽东的百年马拉松路线，要实现“超英赶美”的中国梦，只是现在更愿意公然表达而已。

作者指出，从双方建交起美国完全被中国骗了。白邦瑞强调，“和平崛起”的中国其实一直运用欺敌战术，利用美国的科技、财经实力和各项援助来壮大自己，期待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强权。2049 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百年时，中国预期可收回台湾，实现自己的“中国梦”，就像当年美国取代英国一样。

这本书有几项特点，反映出本书对于吾人了解中国的价值和贡献。最大的是有关中国韧性强大的民族主义。作者明确指出鹰派（民族主义派？）在诸多决策过程里的角色。作者强调，鹰派的影响力历久而不衰；我们不要被温和的声音所蒙蔽，以致对中国做出错误的判断。

作者的观察对中国大陆观察者而言是警钟。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深入，及越来越整合到国际体系，我们对之期待越来越高。我们可能希望中国经济发展促成中产阶级兴起，从而越来越走向民主化。甚至，对台湾的发展越来越能容忍。

然而，事实的发展是相反的。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在政治上越来越紧缩，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者对中国整体的发展越来越不安。对外方面则是越来越坚持己见，越来越没有妥协、反省的空间。

这本书最足以凸显作者充分掌握中文能力的是，在每一章的开头，作者都挑选古籍或兵法中的计策，言简意赅说明该章的宗旨。例如，第一章标题是中国梦，作者以孔子的“天无二日，地无二君”作为子标题；第二章标题是战国时代，作者以《春秋》里的“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总结；其后分别是：“联吴制曹”；趁火打劫；无中生有；移花接木；顺手牵羊；反客为主；百闻不如一见；和釜底抽薪。

透过这本书，作者想要表达什么？第一，透过陈述亲身处理过的案件，作者似乎想让读者知道，他是很重要的人，因为他处理过这么多美国和中国关系发展的诸多重要案件。

第二，凸显作者的独特性。作者自己承认，他和诸多的中国专家一样，过去都被中国欺骗了。但透过近乎忏悔式的分析和陈述，作者表现出反省，进而间接表达其他的人还没有反省。所以，作者的能力是比同行者都高。

第三，表示作者掌握中文能力是第一流的。特别是作者在每一章都有引自中国古籍或兵书里一句话，以彰显每一章的内容。这是所有美国，甚至，西方分析中国战略的作者都不曾做过的。透过这样的安排，作者表达出他比同行者都懂中国。甚至，作者有向同行人士示威

的意味。

作者是美国培养的菁英，也曾在行政部门担任重要的职位。只是，以近乎忏悔方式陈述美国被中国欺骗，说明中国拟取代美国成为霸权，这种分析令人觉得怪异。第一，这岂不是说明美国教育的失败。然而，全世界仍有数以万计的人士，包括当今中国政治菁英人士的子女，千方百计想到美国受高等教育。这岂不矛盾。

第二，国家间的权力关系是西方有历史以来认识和分析国际政治关系的主流思想，所以发展出例如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等的理论以解析国家间的竞争。因此，作者似乎没有必要对中国的行为，特别是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感到惊讶，因为，过去近四十年的发展已为中国累积大量财富，使得他得以大力推动他的强权道路计划。

推荐序（三）

国强必霸的规律？

黄介正

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2014 年 6 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 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习式血脉基因的观点与中国崛起的实践将否反证芝加哥大学米夏摩（大陆译为米尔斯海默）教授“攻势现实主义”之命题？

这是我去年给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硕士班学生，所出的学科考试题目。白邦瑞博士可能认为，习近平的讲法其实是中国对西方的“瞒天过海”策略之一。

在 1970 年代东西方冷战高峰期，美国大学中无不以苏联研究为显学。以白邦瑞出身良好、就读常春藤名校、且又聪明绝顶的年轻人，愿意走入政府情报体系，却是探讨中国、学习中国语文，并愿意从中国人的历史文化来研究政策意图，实属凤毛麟角。或许也可就此观察和理解，多年来白邦瑞在美国政学界所展现出的特殊性格与论述。

东西方长达四十年的冷战，将国际安全研究者聚焦在苏联研究，而冷战结束与苏联解体，不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权力结构形成巨大冲击，也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固有典范造成根本性的挑战。超过一个世代的国际安全（苏联）研究专家们，突然有如自由球员被释出，而需要找寻出路。1990 年代，中国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崛起，使得原本仅限于少数美国政府与情

报机关的中国问题专家，以及在学校智库研究中国的学者，出现了天外飞来的竞争对手。

美国少数看得懂中文、会说中国话，被称为“中国研究者”（sinologist）的学者专家们，遇到了原本研究国际安全，但聚焦美苏对抗，不谙中文的一大群被归类为“战略研究者”（strategist），加入了研究中国的行列。两组学术背景与政策分析有出入的学者专家，会以如何不同的思考基础与角度来观察、诠释以及应对中国的政策意图与行为，不难想见。

诚如白邦瑞在书中所揭示，许多美国政府与民间专家认为，中国不同于苏联，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自然应有区隔。对苏联采取围堵政策，不让苏联向外扩张，而将它锁住（fence in）在一定范围内，以长期的、结合政治、经济、军事的综合实力竞赛，拖垮一党专政的共产政体。对中国则另采取交往政策，利用邓小平推动的对外开放，将中国拉出（pull out）封闭的政经制度，诱导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接受以西方为首的政经与安全规范，并透过类似和平演变的手段，期待中国自我转型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

即使是在美国“中国研究者”本身的群组内，也有因学派师承、出身际遇、工作性质、中文程度，以及个人理念等因素，而有不同的分析角度与立场。部分学者专家倾向认为，美国必须先深入了解中国才有可能改变中国，因此需要采取扩大交流，不能切断联系；这些强调交流的学者专家们，往往被冠以“猫熊拥抱者”（Panda hugger）带有贬损意味的头衔，从而引发许多我个人认为无谓或非善意的争执。另有部分学者专家倾向认为中国与美国立国价值与政体迥异，不可能成为像西欧或亚太盟邦一样，因此基于料敌从宽的原则，美国与中国的交往必须坚守原则、锱铢必较、步步防范，有人称他们为“示警者”（alarmist）。白邦瑞的这本书，显然叙述了他个人长达近四十年的观察心得，也跨越了上述两者的界线。

白邦瑞在书中提醒我们，中国存在着一批“鹰派”民族主义者，这些“解放军的将官和政府中的强硬派分子”的影响力其实不容小觑，却被许多外界分析家所忽视。这些被漠视的事实，以白邦瑞的分析，可能出于不谙中文、学艺不精，或被中国人传统的“欺敌”策略所误导，或基于对中国长期积弱的一相情愿看法。其实世界各国、无论大小，也都存在着追求民族主义倾向、具有强国强种意识的鹰派。白邦瑞博士长期与中国交流，尤其喜爱与他认定的中国鹰派人士来往，我不会认为他是“猫熊拥抱者”，也不认为他属于美国鹰派，但是这本书确是美国以及所有中国周边国家的鹰派人士必读的大作。

“百年屈辱”与“百年马拉松”是白邦瑞这本书的主调。从 2009 年天安门广场大阅兵前，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旗队，步行 169 步，到达升旗台的设计，到习近平多次正式谈话中，强调 170 余年的“深刻总结”，我们观察到这个晋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亚洲头号军事强权，还没有从心理上走出鸦片战争的阴影。如果以白邦瑞博士转引，所谓中国（或习近平）想要在第二个一百年（建国百年）击败美国，跑赢马拉松，不是没有机会，但时间仅剩下 34

年，确实有些急迫。

不过好在本书是以“百年马拉松”为题，田径赛与擂台赛毕竟不同。擂台赛是两者面对面决战，田径赛是许多人一起，且朝同一个方向跑；擂台赛必须将对手击倒在地，田径赛只需要比其他人超前百分之一秒；擂台赛只有最赢的选手独得奖牌，田径赛则至少前三名都能获奖并一同受到表扬喝采。以此观之，中国的马拉松提法很高段，白邦瑞也满聪明。

白邦瑞博士在美国政府与学界，是个有名的人物；他的有名，植基于他的天纵聪颖与勤恳治学，也归因于他广搜武林秘笈、闭门练功、极少亮剑、却偶露锋芒的一贯作风。白博士具备从中国人传统战略文化与思维的视角，来解读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能力，是中国鹰派人士最强劲也是可敬的对手之一；其实，以我的长期观察，白邦瑞自己就是最会灵活运用“三十六计”的美国人，他会想到（或故意）要写这本书即为明证。

在与他相识、交流、争吵、辩论二十余年却不伤彼此友谊，了解也容忍他的思维逻辑与性格特色，再阅读此本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肯定的大作之后，我真的很想看看，在北京的“习办”会写出什么样的书评？

致台湾读者序

一本北京领导人不愿台湾看到的书

白邦瑞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一到二十七日，我去北京拜访了许多中国的学者与官员。这本书中一千多条注释来自于这些鹰派作者的著作、文章，或访谈纪录。

令我吃惊的是，他们许多人坦率承认，他们已经读过我这本书未经正式授权的中文译本了，不过这个版本只有在中共党员之间流通。许多人还欣然同意本书的主旨。然而，第二件令我吃惊的事情是，他们担心这本书会在台湾造成强烈的“负面效应”（negative reaction）。他们甚至批评我会在台湾制造政治纷扰。他们说，中国只是“摸着石头过河”，也没有针对台湾的长程战略计划。我回答说，我的书主要谈的是中美秘密合作的历史、美国人一相情愿的思维，以及北京高明的战略。对此他们没有异议。

然而，他们不希望任何台湾人读到本书提出的证据。为什么？他们说，台湾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对于北京的战略计划已经不以为意了。“你的书可能让我们过去十年来的努力都付诸流

水。台湾可能会误解北京老练的谈判技巧与长期架构。”他们担心我揭露太多从美国档案中新解密的证据，透露北京领导人曾多次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占上风。他们说我揭露了许多足以让他们沾沾自喜的成就，但这书对台湾来说“出现的时机不恰当”。一名“学者”甚至建议我这位“中国的老朋友”，台湾人最好不要讨论这本书。

我跟他们说我没有访问台湾的计划，并问他们为什么现在“时机不恰当”。他们说，2016六年的台湾总统大选将会是两位聪明的女性候选人之间关于中国的“理念之争”，而且他们已然心有所属。如果一位资深的美国官员在这个敏感时机说得太多，他们的胜算就少了。我向他们保证，包括我在内的美国官员从未介入台湾的政治。他们听了哈哈大笑：“太好了，那请你务必在 2049 年 10 月 1 日再来北京，参观纪念百年马拉松的阅兵！”

我因为有幸于 1970 至 1972 年间到台湾大学学习中文，本书方得诞生。我们在史丹福中心（Stanford Center）使用的课本包括从春秋战国时代传承下来的古典文献，来自中国大陆的老师还会教一些如今北京的鹰派战略学者朗朗上口的古典成语。中国人从春秋战国时代的治乱兴亡所总结下来的智慧，恰恰可以作为今天崛起中的中国要如何取代旧霸主的战略方针。在往后的日子里，我在许多用中文进行的会晤中，了解到历任台湾领导人，包括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还有与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对中国大陆的观感。

我写本书的目的之一是我相信，我在台湾的朋友会想要从一个曾经在台湾受过训练的历史见证人的书写中，知道当初为什么美国政府要切断与台湾的关系、投入北京的怀抱。我在书中引用了新解密的文献，提供了一些过去不为人知故事。

美国官员坦白承认错误是破天荒的大事。我的同事当中很少愿意这么做的。前任美国驻华大使、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李洁明是第一位。可惜他受到的重视还远远不够。如果你喜欢他的《李洁明回忆录》，你应该也会想要看看我的《2049 百年马拉松》。我写这本书是为了说服其他美国政府官员，以及台湾领导人，公开地承认我们严重错估也低估了北京的战略与“中国梦”的真正企图。另一方面，如果你相信中国即将崩溃，或者你确信中国马上会像台湾一样民主化，或者你根本不在乎中国与美国早在 1969 年开始就展开了秘密合作，这本书不是为你而写。如果你想知道过去 45 年的历史如何导致今天的局面，请一览本书提供的新证据，它们有的来自于中国，有的来自于美国档案，且皆由美国总统签署。

作者声明

“本书于出版前经过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防部长办公室，以及国防部某部门的审阅，以避免机密资料的泄露。我感谢这些查核同仁删除敏威的细节资讯，以确保此领域里的研究安全。”

导言　一相情愿的想法

“瞒天过海。”三十六计

2012年11月30日中午，暮秋晴朗的天空下，史密松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花白胡子、和善的秘书长韦恩·克劳夫（Wayne Clough），出现在一堆摄影机和麦克风前。当他开口说话时，一阵寒风吹过位在华盛顿的国家广场（National Mall）。四周群众包裹在大衣里，而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代表则高举着一块神秘的黄金色奖牌。当天史密松尼学会的贵宾是中国著名艺术家蔡国强。前一天晚上，内人苏珊黍为活动主办人之一，在史密松尼的亚洲艺术馆萨克勒艺廊（Sackler Gallery）为欢迎蔡国强办了一场豪华酒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英国肯特麦可亲王王妃（Princess Michael of Kent）以及 74 岁的前伊朗国王巴列维的遗孀等四百名嘉宾，举杯庆祝中美友谊，也得以一睹在 2008 年北京奥运开幕式以璀璨的烟火表演而闻名国际的这位大师的丰采。蔡国强以表演艺术彰显中国形象驰名中外，他另一项创举是利用火焰把长城延伸一万公尺，从太空都可以看清楚。这场晚会替史密松尼募到一百多万美元，新闻登上许多报纸杂志的社交版。

次日，蔡国强亮相时，身穿西装、灰色大衣，配上橘红色围巾。这个整洁、英俊、头发斑白的大师抬头望向国家广场，以及他的最新表演艺术作品——一棵四层楼高、缀上两千个爆破器的圣诞树。

蔡国强按下手持引爆器，圣诞树就在众人眼前爆炸开来，浓烟从枝叶中冒出。蔡国强再按一次引爆器，圣诞树再次炸开，然后又按第三次。历时五分钟的表演把松针炸得向四面八方飞散，而浓密的黑烟——象征中国发明火药——吞没史密松尼标志性的红色城堡建筑的外墙。事后馆方足足花了两个月时间才收拾好爆炸后的善后清洁工作。

我不晓得在场来宾是否有人思索，为什么他们会在距离圣诞节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要在首都华府眼睁睁看着一位中国艺术家炸掉基督徒信仰的象征。当时我也不敢确定我明白这

个举动的颠覆意义。我和其余的观众一起鼓掌。或许感觉到恐怕会惹争议，博物馆发言人告诉《华盛顿邮报》记者说："表演本身和圣诞节没有关联。"博物馆的确很单纯地称呼蔡国强的表演是"爆破表演"（Explosive Event），可是它或许没有蔡国强在自己的网站上说的更传神——蔡国强称它是"黑色圣诞树"（Black Christmas Tree）。

当希拉里国务卿的助理挥舞那块金色奖牌让记者们看个清楚明白，蔡国强则谦逊地堆着微笑。他刚由国务卿亲自颁授国务院首度颁赠的艺术奖章，另外还笑纳由美国纳税人支付的二十五万美元奖金。希拉蕊表示，这项艺术奖章是为了表扬这位艺术家"对推动互相了解和外交关系的贡献"。蔡国强似乎认同这一说法，他致答词说："所有的艺术家都像外交官。有时候艺术可以发挥政治办不到的效用。"

心头带着狐疑，我次日在和一位投奔自由的前任中国政府高级干部会晤时提起蔡国强。他对于老美授予蔡国强奖章、欣赏他的爆破艺术，感到不可思议。我们到互联网上去搜寻。我希望能够深入了解蔡国强这号人物和他的艺术创作。我不去看夸赞蔡国强才华洋溢的英文文章，只注重几个中文网站对他们这位杰出同胞的评论。

我发现蔡国强在中国国内粉丝还不少。除了画家艾未未之外，他堪称是中国最受欢迎的艺术家。蔡国强许多粉丝是民族主义者，夸赞他当着西方人面前炸了西方的象征物。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自称是"鹰派"。许多鹰派人物是解放军的将官和政府中的强硬派份子。很少美国人和他们照过面。他们却是我极为熟悉的中国官员和作家。因为自从 1973 年以来我就奉美国政府之命与他们合作。我有些同事错误地轻蔑鹰派是疯子。我则认为他们代表中国真实的声音。

蔡国强与鹰派显得非常支持美国衰退、强大的中国正在崛起的论述。（很凑巧，他的名字就是国家强盛。）蔡国强过去的作品就反覆突出这个主题。比如，美军子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频频遭受自发爆炸雷管攻击时，他模仿一场汽车炸弹爆炸，让"观众欣赏恐怖攻击和战争的某种救赎之美"。这位艺术大师谈到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恐怖攻击时，竟说对于全世界观众而言，这是非常"壮观"的一幕——仿佛在说它是艺术作品——当时就惹人非议。911 事件后不久，有位牛津大学教授指出，蔡国强曾经宣称他最喜欢的一本书，是《超限战：对全球化时代战争与战法的想定》。这本军事分析书籍的两位作者是解放军上校，他们建议北京"采用不对称作战，如恐怖主义，以攻击美国"。直到今天，中国的博客还津津乐道他们的英雄能在与美国国会大厦仅有咫尺距离的地方炸掉基督教信仰的象征。很显然，美国人成了他们耻笑的大傻瓜。

后来我才知道，负责付钱给蔡国强的美国官员，并不晓得他的背景或是他可疑的艺术策略。我不禁觉得内人和我也不察而落入陷阱——高高兴兴的洋鬼子浑然不知存心不良的表演

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进行。这和美国的整体对华政策，其实也没什么两样。中国领导人已说服许多西方人士相信，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不会伤害到别人——即使他们奉行的战略从基本上与此背道而驰。

五大错误假设

我们美国人今天看待中国，依然与中国看待我们完全不同——这个情况已经持续数十年了。为什么史密松尼学会和美国国务院付一位著名中国艺术家二十五万美元在国家广场炸掉一棵圣诞树？答案至少有一部分藏在中国一句古谚“瞒天过海”当中。这句话典出中国民间故事三十六计之一。这些计策都是设计来借力使力、击败强敌的妙招，甚至让敌手还被蒙在鼓里而措手不及。或许是不经心，蔡国强后来在向国务院官员发表谈话时说了一句:“每个人都有他的小伎俩。”

我们这些自命“中国问题专家”的人一般都认为一生致力于降低美、中双方之间的误解。我们认为，美国人对中国一再犯错，有时候铸下严重后果。1950 年，中国领导人认为已经清楚警告美国：韩战中的美军部队不应太逼近中国边境，否则中国将被迫还以颜色。华府没有人读懂讯息，因此当年 11 月，中国部队跨过鸭绿江、进入北韩，和美军缠斗到 1953 年才签订停火协议——美军子弟已有三万多人阵亡。美国也误判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它在 1970 年代交好尼克松政府的原因、它在 1989 年对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者的意向、它在 1999 年对待美机误炸中国大使馆的反应（中国领导人把它视同希特勒的暴行）等等。

我们研究中国问题的人有许多被教导，中国是西方帝国主义魔掌下无助的受害人——中国领导人不仅相信这个概念，也积极鼓励这个概念。1967 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政治学教授就强调西方和日本是如何如何地欺负中国，暗示我们第一代必须设法弥补前人之过错。我们的许多教科书包含了相同的论述。

这个视角——不惜代价协助中国、几乎盲目到看不见中国人的亲善或恶意——笼罩了美国政府与中国打交道的方法。它影响到中国问题专家提供给美国总统及其他领导人的建言。

它甚至也影响我们的翻译。外国人学中文，第一件事要学的就是它本质上是很含糊的。中文没有字母，不是由字母拼组而成。中文字往往可以拼几个小字成一个字。我们英文中的 size 在中文里是“大小”，这是方块字“大”和“小”两个字堆砌起来。我们英文中的长度是 length，中文又是把“长”和“短”两个方块字堆砌在一起。中国人用字典组织数千个方块字，它必须根据约两百个部首划分。每个部首之下的几百个字再依笔划多寡排序，笔划少则一划、多则十七划。

方块字已经够复杂了，还有四声。四声抑扬顿挫，代表不同字义。英文 ma 读一声是妈，二声麻、三声马、四声骂。中国人必须高声讲话，对方才听得清四声轻重。中文的音节也简单，因此许多字发音相同，可是音同却意义不同，误解在所难免。

中文的复杂使它像天书、像密码。外国人在翻译中国观念时必须做重大决定，而它很容易导致误解。我有过几次经验必须决定如何翻译中国领导人使用的罕见的中国词语：比如 1983 年邓小平在北京接见参议员访问团、1987 年朱镕基访问华府、2002 年胡锦涛参访五角大厦，都由我伤脑筋设法翻译艰深晦涩的中文词汇，以便正确无误传递他们的真意。我们同僚经常相互交换翻译心得。不幸的是，美国极大多数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只略通几个字、不会讲中国话——只够在不会讲中国话的人面前冒充内行。这一来这些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往往有个毛病，即依本身的一相情愿主观地解读中方的讯息。我们必须更努力，不只注重谈话、还得注意谈话的前后脉络，更需要注意关键的弦外之音。过去五十多年，美国人在这方面失败了。一直到最近，中国鹰派有时候诲莫如深的语言是借喻了中国的古代历史，因此大多数外国人摸不透他们的战略思想。

自从尼克松总统 1971 年向中国开放以来，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大多以与中国“建设性交往”(constructive engagement)以协助它崛起为主轴。这个政策历经八任总统、数十年之久，大多一路延续下来，只有小小改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们各有不同的外交政策观点，但全都一致认为与中国交往、提携它崛起，非常重要。建设性交往派包含著名的学者、外交官和卸任总统，对于决策者及采访中国新闻的记者颇有影响力。我当然知情——几十年来，我也是这群人之一。事实上，我是 1969 年最早提供情报给白宫、主张与中国接触的人之一。数十年来，有时候我扮演重要角色，力促两党政府提供科技及军事援助给中国。我大体上接受美国高级外交官和学者共通的假设，亦即美国战略讨论、评论和媒体分析一再反覆提到的观点。我们相信，中国领导人的思维与我们相似，只要美国援助脆弱的中国就可以协助中国成为民主、和平的大国，不会有区域或甚至全球称霸的野心。然而，我们低估了中国鹰派的影响力。

根据这个信念做出的每个假设都错了——而且后患无穷。根据中国所作所为，甚至同等重要的是，根据中国的不作为，这些假设的错误日益明显。

错误的假设一：美中交往能带来完全的合作

已经四十年了，我的同僚和我都认为与中国“交往”可以引来中国在相当广泛范围的政策问题上和西方合作。它并没有实现。原本以为贸易和技术会导引中国和西方对区域及全球秩序的观点汇流。它们也没有奏效。简而言之，几乎我们全部的乐观期许，中国都未能做到。

从阻碍饱经战火蹂躏的阿富汗之重建工作和经济发展，到提供救援给苏丹和北朝鲜等反西方政权，中国都跟美国政府的行动和目标作对。中国正在和美国的盟友及敌人建立自己的关系，这一点显示北京的任何和平、建设性意向都是言不由衷的。

以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为例。没有任何一种安全威胁会比它们的扩散对美国构成更大的危险。但是中国一点都不帮忙——这还是客气地说——抑制北朝鲜和伊朗的核武野心。

九一一事件之后，某些评论员表示，相信美国和中国今后将因恐怖主义的威胁联合起来，就和以前因防制苏联而合作一样。小布希总统在 2002 年 1 月的国情咨文演说宣示“泯除旧敌对”，合作对抗恐怖主义的“共同危险”的殷切盼望，并没有改变中国的态度。中美在这个议题上的合作其实在范围和效果上相当有限。

错误的假设二：中国会走向民主之路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肯定有改变，但是它的政治制度并没有按我们支持中美交往的人所希望和预测那样演进。少数派中国问题专家已愈来愈多人开始了解这一点。普林斯顿大学的范亚伦（Aaron Friedberg）观察到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濒临消灭，反而可能继续存活数十年。”作家孟捷慕（James Mann）报导中国新闻逾三十年，他指出他所谓的“缓和的”剧本——即预测中国将平稳地演化为自由民主政体——可能成为幻影。他提出警告说，今后二、三十年中国可能远比今天更加富强，可是它或许还继续受共产党专制统治，仍然“敌视异议人士和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与美国尖锐不和。欧洲外交关系协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是个重要的中间偏左智库，它在 2009 年提出评估，形容认为与欧盟来往会引起中国“经济自由化、法治增进及政治民主化”的想法是“犯了时代错误”、言之过早。中国不但没有出现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学者愈来愈注意到出现了所谓的“威权资本主义”（authoritarion capitalism）。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上撰文，称这种转变是“威权主义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纵使如此，以为民主的种子已在中国村级基层播下的想法却成为美国许多中国事务观察家共同的看法。这派主张认为，只要美国不揠苗助长，中国在乡镇的地方选举终究会演进到省级与全国级的选举。

和美国政府里的许多同僚一样，这套民主理论我已经听了几十年了。我在无数的书本和文章中都读到这种论述。我相信它。我也希望相信它。

1979 年我和一些人受鼓励到工业城市东莞附近一个村子去见证“民主”选举的萌芽，我的信心首次动摇。我在参访时有机会和候选人以普通话聊天，以了解选举实际是怎么运作的。

选举的潜规则很快就露出马脚：候选人不得举行公开集会、不准有电视广告、不准张贴竞选文宣品。他们不准批评共产党推行的任何政策，也不得就任何议题批评对手。不会就纳税、预算开支或国家未来进行美国式的辩论。候选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和对手比较个人品质。违反上述规定即构成犯法。

和我交谈的一个候选人问我，西方的民主选举是这样进行的吗？我不敢告诉他真相。中国的鹰派已经干掉真正的选举。

错误的假设三：中国是脆弱的小花*

1996 年，我参加一个美国代表团访问中国，团员当中的罗伯特·艾尔斯沃士（Robert Ellsworth）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伯特·多尔（Robert Dole）的外交政策高级顾问。中方以为多尔若当选总统，艾尔斯沃士或有可能出任国务卿，不敢怠慢，让我们有机会破例看到中国内部的运作状况和问题。接待我们的一些随员是自命为“鹰派”的军官。

在和中国学者显得相当坦率的交换意见中，我们被告知，中国有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险。崩溃的可能性极大。这些知名学者指出中国有严重的环境问题、蠢蠢欲动的少数民族，以及无能又腐败的政治领导人——加上这些领导人没有能力执行必须的改革。考量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出了名的保密，我很讶异这些学者的坦率直言，也对他们的预测相当震惊，因此加强了我支持美国援助貌似脆弱的中国之心态。

***译注：通常的说法是“脆弱的强权”（fragile power），作者为了夸饰刻意改用“脆弱的小花”（fragile flower）。**

我后来获悉，中方安排其他美国学术、企业界领袖及政策专家参加这类“专属”访问活动，来宾也都听到中国即将衰退的相同信息。他们回到美国后，许多人也在文章、专书或评论中重述这些“揭露”。例如，颇有影响力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发表一份研究报告，列举中国在迫在眉睫的未来会减速成长或甚至崩溃的十大因素。后来许多年有关中国问题的辩论，一直都以此一趋势作为重点。2003 年，《评论》（Commentary） 杂志刊出一篇文章，题目即迳指中国“生病”了，2001 年出版的一本畅销书也指称中国“即将崩溃”。许多人表示担心，深怕美国若对中国施加太大压力，要求它举行选举、释放异议人士、扩大依法治理、公平对待少数民族，这些压力会导致中国崩溃——进而导致全亚洲动荡。

数十年来，我们在新闻报导、读者论坛和专书中读到这类千篇一律的论述，它们主宰了我们全国对中国的讨论。可是，铁证如山的事实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经济合作暨发展组

织和联合国的经济学家的估计，中国已经强劲的GDP预计还会以至少百分之七至八的速率继续增长，因此最早可在 2018 年以前超越美国。不幸的是，像我这样的中国政策专家已经深中"中国即将崩溃"的毒，我们很少人相信这些预测。正当我们还在替中国忧心忡忡，它的经济已经翻了一番以上。

错误的假设四：中国希望和美国一样，而且正如美国一样

我们美国人过分自大，喜欢认定其他每个国家都希望和美国一样。近年来，我们处理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时就犯了这个错误。我们和中国交往也抱持同样心态。

1940 年代，美国政府拨款进行研究，试图了解中国人的心态。它产生出几份研究报告，其中之一涉及到针对纽约唐人街 150 名中国移民以罗氏墨渍测验(Rorschach Inkblot cards)进行研究。研究人员包括纳森·莱特斯（Nathan Leites)、露丝·班乃迪克（Ruth Benedict）和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等知名学者。他们也分析中国通俗书籍和电影的主题。结论之一是中国人对战略的看法见解和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往往喜欢直接了当的行动，华裔人士则重间接、轻直接，偏重含糊和诡计胜于清晰明确。另一个结论是探讨战略的中国的文学和文献更强调欺敌诡计。

20 年之后，以心理分析法进行文化研究著称的纳森莱特斯撰文表示：

从孙子到毛泽东，中国讨论战略的文献都把诡计看得比其他军事理论更重要。中国人的诡计主要是诱敌做出不智举动，而较少着重在巩固本身计划的完整。在其他文化里，尤其是西方文化，诡计主要用在确保己方部队能实现最大的打击力量：……中国式诡计的主要好处是不必动用自己的力量：……中国人倾向于不露锋芒，不公布掌权者的日常活动；他们认为奇袭和诡计非常重要。

中国文献经常凸显尔虞我诈的角色，以及需要"智者"——即明智的政治家——以看穿诡计，洞悉真相。中国许多古典英雄故事都强调利用奸猾玩弄别人。许多通俗小说、电影和电视节目的英雄，皆善于不动声色地耍弄对手，直到最后都不漏出真正意向。这些艺术家策划出最复杂幽微的欺敌讯号，需要读者用心思索，到剧情告终时才有恍然大悟之感。

1940 年代这些研究——认为某一民族对世界会有不同的看法——被认为有争议、政治不正确，因此从来没有对外发表。唯一一份原版报告悄悄地躺在国会图书馆里。直要到 2000 年，我才从和中国军方将领的互动中了解到这些研究的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中国人高度重视欺敌战略的重要性。他们以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自豪。两个鹰派将领成立一个"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推广这个观点。自从我 20 年前认识他们以来，他们在全国媒体上的影响力大为

增长。我的同僚错误地轻忽他们，直到最近，他们某些建议成了中国的政策。

错误的假设五：中国的鹰派力量薄弱

1990年代末克林顿政府时期，我奉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之命进行一项史无前例的检讨，检讨中国欺骗美国的能力，以及迄今为止它究竟愚弄了美国多少。根据秘密情报、未发表的文件、与中国异议人士及学者的访谈，以及我直接阅读的中文材料，我终于开始看穿中国人所遮掩起来、不让我这类人士知道的机密。

我搜集和我一向相信的传统论述相互抵触的线索，开始拼组起过去约四十年的另类论述。经过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中国鹰派向北京领导人提出的建议，他们希望能误导和操纵美国决策者，以取得情报以及军事、科技和经济的援助。我发现这些鹰派向毛泽东以降历任中国领导人建言，要报复百年国耻，期盼在2049年、即共产革命成功100周年时，取代美国成为全世界的经济、军事和政治领袖。这项计划即“百年马拉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自从和美国开展关系时，即已执行这项计划。其目标是报复或“洗雪”过去列强的羞辱。然后中国将建立一个对中国公平的世界秩序、一个没有美国全球称霸的世界，并且要修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布雷顿森林和旧金山所建立由美国主宰的经济和地缘政治世界秩序。若要达成这个鸿图大计，鹰派评估唯有透过诡计，或至少否认心怀任何颠覆计划。

当我提出我的研究报告，指称中国鹰派就中国的野心及欺骗美国的战略提出建议时，美国许多情报分析员及官员起先都不敢置信。他们没有看到我发现的证据。（多亏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慧眼独具，他在2001年颁给我杰出表现奖，表扬我这项研究。（我可以了解我同僚的怀疑。中国政府长久以来都以落后国家之姿出现，它的“和平崛起”需要协助。中方否认它有实现全球领导或与美国冲突的念头。的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禁止中国称霸。中国领导人也例行地向其他国家保证“中国绝不会称霸”。换句话说，中国会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但不会主宰任何国家或试图改变任何事物。我们没有一份这样的计划书。中国也的确说没有这种计划。他们只想让中国恢复三百年前的全球地位，当时它支配全球约三分之一的经济。换句话说，根据中国鹰派的规划，到2049年中国至少要有美国的两倍强。

中国将是和平的、不是那么民族主义的概念，得到遍布西方学界、智库、金融机构和政府的意识型态盟友的确认。宣传中国只重经济发展而无意于称霸全球的概念，对这些人来说是更有利的，不论他们是想要投资中国企业的民间股票型基金经理人，或是智库学者，他们为了筹措经费、资料取得管道以及推动研究计划并与中方同僚举办研讨会，都需要鼓吹这些乐观前景。我们的外交政策专家、经济学者和企业人士有这一派想法并无不当，而且也有凭

有据。中国也有真正想和美国合作的温和派存在。中国政府官员通常也的确反映这些观点，并处心积虑地宣称它们才是真正代表中国的声音。

但是那些被嘲笑是“拥抱猫熊人士”（Panda huggers）的人——我过去数十年也颇以此为傲——所拥有的对中国较亲善的观点，恐怕也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中国境内的许多强硬派民族主义声音（从最高层的政治和军事机构到基层民意皆如此异口同声主张）只不过是“边缘”主张。这些强硬派被贴上“脱离现实”的标签，是已经被全球化和资讯科技消灭的旧时代残留下来的老古董。

西方大部分中国事务专家数十年来都认定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主流。这种一相情愿的偏差想法已经创造一个盲点，未来 25 年内，美国最棘手的国家安全挑战可能就要爆发了。中国有温和派和强硬派、鸽派和鹰派，他们在北京的政府机构以及经常举行的会议里，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有很激烈的辩论。但是，逐渐地，强硬派和民族主义的世界观占了上风，在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核心圈里影响力极大。政府办的鹰派报纸《环球时报》已经成为第二或第三名最受欢迎的新闻来源，它的总编辑胡锡进很清楚表达出中国鹰派是如何看待温和的鸽派，他指责他们是“癌细胞，将导致中国灭亡”。亡羊补牢为晚否？

过去三十年，身为曾在国会及尼克松以降历任总统行政部门服务的中国事务专家，我可以说是比起任何西方人士对中国军事、情报机关都有更深厚的来往关系。解放军和国家安全部的代表为我打开他们最神秘的机构的大门，让我接触到其他西方人不曾见过的文件和作品。他们当中的强硬派把我看作推动他们观点很有用的工具，即使我让北京和华府某些相信中国是和平、温驯的人士感到不悦。1998 年和 2000 年，我发表两本学术专书《中国对未来战争的看法》(Chinese Views of Future Warfare)和《中国对未来安全环境的辩论》(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ment)，把我访问北京所搜集到的许多文件，以及中国军方领袖和投奔自由人士所给我的材料，译介为英文。我把中国内部辩论北京在世界的角色的双方立论都包罗进来；当时我把这两派称为“正统”（强硬路线）和“修正主义”（温和派）观点。被我引述在两本书中的将领和外交政策专家都感谢我精确翻译他们的观点，使他们至少在华府国家安全事务专家的小圈子中受到注意，因此在日后愿意提供我更多协助。

历经数十年密切研究中国事务之后，我认为这些强硬派并非人微言轻，而且是中国地缘战略思想的主流。他们只是把高层决策者的观点直言不讳地说出来，这些人代表数亿渴望见到中国崛起为全球大国的人民。回到文化大革命初起之时，中国无疑也有许多自由派思想家，希望整合进全球自由市场，并且向更民主的治理制度演进。中、美情况相仿，美国有鹰派、鸽派之分，有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干预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中国的菁英也分不同阵营。当然，差别在于这些辩论很少呈现在中国民众和西方新闻界面前。中国没有民

选代表组成的国会或真正开放的论坛讨论这些议题。

在未来的数十年里，西方决策者、情报分析家和学者的挑战是穿透层层迷雾与阻碍，以辨别不同阵营实力的虚实。一直到现在，西方政策和企业菁英还对中国将追求和平崛起并模仿美国的发展信以为真。星巴克、麦当劳和苹果等消费者品牌在中国爆炸性地成长，更使这个观点坚强有力。直到最近才出现令人不安的迹象，显示一个更加穷兵黩武的中国可能悄然成形。某些有志之士已经开始反省过去四十年来没有根据的想法。

即使继续主张美、中应更亲密合作的人士也无法辩驳一个事实，即中国不仅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崛起，而且打从一开始，就是美国和西方协助中国完成其目标。这类援助有个主要源头，就是世界银行。世界银行高级主管 1983 年和邓小平主席会面时，秘密同意派出一组经济学家密切研究中国，前瞻二十年，为中国如何可以赶上美国提出建言。但是，援助并不仅仅限于一端。数十年来，美国政府慷慨地提供中国敏感的资讯、科技、军事技术、情报和专家咨询。事实上，由于多年来长期提供太多援助，以致美国国会在 2005 年抱怨竟然没有一本完整的帐册纪录。犹有甚者，我们没给中国人的，他们自己动手来偷。

然而，百年马拉松的力量在于它总在暗地里进行。借用电影《斗阵俱乐部》（Fight Club）里的话，马拉松的第一定律就是绝口不提马拉松。的确，几乎很肯定，北京不会有一份列举各项战略的指导计划锁在某个保险柜里。中国领导人们对马拉松早已了如指掌，白纸黑字写下来反而有曝上之虞。但是中国人现在已开始更公开地谈论这个概念——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就算美国现在开始急起直追，也为时已晚矣。

我在 2012、2013 和 2014 年三度走访中国，观察到中国人态度出现变化。我照例拜访中国主要智库学者，大家彼此相识已有几十年。我直接询问他们对“中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的看法——稍早前几年，这句话他们不是斥为无稽，就是不敢放言高论。可是，现在许多人高谈阔论此一新秩序，或说是中国的复兴，即将到来，甚至比预期还快。美国经济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时遭到痛击，中国人认为他们期盼已久的美国的衰落已经开始了，而且无药可救。

过去有一批人长期以来信誓旦旦地向我担保，中国只想在新兴的多极世界中扮演一个谦卑的领导者。现在同一批人竟然改口告诉我：共产党正在实现其长期的目标——恢复中国“适当”的世界地位。他们的话无疑是告诉我，他们过去骗倒了我和美国政府。或许不无一丝得意，他们的举动说明了美国有史以来最有系统、最为关键，也最为危险的情报大失败。由于我们浑然不知马拉松已经在进行，美国就要输了。

第一章　中国梦——洗刷百无屈辱

“天无二日，地无二君。”——孔子

习近平的复兴之路

习近平 2013 年 3 月就任国家主席时，美国的中国事务观察家还摸不清他是怎样的一号人物。中国的鹰派敬佩他，但是西方观察家普遍的观感是，六十岁的习近平头发浓密乌黑、面带温和笑容，是个戈尔巴乔夫型的改革派，有心扫除中国的老干部、最终实现这些观察家长期具有的信念：中国将成为他们殷切期盼的自由市场型的民主国家。但是习近平很快就展现他有自己的一套计划——中国将再度崛起、重返全球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宝座。这是毛泽东 1949 年建立政权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雄心壮志，这一年是中国领导人共同理解的百年马拉松的起始点。习近平撷取鹰派的口号“复兴之路”。原本只是民族主义者在喊的口号，现在变成这位新任主席的标语。过不久，大家就见识到它的意义。

《天演论》与《资治通鉴》

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一角，站着毛泽东 1949 年下令兴建的一座十层楼高的尖碑。由中国政府发执照、监管的正式导游通常不带外国人去参观它。即使西方游客走到这儿，也未必了解它是什么东西，因为大理石花岗岩上镌刻的中文并没有英文翻译。可是这块尖碑自始就代表了这场马拉松的精神。

网路上把这块巨碑通称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个巨碑真正要表达的是中国的悲情，是 1939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加诸于中国身上的“百年羞辱”——当年因为贸易纠纷，英国皇家海军炮轰中国海港，迫使清廷签订城下之盟。按照碑文的叙述，此后一百年的中国历史历经了中国人的抵抗、西方人的占领、漫长的游击作战，最后高潮是毛主席得胜建政，结束了西方对中国的压迫。至少它代表共产党政府的解读。

每天都有美国游客走过纪念碑，通常站在远处拍照留念，以示到此一游，可是他们浑然不知它要传递的信息，尽管它是直接针对美国人的。纪念碑成为中国民众爱国示威活动的中心之事实，还有另一层被我们忽略的意涵：中国的冤屈获得洗雪的日子即将到来。简单地讲，这块纪念碑完美地象征中、美两国的关系：中国正在疗伤止痛、伺机再起，美国却浑然不觉。

中国共产党崛起之前，中国老早就清楚知道自己在各国权力排序上的地位。十九世纪末，欧洲列强给中国贴上“东亚病夫”的标签，犹如他们给鄂图曼帝国取绰号“欧洲病夫”如出一辙。对中国许多知识份子而言，这个绰号可谓奇耻大辱，因此他们对外国人心怀怨怼也理

所当然。革命党人陈天华在 1903 年愤愤不平写下:“夷人称我为‘东亚病夫’,是野蛮、低等的民族。”这个溃烂的创伤要到中国夺回全球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地位,才有可能得以愈合。

二十世纪初,中国作家和知识份子迷恋上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作品。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和适者生存概念,激励中国人发愤图强,洗刷西方列强施加的凌辱。翻译家、学者和改革派严复,据信是最早将赫胥黎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htics)翻译为中文的人。但是严复犯了一个大错,把“天择”译为“淘汰”,它后来主宰了中国人对达尔文思想的理解。因此,不仅在竞争中的败者被视为弱者,他们也将从自然界或政治界被淘汰出局。严复写说:“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遗种也,则必强忍魁杰,矫健巧慧,而与其一时之天时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他又写说,西方认为“所有落后种族都该被优秀种族取而代之。”1911 年,现代中国国父孙逸仙的计划明白地以种族生存为基础。孙逸仙想像的中国对抗列强的斗争,是一种抵御白种人“亡国灭种”威胁的运动,因为他们想要征服、或甚至消灭黄种人。

1949 年,这种论述又被采纳。毛泽东的作品充满达尔文式的思想。对毛泽东的思想最有启发性的两位翻译家之一下结论说,只有黄种人和白种人这两大种族构成未来的斗争,且除非黄种人改变策略,白种人将“占上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在发现马克思的著作之前,已经认为中国的生存要依赖凸显中国人民独特特质的长期、激进的策略。如何在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中求生存,这个关键问题左右了中国共产党战略思维的发展。

红军在 1930 年代为躲避国民党的围剿展开“长征”,而毛泽东在长征期间身边只带了一部书,一部西方无可匹敌的治国方略手册。这部《资治通鉴》最重要的菁粹集中在中国战国时代各国彼此攻战杀伐时的谋略,其中包含的历史故事和格言警句可上溯到西元前四千年。其中有一段故事涉及到孔子,就深符达尔文的概念,即“天无二日”。世界秩序具有阶层性质。天下只能有一个最高统治者。

美国的中国事务专家犯的一个大错就是没有重视这部书。它不曾译为英文,直到 1992 年我们才透过《纽约时报》名记者哈里逊·沙兹伯理(Harrison Salisbury)得知,毛泽东不仅在 1935 年就喜爱这部书中记录的历史教训,而且直到一九七六年过世之前还反覆研读。邓小平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也读它。中国的中学生甚至有一本教科书《通鉴选集》,搜罗战国时期的许多史实典故,研究如何愚弄戏要敌人、如何避免被敌军包夹,以及如何引诱旧霸主骄矜自得,以待其荒废政务而有利于己。我们对此浑然无知。

毛泽东清楚引用达尔文的说词表示:“在意识型态的斗争当中,社会主义现在掌握适者生存的一切条件。”1950 年代,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经常谈到要主宰全世界,这番言词被西方人士讥笑为打肿脸充胖子,或只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无伤大雅的行为,本质上和艾森

豪威尔、肯尼迪迪、杜鲁门或尼克松等美国总统言之凿凿地说美国是全球最伟大的国家并无二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所谓的“大跃进”时期发出“超英赶美”的口号时，很少人理解个中意向的严重。

终毛泽东主政时期，美国情报官员都耽溺于自己的偏见之中。许多人认为中国人只想离群索居，是一个由一群狂热分子领导的半开化民族。全中国的街道上挤满了脚踏车、看不见汽车。中国的工厂甚至连电风扇也不会制造。中国罕有外人投资。毛主席荒诞的民族主义作法让西方感到荒唐的可笑：他召回中国驻外所有的大使。为了帮助农民，他命令军队出动杀光所有的麻雀，因为麻雀会吃稻谷。可是，“伟大领袖”似乎不了解麻雀也吃害虫。结果是中国的农作物惨遭虫害。

美国情报官员不相信中国不以屈居苏联小老弟为满足的报告。美国人认为中国有野心太可笑，如此落后的国家还胆敢梦想有一天与苏联较劲、甚至想和美国别苗头。但是有一群人没有在笑——他们是苏联领导人。他们比起美国人早早就看清中国的野心。有关百年马拉松的最早线索来自莫斯科。

谍对谍

一九五〇年代，中国公开归顺苏联，尊它为共产集团首脑。中国人装弱，寻求科技较为先进的俄国人援助与协助。但是毛泽东怎甘于屈居老二。苏联心里也有数。尽管苏联人畏惧、不信任中国，但他们更担心中、美结盟。因此他们向美国人传送假情报。

1961 年底，有个苏联公民安纳托利·葛里辛（Anatoliy Golitsyn）找上中央情报局赫尔辛基站长，表示他有意投奔西方。中央情报局协助他带着家眷从赫尔辛基飞到斯德哥尔摩。乌克兰出生的葛里辛四十五岁、KGB 少校，任职 KGB 战略计划处，后来派到苏联驻芬兰大使馆，化名伊凡·克里诺夫（Ivan Klinov）。从斯德哥尔摩，他再搭机飞来美国，带来苏联在西方间谍作业的情报资料。葛里辛被称为“安抵西方最有价值的叛逃者”，后来热门电视影集《不可能的任务》（Misssion：Impossible）有个角色即影射他。葛里辛也带来中苏关系的情报，它彻底影响到往后几年美国外交界和情报界的研判。

打从一开始，美国情报官员就倾向于相信葛里辛。他供出西方已经掌握的一些苏联间谍，因而展现他的可信度。他最重大的贡献是证实英国情报官员金·菲比（Kim Philby）实际上是替 KGB 效劳的双面间谍。

葛里辛也是阴谋论者，后来还声称英国首相哈洛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是 KGB 的线民。葛里辛的另一项阴谋论则与一则甚嚣尘上的传闻有关。根据这个传闻，中国共产党和苏共政治局意见严重分歧，都争着要当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葛里辛向美方保证，这则传

闻不实，是 KGB 炮制来骗美国人的谎言，以利中国人偷窃美方有价值的情报。葛里辛还预先提出另一个警告，声称有一天会有另一个苏联间谍投奔自由，此人将携来证物证明中苏分裂。不论他在什么时候叛逃来美，万万不能相信他。两年多之后，葛里辛预言成真。

1964 年 1 月，KGB 特务尤里·诺申科（Yuri Nosenko）在日内瓦和中情局人员接洽，不久就逃离苏联。他曾经替西方工作做双面谍、侦探苏联的情报，可是形迹败露，奉召调回莫斯科。诺申科自忖回国后凶多吉少、恐遭不测，遂投奔美国。到了美国之后，有很多说法与美方原先所相信的中苏关系状况大相迳庭。他带来的消息是中苏严重分裂——正好与葛里辛的保证南辕北辙。事实上，中苏不和严重到双方在边境爆发冲突，甚至有上升为全面开战的危险。诺申科声称葛里辛才是苏联派来的反间，刻意提供假情报给美国、以阻挠中、美结盟——中国可藉由和华府结盟，势力更加强大。或许最不祥的是，他声称毛泽东不仅有心主宰国际共产体系，还想掌控全球秩序。

这两个投诚者的说法如此矛盾，让美国政府莫知所从。一方面，两大共产主义国家交恶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美国会想要从中坐收渔翁之利。另一方面，美国人认为共产主义国家在意识型态上会互相支援，西方若是从中挑拨离间，反而会促使他们团结对外。美国情报界慢慢形成共识——不幸的是和往后数十年一样，一涉及到中国就研判错误。他们决定不采信诺申科的说词。

诺申科遭到隔离禁锢，要等到他改变说词才放他出来。可是，关了三年之后，他始终没有改口。最后，某些美国分析员才敢设想诺申科的说法——中美或许有可能结盟对抗苏联——或许是真的。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开始在全球上穷碧落下黄泉搜集这方面情报。我就在这个背景下被吸收。

进入中央情报局

1969 年，美国情报界最渴望有两样东西可以解决这个辩论。第一是能在 KGB 的反间部门（counterintelligence division）吸收到可利用的线民。第二是能有个人与苏共政治局高层接触。可惜，这两者都不可能。因此，为了解决中苏是否失和这个谜题，美国情报机关只能退而求其次。当时有个刚出道的研究生正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秘书处工作，而这个单位俄国职员奇多。

当时我年仅 24 岁，透过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教授的介绍，在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担任政治事务官员。虽然是个小角色，我却是这个单位里唯一的美国人。我因为曾在政府机关任过职，通过安全考核，经常与来自世界各国的联合国高级官员接触，我成了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亟欲吸收的对象。

四月份某个星期一上午八点三十五分，我站在第一大道和四十二街路口等候车潮疏散。挂着外交官车牌的黑色轿车排满整条街，让纽约市民怨声载道。两个月前到联合国总部秘书处担任政治分析员以来，这条路我已经走过许多次。然而，这一天，我的工作变了，我答应替美国政府当间谍。

我的两个接头对象——中央情报局的“彼得”和联邦调查局的“史密斯”——奉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之命，尽一切可能追查来自苏联的与中苏分裂有关的情报。他们并不在乎中国会是什么样的伙伴——可靠、古怪，或甚至危险。我的美国同僚只专注一点：我们可以如何运用北京作为对付莫斯科的棋子。计划进行一段时间之后，尼克森总统于 1969 年 8 月在加州圣克里门提（San Clemente）所谓的西部白宫主持一项会议，研讨亚洲的未来。

如果我脑子里存有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te）的恐怖小说或是詹姆斯·邦德电影里的间谍故事念头，现实很快就将我打醒。我的化名一点也不像 007 那么典雅而神秘。关于中苏问题，最深入的报告是中央情报局厚厚的两篇报告，题名分别为 ESAU 和 POLO。证据正反面皆有。基辛格的国安会幕僚对于是否应该与中国改善关系，也分为两派。大多数人支持坚守尼克松总统 1969 年 2 月会议中表示的观点，即中国是个比苏联更危险的威胁，因此我们需要部署导弹防御中国。直到 1969 年 11 月，今天闻名遐迩的对中国开放政策，在基辛格的顾问送呈给他和总统的报告里其实还是受到反对的。有人告诉基辛格说，尼克松或许想要访问中国，他一口就答说：“门都没有。”

我花了许多时间翻阅这些报告——它们对中国的企图心的描述令我瞠目结舌。我获知，从 1960 年至 1962 年，在中央情报局称为 IRON BARK 的一系列行动中，靠着一台 Minox 照相机偷偷拍下数千页的苏联机密文件。匪夷所思的是，这些文件透露，莫斯科军事首脑早已认为中国是和北约组织同样危险的军事威胁。我也获悉，联邦调查局在纽约有三个间谍作业，代号分别是 SOLO、TOP HAT 和 FEDORA，全都很可靠，且能接触到苏共中央政治局高层内幕。但是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要我去问直接由基辛格及其顾问所提出的问题，以便强化这些情报。

秘书处设在联合国总部三十五楼。我在那里认识了许多苏联官员，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身材圆胖、白发、外向的阿卡蒂·舍甫琴科（Arkady Shevchenko）*。当年 39 岁的舍甫琴科嗜酒如命，最喜欢马丁尼酒，他经常流连曼哈顿一家法国餐厅 La Petite Marmite。我常跟他一道吃午饭，听他嘲笑联合国定了一些虚有其表的规矩，比如不鼓励职员与母国官员交往等等。他笑着说，所有受雇于联合国的俄国人每天都到他在苏联代表团的办公室来分享情报、接受指令。

*译注：谢夫钦科后来于 1973 年成为联合国副秘书长，并于一九七八年投奔美国，成

为苏联叛逃至西方的最高层官员。

1969 年 4 月，我已经和他无话不谈，于是他告诉我一个月前才在中、苏边境发生的两次冲突，以及中国人干了什么好事。当时美国大多数情报官员还不知道有这件事。他说，中方伏击苏联部队，以此暗中掀起战端。舍甫琴科也告诉我，苏联领导人对中国人是又恨又怕，认为中国打算控制共产世界、进而主宰全球。数十年来，中方维妙维肖地扮演可怜兮兮的弱者、仰苏联鼻息而活，而今中国人竟然会如此直接挑衅苏联，让后者惊诧不已。

我特别记得有一次在联合国总部大厦北区代表会客厅和舍甫琴科喝咖啡闲聊天。他讲了一则有关中国未来的笑话，引得我捧腹大笑。笑话中，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打电话给尼克松总统。

勃列日涅夫说:“KGB 向我报告，你们有具全新的超级电脑，能预测到西元 2000 年的事。”

尼克松也不相瞒，坦诚说：“是呀，我们是有这样一具电脑。”

“那好，总统先生，你能告诉我到时候我们政治局委员都是哪些人吗？”

尼克松这一头沉默了许久。

勃列日涅夫忍不住，向尼克松大声说：“哈哈！你们的电脑没那么高明嘛!”

尼克松回答说：“不、不、不！总书记先生，它回答了你的问题，可是我读不懂。”

勃列日涅夫追问;“那是怎么一回事呢？”

“因为答案是中文。”

这则笑话之所以好笑，是因为它太荒谬了。人类的未来竟会属于连人民都喂不饱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落后地区，这谁能相信呢。但是机警的俄国人看到了我们视而不见的东西。我也和我单位里的其他俄国同事——叶夫吉尼·库托沃伊（Yevgeny Kutovoy)、佛拉迪米尔·彼得洛夫斯基（Vladimir Petrovski）和尼古拉·傅奇尼（Nicholai Fochine）——聊过许多次，他们全在不同场合向我提到同一个笑话。我觉得很好笑，一点都没想到个中玄机。

我花很多时间和库托沃伊交往，他在政治事务组上班，办公室就在我旁边。我们的上司彼得洛夫斯基日后出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托沃伊也出任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和谢夫钦科一样，他们似乎都喜欢和我聊天。当时他们都只有三十来岁，甚至乐于指导我中苏冲突历史、讲述中国人的奸诈。库托沃伊告诉我，基本上现代共产中国是苏联打造起来的，政府每个重要机关都有苏联顾问进驻指导。武器转移、军事训练和技术建议，无不倾囊相授，试图将苏联这个中国盟友现代化。可是，1953 年史达林去世，双方关系就开始变质。

库托沃伊说，苏联领导人现在认为中国人有个秘而不宣的梦想，即想要超越苏联，而且野心尚不止于此——他们下一个目标就是美国。中国不会甘于当老二。中国有自己的一套剧

本，也就是尽其所能、成为全球舞台的主宰。库托沃伊警告说，美国如果上了中国的当，苦头可就大极了。苏联人的告诫的重点是，中国受其历史野心的驱使，想要恢复高居全球各国之上的地位。他和他的同僚告诉我，从中国历史学来的教训告诉中国人要成为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必须把他们的意图隐匿到时机成熟时。他警告我说，美国若是提供军事援助给中国，必然自讨苦吃。他给了我两本俄国学者写的有关中国古代史的书，以资证明他的观点。中央情报局 1971 年一份报告引述我的一些发现，例如，我认为苏联早预料到尼克松总统会与中国重启关系，所以若纯只是外交接触，他们不会过度反应。到了 1973 年，莫斯科直接警告尼克松，美国若打算超越纯粹外交，而与中国建立军事关系，苏联将会动用武力。基辛格团队对此一问题有过辩论，而我打报告建议直接援助中国，并获得基辛格核准秘密进行。

我喜欢库托沃伊，发觉他的话有可信度。但那时候是 1969 年，我只有 24 岁。他听起来就像个死党谈起旧日女朋友，警告说她既然曾经让他心碎，将来也会背弃我。当时，中国的经济低迷无力，只及美国 GNP 一成左右。要说中国人会胆敢做梦超越美国，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华府官员听到的都是中国想要换舞伴。尼克松总统必须决定什么时候切入。这一来就开启了一段新关系，其后果影响之深远不是当时我们任何人所敢想像。

中国人计划宛如利用苏联一般来利用美国——表面上誓言合作、以对付第三者敌国，实际上借力使力、壮大自己。这就是冷战时期北京所进行的马拉松——中国利用苏联与美国敌对，榨取苏联援助，等到中苏失和，就转向美国联美抗俄。中国这一招即是三十六计里的“借刀杀人计”。

刘明福论“百年马拉松”

40 年之后，习近平接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之后不久（这是他出任国家主席之前的一道程序），他让我们更看清楚中国的根本意向。习近平以新职身分首次发表讲话，采用中国领导人在公开讲话从来没用过的字词：“强国梦”。

他的评论非常特别。中国领导人用字遣词极端小心，远超过西方政客，尤其是在公开场合。他们在公开讲话时避免“梦想”或“希望”这类字眼。这种带着感性的字词被认为是不踏实、不可靠的西方作风。可是，此后习近平一再在讲话中提到“中国梦”。根据《华尔街日报》头版新闻报导，习近平提到 2049 是实现中国梦的目标年——毛泽东在中国崛起及成立共产政府之后的一百年。

习近平这么说可不是不经意脱口而出。身为解放军退役军人、又是前任国防部长的秘书，习近平和中国军方的民族主义“超级鹰派”有密切渊源。我透过自己和一些听过习近平演讲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军人的谈话，发现他们立刻了解习近平口中的“强国梦”的意涵。

在阐述“强国梦”时，习近平提到一本原本默默无闻的书——在西方的确默默无闻——2009 年在中国出版的《中国梦》。作者刘明福是人民解放军大校，在培训未来将领的中国国防大学任教。我就在这里首次见到白纸黑字写下来的“百年马拉松”。

《中国梦》当下洛阳纸贵，成为全国畅销书籍。这本书只有一部分译为英文，它概述中国如何可以成为世界领导大国，超越并取代美国。它分析苏联为何不能取代美国，并以一整章的篇幅提到中国有八种不同的成功诀窍。刘明福采用的“百年马拉松”一词在全国引起回响——不过，“马拉松”是地道的英文字词。这个概念用中文来讲更清楚，就是中国要在“正义的”世界秩序里“复兴”，也就是书名所示“中国梦”。“复兴”这个字似乎与马拉松成了同义词，即从 1949 年算起要花一个世纪的努力。中国对于马拉松的终局有何盘算，既保密又敏感。它从来不说最后国家复兴了究竟会是怎么一个状况，只说它值得期待。

刘明福这本书主张要有一支世界级的军队来投射中国的全球领导力量。他宣称：“中国在 21 世纪的大目标就是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他预测说：“中、美之间的竞争不像‘决斗比赛’或是‘拳击比赛’，倒比较像是‘田径赛’。它像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刘明福认为，到了马拉松终点，统治者终将是地球上最众望所归、顺天应人的国家——中国。

刘明福于 2010 年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ABC News）记者访问，谈到这本挑衅意味十足的书时，坚守这本书的中心立场，但是他强调中国的竞争和最后胜过西方，将出于和平手段。但是能够直接读他中文原版书的我们，却清楚他书中的论调不是如此。刘明福大校暗喻研究美国弱点的重要性，要准备好在西方发觉中国真正的赛局计划时就出手痛击美国。刘明福也暗示中国领导人当中存在一个正式的马拉松战略，他称赞毛泽东“胆敢制订超越美国的大计划，声称击败美国将是中国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华尔街日报》2013 年揭露，《中国梦》在全体国营书店里都被列入“推荐阅读”书单。

其实，早在刘明福之前就有人提出“马拉松”的概念。比如，赵汀阳在 2005 年出版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逐渐在今天的中国主流思想中流行起来。赵汀阳的“体系”根据传统中国理想重新设计全球结构。新的世界称为“天下”（under-heaven），庶几近于中文的“帝国”和“中国”。中国事务学者威廉·卡拉汉（William A.Callahan）把“天下”翻译为以中国这个“优秀”闻名置于顶端的统一全球体系。其他的文明，如美国，只是“蛮夷”（barbarian wilderness）的一部分。作为文明世界的中心，中国有责任传播中国价值、语言和文化，以之“和谐”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藉此“改良”他们，让他们能于“天下”之中各安其为。这个帝国“重视秩序胜过自由，重视伦理道德胜过法律，重视菁英治理胜过民主与人权”。

我在赵汀阳声名大噪、享誉国际之后，在 2012 年 7 月于北京见到他。我请教他，若是

任何国家不肯依据中文的剧本走，天下体系要如何处理抗命不从呢？他答说：“很简单。《周礼》就说要维持四比一的军事优势，让皇帝可以确保普天之下人人同心。”换句话说，中国赢了经济马拉松之后，经济发展为美国的两倍大，中国可能必须透过军事力量来保卫它的新地位。世界最大经济体将需要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强大的军队，最终可以使美国的军事力量相形见绌。美国本身在 1860 年至 1940 年之间就是这么干。中国鹰派不仅研究美国战略，也从许多世纪之前的中国历及汲取教训。苏联外交官 1969 年在联合国总部提出警告，揭露北京有一套欺敌战术和长期的全球野心，现在果然成为事实。

第二章　战国时代——中国人究竟怎么想？

“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

消失的战国

研读中国历史时，我们看不到 1492 年或 1776 年这样的关键年代。中国丰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年以前。中国没有像亚伯拉罕得到应许之地那样的创始神话，或是颁布独立宣言那样明确的立国时刻。反之，中国的历史是在固定的地理疆界之内反覆发生的战争与分分合合——东为浩瀚大洋、北为险阻沙漠、西为崇山峻岭。朝代兴亡更迭，统治者来来去去。在中国人的思维里，数千年来就是如此递嬗不已。基辛格指出，“中国人的时间意识和美国人节奏不同。当美国人被问起某一历史事件时，他会提到某年某月某日。当中国人叙述某一事件时，他说那是哪一朝代的事。二十四个皇朝中，有十个的历史比美国整个历史还要长久。”中国鹰派没有迷失在他们长久、繁琐的历史里，反之，他们从历史的成败中汲取教训，以便用来赢得百年马拉松。

中国鹰派有些著作把焦点放在中国历史的一段奠基时期，即 500 年战乱不断的春秋战国时期。后半的 250 年从西元前 475 年起，终于秦朝统一六国（China 这个字即源自于“秦”）。春秋与战国这两个时期的中国都陷入军阀割据，充斥着外交上的钩心斗角以及血腥的公开交战。它是凶残、弱肉强食式的丛林世界，军阀相互结盟、彼此对抗，目标即是称霸。春秋时代，五霸相继登场，战国时期则合纵、连横两个集团抗争。对鹰派来说，这段历史是他们探索百年马拉松成功之道的宝库。

北京鹰派战略家长久以来即以战国为师，战国思想在相当大程度上界定了今天中国的战略决策。可是，美国的中国政策官员直到最近才了解此一事实——甚且即使今天，这个观点还未经美国政府普遍接受。我们数十年来对中国战略思维的无知，代价十分沉痛；我们的认

识不足导致我们对中国让步太多，以后见之明来看，这些让步彻底的愚蠢。

毫无疑问，美国的无知——广义而言即是西方的无知——至少一部分可归咎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从十七世纪至现代，来到中国、研究中国的汉学家、传教士和研究人员基本上都被导引去接受一套被编造出来的中国历史。中国人士刻意高抬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和平性质，淡化甚而完全忽略血腥的战国时期。此外，毛泽东发动“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中国共产党以摧毁和抹灭长久以来对中国风俗、文化、思想、习惯的记忆，来号召支持文化大革命，造成西方许多人认为中国已决定和前共产主义的过去完全决裂。

当美国决策者日益认识到中国的核心战略思想乃战国时代的产物之际，中国人近来对此也不再避讳。起先，只有鹰派提到这些古代教训。中国内部刊物最早开始在 1990 年代提起战国时代，美国情报机关拦截到中国人在官方公报及军事理论讨论中提到战国时代的事件和格言。1991 年，中国领导人秘密地引用战国时代一句格言“韬光养晦”。当含有这个字词的文件流传出来时，北京很隐晦、刻意低调地把它翻译为 bide your time，build your capabilities。但是考察其实际的历史背景，这句话指的是推翻旧霸主、洗雪前耻，但历史上只有一个新兴力量成功达成这个目标。美国许多专家起先并不相信这些说法，因为它与他们的先入之见冲突——中国侵略性的战略意图若是出自民族主义鹰派之口或之笔，就无庸挂怀，因为他们普遍认定这些鹰派只是边缘人士。

九大战略元素

大多数中国事务学者一般都认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确影响了它的现在，然而其影响力只是象征性的。可是，这些学者看不到中国政府内部的计划文件，这些文件显示中国是如何明白地运用古代的兵法原理。这些学者也没有接触到原先在中国政府内部位居要职的中国投奔自由人士。我四十年来与中国军方及安全官员的接触，或许会使我得出与中国事务专家南辕北辙的结论：我现在认为鹰派才是主流。温和派有时候看来悄悄地向鹰派顺服，仿佛他们受到党的纪律要求，不得泄露鹰派势力猖獗的任何迹象。

根据这些投奔自由者提供的线索，我开始研读中国高级将领和战略家所撰写的限阅文章，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如何以史为鉴，将战国时代的智慧结晶运用到今天，以助中国称霸。我发现中国领导人早就深受战国思想的影响。身为美国政府官方代表，我从 1995 年起每年都到北京参访，我得到许可进出有管制的国营书店，然后可以和一些书刊的作者谈话。这些书刊和文章显然皆获益于战国时代你死我活的斗争的历史经验。

199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出现一股很明显的趋势，研究战国历史的作家愈来愈多了。李炳彦少将*首开风气之先。30 多名解放军将领每隔几年就举办会议，研讨如何将战国时期经

典著作《孙子兵法》运用于当今之世，而我三度受邀以五角大楼学者身分参加会议并发表论文。中国鹰派把我当作也是鹰派，只是来自美国国防部；他们以为我们也熟悉战国的历史，结果他们当然错了。这一会议直到今天还在举办。2013 年 10 月我参访一家军方书店，很惊讶地发现两件事。第一、比起以前，明显出现更多钻研中国古代史的书刊。我问一位解放军军官，书店新辟的“仅限中国军官进入”那一专室，是否讲中国历史的书更多了。他开玩笑地说：“是呀！这些书不能让老外看，因为书里面的教训说得太直白。”

＊译注：解放军报社高级编辑，曾被聘为中国国防大学、石家庄陆军学院兼职教授，被认为是当代中国军事谋略学学科的奠基者。著有《三十六计新说》、《孙子谋略新论》、《隆中新对》等书。

我注意到，20 年前展开这项运动的作者们已成立社团和研究单位。最早的社团成立于 1996 年，最近的一个则是 2012 年成立。许多发起这些研究的校级军官已晋升为将级领导干部，而新一代年轻作者也接棒延续研究。

《战国策》在中国非常受欢迎，且其研究通常并不公开。它搜集了一些寓言故事，但从来没翻译为英文。它若是翻译成英文，当中国领导人引经据典以中国这段动荡时期的史事来高谈阔论时，更多美国人或许才会警觉中国人的心思。

学生上课会教到战国历史，其中大多取材自《战国策》，它被认为是治国方术手册。中国现代军事学者和政治哲学家看重这段历史远胜过其他朝代。21 名中国将领成立一个委员会，主张发行 19 册的《中国古代战略教训》丛书，它们皆取经自战国史事。今天中国政府内部许多文件使用的成语都来自于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斗争。

中国领导人今天所追求的马拉松策略——事实上已经进行了好几十年——大多是鹰派从战国时期所汲取的教训之成果。构成中国百年马拉松策略的九大战略元素如下：

一、诱敌骄矜自大，以攻其不备。中国人的战略是不应在时机未成熟时去挑衅强敌（如今天的美国），必须完全掩藏自己真正的意图，等候最佳出手时机。

二、收买敌方股肱之臣，以为己用。中国人的计谋之一即借力使力，强调争取敌人领导核心周遭有影响力的关键人士，使之为我所用。这一招中国对美国已经行之有年。

三、动心忍性，欲速则不达。综观历史经验，决定性的胜利从来不会一蹴而成。有时候要经历数十年审慎、步步为营的等候才能成功。今天中国领导人即深知小不忍则乱大谋。

四、不择手段，为战略目的不惜窃取敌人的概念和技术。中国很少忌惮西方式法律禁令和宪法原则，它明白支持为战略利益下手偷窃。偷窃提供相对低廉、迅速的手段，有助于小虾米对抗大鲸鱼。

五、军事力量不是赢得长期竞争最重要的因素。这或许说明为什么中国没有投入更多资源，去发展更大型、更强有力的军备。中国的战略并非穷兵黩武，而是巧妙地锁定敌方的弱点，以静制动。

六、霸权将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其地位。终战国时代，霸权起起落落，更迭不休。中国战略学者相信，当霸权——以今天而言，就是美国——的力量相对趋于式微时，绝不会甘心拱手让位。甚且，中国的战略认定霸主铁定会设法铲除所有实际的及潜在的挑战者。

七、慎察“势”的变化。下文将会更详细讨论“势”的概念。现在先说，“势”有两大元素是中国战略极重要的成分：一是拉拢敌人为己所用，一是守候最佳时机出手。

八、建立比较标准，以衡量自身与其他可能挑战者的优劣条件。中国战略非常重视评估中国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相对力量，而且不限军事范畴而扩及相当多层面。反之，美国从来没有试图这么做。

九、戒慎恐惧，以免遭合围或愚弄。中国领导人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总是认为其他所有潜在的对手都想骗他们，因此中国自然也不能诚实以对。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过于轻信他人的君主必将遭到覆灭。中国最恐惧的处境或许就是遭到包围。中国人玩的围棋首要之举就是避免被敌人包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欺骗敌人，并防止被欺骗。今天的中国领导人相信，相互竞争的国家基本上都亟欲包夹另一方，其目标与下围棋一样。

中国马拉松战略的许多最重要元素是由军方人员，尤其是鹰派所研拟的。上溯到 1920 年，即共产党当家执政之前的中国文官与武官之间的相互关系，高级的解放军将领在文官事务当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要了解它和美国制度有何不同，不妨想像一下：通常会由美国文人领导人负责的议题，譬如家庭计划、课税和经济政策等，有一天居然交由五角大厦的军事将领负责。你再想像一下，某一天美国没有了联邦最高法院及独立的司法机关，你大概就了解到我们的军人的权力受到相当大的限制。这和中国高级军事领导人在 1949 年以来的大权在握，有着天壤之别。

现代中国的第一位外交部长是个将军。我们现在从基辛格回忆录知道，要对美国开放的决定不是来自中国的文人领导人，而是来自四名将领的小组之提议。1979 年，中国一位武器设计师研拟出中国的一胎化政策。1980 年，衡量中国执行其马拉松战略进展情况的指标，是由人民解放军最主要研究机构“军事科学院”一名军方作家所设计出来。中国有关大战略最著名的一本书，书名就叫《大战略论》，作者吴春秋任职军事科学院。一名中国将领勾画出中国管理其能源资源的策略。中国的长期军事科技计划是在 1986 年由一组民族主义鹰派的中国核武器科学家推动出来的。

1970 年 6 月，我和美国政府里其他中国问题专家一样，对这一切浑然不知。那一个月，

我从一群美国准博士学生当中雀屏中选，前往国立台湾大学学习中文，那是我第一次亲炙中国文化和历史。两年的课程专注在中国文化上。我借住在华人家里，整天在研究室里，四位老师轮番上课。课程集中在一套中国历史古典著作的教科书，今天中国学生还在研读它们。我在这些语文教科书读到的成语故事，构成大部分华人世界观的基础，也提供我一扇窗子一窥中国人思想、历史和世界观之堂奥的窗子。这些教训我要经历往后数十年才得以充分理解。老师把中国传统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模式，一个是儒家讲究忠孝仁爱的世界，另一个是战国时期法家认定的弱肉强食的世界。中国人称之为“外儒内法”——表面称颂仁义，暗地里毫不手软。

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鹰派今天用一个寓言故事来形容美中关系。战国时期最有名的一则故事谈到楚与周这两个邻国相对势力的起伏，前者兴，后者衰。楚庄王与国祚已衰的周朝宗室在边界上阅兵，他忍不住问起周室王宫里的鼎有多大、多重。这次会盟的目的是让国势上升的楚庄王宣誓效忠、放弃称霸野心，但是当楚庄王问起周天子鼎的重量时，敏锐的周室代表王孙满责备他：“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庄王开口问鼎，已经不经意地泄露他有意挑战周室。

中国人对个中教训十分清楚：“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换句话说，别让敌人知道你是对手，除非时机成熟，届时他已制止不了你。在国际上，如果你是新兴大国，必须操纵主导的世界大国之认知，别让他先下手为强摧毁你。问起周室之鼎，楚王犯了战略大忌。

战国时期，后起之秀推翻许多霸主。每个案例上，成功的新兴大国都藉由隐匿“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而诱使旧霸主骄矜自满、荒废政务。新兴国家最大忌讳就是在最佳机遇点到来之前，就引起更加强大的对手的戒心。一定要等到争夺霸权的最后阶段，天子已经弱到无力救亡图存，且被其盟友背弃时，新兴挑战者才揭露真主意图。

依据《战国策》的记载，某些最聪明的挑战者甚至还能说服旧霸主不智地协助挑战者崛起。在这些案例中，挑战者经常说服旧霸主惩罚怀疑挑战者意图的近臣（“鹰派”），而拔擢挑战者能够操纵及合作的大臣（“鸽派”）。

《战国策》认为，自然的世界秩序阶层分明；没有统治者位居上端乃是过渡现象。今天的世界秩序当然不合北京的官方计划。中国的领导人宣称希望有个多极世界，并拥护美国领导群伦。换句话说，他们不要问鼎。

然而，事实上，他们认为多极世界只是走向中国独占巅峰高位的全球权力金字塔的一个战略过渡期。中国人称此一新秩序为“大同”，西方学者经常把它误译为“共和”

（commenwealth）或“和谐时代”。其实“大同”更适合译为“单极主宰的时代”。自从 2005 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和其他公开论坛大谈这种和谐世界的愿景。

中国的大战略有一重要元素来自西方人所谓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t）贸易行为——一种高关税、取得对天然资源直接控制，以及保护国内制造业的经济制度，其目的是要增加一国的货币储备。中国人拥抱重商主义。西方人认为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成功，已经使重商主义可以被淘汰了，但中国领导人并不接受这种看法。

由于拥抱重商主义，中国很小心要让贸易和市场永远能让它取得所需的资源。中国领导人有种几近歇斯底里的恐惧，深怕出现造成区域或全球资源短缺的危机。因此，他们决定到海外取得有价值的天然资源之所有权，或直接控制它们。这和十六、十七世纪欧洲重商主义的君王殖民新世界的作法如出一辙。这是《战国策》里的教训之一

战国时期另一个教训是，成功需要极其有耐心。美国企业重视每季财报，美国政客着重短暂的选举周期，而成功的股市策略家可能根据的是一天的交易。可是，战国时期新兴挑战者的故事告诉我们，胜利绝不是一天、一周、一年，甚至十年内可以达成的事。唯有跨越数百年的长期计划才能确保胜利根基稳固。因此之故，今天的中国领导人（自动可以蝉联两个五年任期，共十年）会订定跨世代的计划，甚至追求半世纪或更久之后才能实践的目标。

战国历史和其他民间故事里的中国文化英雄也都强调从对手窃取点子和技术的重要性。今天，中国的情报机关三不五时偷窃技术和竞争资讯，直接就转交给中国的企业负责人。许多美国官员认为中国近年来如狼似虎的经济掠夺——例如进行工业间谋或侵犯知识产权——都已经逐渐降低。其实大谬不然，它是从战国时期以来的战略思想所启发的大战略之一环。

中国情报机关的工作模式与美国的有天壤之别。在美国，政府提供美国企业情报以促进国家经济成长，被认为不道德，甚至不合法。我在美国政府担任公职逾四十年，从来没有听说过美国情报机关奉命以这种方式来提升美国的 GDP。没有错，美国驻外大使可以、也的确会协助美国企业在外国争取有利可图的合约，但绝不是政府以间谍手段直接提供偷来的技术和他人所有的资讯给美国企业。

我们不妨再看看美国人和中国人对军队的适当规模的看法有何差别。美国许多伟大的军事胜利是透过大量军力去赢来。格兰特将军以兵力多、武器精良战胜李将军。1944 年 6 月 6 日，艾森豪威尔指挥历史上最大的舰队抢攻诺曼底。即使在近年，所谓的“鲍威尔主义”）（Powell Dotrine）*也主张兵力需要远大于敌军。

＊译注：来自于前美国国务卿、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鲍威尔（Colin Powell）。鲍威尔主义主张，美国政府要正式发动军事力量需要满足两大条件：第一，首先要穷尽一切政治、

外交、经济等手段以求避免战争，并获得大多数美国民意支持；第二美军在数量与装备上都应享有绝对优势。

可是，战国时期并不讲究运用大型兵力。持续数十年的非暴力竞争是主要的斗争形式。有一个著名的战略是诱敌在军事上投入庞大开销，导致它民穷财尽。两千年之后，苏联崩溃，中方的解读是美国人故意诱使苏联在军事上砸大钱，以致破产。

2011 年，美国把将近 5%的 GDP 花费在军事上，中国的军事经费仅占其 GDP 的 2.5%。中国原先的战略是放弃发展全球投射力量的军队，维持出奇少量的核弹头武器，或许还不到 300 个。中国不跟美国比拚空军、海军的军备竞赛，它大量投资在不对称武器系统上，求取最大投资效益。中国在反卫星技术上一马当先，开发出反制隐形轰炸机的方法，大量投资于骇客技术，也兴建只花几百万美元的导弹，它们可用来击沉四十亿美元打造的美国航空母舰。这些导弹的造价很低，但杀伤能力很高，因为它们可能是以偷来的美国技术为基础制造的。

许多西方分析家搞不懂中国为什么没有建立更强大的军事力量以保护其本身和它的海上运输线。答案就在战国时期的教训：中国不希望被识破其问鼎于天下的野心。中国领导人认为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将会刺激美国，产生不必要的祸端。(从 1949 年至 1963 年遭受美国全面禁运，中国早已理解惹恼美国，会是多么痛苦。)他们认为中国需要的兵力水平是，大到足以支持经济成长，但又小到足以避免太早招惹美国霸权。然而，运用战国时代的原理，中国可以在长达数十年的竞争之最后阶段，决定抛开自我对军事开销的设限——如果它判断美国已经时不我予，无力回天的话。中国有关军事事务革命的写作已经有二十多年都在暗示突围而出的理想时间，这个时间仍在许多年之后才会到来。

如果战国韬略和传统美国世界观两者之间的差异，可以化约为一个单一的根本差异，那就是：美国人倾向于认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会随着竞争与合作之变化而时好时坏；但北京的假设是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政府心怀不轨而且表里不一。如果差异纯粹是因为中国无知而误解所引起，美国就有可能且应该要消除或减少它。不幸的是，事态并不是这样发展。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不信任，大体上是因为有深刻的文化根源，中国几乎所有的战略决定都受到它影响。因此他们对美国的不信任感不可能改变。

天下大“势”

中国战略的核心就是“势”，这是很难向西方人解释的一个概念。它无法直接翻译成英文，但是中国语文学家形容它是“力量的结合”或“事态的趋向”，唯有明察秋毫的战略家才能善

用它克敌制胜。同理，只有精明的敌人才看清自己在“势”之下的弱点。美国对华战略犯的大错就是看不清如何运用“势”。

美国通俗文化里最接近“势”的概念或许就是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充满东方哲学元素的《星球大战》中的“原力”。虽然不是完美的类比，但“势”代表一股神秘力量，让洞烛机先的领导人能因势利导，化被动为主动。《孙子兵法》＜兵势＞篇说“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实待之。”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了解“势”，就是想想《汤姆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中的汤姆如何诱导朋友替他油漆栅栏。他研究他们的心理、明了他们的动念，然后要弄他们替他做事。“势”有一个重要成分或特质称为“无为”，意即让其他国家替你做事。

“势”的概念相当契合中国人独特的世界观，因为它呈现了关于人类在宇宙的角色几近神秘的宿命论。人类与国家可以彼此互动并且影响事态的演进，但这些事态有它们自己的动能。“势”以复合动词出现时，意即“改变情势”、“提升军事威势”、“评估整体战略政治局势”或“寻求均势”。“圣人”——大略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家或有智慧的专业人士——的责任就是抢在对手之前洞悉“势”。

近年来西方学者才开始探索“势”的概念。1983 年，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罗杰·艾姆士（Roger Ames）也在翻译战国时代谈论治术的一本几乎无人听过的中文书——《淮南子》第九篇＜主术＞——时，首度试图界定它。＜主术＞英文版发行后，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跟进研究，连续发表七本书广为介绍“势”，主张它是独特的中国概念。他的主张引起左翼人士的批评，认为他犯了“他者化”的毛病，亦即把中国文化视为他者，因此是落后的。批评者宣称“势”一点也不独特。

于连并未孤军奋斗，有人跳出来替他说话，最重要的是中国军方人士。解放军作家们坚称“势”和中国战略哲学的许多其他方面的确十分特殊、绝无仅有。

我 1990 年代末期第一次在中国政府内部文件上读到“势”这个概念时，并不明白它的确切意思和潜在意涵，但我立刻察觉它攸关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思维。我去拜会艾姆士和于连。借重于他们对这个概念的诠释，对于那些一再提到“势”的中国军事和情报报告，我终于恍然大悟。

他们告诉我，“势”的概念受到道家息想很大的影响。道家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信徒希望与世间万事万物背后的驱动力——道——和谐生存。道家相信宇宙持续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这个信念以阴阳符记为代表——“势”的力量和两极也可以突然间逆转。中国军方作家经常提到“势”如何可以四两拨千斤，或甚至扭转乾坤。这一来就凸显出及早侦测变化的重要性，以及需要注意变化发生时出现的迹象。

艾姆士和于连说，“势”可以有数十种不同的翻译，比如“制造”或“促使”情势。其他翻译者称“势”是创造机会或创造动能。英文的“展开”（unfolding）和“推动”（nudging）也很接近这个概念。“势”有许多的应用。它用来衡量中国书法的品质，评估中国文学作品的吸引力，以及评估中国诗词的美学。于连和艾姆士也告诉我，“势”是哲学家所谓“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的一个范例。这套概念若放在其本身语文脉络之外的地方去思考，可能根本无法被理解。

毛泽东很喜欢谈“势”。他谈论中国战略的经典作品就大谈“势”，直到今天，中共党校和军校仍然必须研读它们。1978 年后的中文作品显示，某些战略家认为中国领导人在 1950、60 年代处理中、苏关系时，未能正确研判“势”。由于苏联发现中国想要僭夺苏联在共产世界的领导地位，中国没有办法从苏联取得更多的外来投资、贸易机会、军事技术或政治支持。鉴于处理中、苏关系时不能掌握“势”的错误，中国人在 1978 年后誓言在发展对美新战略时，绝不重蹈覆辙。

因此中国要找出方法哄骗美国政府提供技术、资金、政治支持，以及准许中国产品进出美国国内市场，又不让美国人察觉中国宏大的野心。北京有办法说服美国情报机关辅助中国，而非提防小心——KGB 就曾经喧嚷中国对苏联怀有二心。北京甚至说动美国保守派把中国视为对付苏联的伙伴、在美苏和缓政策（detente）上的伙伴，且并非真正的共产主义国家。

“势”——以及中国的大战略——有一部分在于收买人心、争取盟友以包围敌人，而且同时破坏敌人的同盟以防止被包围。中国自战国时期就称战略家为“纵横家”——出自战国时期两种主要同盟。“连横”是在地图上自东而西的一些国家之结盟，决定投靠霸主秦国，以享保护和合作之利。和它相对的是“合纵”，它由从北至南的一些国家组成，旨在对抗崛起中的秦国。这两个同盟相互斗争数十年，互以胡萝卜和棍棒争取盟国，还彼此明争暗斗。最后，“连横”以否认有野心取代他们，并诱之以近利，安抚了敌营。欺敌术成功地拆散和它作对的“合纵”，于是最强的“连横”霸主秦国脱颖而出，征服了“合纵”。今天，中国作家经常提到需要小心翼翼对付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但不能惊动美国人，让他们警惕有另一个同盟正在缔结中。

中国最著名的棋艺“围棋”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各国的合纵与连横。围棋的境界不在像西洋棋那样直接歼灭对手。围棋对弈的双方轮流在棋盘上布子，图的是包围对方的棋子。胜负的关键之一是诱使对手轻忽大意，乃至赍盗以粮，终而反被包围。

围棋赢棋的第二个关键是欺骗对手，让他摸不清你的真正方向和意图。要赢，你必须开辟新阵地诱敌深入，在隐藏自己的真正战略之同时包围对方。能够设计多个包围和反包围阵地，让对手看不清包围程度的棋手才能获胜，分数是依谁包围对手更多空间来计算。

如果你能想像正在下围棋，却不知道对手的战略包含相当重要的欺敌元素，你就多少能明白美国是如何被中国耍了。美国人根本不懂围棋的规则。我们绝大多数人也从来没听过“势”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不晓得我们正在输棋。事实上，我们根本不晓得比赛已经开始。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怪罪中国人老谋深算，以及像我和我的同僚这些人长久以来对中国的无知。

基辛格在其新书《论中国》（On China）中举出中国如何用“势”的五个例子，它们全都关系到中国如何处理战争与危机。明白“势”的重要性明显影响到他对中国的看法。他过去四本书谈起和中国领导人会面的点点滴滴，都没提到“势”，但是新书频频提到“势”。基辛格提出的警告，凸显“势”的一个重要面向，他指出中国视对美关系是一种“竞争性共存”（Combative coexistence）关系：“美国人到今天通常还把向中国开放看作是进入静态的友好关系。但是中国领导人对”势“的概念——了解世事难料、变动不居的艺术——早已耳濡目染”……在中国著作中，很难找到美国人口中合法的国际秩序一类被广为尊崇的词汇。可以找到的是一种中国可以透过某种竞争性共存找到安全和进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随时备战与共存的概念居于同样尊荣的地位。”

基辛格说，中国在 1979 年攻打越南即是出自“势”的概念：“广义而言，这场战争起自北京分析了孙子‘势’的概念——即战略地貌的趋势和‘潜在能量’。邓小平的目标是阻挡住，如果可能的话扭转他认为无法容忍的苏联战略攻势。中国后来达成此一目标，一部分是它的军队英勇作战，一部分是因为得到美国史无前例的密切合作。”

“势”关系到了解中国战略家如何评估特定情势下的均势，然后依据“势”如何流动而行动。这个评估有一重要部分依赖战国时期规划人员首创的量化尺标。中国人对“势”的认知有一点很特别，即这个字既可以作为谋士必须用来自我评估的测量概念，也可以是将帅或君主用积极行动创造或操纵的东西。

一般人对强调儒家思想、诗词书画的古代中国文化有个错误印象。他们总以为古人比较有创意和讲究哲学，但不擅长分析和数理。可是兰德公司研究员赫伯特·高德汉默（Hebert Goldhammer）指出，战国时期某些战略家可以只拿出量化计算给对手看，让他看到注定失败，就可以说服对手服输。量化计算在古代中国政治扮演极重要角色，它们在今天仍是如此。

中国军方和情报机关使用量化计算判断中国如何与其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做比较，以及需要多久中国才能超越他们。当我审阅一本好不容易才拿到手、由中国军事分析家写的书时，我很讶异看到中国估计全球实力及国家进展竟是那么精确。最惊人的发现是，军事力量在评比时占的分数不到百分之十。全球军力第二强大的苏联崩溃后，中国修改他们的评估制度，更重视经济、外国投资、技术创新和拥有天然资源的重要性。中国对国力的这些评估毫不含糊地预测，在经济成长趋势继续之下，多极世界将回复到单极秩序。中国领导人相信届时中

国将是领导世界的大国。

中国要达成此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势”的概念。北京把这个概念几乎运用到对美关系的每一方面上，正如汤姆的朋友根本不晓得被汤姆耍得团团转，美国决策者也一样不晓得被中国利用。赤壁之战

中国军事作品上最常引用的“势”的例子，首推发生在西元 208 年的赤壁之战。它完美地展现中国人此一另类观点，认为欺敌、利用敌人误判的策略理所当然、值得赞许。就和西方史上的温泉关（Thermopylae）*、坎尼（Cannae）**、阿金库尔（Agincourt）***或滑铁卢（Waterloo）战役一样，赤壁之战是中国军事史和传统的重要记事。直到今天，赤壁之战和与它相关的一系列欺敌之术仍受到中国军事领导人的研究，也在教科书和小说中受到讨论。

＊译注：发生于西元前 480 年的波希战争，地点位在希腊半岛中部的温泉关，对峙双方是波斯帝国大军与斯巴达列奥尼达（Leonidas）率领的希腊城邦联军。结果斯巴达三百壮士为死守温泉关，壮烈牺牲。

＊＊译注：发生于西元前 216 年的第二次布匿克战争（Punic War），地点位在意大利西海岸的坎尼，对峙双方是汉尼拔率领的迦太基大军与罗马共和国的军队，结果汉尼拔大胜。

＊＊＊译注：发生于 1415 年的英法百年战争，战争地点位在法国北部的阿金库尔，英王亨利五世领导的英军战胜法国军队。

赤壁之战中，南方力量较弱的吴国与蜀国筹谋对抗北方较强大的魏国，因为双方都竞逐控制整个中国。战役开始时，北军统帅曹操率领百万雄师部署在长江北岸，兵力远胜过诸葛亮指挥的南军。可是，北军大多不习水性、不善水上作战，因此初步交战北军失利，南军得以控制水路。随后双方奇计纷出。每一招欺敌之术都有一句成语作为代表，详细记载在中国通俗小说《三国演义》中。

霸主曹操想要扳回一城，派曾经是诸葛亮盟友周瑜童年好友的一名手下过江拜访，设法说服周瑜投降。这位北方密使到了南军营区，伪装只是来访友叙旧；可是周瑜本身就是欺敌高手，识破老友心机。他设宴款待这位旧友，假装开怀畅饮。夜里，周瑜假装醉酒，留友人和他同帐共眠，预期他会搜索四周。周瑜伪造北军两名水师将领的信，摆在桌上；信中他们谈到在曹操幕下如何当间谍。果然，这个密使找到这封信，偷了它、赶紧回到北军营地。曹操展阅伪信后当然勃然大怒，立刻下令把两名水师骁将斩首，因而挫弱北方相对实力。周瑜和诸葛亮脱离险境，制造出新“势”。

在另一场欺敌计中，诸葛亮请教另一位谋士庞统如何才能击败曹军。两人计议好派人假装投向曹营，说服曹操把强大的木船舰队绑在一起，使之易遭攻击，以便一举摧毁敌人最强

大的武力。庞统先假装表示有意叛离南军。北军一个特务闻讯之后表示愿协助他投向曹营。庞统假装喝醉酒，无意间评论北军不习水性，易晕船，哪堪一战。诉诸敌人的恐惧总是高明的诈术。由于曹操已经担心部队晕船，果然中计，向庞统请教如何破解。庞统的“解方”是把三十至五十艘船以铁炼绑在一起、稳住摇晃的船只，然后各船之间搭木板相通。曹操上当，接受建议。他没想到，只要一艘船起火，会波及整支舰队。这里头的要点是，有时候可以用计说服强敌不用他最强大的优势来对付你。

接下来，赤壁之战正式开打。作为战略教训，关键是南方领导人如何评估“势”。诸葛亮非常注意气象，预测将会刮起东风。当智者察觉“势”已成熟，就必须剑及履及、断然行动。诸葛亮下令当天夜里展开攻击。东风助势，加上铁炼锁住船只，曹军舰队立即陷入火海。霸主惨败。

今天中国各地到处可见到“战神”庙。*他在赤壁之战当天大展神威。曹操失去强大的舰队，穿越树林而逃。他在中途几次停下休息，还骄傲地嘲笑诸葛亮不过尔尔，他还是能够逃走。曹操判断敌军会守住主要道路，放火只是要阻止他走这条路。他又上当了。

在赤壁之战的最后阶段，中国历史上最老奸巨猾的战略家终于分出胜负。诸葛亮预料到曹操的思路，因此没把部队放到大路，而部署在小径。沿着羊肠小径几次伏击，曹操只剩下三百兵马，但他仍然设法突围。他自认已经安全，又笑起诸葛亮的不智。不料他又再次遭到伏击，终于彻底战败。

曹操虽统领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一支部队，却被诸葛亮一连串妙计摧毁。他被一个比他更聪明、几近超人之智者的机关和诡计所败——这位圣人侦测到机会之窗，且掩饰他的意向。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今天中国民族主义的军方鹰派讨论赤壁之战的评论里，充满这一论调。

＊译注：作者指的显然是诸葛武侯祠。

小结

无数作者评论诸葛亮在赤壁之战所用的技巧是一连串漂亮出击的结合：审慎评估局势、善用诡计、部署精锐部队进行决定性打击、拉拢敌营中怀有二心的人士，以及组织战略同盟并孤立敌人。反之，曹操未能发挥这些要点，以至于输掉他发起的这场战争。两位中国著名的军事作家强调，赤壁之战的胜方采用“以静制动”（wait and see）战略，以待有利时机。也有人说，情报间谍有助于掌握局势——敌人因内部不和自我毁灭而开始衰退的那一刻，因此提供了理想的进攻机会。

对今天的美国人而言，战国时期留下的一个教训应该是，我们被中国人认为也有战国时

期的策略。中国的战略思想并没说只有中国才有战国战略。我们长期以来认为中国鹰派没有力量、是边缘的狂热者，这种观点妨碍我们的理解。当中国预期美国会像一个侵略性的霸主行动，渴欲维持它的主宰地位时，这会产生危险的后果；当美国反而推动和解、联合国宪章，以及民主和人权时，中国起了疑心。美国人究竟要的是什么？或许中国的温和派和改革派里的确有些人了解美国用心良善。可是，鹰派只看到美国要诈。

第三章　唯有中国才能走向尼克松

——中美建交与美国的秘密援助

“联吴抗曹。”——《三国演义》，西元 200 年

引自 1969 年呈给毛主席的报告

毛泽东与四大元帅的密会

多年来美国的历史教育都告诉美国民众，尼克松总统于 1971 年开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互动关系是非常高明的战略举动。雄才大略的尼克松，偕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相信美、中同盟可以增强美国地位，以对抗美国的心头大患苏联。历史呈现给美国人的印象是：棋艺高手尼克松预见到好几步，在中、苏国际斗争中坐收渔翁之利。

当然美国对中国开放是相当高明的一招。美国也有正当理由在冷战居于高点时推动美、中结盟抗苏。但是许多人忘了——如果他们曾经知道的话——美、中开放实际上不是出于尼克松或基辛格的主动。尼克松上台后头几个月，他们的焦点摆在改善对苏联的关系。他们并不想与中国结盟而激怒苏联。从许多方面来讲，不是尼克松走向中国，而是中国走向尼克松。

针对每一位美国总统，北京的策略似乎都能挥洒自如——精准评估华府政策辩论中首脑人物彼此之间歧异，并不断进行战术调整。中国领导人在评估与美国交往的“势”时，得益于战国时代认为极其重要的因素：在敌人阵营潜伏了地位相当重要的间谍。

在中央情报局任职四十年的金无怠，1985 年被控数十年来替中国担任间谍。金无怠被控将美国无数的有关中国之机密文件交付给中国政府，他在 1986 年对这些罪名坦承认罪。金无怠在向法官认罪时宣称，他这么做是为了促进美国与中国的和解、修睦。不久之后，，警卫发现他在牢房中窒息身亡。金无怠似乎向法官承认，他把我们的计划和弱点泄露给中国政府，北京才能尽情地予取予求。

反之，美国从来没有类似位置的线人可以直接深入地侦察中国的战略思维。由于我们也接触不到中方内部政策文件，本章试图藉由检视美国方面所研判的中国之盘算，以及其他公

开资讯，来探索直到里根政府任期终止时，中国领导人对与美国恢复邦交的背后企图。

和美国不一样，中国没有公布过、也不可能会公布其官方内部纪录，以显示中国领导人是如何从尼克松至奥巴马历经八任美国总统，争取到一切重大的经济、军事，和外交政治援助。可是，北京的确呈现一贯的战略作法，这在中国学者的访谈和文章中大体得到承认。第二章列举的中国战略九大元素，帮助我们更了解中国过去及未来可能的行动。运用计谋、“势”、耐心和避免被苏联包围，全都很明显。特别是，中国战略这九大元素指导中国过去数十年赢得美国的支持，提升了中国国力。

一般普遍认为，在 1960 年代末期中国胆大包天的野心已被苏联洞悉，而且它和苏联已濒临军事冲突边缘，中国要寻找新的靠山。要如何交好美国——或者更准确地说，与美国暂时结盟——毛泽东向军方问计，没找外交官商量。

许多美国人不相信中国鹰派的影响力。他们惊讶地发现是军方秘密规划中国的对美开放。1969 年春天，毛泽东召见解放军四名元帅——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和叶剑英；他们都想结束中国十多年来的消极被动，希望能挺直腰杆对付苏联的威胁。这四位元帅以一句中国古谚“坐山观虎斗”归纳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战略。换句话说，他们相信美国在等候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吞噬另一个国家，这还是受到战国思想的启发。

1969 年 5 月，毛泽东要求他们进一步提建议。根据基辛格的说法，四名元帅的机要秘书记下他们讨论，“从战略角度思考，中国是否应该打美国牌，以防苏联大规模进犯中国。”陈毅建议大伙研究斯大林 1939 年与希特勒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先例。

另一位元帅叶剑英引述“赤壁之战”南方主帅诸葛亮的策略，建议：“我们可以参考魏、蜀、吴三国鼎立时诸葛亮的战略指导原则：‘联吴抗曹。’”

几位元帅的看法是，美国深怕苏联征服中国：“美帝最不乐见的一件事就是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得胜，因为这将”使得苏联“建立起人力和资源都比美帝更强大的帝国。”

陈毅指出，美国新任总统尼克松似乎亟欲“争取中国”。他提出自称是“狂想”的建议：把美、中对话提升到部长级或更高层级。根据基辛格的说法，陈毅还提出最革命性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放弃台湾必须回归中国大陆这个长期以来主张的先决条件。陈毅认为：

第一、华沙会谈“大使级会谈”恢复时，我们可以采取主动，提议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层级会谈，以便解决中美关系基本的相关问题。

第二、中美更高层级的会谈具有战略意义。我们不应该提出任何先决条件……台湾问题可以在高层级会谈逐渐解决。再者，我们或许可以和美方讨论其他战略意义的问题。

中国依然称美国为其敌人，形容尼克松若访问中国乃是中国“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强化我方”的作法。换句话说，美国只是中国可资利用的工具，不是长期盟友。依据这个原则

运作，北京传递秘密讯息给尼克松和基辛格：既然尼克松总统已经访问过贝尔格莱德（Belgrade）和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等其他共产国家首都，北京也欢迎他来访问。这个讯息没有暗示信赖或未来合作。

中国还未发布内部文件证实它决定和美国接触的原因，但是几位中国将领已经告诉我，毛泽东狡诈地接触尼克松政府是辨识及驾驭“势”的鲜明实例。还有人告诉我，毛泽东一度加码他的行动，因为 1969 年 8 月 28 日西北的新疆边界爆发冲突。这时候基辛格已下了结论，恢复和美国接触已成为北京的“战略必要”。我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听到苏联版本的攻击事件之说法，赶快传递给我的接头对象彼得和探员史密斯，请他们转呈给为了和中国接触会有何危险仍争论不休的国家安全会议。

1969 年，毛泽东正确地评估到“势”要中国脱离苏联轨道，改与西方结盟。毛泽东采取两个行动加快改变步调。第一就是邀请尼克松访问北京。第二就是没有示警，相隔不到几天就在靠近苏联边境地区试爆两枚威力强大的氢弹。这个动作有一石二鸟的作用：一则是展现北京的力量，一则是向美国发讯号，告诉华府中国想要脱离苏联轨道。

毛泽东发现美国人还不明白他的意向，又在 1970 年 10 月 1 日祭出坚定反西方的共产党人相当罕见的动作：他邀请著名的美国新闻记者兼作家艾德加·斯诺（Edgar Snow）和他并肩站上天安门城楼阅兵台，又安排两人的合影遍发到全中国。毛泽东发给他的贵宾一个讯号：欢迎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这是很令人惊讶的邀请——是中国政府数度示意后又一最新动作。基辛格承认华府依然不解风情，不明白中方发出的讯息，或者至少是不了解北京的诚意。美国政府太忙于本身的利益和战略，顾不了中国的状况。因此，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起于一个神话。尼克松并没有先向中国伸手，而是中国，特别是毛泽东，拍板决定向尼克松伸手。美国人起先根本浑然不觉。华府也不知道中方文件称美国为敌人，把它比拟为希特勒。

打动尼克松

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思考对中国大战略时，我也在这出大戏中扮演一个小角色。1969 年秋天，我在情报机关的接头人彼得和史密斯探员，要我向基辛格的幕僚简报我在联合国秘书处替美国当特务所搜集到的情报。我和基辛格的高级顾问谈话时，察觉到他们对中国事务意见严重分裂。国家安全会议两名幕僚何志立（John Holdridge）和宋贺德（Helmut Sonnenfeldt）写的备忘录明白赞成和中国接触，一点都不怕苏联会过度反应。另两位幕僚莫理斯（Roger Morris）和海兰德（Bill Hyland）则恰恰相反。莫理斯和海兰德深怕美中结盟会不必要地激怒莫斯科，严重伤害政府正在推动的与苏联和缓的政策。四位美国资深大使已经亲自面见尼克松，警告他：美国若与中国开敌关系，莫斯科可能以停止对美之和缓及武器控制作为回

应。这些意见不同的备忘录正好说明为什么尼克松和基辛格对于向中国开放迟疑不决长达两年之久。他们必须由中国来再推一把，也受我从联合国俄国官员得到的情报之影响——这些俄国情报显示，莫斯科不会取消和缓，其实还预期美国会接受中国结盟的计谋。谢夫钦科和库托沃伊正是如此告诉我。

我的证据似乎为打破此一僵局略有贡献。我转述迄今我所搜集到的情报：中苏分裂货真价实；苏联预期我们会和中国开启关系。我的报告也经其他人证实，即谢夫钦科等高级外交官已经认定尼克松会和中国改善关系到某一地步。他们只怕尼克松会走得“太远”，和北京建立军事关系——这件事当时根本还未浮上台面。我强烈主张——我也希望有说服力——中美结盟。基辛格后来还寄给我一份谢函。

但是当时还有其他因素促使基辛格、以及最后尼克松总统走向北京。基辛格还在试图澄清中方意向时，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参议员也想到中国访问。中方甚至在基辛格 1971 年 7 月秘访北京时，向他提到此一可能性，这一点符合战国时期操纵鹰派与鸽派的作法。

尼克松的反应果如中方研判，他指示基辛格要求中方，不得在他访问中国之前邀请其他任何美国政治人物到访。尼克松有很好的理由相信肯尼迪企图抢走他的光彩，成为第一个访问北京的美国政治人物。肯尼迪公开演讲提起和共产中国恢复邦交的可能性，明显是要替 1972 年参选总统铺陈外交政策政纲。

另一个因素是中国涉入到越战。自从 1950 年代起，中国就供应武器、补给和军事顾问给北越。中国近来已减少对北越的军事援助，甚至大量减少借道中国、送交北越的苏联供应。这使得尼克松政府相信更应该与亲中集团接近。尼克松访问北京时，毛泽东又让他服下定心丸，告诉总统说，他乐意排除中国对美国的一切威胁；

目前，美国发动侵略或是中国发动侵略的问题相当小；可以说这不是大问题，因为目前的情势是我们两国之间并不存在战争状态。你想要撤回一部分军队回国；我们则不想要派兵出国。

基辛格认为这句话表明中国不会派部队出国，降低了美国深怕中国会像 1950 年介入韩战一般也介入越战的顾虑。毛泽东正确地研判到美国思维里最牵挂的就是这一点，他要诱使美国人放心。

1971 年 7 月，基辛格秘访北京开启了历史的新页，这是毛泽东的长期计划的第一项具体成绩。中方羞于启齿承认苏联的威胁使他们向美国投怀送抱。周恩来闪闪烁烁地提到“我们北方邻国”和“另一个超级大国”。中方也没有主动倡议讨论苏联威胁的议题。他们是真的那么怕遭到攻击吗？

基辛格同年 10 月第二度访问北京，周恩来在实际议程上列了六大议题，但是刻意把苏联摆在最后一项。中方宣称他们不反对美苏改善关系之后，基辛格研判他们故作勇敢状，隐藏他们对苏联威胁的畏惧。基辛格警告周恩来，莫斯科“希望在欧洲能脱身，才能集中注意其他地区”。“其他地区”指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即使在当时，也偶会出现中国视美国为障碍，而非盟友的迹象。周恩来在提到美国时，透露出中国人对新交的朋友真实的感觉。

周恩来对替基辛格翻译的中国外交部官员冀朝铸说：“美国是一霸。”这个词语也经常出自毛主席及他的接班人邓小平之口。

懂普通话的美国政府官员——人数不多、但已逐渐增多——都晓得许多中、英文词语无法完全翻译出来。译员经常必须决定每一方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基辛格的翻译员告诉基辛格，周恩来这句话意思是“美国是领袖”。这似乎是无恶意的评论，摆在冷战脉络里，甚至还可说是恭维。但是中文里“霸”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霸”从中国战国时期即有特定的历史意义，“霸”对已知的世界提供军事秩序、使用武力扫除敌人，直到“霸”本身被另一股力量推翻。“霸”比较正确的翻译是“暴君”(Tyrant)。战国时期，至少出现五霸。他们此起彼落，每个新的挑战国在持续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竞赛中殚精竭虑、阴谋筹划取代旧霸主。这导致我们不免要忖想，如果当天基辛格听到的是中国人没把美国当作领袖，而是一个暴君，美国对中政策不知会有什么转变。直到今天，我们还必须厘清此一关键误译的结果，并且与之共处。

若干年之后，我有机会和冀朝铸大使谈话。他写了一本相当絮絮叨叨、钜细靡遗的回忆录《毛身边的人》(The Man on Mao’s Right)，对中国外交部如何看待对美开放提供罕有的内幕，但是书中完全未提到他如何把“霸”的概念翻译给基辛格听。我请教他，他用的英文“领袖”这个字在中文的原始意思就是“霸”吗？

我请教：“你告诉基辛格博士‘霸’是什么吗？”

他答说：“没有。”

“为什么？”

“他会不高兴的。”

如果基辛格了解周恩来的“霸”的意思——如果他了解中国如何真正看待美国——尼克松政府对中国或许就不会那么慷慨大方。尼克松政府旋即多次表示愿意秘密军事援助中国，但这全是依据错误假设的结果，以为美国是在和中国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而非因“势”所需的短暂结合。或许如果美国分析人员得知反美鹰派的观点，中国把美国视为暴虐“霸”的认知就会让华府心生警惕。兰德公司 1977 年就有一份研究报告提出警告，自从 1968 年就有

证据显示，中国领导圈内有一个强大的反美集团，他们用成语批评美国绝对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周恩来和基辛格这番谈话的两个月后，尼克松访问北京已近在眉睫，基辛格对中方首度提出秘密援助。外界当时浑然不知，若是知道美国如此援助、教唆人民解放军一定大为震惊。基辛格把印度针对巴基斯坦进行军队调动的详尽机密情报交给中国，又说美国“赞成中国支持巴基斯坦，包括声东击西式调动部队”。基辛格要求的回报是，中国部队在印度边境调动，以便印度分神、不遑入侵及瓜分东巴基斯坦。中国部队并没有配合调动，但美国也没因此就沮丧。

1972 年 1 月，尼克森批准基辛格的副手黑格（Alexander Haig）向中方提议另一个秘密方案。黑格率领先遣小组为一个月之后尼克松即将展开的历史性访问打前锋，他承诺美国将具体与中国合作、对抗苏联。黑格告诉周恩来，一旦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爆发危机，美国会试图“抵销”苏方沿中国边境的威胁，并且“吓阻”针对中国的“威胁”。以秘密交易而言，基辛格和黑格最早这两个提议只是战术性质。但是它们代表在美国对中国全面禁运二十年之后，政策的大转向。最重要的是，它们暗示还会有更多援助源源而来。

秘密援助

1972 年 2 月，毛泽东和尼克松面对面坐下来一谈，中国把它的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毛泽东把他当年对付苏联那一套又搬出来表演给老美看：中国无辜又脆弱，是嗷嗷待哺、需要大国保护的小国。毛泽东私底下谈起美国人时表示：“他们会关心我？那是哭耗子假慈悲！”毛泽东甚至让美国人下不了台，声称他们站在中国肩上去打莫斯科。

多年之后，基辛格回想在和中国官员沟通时，他感受到那种明显的不确定感：

美国“反霸”的承诺是个骗局吗？一旦中国放松戒心，华府和莫斯科是否会勾结来解决中国？是西方骗了中国，还是西方自欺欺人？总而言之，最实际的结果是把苏联这个“祸水”向东推向中国。

为对抗这些可能的观感，尼克松向毛泽东保证，美国将反对苏联针对中国的任何“侵略行动”。他表示，如果中国“采取措施保护其安全”，他的政府会“反对他国干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行动”。

尼克松在北京拜会其他领导人的同一天，基辛格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简报苏联部队沿中苏边境部署的状况。耶鲁大学教授保罗·布瑞肯（Paul Bracken）在他 2012 年出版的专书《第二核子时代》（The Second Nucluar Age）首度指出：中国在这次简报中获知苏联核武锁定中方目标的资讯，叶剑英对此表示：“这显示你们诚心希望改善双

方关系。"这次简报也讨论到有关苏联地面部队、飞机、导弹和核武力的细节。基辛格的中国事务重要助理温斯顿·罗德（Winston Lord）晓得，白宫认为苏联可能很快就会"听到"美中这次交换讯息。莫斯科果真很快就知道了。

毛泽东强调美、中应该合作对付苏联这个"混帐东西"，他也力促华府应该与盟友更亲密合作，特别要维护北约组织的团结。毛泽东也力主美国建立包括欧洲、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和日本在内的一个反苏轴心。对苏修霸权反包围，乃是典型的战国时期作法。美国人没有了解的是，这不是永久的中方政策偏好，只是两个国家战国式的权宜合作。毛泽东在 1972 年时究竟怎么想，我们一直要等到二十年之后中方出版一本回忆录时才得知个中玄机。

基辛格并不以为意，他告诉尼克松说："除了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球观点或许跟我们最接近。"基辛格似乎并不怀疑中国的战略。

可是，中国对美国仍然抱持猜疑之心。中、美双方峰会结束后签署的《上海公报》是双方理解的重要文件。基辛格认为《上海公报》代表"在亚洲围堵苏联扩张的一个心照不宣的同盟已经形成"，中方并不以为然。《上海公报》说：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协力厂商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如果尼克松政府希望与中国成立准同盟，中国的讯息似乎是美国还需要再加码。因此，尼克松政府在 1973 年 2 月的北京会谈又提出秘密援助中国之议。它也提出明白的安全承诺，中、美双方要找出合作方式，最好是能够吓阻莫斯科，至少也要引起苏联注意。基辛格告诉中国人，尼克松希望"（和中国的）关系紧密到令人相信若是攻击（中国）就会涉及美国相当的国家利益"。这是一种象征性警示线的概念，有如美国在南韩及西德部署部队，以示美国在某种状况下会涉及到"相当的国家利益"。基辛格没有承诺美军长期部署在中国北方边界，但是他希望能造成轰动。这也是毛泽东手下将领 1969 年建议他向尼克松争取的：向莫斯科明白地表态。

基辛格甚至替这一策略定出时间表。他告诉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对中国而言，"最危险的时期"将是 1974 至 1976 年之间，这段期间苏联将会透过和缓及裁减军备、转移军事部队，以及发展其攻势核武力，完成"绥服"西方的工作。基辛格希望届时警示线已经到位。

下一个秘密援助——尼克松和毛泽东首次会面以来的第四个、也是基辛格首度秘访中国以来的第六个——承诺美方给苏联的任何援助，中国也将一律比照办理。尼克松即将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 1973 年 6 月进行高峰会议，基辛格先向中方承诺，"我们预备和苏联做的任何事，我们也预备和人民共和国来做。"事实上，美国愿意给中国比苏联更优惠的条件。

基辛格说："我们可能准备与人民共和国做些还未准备和苏联做的事。"

大约这段时候，尼克松写了一封短笺表示"美国绝不会与苏联参加依据"防止核战争"协定有关冲突的联合行动……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当事国的话"。在此同时，他决定绕过美国法令规定，透过英国提供技术给中国。

第七个秘密援助最为敏感，保密三十年，连中央情报局都被蒙在鼓里。它发轫于我在 1973 年 10 月目击的内部辩论，当时的辩论是，美国是否要加强对北京原本含糊的承诺，并做出具体行动以巩固中国，还是停留在口惠而实不至的水平？美国可以和中方建立"更具体的安全了解"，或是只承诺在双边外交关系正常化上做出重大进展。两者都有坚强的理由。

那一年我在兰德公司任职。因为我是中国问题专家，与基辛格关系密切的同事理查·莫尔斯汀（Richard Moorsteen）提供我基辛格与中国领导人对话的机密文件。安德鲁·马歇尔（Andy Marshall）和佛瑞德·艾克尔（Fred Ikle）两人聘我到兰德公司，而艾克尔旋即被尼克松延揽为武器控制暨裁军署署长，旋即离开兰德公司。1973 年，艾克尔几度邀我到裁军署见他，讨论我对中国的分析，也起草了一份情报及警告技术秘密合作的计划书给基辛格。

我认同艾克尔的见解，赞成美国具体地与中国秘密合作。虽然艾克尔告诉基辛格，不宜有"正式关系"（即正式缔盟），不过华府可以单方面提供"技术性质"的协助。美国可以设置"热线"作为掩饰，若是苏联针对中国有军事行动，华府可以秘密地提供北京预警资讯。艾克尔和我在一份备忘录写下："鉴于中国大部分战略部队仍将由轰炸机组成，他们可以利用提早几小时的预警大幅降低其部队的弱点。热线或许让我们可以传递苏联来攻的警告，这可以是强有力的论据。"我们也主张华府卖给北京硬体和技术，让中方可预知苏联即将发动攻击；我们也支持提供美国优异的高解析度卫星照片，以增加中方锁定苏联目标的准确度。

基辛格同意我们的提议。只有少数人知道他提议美国与中国具体秘密合作。1973 年 11 月，基辛格在北京告诉中方，万一苏联进犯，美国可以供应"装备和其他服务"。基辛格说，美国可以"在某种伪装下"协助改善北京及中国各地轰炸机基地之间的通讯。他也提议提供"某种雷达"技术，中方可以依样建造。换句话说，基辛格秘密提议协助人民解放军。他提议展开军事供应关系，不仅限于和平时期，也适用于苏联进攻的状况。

我觉得惊讶的是，中方起先对这个第七次提议还犹豫不决，表示还要深入研究再回答。他们说，美国提供的预警合作将是"非常有益的情报"，但是必须小心处理，"才不会有人觉得我们是明盟国"。怀着战国时代无情无义、结盟随时可翻脸的心态，中国领导人满腹狐疑，深怕基辛格包藏祸心，企图把中国卷入和莫斯科的战争。

中方或许不了解尼克松和基辛格这样提议，是冒了多大的风险。基辛格在中国事务上最亲信的顾问罗德，向基辛格上报告，强烈反对这样做。罗德说，这有可能违反宪法（更不用

说受广大舆论反对），也会激怒俄国人。基辛格驳回罗德的反对——不过罗德本人也强烈支持与中国改善关系。

“饥则为用，饱则飏去”

中美关系在 1970 年代末期出现最大的进展，此时邓小平权力愈来愈大，成了中国对美国公关攻势的代言人。在西方人眼里，邓小平是理想的中国领导人；温和的改革派，有着老爷爷般沉静的言谈举止。简单讲，他是西方人乐于见到的那一型人物。

但是邓小平绝不是和蔼可亲的老爷爷。私底下在政治局内部会议里，他痛斥助手和顾问，中国在对付西方时毫无进步。他认为在毛泽东主政、以及他的“改革”之下，中国已失去三十年可以超越美“霸”的时间。

邓小平很热切要和美国做伙伴，但有个理由不能明说。他正确地观察到，中国遵循苏联经济模式是走错了路，现在正在付出代价。事实发生许久之后美国情报官员才拿到的中国内部文件，显示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没有从现已动摇的苏联同盟汲取足够的利益。邓小平不希望和美国人来往时又犯同样的错误。他知道要在马拉松比赛中有进展，要靠从美国取得知识和技能。换句话说，中国要急起直追赢得马拉松，需要从骄纵自满、跑在前头的美国人那里捞好处。

邓小平在政治局内讲了一句战国时期的名言“韬光养晦”——隐藏野心、储备实力。邓小平也透过似乎迂回、无害的故事传递讯息给对手。1975 年 12 月首度和福特总统会谈时，他提到中国经典小说《三国演义》里的一则故事，事后回想起来，他这么说饶富深意，可是当时福特完全不解其中玄机。这则故事又涉及到前面一章所提到的曹操、中国文学上公认的历史枭雄之一。事实上，曹操或许称得上中国古代文学中“霸”的典范例子。

邓小平告诉福特说，曹操击败对手刘备，维持住“霸”主地位。战事之后，刘备表示愿投效曹操，但曹操还是怀疑刘备的忠诚。邓小平向福特提到曹操说的一段话：“譬如养鹰，饥则为用，饱则飏去”表面上，邓小平故事里的“鹰”是苏联。邓小平警告说，美国百般迁就苏联会失败。一旦他们得其所欲，苏联会像刘备，去追求自己的利益。美国人从这则故事里没有体会到的是，同样的逻辑也适用在中国身上。一旦美国协助中国富裕壮大，中国不会甘于当盟友，而会“饱则飏去”。*

*译注：作者此处引用似有错误。根据《三国演义》第十六回“吕奉先射戟辕门，曹孟德败师淯水”，曹操指的“鹰”应该是吕布，而非刘备。

然而，邓小平圆滑地决定不把曹操和刘备之间最精彩的过招故事说出来——因为如果说

出来，就会泄露了中国和老美打交道的真正意图。中国鹰派还未公开著书撰文大谈这些古代故事中的寓言。我们需要这把钥匙去解读中国人的战略手段。没有迹象显示福特或基辛格明白邓小平的弦外之音。

“正欲使操知我无大志”

中国战略强调隐匿取霸主而代之的真正意图，在“问鼎”的故事已表述出来。然而，三国时期另一则不同的类似故事，却告诉我们中国人不仅会消极隐匿，还会积极欺骗敌人以掩饰自己真正的野心。

赤壁之战前几年，虽有鸿鹄之志但势单力薄的刘备被找去见曹操。阴谋推翻曹操的刘备，“正欲使操知我无大志”。刘备到后，曹操邀他到后院桃树下落座饮酒。两人喝酒时，天气开始变乌云密集，似乎将下大雨。曹操一名部属指着天上一朵云，状似神龙。众人目光投向那彩云时，曹操问起刘备是否知道龙的千变万化。

刘备答说：“未知其详。”

曹操说：“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历四方，必知当世英雄。请试指言之。”

刘备装迷糊：“备肉眼安识英雄？”

曹操坚持：“既不识其面，亦闻其名。”

“淮南袁术，兵粮足备，可谓英雄。”

曹操大笑：“冢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

刘备又说：“河北袁绍，四世三公，门多故吏……可谓英雄。”

“袁绍色厉瞻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

“有一人名称八骏，威镇九州——刘景升可为英雄。”

曹操说：“刘表虚名无实，非英雄也。”

刘备再问：“江东领袖孙伯苻乃英雄也。”

“孙策藉父之名，非英雄也。”

“益州刘季玉，可为英雄乎？”

“刘璋虽系宗室，乃守户之犬耳，何足为英雄！”

“如张绣、张鲁、韩遂等辈皆何如？”

“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挂齿！”

刘备最后说：“舍此之外，备实不知。”

曾操为英雄下了定义：“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

刘备问：“谁能当之？”

曹操以手指指向刘备、再指向己，然后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刘备一口气差点上不来，筷子落地。此际天上响起一声闷雷。刘备低身捡起筷子，辩解道：“一震之威，乃至于此。”

曹操吃了一惊：“丈夫亦畏雷乎？”刘备成功地隐瞒称霸雄心。

不久之后，刘备向关羽与张飞提起这段经历：“吾之学圃，正欲使操知我无大志；不意操竟指我为英雄，我故失惊落箸。又恐操生疑，故借惧雷以掩饰之耳。”关、张称道：“兄真高见！”

其余就是历史了。刘备很快就脱离曹操，自立门户，终其一生与曹操角逐天下。

借力使力

一旦尼克森和福特政府与中方启动新关系，就很乐意满足中国许多立即的政治目标。所有这些礼物——日后还有不少——至少对美国民众保密达三十年之久。美国不仅切断中央情报局秘密支援达赖喇嘛的计划，也取消美国海军例行经过台湾海峡的巡逻。达赖喇嘛是共产中国第一号公敌；巡弋台湾海峡则象征美国对台湾的承诺。美国政策变成一系列倡议，要强化中国对抗其敌人。

1975 年，我还在兰德公司任职时，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上发表文章主张美国与中国发展军事关系，以建立对付苏联的楔子。外交官出身的理查·郝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当时是这份刊物的总编辑。他非常支持这篇文章的观点，称赞我的主意是“重量级炸弹”(blockbuster)。他对许多人提到我的想法，因而《新闻周刊》(Newsweek)出现一篇长文《给北京枪炮？》（Gun for Peking）深入讨论。其他传媒也跟进讨论，而苏联媒体不仅抨击我在文章中的论点，也对我个人进行人身攻击。中国派在联合国的军官向我建议这个点子。因此从 1973 年起我和中国军方鹰派有四十年的对话，听到许多战国时代与霸主交涉的故事，而当时我认为他们讲的霸主一直就是苏联。

1976 年，要挑战福特总统、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里根，读到这篇文章。（我在郝尔布鲁克敦促下，把文章送给里根过目。）这位前任加州州长亲笔回信，表示他同意与中国拉近关系、以对付苏联的主意。但是他也提醒我提防中国，并且特别担心放弃美国在台湾的民主盟友的影响。我到里根州长位于太平洋帕勒赛（Pacific Palisades）*寓邸拜访——当

时他开玩笑自嘲“高龄六十四的失业人士”——他鼓励我继续送有关中国的资讯给他，他或许可在演讲中采用。

＊译注：洛杉矶以西海边一个高级住宅社区市镇。

1978 年，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也就是说美国正式承认共产中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府。这一年，邓小平处心积虑从美国得来他最想要的东西：科学与科技。这是战国时代“无为”概念的发挥——借力使力，让别人替你做事。邓小平 1978 年订定策略时就明白，他说：“技术是（促进经济成长）头号力量。”邓小平相信，中国要超越美国成为经济大国，唯一的方法是彻底大规模的科技发展。最根本的捷径是取得美国已有的科技。邓小平发现美国新任总统卡特很热切希望促成中美正式伙伙关系，建立外交同盟。

中美建交

1978 年 7 月，卡特总统派出有史以来出访其他国家最高级的美国科学家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卡特的科学顾问法兰克•普瑞斯（Frank Press）原本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专精地震科学，担任团长。普瑞斯 1975 年至 1977 年曾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US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主席，因此对与中国的学术交流特别感兴趣。普瑞斯代表团受到中方极大重视。《人民日报》很少刊登外国人讲词，却特别刊载普瑞斯在接待宴的讲话，阐述全球化的好处。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是国家安全会议主管中国政策的官员，曾经列席和邓小平会谈十四次。他说，他从来没见过邓小平像这次如此兴致盎然地不断追问、并且陈述他对中国未来的观点。一如既往，邓小平又摆出哀兵姿态，向普瑞斯代表团哭诉中国在科技方面遥遥落后，并且表示他很关切美国限制高科技向中国出口。

过去，北京严格管控中国科学家前往美国，限制出访人数，深怕他们会叛逃。普瑞斯预料他们仍会小心翼翼、不敢与西方扩大科学交流。因此当邓小平提议美国立刻接受七百名中国理工科留学生、并且后续几年留学生可上看数万人时，普瑞斯吓了一跳。邓小平迫切希望立刻得到答案，而普瑞斯觉得这是他一生事业最重要的突破，遂果真立刻打电话回华府，在凌晨三点钟把卡特总统吵醒。卡特和他的顾问一样，也没有多想中国突然对科技交流兴趣浓厚是怎么一回事，只认为这是中美双方关系改善的一个可喜的迹象。

1979 年 1 月，邓小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赴美国访问，造成大轰动。*卡特总统摆了国宴招待他，而且为了表示两党皆支持美中政策，还邀前任总统尼克松出席；这是尼克松 1974 年 8 月含愧辞职下台后首次回到白宫作客。邓小平在美国逗留十三天，参观可口可乐总公司、

休士顿的詹森太空中心，甚至迪士尼世界。《时代》杂志两次以邓小平为封面人物，可见美国大众媒体接受他的程度。

*译按：1974 年邓小平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技术上来讲不算访问美国。

游客在北京的国家博物馆可以看到邓小平戴着一顶十加仑大帽子笑咪咪的照片，这是他在德克萨斯州收到的礼物，成为他 1979 年访美的象征。它向美国民众显示，他风趣幽默、不像“那些共产党”，比较像“我们”。对中国人及马拉松较劲而言，它也是转捩点。邓小平的收获比毛泽东还要大。

1979 年 1 月 31 日，邓小平在访美期间，他与中国国家科技委员会主任方毅与美国政府签订协定以加速科技交流。这一年，头一批五十名中国留学生飞往美国。在头五年的交流中，中国约一万九千名留学生来美国学习，主要研修物理学、卫生科学和机械工程，而且人数屡创新高。卡特和邓小平也签署领事馆、贸易、科技协定——美国提供各种科技知识给中国科学家，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科技知识向外输出。

中国亦邀请美国国家科学院派出一系列代表团到中国，在中国选定的若干领域展开美中科技交流。中国的策略是让美国人协助他们加入国际上有关物理学、原子能、太空科学及其他领域的组织。美方欣然同意，这构成对中国的第八项援助。

美方也同意进行更秘密的军事合作。卡特总统提供中国情报支援，帮中国发动惩越战争，这个举动连基辛格都震惊，他在 2011 年出版的《论中国》一书特别提到这一点。基辛格的口气似乎是在说，或许因为他打开对中关系，却创造出一头怪兽。基辛格谴责卡特“非正式勾结”北京，“形同秘密军事侵略”——这项协助“有间接协助红色高棉残部的实际效用”。基辛格愤怒地说，国防部长哈洛德·布朗（Harold Brown）访问中国“象征中、美合作往几年前仍不敢想像的地步又迈进了一步”。

第九项提案即第 43 号总统令，签署于 1978 年，设立无数的计划把美国在教育、能源、农业、太空、地理科学、商业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科技发展转移给中国。次年，卡特政府赋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

中央情报局官员、日后出任驻北京大使的李洁明（James Lilley）在回忆录《李洁明回忆录》(China Hands: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and Diplomacy in Asia)中透露，卡特总统 1979 年批准于中国西北部设置讯号情报搜集站。李洁明说：“我得到中央情报局颁授勋章的部分原因，即是我在北京开办第一个中情局工作站。另一件功绩是我协助开发与中国分享情报……它听起来像是很牵强的点子——美国和中国前几年还透过代理人在越南相互作战，现在却合作搜集苏联的战略技术情报。”

里根的秘密战略伙伴

1978 年，我在联邦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担任专业幕僚，另外也担任国防部顾问，从国防部可以继续读到有关中国的机密分析，我也提出我自己的报告和分析。里根于 1980 年第二度争取白宫大位时，我受聘为他的顾问，协助起草他第一次外交政策竞选演讲稿。我表达顾问群共同的观点，即美国应该协助中国避开来自苏联更大的威胁。里根当选后，我奉派为总统交接小组成员。当时我仍主张与中国更加合作。黑格很支持我，他对卡特政府和中国的合作非常了解，现在身为里根总统的国务卿访问北京，公开提议销售武器给中国，乃是合乎逻辑的下一步。

里根总统 1981 年签署的第 11 号国家安全决定指示（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Directive 11），准许五角大楼出售先进的空中、地面、海上和导弹技术给中国，以便将人民解放军改造为世界级的作战部队。次年，里根又签署第 12 号国家安全决定指示，启动美、中核子合作与开发，扩大中国军用及民用核子计划。

里根对他的前任之对中政策深为怀疑——这个立场导致政府内部政策严重失谐。里根比起我以及政府内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更能看清楚中国的本质。表面上，里根遵循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与中国亲善合作的路线——以 1984 年的第 140 号国家安全决定指示的话来说，“基于强大、安全和稳定的中国可以是增进亚洲及世界和平的力量，协助中国现代化。”（国安会幕僚严格限制能取阅第 140 号国家安全决定指示的人数——该指示总共只印 15 份——至少有部分可能是因为它描绘出里根政府强化中国此一有争议的目标。）

里根签署这些秘密指示以协助打造强大的中国，甚至愿出售武器给中国、并且减少对台湾军售。不过里根和前几任总统不同的是，他加了攸关重大的但书。他的指示表明，美国援助中国附有条件，即中国不得靠向苏联，且必须将它的专制体制自由化。不幸的是，他的顾问大多忽略这些先决条件，而不晓得为什么，他也没有坚持。

此外，里根政府提供经费与训练给中国政府公营的新研究单位，专注基因工程、自动化、生物科技、激光、太空科技、载人太空飞行、智慧机器人等等之研究。里根甚至批准中国一个军事代表团参访攸关国家安全的“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Defense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这个研究单位发明网际网路、网路作战和数十个其他高科技项目。

里根总统任职内，美国和中国的秘密军事合作扩张到以前不敢想像的地步。美国秘密和中国合作，提供军事补给给反苏联的阿富汗叛军、红色高棉，以及安哥拉的反古巴部队。四名中央情报局官员在一次访谈中谈到中、美合作对抗越南占领柬埔寨，其中包括武装五万名反越南的游击队。他们还在《柬埔寨战争》（The Cambodian War）这本书中透露了这项作业

的详情。中央情报局其他官员还在乔治·克瑞尔（George Crile）的书《查理·威尔逊的战争》（Charlie Wilson’s War）中揭露另一个更大的机密：美国向中国购买 20 亿美元的武器交给反苏联的阿富汗叛军。基辛格的回忆录透露中、美在安哥拉也秘密合作。

中国为什么要在这些大规模的秘密行动上和美国合作呢？唯有当北京公布它的档案、或是有非常高阶层的官员叛逃到西方时，我们才有办法知道。现在我们只知道一件事：北京希望利用美国的力量和技术来壮大自己的实力。关键点似乎在于北京认为它正在玩一场战略围棋，而它必须避免被苏联包围。没有人看到这是为了在百年马拉松中获胜的阴谋。中国让我们觉得它脆弱、落居守势、需要保护。

根据《纽约时报》记者�releasing培德（Patric Tyler）的说法，第十项援助核准了美、中合作沿中、苏边境搜集情报，其代号是“板栗行动”（Operation Chestnut）。后来，卡特的副总统华德·孟岱尔（Walter Mondale）1979 年 8 月访问中国时，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利用军机运送板栗行动侦测站器材到中国。�releasing培德很生动地报导，中国要求美国空军 C－141“运输星”运输机在北京机场停在一架苏联民航机旁，让苏联看到中、美的合作。

郇培德说，这些侦测站可以搜集空中交通的资讯、苏联空防的雷达讯号和 KGB 的通讯，并且也能侦测到苏联核武部队警戒程度的更动。因此一旦苏联来犯，中国的警告时间会增加。在苏联支持的越南入侵柬埔寨，以及苏联在 1979 年 12 月入侵阿富汗之前几个月，对于中国的安全而言这是很大的进步。在持之以恒的经营后，中国得到了基辛格、艾克尔和我六年前所提议的更多的东西。

根据“势”的要求，北京必然想到它需要美国协助打破苏联包围中国的两把“钳子”，即阿富汗和越南。情势所逼之下，邓该比毛更倾向美方；邓小平会接受来自霸权的重大援助。

从 1982 年至 1989 年，中、美援柬计划作业中心设在曼谷，有中国、泰国陆军、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支援。这构成美国第 11 项援助中国的方案。这项秘密合作计划有效地隐密了 20 年，因为它有一部分是公开的。美国国际开发总署（USAID）提供经费，由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比尔·麦柯隆（Bill McCollum）和纽约州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史帝芬·索拉兹（Stephen Solarz）联名，以人道援助柬埔寨为名义推动。依据肯尼士·康波伊（Kenneth Conboy）的说法，在这两项公开计划背后，里根命令中央情报局提供秘密援助，最初在 1982 年是每年 200 百万美元，到了 1986 年提高到 1200 万美元。这项计划混在一项泰国人称为“三二八专案”（Project 328）的计划当中。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也提供武器和经费。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甚至访问曼谷，亲赴秘密营地视察。我在 1985 年和 1986 年也去参访过，听取中情局站长的简报；此君奉调到曼谷之前是中情局总局远东科科长。他认为这项计划是冷战“在本地区的唯一一场大戏”，中国和美国联手来对付苏联。

从 1984 年夏天起，也就是柬埔寨行动启动后两年，中国要把苏联赶出阿富汗的秘密合作，规模将变成在柬埔寨的 50 倍。

当时我们不了解“势”和反包围，因此没有人想到中国政府会肯冒触怒苏联之虞。来提供武器给美方，以协助阿富汗叛军。精明干练、通晓中文的中情局探员乔·狄崔尼（Joe DeTrani）发现这个玄机。中方与此有牵扯是个严守的秘密，据郎培德说，整个中情局知情的人不超过十个人。中方迄今仍不承认他们供应武器。乔治·克瑞尔在他的书《查理·威尔逊的战争》中说，第一批订单是 AK－47 攻击步枪、机关枪、火箭推动反坦克榴弹炮和地雷。

1984 年，众议员查理·威尔逊筹到 5000 万美元，提升对阿富汗叛军的援助。克瑞尔报导，中情局决定从其中拨款 3800 万美元向中国政府购买武器。《华盛顿邮报》于 1990 年引用匿名人士报导，在中、美秘密合作的 6 年期间，中国提供的武器总价超过 20 亿美元。

美、中秘密合作在里根政府时期达到顶峰。尼克松和福特两位总统提供中国有关苏联的情报资讯。卡特总统建立板栗行动侦测站。可是里根对待中国有如完全的战略伙伴——虽然只是秘密伙伴。

三个主要计划是秘密援助阿富汗、柬埔寨和安哥拉的反苏叛军。这时候我已被调升为相当于三星将军的文官职位，在五角大楼主管政策规划及秘密行动，顶头上司是主管政策的佛瑞德·艾克尔。艾克尔和我是少数知情官员，我们知道基辛格 1973 年提议援助中国，以及卡特总统的板栗行动计划。他和我准备好测试中国是否真的愿意成为美国的盟友。结果若是正面，美国许多高级官员在未来好几年都会偏向中国。

我的任务是到伊斯兰马巴德、曼谷和南部安哥拉，分别访晤阿富汗、柬埔寨和安哥拉叛军集团的首脑，确认他们的计划和需求。我也奉派要取得中国的意见、赞同和支持。我们建议里根总统签署第 166 号国家安全决定指示，此一指示反映阿富汗情势升高的话有可能激怒苏联的报复。我们需要中国评估情势，最理想的话，也能得到它的支持。

二十年之后，新闻记者史蒂夫·寇尔（Steve Coll）声称“中国共产党在中情局所交涉的交易中，从贩售武器赚了巨大利润”。如果这个说法正确，相较于美国花了 20 亿美元购买中国武器供给反苏叛军团体，中国购买 5 亿多美元的美国军事设备自用，就相当少量了。

中国不仅卖武器给我们，还建议我们如何进行秘密作战。从他们的建议浮现出几个中国人对付衰退中的霸权——指的是苏联——的教训。第一、中国人强调我们必须确认苏联有哪些重要罩门可以下手。他们说明，有一项战术就是提高帝国的成本。当我最先提议提供毒刺（stinger）反飞机导弹给阿富汗和安哥拉叛军时，中方乐不可支，这些武器打下苏联直升机和喷气战斗机，会让苏联损失惨痛。

第二就是说服别人去作战。这当然是战国时期“无为”之术的表现。

第三是攻打衰落中的霸权之盟友。柬埔寨叛军攻打苏联的越南傀儡。安哥拉叛军设法击退古巴部队；苏联以军机运来古巴部队投入战场，叛军若有毒刺导弹，可用来对付苏联军机。美中合作把这一切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问中国人，若是再采取下列两个作法，他们是否会觉得过度挑衅：我们应不应该供应及鼓励阿富汗叛军跨越边界，进入苏联进行突击队破坏行动（冷战期间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们应不应该同意叛军的要求，提供长射程狙击手步枪、夜视镜，以及标出在阿富汗境内工作的苏联高级官员位置的地图，以便他们发动暗杀行动？我的同僚一口咬定中国人一定不会同意这样的行动。我读了太多中国历史，因此猜想他们会同意。等到他们很肯定地答覆这两个问题时，我对北京会如此亟盼打倒苏联还是吓了一跳。

史蒂夫·寇尔在他那本得到普立兹奖的书《鬼影战争》（Ghost War）中写说，反倒是美方拒绝了这些要求。他写说中情局的律师“起了警觉”，深怕它几近“赤裸裸的暗杀”，中情局驻地站长“可能锒铛入狱”。因此，可以准许提供狙击手步枪，但不能给地图和夜视镜。突击队进入苏联国境攻击，是中方认为可以推倒俄国霸权的妙招，虽然中方向我们建议，宣称它对衰退中的霸权会产生心理震撼，我们还是叫停。

1985 年，美方对中国马拉松的协助又扩大到包括美国武器；里根政府安排六大武器系统卖给中国，总价超过 10 亿美元。这个计划的目标是强化中国的陆、海、空军，甚至协助中国扩张其陆战队。1986 年 3 月，里根政府协助中国发展八个国家研究中心，从事基因工程、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自动化、生物科技、激光、超级电脑、太空科技和载人太空飞行的高深研究。不久，中国人就在 1000 多个项目上得到重大进展，它们全都高度依赖西方援助，也全都攸关中国的百年马拉松战略。里根政府希望藉由增强中国来对付苏联，而从里根以降，每个人都希望相信北京的说词：中国正大力推动自由化。

小结

中国借助其战国盟友打破苏联包围的策略慢慢奏效。1989 年，苏联宣布从阿富汗撤军，越南很快也退出柬埔寨。现在，华府和北京会以此一信赖基础更进一步，成为真正的永久盟友吗？我一度这样认为。但是根据战国时期的定律，现在该是中国回头对付真正霸权——美国——的时候。

“势”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涉及到对付敌人包围的野心。1989 年 2 月邓小平在北京与老布什总统会面时非常坦诚地讨论了“势”的包围理论，他回顾 1980 年代的成就时说，苏联包围中国曾是致命的威胁。但是现在围棋赛局已转变为中国包围江河日下的苏联。当强大的美国霸权持续增强、同时苏联开始衰退之际，没有人预见到中国会如何评估“势”。

第四章 白先生与绿小姐——美国误判天安门局势

"趁火打劫。"——三十六计

天安门事件

1989 年 4 月，我第 13 次访问北京。当时我在美国政府有两个职位：我既是联邦参议院的调查员，也替直属国防部长迪克·切尼（Dick Cheney）的五角大楼净评估室（Officeo of Net Assessment）撰写有关中国的报告。这时候我已经受到一些肯定，而且 1983 年曾与邓小平有过一次长谈。我用中文邀请邓小平和我拍了一张两人握手的纪念照，作为我替五角大楼翻译的中国军事文章专辑推广之用，这把当时美国大使恒安石（Arther Hummel）吓了一跳。

1989 年这次访问，我要查证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示威活动的报告。抗议者宣称他们志在加速改革的过程；我们认为北京早已在改革，我们在美国关注中国问题的人都认为走向民主和资本主义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4 月 22 日，我得到代理大使彼得·汤生（Peter Tomsen）的许可，搭车前往广场会见几位学生。我自己在 1960 年代即是学生示威者，因此很想瞧瞧民主示威活动在中国如何进行。我出发前，彼得把卸任大使罗德写给新任总统布希的机密离任电文给我看。

老布什在福特政府期间担任过驻中国代表，对建立建设性的关系兴趣极浓。事实上，他对中国期许很高。布什就任总统后第一次出国访问，即为 1989 年 2 月访问北京，是我访问之前 2 个月。布什离开前抱着乐观心情，并且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表示"民主之风正创造新希望，自由市场的力量也释放出新趋力"。

罗德的电文依据在北京得到的"可靠的"情报，称赞美中关系的大好前景。它重复常见的传闻，即中国的村级已开始民主选举，很快就会普及；中国存在建立真正自由市场经济、结束国有企业的基础；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不会修好。罗德大使指出，中国领导人不会威胁美国利益，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也不是争取民主体制。

我得替罗德讲句公道话，当时我们这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普遍都是这个观点。我呈给五角大楼的报告也是这么说。即使学生示威者已经群聚在广场，我认为这场抗议相当不重要，6 月间学校一放假，学生们全会回家去。美国大使馆里只有赖瑞·伍泽尔（Larry Wortzel）上校认为学生示威不可等闲视之。最后他断然预测中国将出动军队清空广场。伍泽尔和我一样，多年来与鹰派颇有交往。他很注意鹰派的言行主张。后来他告诉我，他从鹰派身上看到

会动武，这是很罕有的实例，显示鹰派有时候比温和派更洞悉领导人的心意。

我们许多人担心学生可能会让共产党内的改革派下不了台。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冥顽不灵地认为，中国不可能不进行改革。没错，我们被告知，中国政府高层少许英雄推动重大改革的步伐太快。但是我们无法想像，一年之内他们全被抓去坐牢或遭到软禁，或甚至叛逃或出国流亡。我们知道政治局内部对改革发生辩论，但是我们不清楚谁主张什么，或反对改革者有多么强大。

当时很少征兆会推翻我们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注意还是可以发现。有个意外就发生在前几个星期，5 万名学生在北京游行，替遭到邓小平罢黜的共产党前任领导人胡耀邦悼丧。（报上说胡耀邦因性格“反覆无常”遭到罢黜。）接下来 7 个星期，约 100 万名抗议者涌到广场，与学生联手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扫除贪腐、政府提升问责品质。他们高举美国《独立宣言》，也搭建一座三层楼高的“民主女神”。他们要求与共产党领导人对话，又在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前来北京国事访问前夕绝食。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时，天安门广场抗议已成为全世界的头条新闻——对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是重大的、会造成不安定的尴尬事件。

美国人认为邓小平是中国真正的改革者，因此中国学生反而在这些未经核准、且越演越烈的示威活动中推崇胡耀邦，就显得挺奇怪。我们大多数人从来没想过，或许我们一直都没把胡耀邦和邓小平正确定性。

或许我脑子里有些疑问，因此我想要亲自会见抗议者。彼得·汤生和我坐一辆插着美国国旗的凯迪拉克黑色轿车，前往天安门广场。当我们走向数百名长头发、穿恤衫的学生时，没有人阻拦。和我们谈话的学生没有透露有绝食的计划、或是要公开违抗共产党当局。回想到 1968 年我参加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反越战“罢课委员会”，我和一位年轻的中国教授交换起越战时期参与示威的故事。戴着飞行员眼镜、香烟一根接一根的这位教授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晓波。刘晓波刚在前一天从纽约回国，立即到广场声援学生。刘晓波应邀到哥伦比亚大学当访问学人，但是他不愿意在历史中缺席。他要到 20 年之后因为签署“零八宪章”被捕、再度判刑，才真正进入历史。他后来获颁 2010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最近的著作包括直接抨击极端民族主义和他认为必须严肃面对的军方鹰派。1989 年时，中国和西方的主流观点是，鹰派不会胜出，当局不会动用武力对付学生。

5 月间，邓小平宣布戒严、急调 25 万大军入京。抗议者不肯解散，邓小平出动坦克及士兵。数百名、或许数千名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命丧街头，许多人是被一碰人体就会爆裂的子弹击毙。广场四周的各大楼被枪弹打得遍体鳞伤。士兵拳打脚踢、棍棒齐飞，对付抗议者，坦克辗过他们双腿和身躯。这场屠杀留下一张经典画面：一名男子站在一排坦克车队前，阻

挡它们前进。一群人把他拉开——此人从此音讯全无。

编织幻觉

天安门事件之后，许多中国改革派终身遭到软禁，同时共党智库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则设法逃到西方。政府雷厉风行地进行新闻检查，拚命想要从中国报刊杂志和历史书籍中删除提及抗议的一切纪录。根据政治学者裴敏欣的研究，屠杀过后不到一年，中国政府“关掉 12%的报纸、13%的社会科学期刊，以及中国 534 家出版社的 76%。”它也没收 3200 万册书、取缔 150 部影片，有 8 万人因媒体相关活动遭到惩罚。

尽管发生这些毛骨悚然的事件，美国既有的对中政策却很慢才有改变。布什总统努力阻挡国会召回汤生的后任李洁明大使的决定，也迟迟不肯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改变美中关系。他反倒接受昔日长官尼克松的建议。布什在日记中写下，尼克松建议他，“别惊扰双方关系。（中方）处理失当甚为可叹。可是要往长期看。”据布什说，尼克松“不认为我们应该停止贸易，（或做）象征性动作，因为长期而言我们必须维持良好关系”。布什一度描述聚集在天安门的学生“只是一小撮那种示威者”。

中国人对事态的看法当然不一样。对邓小平而言，中国刚萌芽的学生运动似乎实现了中国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发出的警告；他们撰文写出美国已在中国国内铸下的祸根，以及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亲美情感的危险。邓小平允许民间表达这种感情，当然是为了取得西方的退让。现在它却逾越界限了。

中国极端的民族主义者——鹰派——至少自从 1980 年代初期就发展出一派思想，认为美国生活方式和文化是会摧毁中国的“精神污染”。他们认为美国想要建立全球消费文化，并且主宰世界。这一派思想的主要宣传人邓力群和胡乔木在解放军及政治局成员中都有追随者。

邓小平绝不是这一派激进反美群体的始作俑者，但他对他们的同情程度显然高出我们的了解。学生在北京及其他重要城市抗议，让邓小平及其他领导人大吃一惊，他们原本相信共产党维持在全国无可质疑的正当性。中共试图解释事件前因后果，党内文件描绘抗议纯为美国策划的心战，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惊慌紧张的邓小平采信此一谬误的说法，写下美国“开始发动所有的宣传机器煽动、鼓励中国所谓的民主人士、所谓的异议人士，其实这些人是民族败类”。邓小平变得相信美国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

邓小平投向保守派，指派一名保守派担任总理。这时候还没有人晓得天安门事件导致中国治理的自由化趋势之瓦解。可是事件之后，邓小平开始利用直接得自“精神污染”的民族主义意识型态的反美言论。他增强李鹏、胡乔木和邓力群等强硬派的角色，有系统地铲除有革命倾向的解放军及政治局成员。让许多美国人惊骇的是，中国具有改革思想的党魁赵紫阳

终其一生遭到软禁。时隔 12 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神秘地取得、出版了《天安门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揭露赵紫阳如何与鹰派搏斗、争取改革却失败，他当时面临的极大困难是我们所不清楚的。

布什政府中的亲中派尽力替北京开脱。我也是参与编织此一幻觉的人士之一，认定中国共产党领袖被捕只是暂时的挫败；中国仍走在民主的道路上；这次清算只是反应过度；我们必须保护邓小平为首的“温和派”，他会导正这艘大船，维持我们的关系平顺进行。我们知道有些事改变了。我们只是希望它不会永远改变。

回顾起来，如此容易上当受骗，实在令人悔不当初。任何优秀的分析家下注时会留一手，或至少预测事情会有丝毫机会出现差错——也就是说改革派和对手之间会出现致命的摊牌；中国真正的改革派很快会被捕入狱、遭受软禁，或流亡出国；我们对中国的军售会取消。任何接触最高机密报告的人，都被教导冷战期间经典的情报出错案例。中央情报局历史上第一份“国家情报估计”（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铁口直断中国不会介入韩战，主要因为北京说它不会参战，但是不到几天，中国人就参战了。1962 年，中情局预测苏联不会把导弹或核武器部署在古巴，因为分析员相信许多骗了我们的苏联官员的话。1979 年，中情局最高级分析员罗伯特·鲍威（Robert Bowie）在国会作证说，伊朗国王将保住权位、霍梅尼大主教（Ayatollah Khomeini）没有机会接管政权、伊朗政局稳定。许多消息来源这样告诉中情局线人，但这个情报并不真实。

我 1980 年代在中情局或五角大楼的同僚，没有人料想中国会欺骗美国，或是会造成重大情报失误。反之，所有消息来源和叛逃人士基本上异口同声说，中国将走向自由市场经济、选举及扩大合作之路。但是天安门事件之后，愈来愈多中国投奔自由者来到美国，对未来情势提出警告，也对于他们本国的未来发出不同的、更有恶兆的声音。可是，即使这时候，我们还是不肯注意聆听。

有位叛逃者特别突出，至少在我心里是如此。身为高级叛逃者，他的要求不寻常的温和——政治庇护；崭新姓名、身分；一栋房子；一份薪水不恶的工作；当然还有一个用来掩护真相的故事，让中国情报机关以为他已不在人世。投奔自由的叛逃者一向会提出要求，通常会要求钜额金钱。他们通常也宣称比别人更清楚重要机密。但是这位身材胖胖的先生，则与众不同——不仅因为他要求的东西相当少，也因为他所说的，完全违反我们的传统智慧，也挑战长期以来许多政策。

这位先生——我们姑且称他为“白先生”——1990 年代初期来到联邦调查局宾夕法尼亚大道的总局八楼国家安全会议室，进行讨论。这次会谈相当不寻常，因为美国政府各机关的中国问题专家都被召来评估好几位投奔自由者提供的秘密资讯。预定一个小时的讨论后来延

伸为三个小时。

白先生是首要讨论对象之一。虽然在揭露细刮时他的眼睛闪烁、手指弹动，显得坐立不安，他各方面看来都还可信。他告诉我们一些我们可以独立验证的秘密：潜伏在美国的几个中国间谍的身分，以及中国领导人所用的机密电话系统的细节、以及会议室的陈设布置。他讲出一些我们已经取得的中方秘密文件，轻而易举地辨识出真假文件。他也通过测谎。对他，我们唯一的问题是，他提供的新情报我们并不相信。

白先生透露，从 1986 至 1989 年的三年期间，政治局对中国未来战略出现权力斗争。他宣称读过高层秘密会议和辩论的笔记，告诉我们鹰派的力量，以及他们全力在国内镇压亲美势力；天安门广场危机撼动了中国内部安定；邓小平现在与这些强硬路线派站在同一边。他晓得某些鹰派的角色，以及他们如何制伏温和派。他认为我们应该设法协助真正的改革派。我很感动他相信我们了解中国国内政情，以及他希望我们能够拯救改革派。

这个投奔自由者透露，邓小平有更大胆的计划要散布中国民族主义的鹰派观点。白先生参加过讨论如何恢复孔子为民族英雄的秘密会议，而过去数十年，共产党还在大肆抨击儒家文化及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

当然，中国领导人以欧威尔的方式下令改写国家历史，并不新鲜。共产党 1949 年夺取政权后，一大群中国历史学者改写中国历史，强调所有的进步都来自农民革命——历史学家詹姆斯·哈里逊（James Harrison）称之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意识型态改造企图”。根据白先生的说法，最新的此一改变令人难以置信。中国共产党自从建党以来就信誓旦旦与中国的过去一刀两断，现在竟会重新拥抱它？共产主义意识型态会悄悄遭到抛弃，换上狂热民族主义作为政府生存之根本？红色中国实质上已不再那么红色？一切都似乎不可相信。真假改革派

白先生提供的情报却与联邦调查局长期以来十分重视的另一位女间谍——我姑且称之绿小姐——同时间传递的资讯相互冲突。她所索取的回报高达 200 万美元，可是她所声称的交往关系可十分不得了。她不仅知道中央政治局的秘密，也熟悉邓小平的继承人、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的底细。她声称邓小平仍然坚定亲美，江泽民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江泽民喜欢唱“猫王”的英文歌曲。她说，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国人希望与美国更亲密合作，她对孔子会被颂扬或马克思主义会从全国教学课程上拿掉的想法不屑一顾。她一口肯定鹰派是上不了台面的思想家，他们与主流社会脱节、老迈昏庸，很快就会失去还有的一点影响力。

如果我们想要查证绿小姐的可信度，我们很容易可以做到。她和白先生不一样，她讲不出美国境内任何中国间谍的名字或地点，也不能从照片中辨认已知的任何一个中国间谍。她声称不知道北京城地下有秘密通道供党领导人通行。她也不能正确辨认中国的机密文件。

她和沉静的白先生还有一点不同。白先生的英语结结巴巴，不易听懂他的意思，绿小姐的英语却相当流利。她对于未来美国与中国在大多数政策领域合作相当乐观。白先生似乎害怕、甚至可说是吓破胆，也不敢再接触中国同胞。绿小姐则不然，她说她愿意冒生命危险，每年飞回中国一、两次去搜集新鲜情报。

我主张我们可以同时聘这两位叛逃者当政府线民。我的同事不赞成。美国情报圈靠共识运作，这次对中美关系观点歧异会令人不知所措。绿小姐替我们解了围。我们站在她这边，答应她要求的价码。

我在会议后又安排去见白先生，倒不是我相信他说的话，而是它们引起我的好奇心。我们用国语交谈。如果从全国意识型态和全国教学课程中剔除掉马克思主义这个荒诞不经的主意有丝毫真实的份量，我想知道它会要如何执行？

白先生回答说，他有听过要设立听来无害的“爱国教育”课程的计划。中央要在全国设立一百个“爱国教育”基地、新的历史纪念碑和供观光客游览的新博物馆。中国领导人计划拨款拍摄电视节目和影片，记录中国在日本、美国等列强手下遭受的“百年耻辱”。它们会宣称美国力图围堵中国、想要阻挠中国恢复历史光荣。

他说：“我们的年轻人和知识分子在天安门广场爱上了美国。这种事情绝对不容再发生。因此我们的领导人会抹黑你们，加紧追求民族复兴，终结遭到西方人的羞辱。”

他的结语是“一石二鸟”。中、西方都有同样的谚语。

我问他：“二鸟指的是什么？”

他答说：“苏联不再是威胁。他们垮了，北京不再需要美国保护我们。”那第二只鸟呢？他显然暗示是指美国。他用的是“霸”这个字。然后他又说：“‘势’变了。”

从尼克松 1972 年开放以来，天安门事件是美国首次真正有机会改变对中国立场，以比较不是那么美好的角度好好检视中国领导人。可是美国政府却迫不及待将美、中关系送回到更平静的停滞状态。即使发生大屠杀、即使明知道中国自由派改革者遭清算、温和派总书记遭逮捕，布希总统还是死抱着错误的旧观念。没有人赞扬赵紫阳这位遭到终身软禁的改革派党领袖，也没有人称赞胡耀邦这个赵紫阳之前的“反覆无常”的党魁。美国政府决定不再提起已逝的胡耀邦或是赵紫阳的命运。没有人想到他们是真正的改革派。没有人晓得他们在高层所主张的改革之程度。这些情报日后才流传出来，由参与胡耀邦、赵紫阳民主政治改革的中国投奔自由人士揭露出来。

我依然认为邓小平和江泽民是真正的改革派。但是我很快就发现我们犯了无药可救的大错，支持了假改革派，放弃了真改革派。

为了完成我的报告，我奉派到巴黎探访许多逃避被捕、现在受法国政府庇护的流亡干部。

他们通过一项十点政纲、推选一位领导人，希望能被西方接受为流亡政府。这个组织叫做“民主中国阵线”（Feder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布什总统根本不注意这个组织、它的十点政纲，或是它选出的领导人严家其。严家其的回忆录透露更多有关极力争取政治改革及采纳美式民主制度的细节。严家其曾经直属赵紫阳，他的说法吻合另一位流亡人士阮铭的回忆录，阮铭则是在邓小平之前掌握共产党的胡耀邦之直属部属。但是，这些故事来得太少、太迟。毕竟邓小平曾经作东接待过福特、卡特和布什总统，是《时代》杂志两度封面人物，而且绿小姐还坚称邓小平现在钦选的继承人爱唱猫王的歌。

布什总统说：“我相信民主的力量将会克服天安门广场上的不幸事件。”可是，在动乱和镇压之后，布什命令五角大楼兑现将已经答应的鱼雷、雷达和其他军用补给运交给中国。布什已经接纳了尼克松对待中国人的方式，无法以新角度观察中国。由于中国几乎肯定将是全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美国企业界领袖渴望和他们维持关系和商机，布什的立场受到他们影响。

布什对中国的立场受到继任的克林顿的尖锐抨击。克林顿在竞选时扬言要采取更强硬的作法。他的确也一度如此做。1992 年在总统大选中克林顿赢了布什，他采取的是自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历任总统以来对中国最强硬的路线。

克林顿大逆转

克林顿出任总统之前从来没去过中国，可是以阿肯色州长身分四度访问台湾。1992 年总统大选期间，他痛批布什总统宠溺“北京屠夫”。克林顿一上台，他的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说：“我们的政策将是藉由鼓励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的力量，促进中国全面、和平地从共产主义朝向民主演进。”这个作法获得前任大使罗德的鼎力支持。罗德深受天安门屠杀的震撼、懊悔自己长久以来误判中国领导人，因而摇身一变成为全美批评中国最力的人士。现在他出任克林顿政府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保证会对中国立场强硬。如果中国在人权及民主选举上面没有进步，不会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1993 年，民主党籍众议员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和参议员乔治·米切尔（George Mitchell）联手推动立法，对中国提出种种条件。1980 年代对中国改革的一相情愿想法似乎已经烟消云散。

克林顿政府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在 1993 年 5 月 28 日达到巅峰，他邀请 40 名中国异议人士到白宫——其中包括达赖喇嘛的代表，以及天安门广场抗议学生领袖。中共中央政治局视此举为史无前例的贬抑，威胁到中国仍然万分仰仗的整个中美关系。因此他们赶紧采取对策。

白先生和留在中国的消息来源仍有接触，根据他的说法，中国情报人员都晓得克林顿政

府内部对如何与中国往来意见分歧，因此拟订战略在美国政府内部建立强大的亲中同盟力量。中国锁定国家安全顾问东尼·雷克（Tony Lake）和他的副手桑迪·伯格（Sandy Berger）对北京比较友善。中方也看好当时的国家经济会议主席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为可以争取的盟友，因为他在全球化及自由贸易化的立场，另外，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劳拉·泰森（Laura Tyson）和当时担任财政部主管国际政策的副部长、哈佛教授出身的劳伦斯·桑莫斯（Lawrence Summers）也都有同样的立场。

中方竭尽所能拉抬这些人的地位，安排他们和中国在美国企业界的盟友接触，并促进中国在华府的利益。中国再拿商机引诱有影响力的美国企业人士。克林顿竞选时的大金主直接向总统游说，要求他不要破坏波音飞机售予中国的可能商机、或阻碍藉由中国火箭发射美国商业卫星，理由是这可以让美国政府省下好几亿美元。此外，中国亦以选区的经济利益为饵，动员国会议员们的支持。

到了 1993 年年底，在中国人现在称为“克林顿大逆转”（the Clinton coup）之下，这些盟友说服总统缓和其反中立场。克林顿不再如先前之承诺、会见达赖喇嘛。经济制裁先放松、后取消。克林顿政府许多亲中人士受到中国感谢，称赞他们是有远见的政治家、是“中国的友人”，让他们有机会多接近中国的决策大员。同时，中方悄悄地持续镇压异议人士。

现在似乎雨过天青了。美国又把中国视若盟友。美方认为天安门镇压殊为不幸，但只是暂时的波折。我们必须有耐心。中国人的反应很不一样。他们晓得古代霸主如何对待挑战者。

误炸大使馆

1999 年 5 月 7 日、星期五，接近克林顿第二任期尾声，美国带头和北约盟国军事攻击塞尔维亚及其盟友。两架 B-2 轰炸机由密苏里州诺布诺斯特（Knob Noster）的怀特曼空军基地（Whiteman Air Force Base）起飞，飞往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飞行员朝标明“贝尔格勒仓库一号”的目标投下五枚“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oint Direct Attack Munition，简称 JDAM）炸弹。中央情报局提供的目标资料已经经过再三检查。但是查核显然出了问题，而且导致悲剧性的大错。炸弹在半夜击中中国驻贝尔格勒大使馆南侧，炸死三名职员。*

*译注：死者确切身分为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朱颖。

这件事发生在距我首次见到白先生将近十年之后。他提供的消息没有绿小姐那么可信，但是我觉得他很有趣、还满喜欢他，因此三不五时会找他聊聊。中国大使馆被炸的当天晚上，我请教白先生，请他预测一下中国对克林顿总统的道歉会有什么反应。

贝尔格勒使馆挨炸当然是件不幸的意外事故。我晓得中国政府一定会大做文章。但我没

料到反应会有多强烈。美国绝大多数情报分析员也没料到，他们收到来自其他方面的警告，但是没当一回事。

白先生立刻断言，炸馆事件给了中国政府难以抗拒的机会执行他告诉过我们的极端民族主义。他预言：“一定会有很多天的反美暴动。”

暴动？我心想，为了这么明显的意外事故会发生暴动？美国高层官员已经道歉了耶。

他对他的预测坚定不移——而且理由充分。他晓得——也警告过我们——中国政府内反美势力力量愈来愈大。几乎就在这一刻，美国驻北京大使尚慕杰（Jim Sasser）已经突如其来遭到包围。

白先生说，中国不会把这件事看作意外事故，而是霸主对潜在对手之测试。他告诉我说：“他们会认为这是美国人的警告，是在测试中国的决心。”

暴动发生时，尚慕杰大使根本不知道白先生的预测，这些预测是白先生依据他对中国鹰派和战国战略思想的理解，认为应该受到重视而来。尚慕杰也不知道在大使馆西边三英里路外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室发生的事情，会中中国领导人把美国“攻击”贝尔格勒大使馆视为天赐良机。几个小时之内，数百名中国人在美国大使馆门外发起示威。许多人投掷石头、鸡蛋和番茄，狂呼向美国和北约“报仇”。

那个星期六下午，尚慕杰正好在办公室，他发现自己身陷围城，无法安全离开大楼。往后几天，馆外抗议人潮已激增到上万人，这位驻中国的最高级美国官员简直成了这些中国群众的囚徒，无法更衣、无法梳洗。他困在大使馆办公室里，吃冷冻军用粮食、睡地板，还没被毯可盖。

5 月 9 日，星期天夜里，抗议民众透过打破的大使馆窗子丢进两枚汽油弹，引起火灾，幸好陆战队守卫以灭火器扑熄。尚慕杰大使的夫人和儿子躲在不远的大使官邸中，民众透过餐厅窗户丢进一块又一块的水泥。尚慕杰很困惑，他拨打电话都找不到任何一个中国高层官员。尚慕杰告诉《纽约时报》说：“我不确定他们完全明白在我们大使馆前发生的状况。”

与大使的说法，或至少其希望相反的是，中国领导人很清楚状况。中国的抗议活动很少是自发的，这也是为什么十年前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活动吓坏了中共领导人。这几天的示威活动是由中国情治机关策动，其迹象就是官方认可的主要宗教团体有条不紊地陆续抵达，并参与游行——佛教僧尼、喇嘛和尚、道士、天主教、基督新教和穆斯林领袖纷纷现身。

接下来的 5 月 10 日（星期一）整天，公安人员引导示威者走到离美国大使馆相距 25 英尺的地方。许多人高喊“打倒美帝!”的口号，也唱起中国国歌。年轻人把水泥块飞过戴钢盔的武警头上丢进大使馆。大使馆职员一度开始销毁机密文件，以防抗议者冲进大楼。最后，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打电话给美国大使。针对大使馆被炸事件，他传递了中方对“美国带头

的北约组织”四项要求，其中之一是“公开正式道歉”。

事实上，中国政府很清楚，美国已为事件一再道歉。星期一，克林顿总统本人再次道歉，当着记者的面说：“我道歉，我对此表示遗憾。但是我认为，在不幸的错误和故意的种族清洗之间划清界线是很重要的，美国将继续划分清楚。”

私底下，在国家安全决策圈里，反应就和尚慕杰的反应一样，震惊、迷惑。尽管白先生预测到中国的行为，我还是与同仁有同感，尤其是中国官方对炸馆事件的反应愈来愈激烈时。中国政府宣传喉舌《人民日报》称贝尔格莱德使馆被炸是“野蛮的罪行”，又说“美国领头的北约组织”是“大恶棍”。头版的长篇大论分八点把美国比拟为纳粹德国。例如，文章指称美国的“唯我独尊的心态及称霸世界的野心如出一辙……环顾当今世界，若问哪个国家像当年纳粹德国一样想做‘地球之主’，回答只有一个，就是奉行霸权主义的美国。”

十年前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运动示威立起中国版的自由女神，现在的中国学生高举标语痛骂美国，包括复制一张毕加索 1937 年反战油画《格尔尼卡》（Guernica）*，洒上红漆。他们还用纸板制作自由女神，把脸孔换上克林顿，让他举着染满鲜血的炸弹、而非火炬。

*译注：1937 年 4 月 26 号，纳粹的空军对格尔尼卡这个城市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进行无情的轰炸，也是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空军对无辜民众的轰炸，毕加索用画把这一幕记录了下来。

我们美国情报圈人士对中国的行为有不同的结论。有人认为中国人太过小题大作，几近偏执狂，所以会有这种举动。有人认为它们最多只是做些无损大局的虚张声势，以便在其他事项上逼美方更加让步而已。但是就我所记得，没有人认为中国的反应是经过深思熟虑、刻意为之的。没有人认为我们必须重新评估对中国的策略。就我所知，没有人重视白先生提出的说法。

2001 年，美国情报机关取得一份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1999 年贝尔格莱德使馆遭炸后的紧急会议之机密纪录。这份纪录透露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真正看法。每个委员都对情势提出了分析，也建议了反制措施。事实上，白先生的警告其实还低估了中国政府民族主义的偏执程度。

江泽民说：“美国希望藉由此次事件确认中国对国际危机、冲突，尤其是突发事件的反应力量。”江泽民认为这件事可能是“更大阴谋”的一部分。政治局常委会第二号人物李鹏宣称：“同志们！鲜血淋漓的使馆事件不是孤立事件，也不只是对中国人民的欺负和挑衅；它是仔细规划的颠覆阴谋。这件事比起其他任何事，都更加提醒我们，美国是敌人。它绝不是有些人所说的朋友。”副总理李岚清说：“未来中美之间直接冲突已无可避免！”他认为克林顿总统下令炸馆是“投石问路”，旨在“确认中国对国际危机和冲突的反应；确认人民的声音、民意

的立场、政府的意见，以及它会采取的措施”。

根据这份纪录，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替美国辩护。没有人跳出来说或许有可能是意外事故。没有人提议先等几个小时再谴责克林顿总统，或是提议在发动大批学生于美国大使馆前示威之前先听听美方的说词。自从 1973 年以来我们和北京所推动的种种互动，所建立起来的友谊和信任就只有这么多。高层看不到的档案

可是，即使这些事件也撼动不了我们对中国的自以为是和乐观心态。我们认为，中国的确存在鹰派，但是他们的影响力可以也将会被更理性、更冷静的头脑所克服。我的同僚开始主张增强建设互信、降低误解。不久，江泽民和许多“中国之友”都高唱“减少误会、增加信任”。我们对中国的“爱国教育”掉以轻心。我们认为，美国人也提倡爱国教育。我们告诉自己，中国政府内的反西方分子是很讨厌，但是中国高层领导人并不认同他们。

绝大多数美国官员完全忽视中国的反美倾向。某些反美证据甚至被压下来。1990 年代某次我例行性地拜访中央情报局设在维吉尼亚州雷斯顿（Reston）的翻译中心，向一位翻译员问起，为什么报告里很少看到中国领导人反美的长篇大论。几乎所有的美国官员都依赖翻译中心的工作来了解中国领导人的心思，因为很少人真正能读中文资料——而且掌握其中许多关系重大的微言要义。

她回答说：“很单纯呀！因为我奉指示不要翻译民族主义色彩的东西。”

我大惑不解，再追问她：“为什么？”

“总局的中国科告诉我，这只会激怒华府的保守派和左翼人权团体，伤害对中关系。”

即使当时，纵或稍有动摇，我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仍未消退。尽管听取白先生提供的情报，也读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纪录，我还是没有怀疑中国。许多情报管道似乎都证明，这只是一时的现象，在这个阶段，高瞻远瞩的美国政治家应该专注在中国无可避免的民主化之上。它的经济荏弱，再加上强硬派全已是七、八十岁的老迈人物，只要华府有耐心，鹰派迟早都会被温和的改革派替换掉。当时我们认为这么多情报管道不可能都被中国情报机关玩弄于掌心之中。

当然，一路下来，我们的希望也因为一位高级间谍——绿小姐——提供我们的中国内幕情报而加强。她也一再向我们担保，北京对美国不构成威胁，我们需要共产党领导人牵制更激进、危险的中国政治人物。她与中国领导人的接触与提供给美国的密报持续左右美国官员，直到联邦调查局在 2003 年 4 月 9 日逮捕她。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的某个线民揭穿了她。她认罪，接受未申报从联邦调查局收到的 170 万美元的罪名，也同意合作，说明她给了中国什么机密。联邦法官裁定，她有权传唤联邦调查局证人、替自己辩护，可是司法部限制她在调查局的联络人受传唤，此举侵犯了她的权利，因此本案不起诉处分。后来她又被起诉，因为同

意合作，被判缓刑三年。

联邦调查局督察长有关本案的报告，建议要订定制度，对中国线民的档案要设置红旗，以防他们提供假情报。联邦调查局主管反情报作业的助理局长大卫•施札迪（David Szady）告诉一位记者，这个案子凸显出联邦调查局需要“妥为控制其线民，查验他们提供的情报”。联邦调查局从来没对绿小姐提供假情报一案的报告解密。在联邦调查局报告发布前，美国民众无法判断哪个伤害较严重——是她提供给中国的机密，还是她向美方的担保。忽视鹰派对赤壁之战的现代诠释的人，再度犯下大错。

第五章　万恶的美国——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美国

“无中生有。”——三十六计

新美中关系史

虽然美国官员当时并不清楚，1989 年 6 月 4 日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向国内民众如何描绘美国的一个转折点。虽然中共党内一直根深蒂固有被西方欺负的意识，它却因毛泽东的权力算计而有所缓和；毛泽东认为中国需要西方，才能发展成可与西方匹敌的超级大国。投奔自由者日后透露，最高层级领导人曾经考量过真正的民主改革。即使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权力分立的主张也有人拥护。到了 2001 年，从中国偷渡出来的官方文件终于完整曝露鹰派是如何扭曲事实，让邓小平及元老心生恐慌而采取镇压行动。

本书的核心主旨是要证明，有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鹰派已成功地说服中国领导人把美国视为危险的、必须取而代之的霸权。这个观点在 1989 年终于定于一尊，因此北京开始向中国人民有系统地妖魔化美国政府。党营官方媒体对内所说的，和中国向美国人民所呈现的，截然不同。鹰派毫不遮掩他们的主张。他们认定美国霸权想要推翻中国政府，且早在 1980 年代即已着手实行。中国鹰派鼓励推行“爱国教育”和反美教学，因为美国仍然对他们的对手，即温和派，很有吸引力。

的确，紧接在毛泽东邀请尼克松到访之后那几年，中国的大众文化和国营媒体大多以正面角度描绘美国。天安门事件之后，鹰派认为此风不可长，他们很快就说服政治局领导人改弦更张。美国当时可以抗议，但是美国情报分析人员和中国事务专家却认为这只是短期现象，只要这些深信马克思主义及中国注定要成为超级大国的强烈民族主义者一旦像恐龙般被自然淘汰，它就过去了。

天安门屠杀之后几乎紧跟着就发生另一起地缘政治大地震。到了 1991 年，即毛泽东的鹰派元帅们建议他“联吴制魏”之后 20 年，苏联崩溃。柏林围墙倒塌、东欧出现民主政府，以及苏联立刻瓦解，这些意味着美国在冷战大胜，这让北京慌了。它正好可以凸显中国领导人反美的偏执狂，这在天安门事件之后日益高升。在他们眼里，天安门事件是美国“在敌营播下不和种子”大攻势的第一步。在这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看来，美国差一点成功整垮共产党，若非最后一分钟决定罢黜改革派的总书记赵紫阳和政府里其他美国“盟友”，大势就不妙了。

1980 年代影响力日益上升的亲美改革派遭到整肃，使得中国知识界和分析圈出现空窗，不仅少有亲美派留任实权位置，也阻止未来这类观点提出的机会。中国鹰派的呓语原本被斥为“极端民族主义”的言论，成为党的正式路线。

接下来，中国政府实质上创造出中美关系的“另类历史”，把美国描绘成几乎是真实美国的另一个邪恶的孪生兄弟，他伤害中国人民的纪录罄竹难书，尽管事实上美国人努力要帮助中国。让人更加摸不着头绪的是，当中国领导人下令它的大众文化展开反美攻势，可是当着美国领导人的面又假装很惊讶会有这种攻击。许多外交官和美国人都听过，我自己也听过无数次，每当特别不符外交礼仪的反美言论传到西方时，就有人跳出来说：这只是一小撮强硬路线保守派的观点，他们不是共产党领导阶层的“主流”。

现在许多新世代中国人民对美国的认知完全不同于大多数美国人民——它说，过去 170 年，美国试图主宰中国。中国把美国的国家英雄，包括林肯、威尔逊、小罗斯福总统，描绘成“邪恶首脑”，处心积虑掌控中国官员及其他人，削弱中国。至少在某个程度上，这个歪曲的历史观扭曲了他们目前对中美“合作”的观点，许多人认为这是美国打压中国的远程战略当中的过渡阶段。

美帝恶行

从 1990 年起，中国改编教科书把美国描绘为霸权，过去 150 多年试图抑制中国崛起、并且破坏中国文明的精神。它把这种再教育工作贴上看来中性的“全国爱国教育计划”的标签。投奔自由者白先生已经预测这些课程会重启自毛泽东政权最初时期——即比向美国示好更早以前——即已冬眠的对美历史的扭曲观点。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即是 1951 年由王春所写的教科书《美国侵华史话》，它在 2012 年发行新版，编者在网路上附加一段评语，宣称这本书的教训历久弥新：“《美国侵华史话》这本书绝版已久，（我们重新付梓）……虽然年代久远，书中的史实依然正确。它们不因时间变动而改变。”这段话贴在应该算是温和立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网页上。

当我 2013 年秋天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时，看到这一宣传骇人的例子。中国共产党鹰派和自由派改革分子长久以来即为他们历史的事实和如何表述有争议，因此自从毛泽东掌权以来，这个博物馆关馆的时间比开放的时间要长。博物馆 1961 年成立，就在天安门广场旁边。1966 年文化大革命一起，它就关馆。邓小平 1979 年开始开放中国的经济，他重新开放这个国家历史博物馆。但是博物馆在跨入新世纪后不久，又在 2001 年关馆。花了 10 年时间、斥资 4 亿美元整修，中国领导人才在 2011 年让它重新开放。他们希望达成两个目标。第一，他们希望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比罗浮宫、大英博物馆和大都会美术馆都大。地面层的入口大厅就有十层楼高，长度几等于三座足球场。在它的二楼是三座巨鼎。（我可不像中国传说中那位可怜的楚王。我没有问鼎有多重。）

中国赋予这个博物馆的第二个目标是，叙述“一个伟大的国家，其人民勤劳、勇敢、聪明和爱好和平，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的故事。当然，一个国家的历史博物馆会替自己的历史文明说好话，这无可苛责。然而，让我对中国这所博物馆感到惊讶的是，它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关系的描述，以及刻意省略不描述的史实。

在命名“复兴之路”的常设陈列室里，博物馆展示出执政党对 1840 年至今天的现代中国史的诠释。历史开始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大规模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包括美国在内，这些“帝国主义列强”“蜂拥而至，掠夺财宝、屠杀人民”。它影射 1900 年的义和拳之乱，说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地抗击外敌入侵”。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性选择”，而它舍弃“反动派”蒋介石的“独裁”，选择了毛主席“为争取和平民主积极斗争”的中国共产党。

藉由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拜党的领导，“伟大的国家”打造“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在享有“完全的开放”。未来，中国人应该“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它略而不提的是，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得胜靠的是陈列室所说的恶棍——“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军事干预；美国投资和美国市场是中国突飞猛进的出口成长不可或缺的助力；中国的科技进步依赖的是与美国签订近百个科学交流协定。我只看到一张美国人的大照片，影中人在义和拳之乱时大剌剌坐在紫禁城皇帝龙椅上，对皇帝大不敬。展示没有交代为什么美国人来到中国，访客离去时得到的印象是：美国人的首要目的是征服和羞辱中国。照片旁边是一张军用地图，显示拳乱之后，包含美国在内的八国联军屯驻在中国各地。

中国外交学院三名研究生应我之邀，陪我一起参观博物馆。他们接受培训要当外交官，

从中国共产党政府的角度看，全都受了良好教育。可是，他们不知道义和团杀害十万名中国老百姓；不知道美国人在二战期间援助中国；也不知道从 1959 年至 1962 年，有两千万中国人死于毛泽东的政治运动和大饥荒；更不知道 1966 年至 1976 年的文革害死数百万中国人民、关闭了大学、撕裂了中国。虽然他们听说过天安门广场抗议事件，他们晓得明哲保身之道是别去谈论它。

这些研究生是邓小平在天安门广场屠杀后一项决定性的产品——屠杀就发生在对此事件只字不提的博物馆旁边、仅有两百公尺的广场。1989 年后，邓小平决定和李鹏及其他强硬派结盟，以巩固党的控制。中共领导人誓言绝不再容许中国学生树立自由女神、引述美国《独立宣言》，或崇拜美国价值，甚而把它们当作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的信条。不到一年，教科书被改写，美国人被描绘为欺凌中国的大恶棍，新的政策和规定确保只有这一个官方对美国的诠释可以进入中国的教室和图书馆。

中国最新版的历史课本中，第一个美国恶人是约翰·泰勒（John Tyler）总统。1844 年签署的中美《望厦条约》，毛泽东称之为“美国侵略中国所签下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根据发给中国学童的这份教科书，望厦条约是美国操纵中国的跳板，它开启美国“非法剥削中国”的门户。泰勒和美国人选择“以逸待劳”之计；他们还没有实力主宰中国，但是美国愿意等候时机成熟。实际上，泰勒只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意外继任、几乎让人遗忘的总统，大部分美国民众会记得他，都只是因为他的名字出现在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竞选口号“蒂珀卡努和泰勒”（Tripecanoeand Typer Too）的后半段上。*可是在中国鹰派眼里，泰勒是个邪恶的天才，为美国完全霸持中国文明的大计划铺下基础。

*译注：约翰·泰勒于 1840 年以副总统的身分参与总统选战，总统参选人是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哈里森是第一位主动提出竞选宣传的总统，口号即“蒂珀卡努和泰勒”，其中蒂珀卡努指的是哈里森于 1811 年军旅生涯中、在俄亥俄州击溃印地安人的胜利。他们当选之后，哈里森于 1941 年去世，泰勒遂继任为总统。

泰勒首当其冲之后，下一个被批为反中首脑的美国领袖是林肯。在美国，林肯当然受到后人缅怀追思，是个维系住联邦、解放黑奴、为原则而牺牲性命的英雄。可是在中国，他只是凶残霸道的美帝打手。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认为林肯希望“中国在国际社会内受宰制、甚至受剥削”。根据这个版本的历史，因此林肯派外交官蒲安臣（Anson Burlinggame）跨过太平洋，促成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正常化。根据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梅仁毅的说法，1868 年的《蒲安臣条约》强迫中国“遵守西方文化规范”。它打破中国固有仪式和礼节制度、

换上西方外交传统，一圆林肯的由美国控制太平洋之梦。**

＊＊译注：林肯总统 1861 年上任不久，即派蒲安臣为驻华公使。他在任六年，坚持不威胁中国的领土完整，也因此赢得清朝政府的信任。卸任之后，应恭亲王奕欣的提议，满清政府委派他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代表中国政府出使美、英、法、普、俄诸国，进行近代中国首次的外交活动。1868 年，蒲安臣代表中国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在华府签订《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它是晚清时期第一件相对平等的对外条约。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美国更展现其真面目。1900 年义和拳之乱，美国参加八国联军，击败“扶清灭洋”的义和团爱国民众。八国联军一路奸淫掳掠，迫使中国人民赔偿 610 亿美元（换算成今天的币值）。美国不但“趁火打劫”，还“借刀杀人”，诱使其他国家攻打中国。

义和拳乱之后，中国可能国势衰颓，但肯定还没有出局。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协助盟国，当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承诺在凡尔赛要坚持人权与民族自决时，中国怀抱莫大的期望。根据中国版本的说法，威尔逊的自由之梦及全球军事合作确保和平，是个狡猾的诡计，诱拐全世界支持美国的霸权侵略。根据邓蜀生写的教科书《美国历史与美国人》，威尔逊要“把整个中国纳入美国势力范围”。因此，他把夺下来的德国殖民地山东半岛交给日本，没有返给正主中国。就像战国时期口是心非的霸主，威尔逊秘密地颠覆一个弱国。很不幸地，1919 年，遭美国“出卖”的新闻立刻掀起所谓的五四运动，它触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促成中国共产党在 1921 年建党。

根据中国分析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描述，日本 1931 年侵略满洲以及 1937 年入侵中国本土，乃是美国要让亚洲两大国家陷入不断争战的阴谋，才能阻止它们任一个崛起并威胁到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优势。济南大学历史学者唐青（Tang Qing，音译）说明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sevelt）总统如何“造成中国人民在抗战时付出更大牺牲”，因为“让中、日缠战，以中国为抗日根据地，推动中、美战时合作，有利于美国，美国日后才能完全主宰中国及全世界”。邓蜀生认为，罗斯福“要负最大的责任，把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喂大”。罗斯福就像战国时期的霸主，“坐山观虎斗”，等待中、日两国都大部分毁灭、无力抵抗美国的控制。他“隔岸观火”，然后“假途灭虢”。

中国领导人到现在已经近乎无法无天，尽管尼克森对中国的开放根本是由北京发动且热烈欢迎的，现在他们却改口称为是美国想要宰制中国的奸猾计划的一步棋。北京新编撰的故事说，尼克松希望挑拨中国与苏联两个共产主义大国爆发核子战争。尼克松就和罗斯福一样

也玩坐山观虎斗的伎俩，美国日后才好以全球救星之姿出现，成为硕果仅存的超级大国。在这个故事中，料事如神的毛泽东看穿美国的诡计，他让尼克松访问中国只是因为北京需要有个盟友对抗苏联，即使它日后会试图出卖中国也不妨。以三国时期蜀能赢北魏为例，毛泽东的一名高级将领建议毛主席“联吴制曹”。

《较量无声》

根据中国版的现代史，美国利用贸易、经济合作、技术转移、外交、文教交流，以及民主改革的压力，从内部削弱苏联。用战国时期的术语讲，它以甜言蜜语引诱苏联青年和理想主义者，然后利用他们当“内奸，在敌营播下失和的种子”。

在中国战略家看来，这是美方高明的算计，利用苏联的错误；中国人誓言绝不上美国人同样手法的当。2013 年，相当于美国西点军校的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制作九十分钟的电影《较量无声》，形容美国无所不用其极地渗透中国社会，“瓦解中国”、“洗脑政客”，再次企图推翻共产党执政。美国的罪魁祸首包括傅尔布莱特奖学金（Fulbright Fellowship）、福特基金会（Fold Foundation）、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联合军事演习，和其他美、中菁英交流机制。中国唯有在“谨微慎小，建立强大的政治和意识型态防线”下，才能抵御美国斗垮苏联的“所谓的民主力量”。

中国人也改写冷战史，把数十年的冲突描述为美国要实现全球霸权的战略计划。中国电视经北京批准、2013 年十月播出迷你影集，把里根时期苏联帝国的崩溃描述成美国要诡计的结果。苏联不是因为一般所认知的共产主义制度自己支撑不了而崩溃。它是上了美国的当才崩溃的。

中国共产党官方版本的这部美、中关系史当然是子虚乌有。约翰·泰勒的《望厦条约》是亲中国的条约，不仅与中国建立正式邦交，还给予中国港口最惠国待遇，废除不准美国人学中文的禁令。亚伯拉罕·林肯根本没有时间去想中国，他的特使蒲安臣所谈判的条约对中方有利；它承认备受欧洲列强威胁的中国主权，订立 19 世纪相当于今天解决冲突的“热线”之机制，以消弥侵略和误会。义和拳乱时，美国带头限制外国士兵胡作妄为。伍德罗·威尔逊在凡尔赛当中，以把青岛归还中国当作谈判的优先项目，虽然最后不幸失败，但他已尽心尽力。根据西方学者的说法，威尔逊竭尽全力要归还中国领土，甚至冒了日本退出和会的风险，并且他取得日本承诺归还领土，只是日本后来失信。富兰克林·罗斯福根本没有要征服中国，他提供美援、介入太平洋事务，并与日本开战救了中国。理查·尼克松从来没有设想他交好中国会激发核子战争，而天安门广场抗议事件是中国学生追求建设美好中国的结果，不是有哪个美国组织想要摧毁中国。

由于中国领导人整体而言没有接触到正确的美、中关系史，2012 年 6 月中国作家向我警告，说什么奥巴马的反中计划北京老少皆知，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讶异。

真正熟悉美国历史的中国学者和官员，就不会鹦鹉学舌、复诵官方说词。他们很少主动向美国访客提到这些反美观点。他们不是刻意不诚实，只是难为情需要教这样的历史。2013 年秋天访问北京时，我试着直接请教一位教授他在课堂上使用的一些教科书。他所不知道的是，我已经取得他的教学大纲和课本。

我请教他：“我很好奇，我在您书中读到有关泰勒、威尔逊和林肯的许多事迹。说白了，你形容他们的中国政策是‘邪恶的’。”

他脸色苍白、舌头打结地说：“喔，我们最近从美国档案中得到微缩片文件……”

我答说：“我知道，我也看过这些文件。我只是在我们美国教科书中找不到任何地方有这些反华政策。事实上，我们当年似乎很支持中国。如果我没记错，美国开国先贤，尤其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佛逊，非常敬佩中国的制度。”

他望向窗外，叹了一口气，说明他的困难。“教科书材料不是我选的。所有的老师都是党员，而中央保管我们的人事档案。偏离核定的教材，我们的前途就完了。”

我露出同情的微笑：“你是说，这是上级做的决定啰？”

他答说：“是的。”

同一个星期，至少是我第 15 次访问颇负盛名的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由于它规模太大，在主建物里容不下，因此搬出十五层楼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设在相距三英里外的另一地点。我和美国大使馆的代表团一起到访。

所方安排在五楼接待我们。不幸，电梯故障，我们必须从水泥楼梯拾级而上，我们团里一些上了年岁的人走得很辛苦。到了五楼，我们成一排走过一道灯光闪烁不明的水泥廊道。我经过这个积灰、光线幽暗的走廊时，注意到每个单位门口挂着他们研究分组的招牌，如美国战略、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

进到会议室，所方安排 16 位中国学者和我们座谈，他们大多年纪四、五十岁；全都穿着当年在美国当研究生时所穿的美式穿着。

所长黄平是伦敦政经学院博士，致词欢迎后展开座谈。隔了 20 分钟左右，我提出几个问题请教中方是如何描述美国。

各位先进，我费尽工夫搜寻，却找不到一个例子可以告诉我有作者提到美国对中国发展有正面贡献。近来我读到一本历史佳作，谈论西方人对中国的贡献，那是耶鲁大学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教授写的《改变中国》（To Change China）。书里头提到传教士协助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献，以及美国如何交还庚子赔款、以它建立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

一清华大学。在座二十位先进，有没有哪篇文章表示感谢美国对中国的援助？有没有任何教科书或论文宣称美国在中国的百年羞辱期间协助过中国？有没有人写过，自从 1978 年以来，我们的专家认为中国一半的增长率是因为美国支持以中国为投资地而产生？有没有文章或书籍谈论美国如何降低关税，并在银行、科学和海洋发展方面提供指导？我一直没办法在任何一本中国教科书中找到承认的叙述。显然我疏漏了。哪位先进可以举个例子吗？这下子全场默不作声，中方学者彼此尴尬面面相觑。

有位学者嗫嚅地说：“我们在美国留学时读过你们协助我们的这些故事，但是它们没列在我们官方审订的课纲。”

走出座谈会场，我拿到一些书本和文章，它们叙述小布什和奥巴马总统包围和封锁中国；掠夺其海洋资源；封锁其海上航线；瓜分其领土；协助中国境内叛徒；煽动暴动、内战和恐怖主义；从航空母舰攻打中国等等计划。如果中国领导人是这样看待历史，他们对未来的观点会让人惊骇的不会是他们对美国的种种作为扯谎，让人惊骇的是他们真正相信自己的宣传。

起初，我根本无法相信在中国有头脑会思想的人会相信，从泰勒到奥巴马历任美国总统会晓得战国时期的战略思想，并且决定运用这些玄妙莫测的概念来对付中国。但是后来我发现，中国有许多人认为这些战略原则是普世真理。他们晓得美国是世界最强国家，他们以为美国会像战国时期每个霸主一样，自私、狡猾、冷酷。“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在 2002 年的报告里说：“中国领导人不断把美国定性为‘霸权’，意即强大的劲敌和高傲的恶霸，是中国的主要竞争者。”

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还说：

> 中国传统上只会把与它保持高度敌对关系的外在势力定义为霸权……中国领导人相信美国的根本动力是，透过肆无忌惮地追求“权力政治”以维持全球霸权，而且经常伪装为追求民主化……它认为，美式民主自由主义和美军在亚洲周边的部署威胁到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这个观点影响了它对美国国力的战略评估，以及它在公共领域里赋予美国的形象。

中国以美国在海外几乎每一桩干预作为例证，不问它们是否有利于对方。委员会提到：“北京把美国轰炸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比拟为纳粹德国；它把美国介入波斯尼亚和科索沃贴上企图维持美国在欧洲霸权的标签：它把北约东扩定性为围堵和包围中国的野心；它又批评美国发展弹道导弹防御造成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

简单讲，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企图主宰中国已经超过 150 年之久，而中国的反制计划是竭尽全力反过来主宰美国。中国领导人认为全球环境基本上是零和之局，他们认为从泰勒以降，“美帝”长期以来仇视中国，中国计划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毫不留情对付美国。

如果中国领导人不预备根据他们的错误观念行动，中国怎么看美国就不是一个大问题。

固然乍看之下中国似乎没有预备以美国为对手，铁一般的事实是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是他们志在必得的全球斗争中的敌人。中国对中美关系的理解说明了为什么它不断地协助美国的敌人蚕食美国的力量，尤其是美国的反恐战争。例如，911 事件后，中国政府制作一卷录影带《行动中的五角大楼》(The Pentagon In Action)，根据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的报告，它把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描绘为明智的理性声音，“买力地把美国政府描述为受伤的恶霸，它的霸权力量和自我受到挑战，因此执迷于鲁莽的军事报复。”

中国鹰派建议邓小平发动诋毁美国的运动，大体上已经成功。他接受了中国人对古代霸主普遍又深刻的认知。

邓小平评估国内、国外的“势”。他抛弃 1969 年至 1989 年已经 20 年的对美修睦。不过他没有大张旗鼓，以免惊动美国政府。他不再需要可以反制百万苏联大军兵临城下的威胁。美国方面，很少有情报官员认为中国领导人真正相信他们对美国的评语。华府没有人把这些反美言论认真当一回事看待。很少有西方领导人在公开场合提起它们；大多数人则根本没注意到。因此这种诬指美国奸邪的言论从来没遭到反驳。少数提起这个话题的人则被告知，中国只有少许不在核心的鹰派人物有这种观点。

抹黑战

数十年来，中国领导人试图控制国内及国外对中国的政治讨论。为推动这个目标，中国领导人建立一套编造舆论以影响外人对中国及其政府观感的制度，它要诱使美国这个对手协助中国崛起、并且最终超越美国。从 1995 年以来，中国领导人晓得要赢得百年马拉松，必须建立强大的宣传体系，在外国媒体上潜移默化对中国的观感。成本固然高昂，但攸关的利害实在重大。

中国领导人不仅不相信美国；它也不信任美国的媒体。在 2013 年底，中国还在筹划要把 20 多个美国记者赶出中国。许多记者并没得罪中国政府，他们之所以受到制裁是因为中方认为他们的雇主《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其心可议。2012 年 6 月，彭博社发表一篇文章，揭露习近平的家属聚敛财富。同年 10 月，《纽约时报》报导在任总理温家宝的万贯家财；然后它又在《纽约时报》拥有的线上中文杂志跟进一则类似故事，报导 J·P·摩根公司付秘密顾问费给温家宝的女儿。中国封锁其网民进入彭博社和《纽约时报》的网站。中国政府把美国记者当成又是一伙想策反中国人民、阻止中国正当崛起的帮凶。

今天，这种思维在中国菁英圈中不仅司空见惯，还变本加厉。戴旭上校是个有影响力的军事战略家，也是中国国防大学教授，经常以指控美国策划的阴谋而登上中国新闻头版。如果不是中国政府默许，这是不可能的事。比如，他在 2013 年指控美国在上海制造 H7N9 禽流

感，发动“生物心理战”。他经常提出警告，指称美国企图将全球人口降低百分之二十、秘密控制中国的工业，也想把中国分裂为好几个国家。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并未察觉中国在今天、甚至在过去，都把美国当作恶人。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于 2004 年委托马里兰大学进行一项重要研究，“就中国长期以来报导美国的讯息和调性提供经验证据”。研究发现，“美国投入资源不足，未能搜集、翻译和分析中国的著作与文告。因此，它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对美国的观感了解有限。”

中国有影飨力的鹰派或许从来没看过美国电影《刺激惊爆点》（The Usual Suspects），其中凯文·史贝西（Kevin Spacey）饰演的邪恶天才，伪装为说话温柔、肢体残障的傻子，骗倒众人。他们肯定会喜欢这个大骗子的经典名句：“恶魔最高竿的诡计就是哄骗这个世界他并不存在。”他的意思是第一流的诈术隐匿了它的存在。中国的鹰派企图隐匿中国统一指挥调度的抹黑动作。中国希望得到美国投资、贸易和教育的好处，以及华府善意宽容中国崛起。因此他们需要中国端出友善的面孔。

可是，中国鹰派另一个战略目标似乎是妖魔化美国政府，破坏美国政府模式在下一代中国文武官员和政治领导人心目中的魅力。鹰派深怕若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和选举持续扩散，会引发民众对北京政府的不满。可是，到美国留学，研读理工科学、企业管理和其他政治上安全的科目则不妨——今天中国在美留学生高达 24 万人。

中国的鹰派认为他们已经找到方法降低美式政治模式在中国的吸引力：要求中国温和派否认抹黑攻势的存在，并期盼美国玩忽大意。

第六章　网路警察——滴水不漏的言论统战

“移花接木”——三十六计

从勾践复国到中央统战部

中国的马拉松策略非常依赖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善意。善意转化为大量的外国投资、购买中国的商品、当政府或国有企业偷窃技术或违反世贸组织规定被抓到时予以宽容，以及对侵犯人权视若无睹。西方国家曲意容忍，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以为，中国整体正在走向更自由的市场、有建设性的国际合作，以及政治自由化的“正确”方向。

对中国有这个理解，或者更精确地说是误解，不是意外也非天真无知的结果。过去几年，我和其他专家从中国投奔自由人士和异议人士那里获悉，北京有一套细腻的系统能潜移默化外国人对中国情况的认知，以确保西方的偏见和一相情愿的思想。主管这一系统的是中国高

高在上的第三号领导人。

博客是中国民众把真相揭露给西方记者的重要管道，异议人士、艺术家艾未未因泄露一项秘密打压博客的行动而被捕。“无国界记者”组织详细报导，艾未未“讽刺（他受到中国当局）监视，在自己的办公室和卧房装了四个网路录像机，把他一举一动 24 小时全都录下。不到几小时，他的网页就被关掉。”艾未未晓得当局玩什么伎俩——中国政府最高层以假象争取外国政府、决策者、学界、记者、企业领袖和分析家的好感。它的手法圆滑细腻，远超过一般的公关宣传。它是马拉松不可或缺的一环，以哄骗霸主上当。他们这个秘密行动历数十年之久，外界大多不知不觉，的确了不起。

自从 1960 年代以来，美国决策者被诱导相信中国是个落后、没有军事野心的国家，而且铁定不认为美国在军事上构成其威胁。这是北京领导人传递给西方世界的讯息，且成效极好。1999 年，《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主任郇培德报导：“今天证据显示中国虽努力想要在实验室中取得尖端科技，它只有很少的专业知识和资源去建立成为现代军事大国所需的工业基础。”

最早让人意识到这一切恐怕不正确的是，同一年西方人士接触到一本热销全中国的书《超限战》。这本书因用词直率、大谈美国弱点，在中国军事圈造成轰动。作者建议不用采取直接军事行动，可以透过以下非军事手段击败强大的美国，例如法律战（即利用国际法、国际机构和法庭。限制美国的行动自由和政策选择）、经济战、生化战、网路战，甚至恐怖活动。这本书引人侧目还有另一个原因：乔良和王湘穗这两位作者是解放军上校。

这本书出版的消息一传到西方，北京很快就把书撤下书架。中国政府极力澄清它不代表官方想法，可是书是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两位作者在书出版后都获得晋级。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国遭到恐怖攻击后，中国网页上报导，乔良说美国伤亡者是“美国政府政策的牺牲品”。2004 年，他与其他人合作又写了一本畅销书，讨论今天的国际政治与战国时期相似。

有一群美国亲中学者和企业领袖立刻跳出来替北京辩护——标准说法是两位作者仅仅位在中国思想界的“边陲”，他们的主张不值一哂。美国政府的官方翻译机关甚至不肯翻译这本书，直到我在五角大楼任职的单位提出正式要求。甚且，美国官员还邀请本书作者在 2005 年（及 2013 年）访问华府，或许理由根据是：等到他们有机会见识到美国真相，他们会抛弃书中提到的观点。可是，王湘穗又写了一本书，讨论战国时代给予我们这一代的启示。中国鹰派并不介意被认为是无足轻重人物；王湘穗亲口告诉我，因为“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力”。

中国政府的运作方式独树一格。它的领导人不会铺红地毯欢迎批评他们政府的学者和记者当座上宾。现在大家都知道，北京推动有助于其路线和长期策略的讯息、肃清不利他们的言论，而且手法强悍果决。和天安门事件后一样，政府修正官方中国历史，严惩不符路线要

求的人士。假设美国决策者或一般大众清清楚楚看到中国政府高阶层内部充满怨恨的反美思想，你不妨想像它对美中关系会有什么影响。北京知道，这种事万万不容发生。因此，由北京高层领导人督导的一项天衣无缝、神鬼不知，且又极为大胆的舆论控制行动，迄今仍在进行。其实，这项行动美国情报官员许多年前即已知情。

我在 2003 年首次从一个中国投奔自由者——我称之为“李小姐”——口里听到有这项行动。她在和一群美国官员谈话时，举战国时代一则历史故事做说明。西元前 490 年至 470 年时，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就有如今天的美国和中国：夫差是现存霸主，勾践是挑战者。夫差先把勾践俘虏。这位霸主的“鹰派”大臣伍子胥力谏夫差杀了勾践。伍子胥一向疑惧可能的威胁，亟欲杜绝后患。他提出警告说，勾践有一天会逃跑，恐怕会不利于吴国。其他大臣私底下勾结勾践，串连起来进谗言、抹黑伍子胥，搞得夫差决定伍子胥该死。经过一番政治斗争，夫差派人送一把剑给伍子胥自我了断。这个故事被拍成电影，其中一段情节是，伍子胥留下一句名言，他日勾践进城灭了夫差时，可要把他的眼睛挖出来挂在城门，“目睹”夫差的下场。

勾践同时说服夫差，准许他担任大王三年仆役以换取自由。勾践并立誓日后听候吴王的差遣。当吴王生了怪病时，勾践还以尝粪替他诊治以示绝对效忠。

然而，勾践一获自由就背弃承诺。果如伍子胥预料，勾践一心报仇雪恨。他卖种了也不会发芽的熟谷给吴国，因而造成吴国的大饿荒。然后他攻打吴国，擒拿夫差。夫差被俘后羞愧难当而自杀，勾践终于成就霸业。

李小姐告诉我们，这个故事是今天中国与西方交往时的战略指南。她说，美国有如夫差，被周遭别有用心或愚蠢的大臣包围，漠视忠臣对敌人意图提出的警告。按照李小姐的说法，中共领导人就是现代版的勾践——卑躬屈膝地承诺和西方交好，以等候适当时机反扑。北京就像句践，虚与委蛇而笑里藏刀。同时中国领导人“蓄势待发”，等候最适当时机出手，有如勾践坚忍守候吴国人困马乏时才一举加以征服•

后来我在 2004 年访问中国时，向好几位学者请教这则故事。他们对它都很清楚，并再三琢磨，甚至提点我去找些谈这则故事的书本和文章好好读一读。有本书的作者说：“若志在天下，则更须藏拙守朴。别让人知道你胸怀大志。如果锋芒毕露，就会招致杀机……勾践的成功是个奇佳实例。”有位解放军作家评论勾践遵循的原则是：“按兵不动，创造有利的战略条件。”李小姐说，中国正是按照这个原则和西方打交道。

李小姐叙述中国领导高层有个秘密单位，负责仔细控制媒体，确保只有“正确”的讯息才能传出中国。她说，关键就是藉由在国内管道散布讯息，打造传出到外国（尤其是美国）的讯息。她曾经听过美国人搞行销说过的一个比方：啤酒卖得好，重点不在品质，而是经销

管道的数量多不多。她提供三个证据支持她的说法，不过没有一个能百分之百证实她的主张。她的重点似乎不可置信：中国领导人花费极大时间和精力控制中国国内的资讯，以求它们直接影响外国人对中国的认知。美国政府利用外交和策略性沟通把它的形象彰显出去。但是，试想一下，要控制美国每一媒体机构、每份地方报纸、每家电视台，以及每个博客，以便影响外国人对美国的认知？这是不道德的，至少在美国是非法、不可能的。白宫幕僚和总统的民调顾问不能下令《纽约时报》和美联社要刊登什么消息。

她告诉我们，中国政府如何例行地监视批评政府的异议人士，有时甚至予以消音。她说，鹰派经常和温和派为如何设计特定讯息而争吵。这个说法吻合白先生提供的资讯；白先生曾透露，强硬派在 1980 年代控制中国共产党宣传机器，和温和派为如何向国内民众妖魔化美国吵不停。他们从驻外使馆、甚至中国情报机关收集反馈，因此可以适时调整讯息。

她透露这项行动的年度预算为 120 亿美元，主管机关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政治局常委们每周开会一次，花很多时间编造讯息，然后交由控制全国报纸、电视节目、海外发行杂志以及中国网际网路的宣传系统去扩散。这项行动的另一个关键角色是中南海对街的一个秘密单位，它的总部有 1000 多名员工。它就是中共中央统战部，下辖情报搜集与分析部门。我曾在 1999 年拜访过这个单位，但是它的负责人告诉我，统战部的重点是“国内”议题。我们并不了解它的双重意义。这些单位在中国领导人直接控制下，联手确保唯有正确的讯息先传播到国内，尤其是外国居民。这或许说明为什么中国的对外宣传带有只有中国人才懂的成语和口号。

李小姐举这项行动影响的第一个例证是，它要影响 2000 年美国国会表决美中贸易正常化，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两者都将带给中国极大的经济利益。这项行动的成功关键是得在中国国内及国外掩盖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放弃社会主义经济的消息，而要显示中国温和派改革人士希望走向自由市场，并且很可能会成功。北京需要以这套说词争取一般持怀疑态度的美国国会的支持。

她举的第二个例子是，北京如何设计讯息来化解克林顿总统逼中国谈判让达赖喇嘛回西藏的压力。中方的目标是藉由夸大他的政治要求、妖魔化达赖喇嘛，污蔑他是政客而非宗教领袖，是“披上僧袍的豺狼”，然后另外推崇其他西藏人领袖。

她举的第三个例证是北京如何破坏美国对中国人权运动者的支持，尤其是原本是中共高级干部、而今流亡海外者。在她所举的三个例证中，她说她觉得影响美国国会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一案最为成功。

虽然李小姐的指控让我们许多人大为惊讶，美国政府内外已有些人怀疑中国已将黑手伸向国会和白宫。1996 年，联邦参议院在弗雷德·汤普森（Fred Thompson）和约翰·格林（John

Glenn）两位参议员提案下进行调查，发现中国企图直接影响美国政治过程。中国的这项计划，完全违反美国的竞选经费法，试图以现金直接资助国会“友好”议员的竞选。2000 年 3 月，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呈交一份没有列为机密的报告，提到北京“监测及影响……全世界对中国的观感”。报告指出，中国的目标之一是搜集“可能影响中国利益的各国关键人物及发展的情报。渗透美国情报圈是中方一项重要目标”。李小姐说，由于参议院的调查使得行动曝光，中国在 2000 年已经停止直接捐献给美国政治人物的作法。但是中国并未放弃干预美国的政治运作。它另寻合法手段以达成相同结果，如传递中国媒体和智库的讯息给它在华府的盟友，以及从源头控制国内媒体，不让刺耳的消息打草惊蛇惊动霸主。李小姐的叙述透露出中国远比我们想像厉害多了。

孔子学院

李小姐说明。多年来中国都将各国的决策人士分门别类，标准是他们有多配合北京传播有利于中国的言论。中国驻外重要使馆成立“友好委员会”追踪这些人言行，评估关键政客、企业领袖和媒体人士，把他们依友善至敌对排出顺序。中国把它认为对中友好的人士称为“亲密友人”。在美国，这些人包括车载斗量的学者和前任、现任政府官员，其中不乏来自两党的美国国家安全政策顾问。

前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专业顾问威廉·崔普勒（William C. Triplett II）是两本有关中国书籍的共同作者。他创造“红队”这个名词称呼被视为亲北京的美国专家，判断的标准是他们大多不是看不透解放军的真相，就是刻意避而不谈。立场南辕北辙的一群中国事务专家则被崔普烈称为“蓝队”，这群分析家自认和亲中专家意识型态针锋相对。很显然，被贴上“红队”标签的人很厌恶这个标签，也否认受到中国愚弄。他们坚称中国政府没有骗他们、也没骗任何人。

中国政府发给中国媒体人员的正式指示，强调中国必须支持“红队”成员——用中国政府的话说，这些“熟悉中国”的美国人可以是“中国公共关系的好帮手”。就这一点而言，北京在美国不乏“好帮手”。“亲密友人”受邀到中国参访；可以接触到各级领导人及学者；受到媒体赞扬；有时候还得到政府的委托计划或投资机会。他们的中方对口单位能够侃侃而谈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也警告说中国若被外国政府或国内异议人士逼得太紧或是批评过甚，恐怕无力推动改革。主调很清楚：中国不是威胁。美国应该协助中国和平崛起为大国。

北京官员很重视美国的某些中国事务专家可以作为重要喉舌，表达北京的观点。我知道的，因为早在“红队”这个名词出现前，我就是“红队”队员。我们彼此都认识，统统凑起

来大约可以装进一座普通大小的演讲厅。因此中国相当容易监视我们的讨论和文章，以研判谁是他们同伙、谁又不是同伙。中国领导人明白，他们若能影响这伙学者中足够人数，他们的观点可以散播到其他作家、分析家、决策者，以及向专家请教北京的政策方向的新闻记者。

中国有许多方法将手伸进美国的学术和舆论中心。哈佛大学历史学者谭若思（Ross Terrill）形容这个过程是，“从与中国的生意往来上捞到好处的美国商人或其他成功人士，与美国机构之间的共生关系。”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大量捐款给美国智库与大学，赞助支持北京观点的对中政策研究。这就是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指挥的亲中大合唱，它是赢得马拉松的关键战术。

为了争取更多盟友，中国在 2004 年发起一项极聪明的行动——在全球各地广设孔子学院。北京政府有多么重视孔子学院，从它派国务院副总理、也是第一个女性政治局委员刘延东主司其事，就可见一斑。孔子当然是传递中国亲善形象的完美象征。在西方，这个名字令人想到一个时常说出醒世名言的良师、爱好和平的哲学家。

就官方而言，孔子学院提供中国语文和文化课程给有志学习的外国人，通常与各地大学合办。但是它们也漂白中国历史，向外国人描绘中国是个爱好和平、快乐的国家，而孔子是了解中国文化唯一的典范。孔子学院鼓励将《孙子兵法》重新诠释为无关于暴力的智慧结晶。各国学生听了许多儒家圣贤高风亮节、仁民爱物的故事。和平与真诚被誉为中国文化首要的美德。按照中国政府网站的说法，孔子学院是“强化中国与世界友好、合作的桥梁，在全球普受欢迎”。

过去十年，全世界约 350 所知名学府，如斯坦福、哥伦比亚和宾州大学，都与中国合办孔子学院。中国多么重视对美工作呢？全球五分之一的孔子学院设在美国。那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四倍。

《纽约时报》2012 年报导：“对于财政困难的大学校方而言，孔子学院犹如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不仅带来北京培训、付薪的语文老师和教科书，还支付院长薪水和一项公共事务计划。”学校还得到数十万美元，另有机会为各种特别计划争取经费。这些钱全来自“汉办”，有一份刊物形容它是“中国政府的一只臂膀，由教育部长担任主任”。汉办的主任是刘延东，由国务院十二个部委派高级官员组成。《国家》（Nation）杂志有一篇长文介绍汉办，它说：“汉办是一个党国工具，以向国际推广教学的形式运作。”

2011 年，北京政府的英文报《中国日报》在《纽约时报》刊登两页广告，夸赞孔子学院的好处，声称它“全力以赴满足外国学生的需求，对开发多元文化做出贡献”。广告又说，孔子学院“课程专注文化和沟通，避免意识型态内容”。但事实不是如此。

曼荷莲学院（Mount Holyoke ollege）中国文学教授强纳生·李普曼（Jonathan lipman）

提出警告说："孔子学院名义上投吾人所好，说是要推广中文，实际上却强渡关山，把中国政府带进美国学府。"迈阿密大学一位教授同样也说，中国慷慨解囊是有条件的："你被告知，不得讨论达赖喇嘛，也不能邀请达赖喇嘛到学校来。西藏、台湾、中国建军、中共党内派系斗争等等话题都是禁忌。"彭博新闻社报导："当北京一个和中国政府有紧密关系的组织表示愿意捐助斯坦福大学 400 万美元，办一所传授中国语文文化的孔子学院，还负担一位教授的薪水开销时，它附带一个但书：这位教授不能讨论类似西藏这样的敏感话题。"澳大利亚知名学府悉尼大学因为怕伤害到学校与中国的关系，以及该校孔子学院的经费，取消已安排妥当的达赖喇嘛到访行程，为此受到各界痛批。

我参观过华府地区一家孔子学院，惊讶地发现"五经"当中的第五部《春秋》也列在课程里，其内容包括春秋五霸的历史。加拿大教授泰利·罗素（Terry Russell）任教的大学拒绝接受中国经费在该校设立孔子学院，他说："它们只不过是在大学正当化架构内的宣传和公关活动罢了。"

由于大多数谈判是秘密进行，我们很难确实知道孔子学院对大学提出什么要求。《国家》杂志记者声称拿到一份协议，它载明："缔约双方同意视此协议为保密文件，未经另一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宣传、透露或公开从另一方取得或获悉的文件或资讯，除非宣传、透露或公开是协议之一方依据协议履行其责任所必须。"

批评者警告说，除了学术审查之外，孔子学院可能也提供掩护"从事工业和军事间谍、监视海外华人和打压台湾的势力"。瑞典方面，斯德哥尔摩大学几位教职员要求校方切断和北欧孔子学院（Nordic Confucius Institute）的关系，因为"中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利用孔子学院进行政治监视、秘密宣传，并禁止对敏感领域如法轮功的研究"。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University of Manitoba）一位教授担忧孔子学院雇用的中国老师"监视在本校念书的中国留学生的活动"。

孔子学院遍布各地令中国政府引以为傲，称赞它是中国蓬勃发展、即将与美国旗鼓相当的指标·《人民日报》2011 年夸口说："中国现在为什么备受瞩目？那是因为它国力蒸蒸日上……今天我们和西方有了不同的关系：我们不再需要他们怜悯。我们已逐渐崛起，能和他们平起平坐了。"和中国领导人受到西方批评时的反应一样，他们贬斥批评孔子学院的人是战争贩子或食古不化。中国驻英国大使在 2012 年说："有人见到孔子学院快速发展，很不舒坦。他们死抱着过时的'冷战'思维。"

在大学校园成功之后，孔子学院现在乘胜追击，伸入全球各地的中学及小学，且运作模式还是一样。中方在澳大利亚提供各地学校 20 万美元以促进中国"语言及文化"。附带一个条件："最好"不准学生讨论天安门广场屠杀或人权的议题。实际上，学生只专注中国核准的

观点：中国是个和平的国家，积极努力与所有国家和谐相处。惩罚批评中国的人士

光谱的另一端就是坏人，亦即被认为对中国猜忌怀疑、甚至公开敌视的西方人士。这份名单目前包含许多国会议员、左右两翼的名嘴评论员、人权组织、工会等等。左翼有李察•基尔（Richard Gere）这类的人权分子，以及南希•佩洛西这类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的国会议员。在右翼，美国国防的鹰派，以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这类的贸易保护主义者。这些人是中国政府试图“冻结”、尽可能将他们边缘化的人。有些人拿不到签证进入美国。有些人接触不了重要资讯或中国官员。北京鼓励以中、英文文章和博客，有时甚至蓄意杜撰假资讯来破坏他们的学术生涯或观点。中国研究美国政治制度的专家经常告诉我，起初中国非常惧怕美国左、右两翼敌视中国人士的“大结合”，后来他们发现这些团体彼此之间的矛盾，远胜过他们对中国长期战略的关心。

长期研究中国的学者都晓得，讨论中国问题时最值得信赖的人是那些拿不到签证进中国的学者、记者和作家。其他人例行地在有意识或下意识下做出妥协，以维持进出。他们会避免称赞达赖喇嘛，以及其他可能触怒北京的方式提到两岸争端。《华盛顿邮报》于 2013 年报导：“由于中国从不说明拒绝的原因，或说明那种学术研究不够格申请，结果造成一种自我检查、缩小研究题目。”

林培瑞（Perry Link）是美国最受尊敬的中国研究学者之一。他因为不肯屈服北京的说法，长达十八年进不了中国。林培瑞说：“美国民众付出的代价十分严重，大家都不晓得：……中国问题专家都以暗语和间接说法回避触怒北京，这种作法相当普遍，而且大家心照不宣。例如，一般都不用‘台湾独立’，改用‘两岸关系’。通常也不会提到被关押在牢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通常提到 1949 年也接受‘解放’这个字词。”他说，学者了解这是暗语，“但是当学者向大众撰文、演讲时用这些暗语，一般人就会以为 1949 年真的是解放，而台湾独立不是太大的问题，诺贝尔奖得主坐牢也不值得一提。”

中国政府对付学者的胡萝卜和棍棒策略我有亲身的体会。1980 年代及 1990 年代，我极力主张对中国军售，且被认为积极推动美中关系，因此在中国备受礼遇。我可以接触到中国智库、学者、军官、政府官员等等人士。我拿到保留给学者专家的签证，可以进出中国。2006 年 9 月，情况变了。我在美国政府圈内愈来愈怀疑中国的所作所为，这使我成为《华尔街日报》一篇人物特写中的主角。文章一开头就定调：“颇有影响力的五角大楼顾问、原本亲中的白邦瑞，认为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看走了眼。他们误认为中国是个爱好和平、专注经济发展的国家。他批评国务院与中央情报局的低级官员、大多数美国投资人及大多数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都一样，都是‘拥抱猫熊的人’。白邦瑞先生说，他的使命是确保国防部不会重蹈覆辙。”

我在这篇文章中说：“北京认为它迟早要与美国对决，且正在拟订对策。我们若不正视这个问题，就是怠忽职守。”我在其他地方也说：“至少，我们必须承认没有准备好认真了解中国的想法，然后重新开始。下一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面对的中国可能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大的挑战。”“无庸赘言，这不是北京听得进去的话。

几乎是一夕之间，我失宠了。我本来可以接触到中国将领和学者，现在全飞了。我后来获悉，美国国内支持中国的人士，就是那些在《华尔街日报》报导中被我讥笑是“拥抱猫熊的人”，跑去找中方，建议他们切断与我的联系。我过去为了例行公事申请访问学人时，签证都没问题，现在却拿不到。未来要入境中国，我需要美国政府正式发外交文件申请。我和中方人员的互动比过去受到更严密的监视。我在中国的一些“朋友”不再跟我交谈。在美国，有人试图“揭穿”我的学术成绩，提醒别人我对中国不怀好意。

这种情况持续好多年。2013 年里却又发生预想不到的情况。我再次以学人签证申请入境中国，起先并不预期会得到批准。可是，六年来第一次，中方竟然批准了。而且，还有好几位解放军将领邀请我共进午餐和晚餐。我受邀到北京共同主持南中国海如何双赢的讨论会。会中，许多多年不见的中国朋友刻意过来和我打招呼。两位解放军将领告诉我，我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对中国有“大贡献”，他们希望我日后继续如此。

回到美国后我对一位投奔美国的中国朋友说：“我很惊讶。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呢？”

他回答说:“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在电子邮件上谈到你的书(指的是这本书)呢？”

我茅塞顿开：“有啊!”

他说：“那就是啰!”

在中国人的宣传工作中，没有哪个老美是完全争取不过来的。有足够的压力和诱惑，顽石也可以点头。中方显然要赌一把，假如对我好一点，让我能进出中国，或许这本书就不会太苛责他们。

中国领导人显示随时可以动用更凶悍的方法来维护其形象。中国在西藏的暴行现在只有喇嘛能向外揭露，因此他们常态地受到中国官方监视，寺庙经常遭搜查。北京同样针对外国媒体员工下足功夫。有些分析家估计，目前有七百多个中国新闻记者在美国工作。其中许多人被认篇是“宣传人员”，散布中国喜爱的观点，或者根本就是中国情报机关的特务，监视在美国的反中人士。

国际媒体援助中心（Center for Intemational Media Assistance）最近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对媒体之限制已开始严重影响国际组织的报导与运作。”这份研究报告提到中国利用下列四大策略来影响或操纵西方媒体。根据 2013 年 11 月 5 日《商业内幕》(Business Institute)的报导，它们是：

——由中国国内、国外的外交官、地方官员、安全部队和监理部门直接行动。这些措施包含阻碍搜集新闻、防止负面内容刊载，并惩罚不服限令的海外媒体机构。

——用经济胡萝卜和棍棒，以诱使位于中国大陆之外的媒体高层及其分局自我检查。

——透过广告主、卫星公司，或外国政府等代理人间接施加压力，让他们采取行动防范或惩罚刊载批评中国的内容。

——进行网路攻击和实体攻击，这万万不能让人追踪到是中国中央下的命令，但它们是吻合党的意志。

许多外国驻华记者都认为，他们说的话、写的稿子，他们的电话、电子邮件，都受到中国当局监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都曾因为报导内容惹火中国政府，遭到中国政府发动网路攻击。2013 年 2 月，推特宣布大约 25 万用户受到来自中国的网路攻击，情况类似《纽约时报》的际遇。

2013 年，有百分之十的外国驻华记者表示很难取得采访通行证，原因是他们本身或前任的报导触怒当局。中国在 2009 年拒发签证给《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主任安德鲁·希金斯（Andrew Higgins）。希金斯因为报导中国异议人士出名，1991 年遭中国驱逐出境，此后再也不准他入境采访。《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2011 年在所谓的茉莉花革命期间报导中国政府取缔对动乱的报导：

中国政府联系外国记者，交代他们不要报导动乱。有几个案例，公安真的到记者住处拜访，亲自面交禁令。如果记者执意报导，他们的签证立刻注销。记者保罗·莫尼（Paul Mooney）说，这是他唯一一次决定不报导这则新闻，因为它可能影响到他在中国的居留。

保罗·莫尼采访中国新闻已有 18 年资历，也曾经遭到拒发入境签证。莫尼的报导专注贪腐、污染和中国的癌症村、爱滋村的议题，肯定让中国官员十分恼火。莫尼、希金斯和陈嘉韵（Melissa Chen）等外国记者，都因为中国政府认为他们的报导不利，强迫他们离境或不准他们再入境。陈嘉韵受雇于半岛电视台（Al Jazeeta）英文频道，是中国十四年来首度再驱逐外籍记者出境的例子。《华盛顿邮报》指出，其他许多记者“遭到威胁要被驱逐出境，也有人苦候许久、得不到入境签证”。

彭博新闻社记者曾指控上司因为害怕遭到北京当局反弹，压下有关中国的报导。彭博社记者拿这个情况与“纳粹时代的德国相比，当年新闻机构自行检查，以维持入境采访”。中国封锁网路的行为早已恶名昭彰。法新社（Agence France-Presse）指出，“中国共产党有如在经营一个世界最大的数位帝国。”由中国电信（China Telecom）、中国联通（China Unicom）和中国移动（China Mobile）所组成的网络，全由国家控制。政府安装工具以侦察互联网的作法，被通称为“中国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 of China）。中国当局能够封锁中国公

民的通讯以及任何加密的动作。“监视已深入到社群网路、线上聊天和网路电话。”冒犯当局的博客经常被骚扰、甚至遭到逮捕，因此剥夺了他们发送资讯和讯息给西方记者的机会。

中国也强迫西方公司协助他们进行检查。2006 年，由丰田汽车、苹果电脑和诺基亚等两百多家在中国营运的跨国公司组成的“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Quality Brands Protection Committee），发电子邮件给全体会员，告诉他们中国当局关切各公司在华职员绕过“防火长城”和公司在境外其他部门通讯的行为，委员会警告大家，公安可能会上门拜访。

苹果向中国政府退让，同意移除可将用户和某电视台及海外书店连结的应用软体，因为它们含有反中的内容。苹果尝试多年想取得同意在中国移动可贩售 iPhone。法国卫星通讯商“欧洲通讯卫星公司”（Eutelstat）原本和反中的新唐人电视台（NTDTV）合作，2005 年为争取中国国企客户，琵琶别抱。纽约纳斯达克（NASDAQ）也向中国压力退让。有一则报导揭露：

2007 年 1 月，该公司美国藉的驻华代表被国家安全部找去问话，盘问为什么新唐人电视台人员从纳斯达克纽约办公室报导。他在同一天即被请回，但显然承受到压力，“可能已向中国当局保证，纳斯达克不会再允许”新唐人电视台从其交易本部报导。

从 2007 年 2 月起，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突然不准在那栋大楼报导，尽管过去一年多，它每天都在那里报导。电视台怀疑中方施压是突如其来变化的幕后黑手，但是个中详情不得而知，直到 2012 年才流出电文。新唐人电视台被逐之后不久，纳斯达克得到中国监理当局批准，在中国开办正式代表办事处。

《华尔街日报》2013 年报导：“近来苹果公司和福斯大众汽车遇上的麻烦，代表跨国公司风险日益增大。他们愈是依赖中国蓬勃的经济。就愈是曝露在中国风向改变的风险中。某些情况下，外资公司正受到国营媒体的攻击。有时候也受到中国监理机关或政府政策的影响，比如反贪打腐运动严禁公司送礼。”

博讯是一家受到欧盟支持的中国新闻网站，它经常报导中国人权遭受侵凌的新闻。博讯创办人韦石（本名孟维参）说：“美国任何一家大公司都不会想（和我们）有瓜葛；即使在北京设有办事处的基金会也不想（和我们有关系）。中国会追踪谁捐钱（给海外不受欢迎的组织）。他们会接到电话。”

所有这些伎俩——操纵舆论、奖赏甘美之辞、惩罚谔谔之音——全都源于战国时代的战略思想。谋臣策士在规划扳倒旧霸主的过程中向国君所提的建言，通常也包含如何对付敌国的鹰派和鸽派的伎俩。当然这里头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作怯。首要目标是要扰乱敌人的计划，蒙蔽对方对国际地缘局势的掌握。如果他比你早看清“势”，你在围棋盘上就无法挥洒自如了。

第七章　杀手锏——解放军的秘密武器

“其疾如风，其接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孙子兵法》

小不忍则乱大谋

一名水兵说：“部长先生，轮到您了。”身穿白色制服的水兵，站在一幅亚太地区大地图上方。这幅六边形地图占满了黑白相间的一片大磁砖地板。众人眼睛都聚焦在地图上特定的一点——一个遭到中国入侵的国家的海岸，它有漫长的海岸线、也曾经破解美军精心策划的战略。它就是越南。

一位海军军官说：“国防部长现在下令四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全速驰赴南中国海。我们至少可以靠它守住夏威夷。”

想像中的这一年是 2030 年，扮演国防部长下达命令的这位军官是在罗德岛州新港海军战争学院（Naval War College in Newport）。参加兵棋推演。过去七十多年，类似的许多次战略推演都在这个房间进行。有些是和平时期的竞争，测验重点仅在于外交折冲能力。有些则模拟军事入侵、海军封锁，以及全球规模的大战。就在这间如今装饰着考究的地砖和二战纪念物的房间，日本进攻珍珠港的阴谋最早被揭露，可惜却受到漠视。进到这里，就好像进到希腊的德尔菲神庙（Delphi），神谕曾经建议雅典伟大的立法家梭伦（Solon）订立全世界最早的其中一部宪法，也告诉亚历山大大帝他是“战无不胜”的勇将。

那一天，我不仅在场，也参加兵棋推演。我的“红队”代表中国。我受邀要以中国军事领导人的立场思考，要发挥我过去的分析研究，把中国的不对称战法展现出来。我得运用它们来对抗海军史上最强大的舰队。

兵棋推演历三小时结束，最后一步棋下了，地图有如棋盘，显示美方主帅陷入重围、遭到“将军”。美军输了，这是五角大楼核定的兵棋推演史上的第一次。我运用多年来我对中国战略的了解来拟定对策，竟然出奇制胜。我使用的武器以及指导我制订战术的原则，全都来自中国，而它们的现代化身正是人民解放军汲汲营营在钻研的。它们号称“杀手锏”——古代中国传说中用来给强敌致命一击的武器。

往后几年，五角大楼又进行了二十次类似的兵棋推演。只要中方使用传统战术和战略，美国就赢，而且势如破竹的大赢。然而，每次只要中方祭出杀手锏，中国就能反败为胜。从这些模拟演练得到的教训，是奥巴马政府采取“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主要因素。

包含我自己在内的许多美国官员很慢才理解到，中国的战略大多反映了它的恐惧，而我们迟迟都还搞不清楚状况。更糟的是，我们对中国的恐惧竟然一知半解。愈来愈多重要证据

累积起来，譬如李小姐提供的情报，帮助我们当中比较机警的人睁开眼看到自己错得多离谱，尽管还有很多人尚未觉醒。

固然中国领导人有根深蒂固的危机感，甚至偏执地担忧美国和西方国家要“包围”它，倒没有太多证据说中国想要刻意与美国掀起战争。事实上，对百年马拉松战略来说，为了短期利益爆发军事冲突反而是一大败笔，会伤害多年来谨小慎微、孜孜不倦将中国建设为经济及地缘政治霸权的努力。中国领导人晓得，虽然解放军兵员高达两百三十万人，早已超越美军员额，但若要在近期内建设一支可与美军传统兵力匹敌的军队，它还得增添船舰、飞机、坦克和士兵。然而，这么做一定会引起西方国家警惕，并且可能掀起军备竞赛。中国领导人着眼的是长期赛局，目标是悄悄建立吓阻能力，再逐渐增进传统战力。

以小搏大

中国古代传说中有位英雄遇上比他强大的敌人。敌人比巨人还强大，又有当时技术最先进的武器，人人都怕他。但是英雄并不退缩，勇敢地与强敌决一死战，因为他握有秘密武器。他宽大的袍袖里藏着一把短、轻的钉棍，它能够轻易斩断一把利剑或一颗脑袋。光看这把杀手锏，它并不危险，但是到了英雄手里，可用来一击必杀。他早已苦练多年，手持这把利器，再加上突袭的效果，他的强敌胜算无几。

这个传说很像《圣经》故事里的大卫和巨人歌利亚（Goliath），但是屈居下风的人不是被上帝所救，这位中国英雄是靠他的秘密杀手锏致胜。

杀手锏是确保胜过强敌的王牌。这个名词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中国古代治术典籍、武侠小说和今天的军事报导多少都会提及。中国人在各种不同场景下都可以用上杀手锏这个字词。比如说，约会时男性可以赢得芳心的杀手锏是优雅翩翩的风度。做生意时，握有杀手锏的商人有绝招可以击败更大的竞争者。踢足球时，杀手锏可能是个射门高手。

中国投下不相称的大量资源开发不对称武器，希望建立杀手锏。1990 年代末期和 2000 年代初期投奔美国的人士，提到解放军正在开发的新军事技术，可用在“台湾以外”，换句话说，美国战略家所规划及兵棋推演的一些剧本未必是最有可能的状况。有位叛逃者在提到这些在科技上有重大突破的武器时，特别用“杀手锏”这三个字来形容。最常讨论的剧本还是集中在台湾身上，包括中国发展的反介入战略，以确保一旦中国大陆要入侵台湾、而美国企图保卫台湾时，可以成功阻挡美军介入。

杀手锏技术在中国军事圈内列在“以小搏大”的军事理论中。这个理论若要成功，中国假定它起初要能诱敌骄矜自满，或拐骗他为己所用。一丝不苟地掌握敌人的动态也属关键，特别要能预判敌人行动、能够蒙蔽他、扰乱其结盟、神不知鬼不觉地建立反制同盟，然后在

适当时机出手，破敌之“势”。这种评估就像针灸时要找到正确的穴位，一点即可瘫痪强敌。

我在 1995 年阅读中国三位著名军事战略家写的一篇论文《海战军事革命》时，首次接触到“杀手锏”这个名词。作者们列举可以有助于击败美国的新技术。他们认为在外太空取得军事优势攸关海战胜负。“控制外太空将是海战胜利的先决条件，以外太空作为海战的制高点……掌握电磁作战优势的一方将全面运用杀手锏武器赢得海上胜利。”他们呼吁中国全力开发“杀手锏武器”，例如将“先用于反舰导弹防御系统”的战术激光武器，以及可用于海军军舰和巡航导弹的隐形技术。他们又说：“闪电攻击和强大的第一击也将大量运用。”此外，作者们也列出一些可用来对付美国这样超级大国的战术，比如以智能型武器（smart weapons）攻打雷达和无线电台；透过电子战灌爆敌人通讯设施；攻击通讯中心、设施和指挥舰；以电磁脉冲武器摧毁电子系统；以电脑病毒破坏电脑软体；以及导能武器（directed-engergy weapon）。

经过进一步研究，我发觉在军事圈里，杀手锏指的是一套不对称武器，让弱国能够打在敌人最脆弱的地方而击败强敌。我看到这个名词一再出现，第一个反应是，这只是中方的梦想与期望而已。此外，这个名词本身的意义也很含糊，可能让人以为杀手锏只是形容某一武器“很先进”或“超时代”罢了。但是我愈是搜查，也请美国情报分析专家翻寻文件，杀手锏出现得相当频繁。

美国只从军事的棱镜去看冲突，不像中国古代思想家孙子有宏观的战略视野，强调情报、经济和法律等各个方向。乔良和王湘穗在他们 1999 年那本著作《超限战》中写说：“很显然，正是战争手段的多样化，扩大了战争的概念。战场就在你身边，敌人就在网路上。只是闻不到烟硝或血腥味而已……很显然，战争已经不再只是士卒或将领的事务了，它愈来愈成为政客、科学家，甚至银行家的工作。”911 攻击之后两天，这两位解放军上校接受中国共产党一份报纸访问，谈到攻击“对中国有利”，也证明美国面对非传统方式攻击时非常脆弱。避重就轻

2000 年，我替中央情报局写了一份杀手锏研究报告。一年后，我接到中情局来电。副总统切尼和他的幕僚长从总统的每日简报——这是中情局分析师每天呈给总统及国安会人员的报告——中读到杀手锏。副总统希望了解杀手锏的背景，也希望深入了解它代表的意义和影响。他的助理对我的报告感到惊讶。我预测中国会减少输出危险武器，也认为杀手锏概念只是一个概念，一个还无法实现的雏形。切尼下令进一步搜集情报，查明中国是否真的有反卫星计划、反隐形计划，或航母杀手导弹。我们很快就得到答案。

我现在晓得杀手锏是中国百年马拉松战略的关键军事要素。建立此一技术不只是中国军事领导人希望有朝一日能有资源去进行的幻想或愿望。他们已经着手启动了，投资数十亿美

元要在军事能力上取得跨世代大跃进，俾便制伏西方大国的传统兵力。他们要小规模地搞，以免惊动西方国家。

中国领导人希望透过取得高科技以增强中国相对实力的野心，不仅限于追求高科技武器系统。1986 年 3 月启动的“国家高级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代号 863 计划）是中国透过运用科技以克服国家安全缺陷的一项重要项目。863 计划包括发展军、民两用科技，如生物科技、激光科技和先进材料等。这项计划也替中国的“本土创新”策略奠定基础；些策略纳入 2006 年“国家发展科技中长期计划”中，该计划着眼的是 2005 至 2020 年的科学与技术发展。中国的本土创新策略包括透过研发投资、技术转移，以及海外公司和研究机构培训中国工程与科学人才，以确认、了解、创新及运用某些军、民两用的科技能力。

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大幅增加 863 计划的经费和范围。2006 年的中长期计划可谓中国有史以来最有野心的全国科技发展计划。中长期计划中的十六个“国家大型项目”涉及到电信、太空和其他部门，被视为“优先中的优先”。不过，十六项中有三项列入机密，对外不公开。2006 年中长期计划和 863 计划底下兼具军、民两用用途的开发，反映出中国长期军事计划愈来愈倚重中国的民用科技基础。

美国许多主张对中国采取鹰派立场的人士假定中国的建军构成威胁，认为北京拓展蓝海海军、新式隐形战斗机、弹道导弹系统等等都是隐忧。在他们的想法里，和中国一战已经迫在眉睫，而且将在空中和大洋交战。可是中国的行动常常让这些鹰派的说法漏气。他们预期中国将努力打造一支强大军力，可以进行攻击性的投射能力，来主宰其邻国及广大世界，有如希特勒或斯大林。然而，这个想法却似乎没有依据。

美国兵力投射系统的元素包括前进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和军事基地；空中加油能力；核武器轰炸机；以及远程部队运输能力。中国并不想像苏联那样复制美式的兵力投射系统，因为那会打草惊蛇、惊动霸主。中国领导人研究了美国如何警觉到苏联的扩大军事力量，以及苏联的扩军是如何刺激到美国人，导致美方结束和斯大林的战时合作并发动冷战，以及美方对苏联展开大规模的贸易和投资抵制。北京誓言在这方面绝不重蹈莫斯科的覆辙。因为这么做，等于宣告马拉松的终结。

中国并未加强它的兵力投射能力来与美国竞争，它在几种力量投射方法上面，例如远程轰炸机、大量的地面部队和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投资都很小或根本不投资。中国实际上还大幅削减它的力量投射能力。中国花在先进武器上面的军事经费，在过去十年大幅增加。2002 年，美国国防部对中国军事费用的年度报告大胆指出：中国的国防预算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公布的两倍。

为什么中国要把它实际军事开销短报到如此地步？毫无疑问，中国领导人如此短报，有

他的战略目的，灵感来自古代中国历史。中国领导人深知要维持中国和平崛起的形象，它必须掩饰钜额军事开销以及在最先进能力上的投资，以免让区域邻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警觉，而引发军备竞赛。

根据兰德公司替五角大楼进行的一项研究，从现在起到 2030 年，中国将有一兆美元以上可花在替海空军采购新武器。这一点，再加上美国的军事投资正在递减（例如，美国海军到了 2050 年，军舰数目将少于 250 艘，其中大多数是近海作战的小船；美国空军仍然依赖 1970 年代发展的许多技术），意味着到了本世纪中叶，中国即使军事上不占上风，也是将近平手。未来的军事力量均势慢慢在移动，从十比一的美军优势往平分秋色移动，然后终于中国会占上风。2013 年 12 月，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透露，美国海军造船预算在往后三十年可能每年只有 150 亿美元，可是每艘新军舰的造价都将会攀升。我们维持优势的唯一机会将是开发优异技术和反制措施对付中方的杀手锏，譬如国防部研拟的“海空一体战”（AirSea Battle）新理论，它结结合海、空军资源，防卫意在阻挠航行自由的敌人。

中国推动杀手锏计划大多依赖在美国布建间谍网、偷窃机密来进行。2005 年，联邦调查局跟监的嫌犯麦大泓夫妻搭乘国泰航空班机由洛杉矶飞往香港之前九天，联邦调查局探员窃听到麦大泓打电话给中国某个该局已确信的情报人员说，他和“北美红花”在一起，这是中国情报机关的密语。联邦调查局又在麦大泓的哥哥麦大志的垃圾中找到撕毁的文件。麦大志赫然就是红花。红花奉命搜集美国海军最先进技术的情报，如潜艇静音推进系统、舰载通讯系统以及先进的驱逐舰能力。如果麦大志得逞，对杀手锏计划助益极大。

美国过去也乐于协助中国发展军事能力。我在 1980 年代建议华府对中国进行军售和技术转移，它们在冷战时代容或有道理，但许多计划迄今仍在继续中。七大恐惧

除了示弱以避免惊醒美国之外，中国的战略大致是针对中国领导人研判美国对中国构成的威胁做出回应。包含我自己在内的许多美国官员，很晚才体认到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威胁”看得有多么严重。种种证据累积起来，最后终于说服了我们之中的部分人士改变对中国人的认知的看法。中国根本对传统武力的投射不感兴趣，它只关心如何对付美国的威胁。杀手锏就是关键的反制措施。

我奉五角大楼之命研究中国人对威胁的感受。我的许多发现，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大家都不相信。可是中国人对威胁的这些感受（我称之为中国的“七大恐惧”），反映出中国军事和政治领导人的根本态度，特别是因为书写、谈论这些恐惧的人并没打算以他们的作品影响民意塑造。七大恐惧完全出自中国国内军方人士；它们不是想要影响群众舆论而搞出来的宣传。

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至少打从林肯总统时期就想宰制中国。我请教我接触的中国人，

请他们提出证据证明美国有这个宏图大计。几位中国军方及民间作者交给我一些书籍和文章。从这些材料，以及 2001 年至 2012 年期闲六度访问中国我所进行的访谈，我得出结论，中国领导人是以战国时代的霸主为模型，来认知与预测美国的行为。起先，我觉得不合逻辑，甚至大惑不解，中国领导人竟然会一口咬定从泰勒直到克林顿，历任美国总统会多少了解战国时期的治术，还运用这些诡诈的思想来遏止中国的增长。这简直是子虚乌有啊！事实上，美国竭尽全力支持中国的主权、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也让中国在国际社会享有优势的地位。

我很惊讶我自己的报告证实了我和别人早先已经抛弃、认为不足采信的一项发现，即使它是由官阶最高的中国叛逃人士之一陈有为所提供。陈有为原本是中国外交部驻外高级干部，他举出北京决策上的几个病态：总把敌人的动机往最坏处去想、顽固的意识型态，以及脱离现实。奇怪的是，中国人认定中国是美国战争计划的核心对手。

中国的七大恐惧分述如下：

第一，美国的作战计划是封锁中国。大多数战略行为者的行为是受到他们的心理特性，如情绪、文化和恐惧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似乎很害怕它漫长的海岸遭到封锁，在它海岸外的一串岛屿使其领导人觉得益加薄弱。因为从日本延伸到菲律宾的第一岛链的地理形势，中国军方许多人担心中国很容易遭到外国封锁。这些岛屿被视为天然的地理障碍，挡住中国进入大洋。日本海上自卫队前任参谋长即夸口，中国潜水艇无法在不被美国和日本反潜部队侦知下，穿过琉球岛链、台湾之南或北，或是巴士（吕宋）海峡，进入太平洋深洋。中国军事作家经常讨论需要训练演习和军事作战计划，以突破岛链封锁。有一项作战研究分析形容敌方有七道防线，是中国舰艇必须克服才能突破封锁。在他们的估计中，美国应已建立一套包含反潜网、水声系统、水雷、水面舰艇、反潜飞机、潜水艇和侦察卫星等等的封锁系统。

第二，美国支持他国劫掠中国的海上资源。中国作者声称，由于中国海军太弱，中国领海疆域内宝贵资源会遭到列强侵夺，因而威胁到国家未来的发展。中方提出许多改革方案。中国国家安全部智库前任研究员张文木曾说：“海军关系到中国的海权，而海权又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发展。我认为，一个国家若无海权，它的发展就没有前途。中国军方刊物《军事经济研究》2005 年有一篇文章说，中国面向外国的经济、对外贸易和海外市场，全都需要有一支强大的兵力做靠山。

第三，美国可能扼杀中国的海上交通线。中国有许多著作探讨中国海上交通线的罩门，尤其是穿过麻六甲海峡的石油命脉。拥护中国发展蓝海海军的人士会举中国能源进口不安全为理由。中国有位观察家说，美国、日本和印度的舰队总合起来，“对中国的石油供应构成压倒性的压力”，不过另一项研究说，“只有美国有实力和胆气封锁中国的石油运输路线”。同样地，中国国防大学学者 2002 年写的教科书《战役理论学习指南》提出几个海上交通线封锁

和防卫的可能剧本。国防大学出版的另一本重要教科书《战役学》2006 年版讨论如何防卫海上交通线。有些作者表示情势紧迫:“关于海上封锁或石油线被切断的问题……中国必须‘未雨绸缪’。”这些拥护者似乎想要把解放军海军建军重心从以潜水艇为主改为以航空母舰为主。

第四，美国图谋中国领土之瓜分。中国已在一份限定“军内发行”的训练手册中，列举针对各种侵略剧本的作战计划。中国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及其他高阶战略智库 2005 年进行一项重要研究，它评估中国七大军区每个的弱点、检讨敌军入侵可能走的各个不同路线。他们利用每个军区的军事地理学，以及历史上外国军队入侵的频率，预估未来遭到陆地攻击的罩门，甚至推定哪个邻国可能是入侵者。解放军近年结构改革显然是为了改进中国抵抗陆地入侵的能力。

第五，美国可能援助中国国内叛军。根据 2005 年的研究《中国战区军事地理》，北京军区等三个北方沿俄罗斯边界的军区，最经不起坦克进攻和空降登陆。2005 年在内蒙古举行的“北剑演习”涉及到两个装甲师，2800 辆坦克和其他辎重车辆演出中国最大规模的野战演习，出动装甲部队及 2000 公里的空运作业，模拟针对得到外国军事援助的恐怖份子发动攻击。中国发言人声称演习剧本是外国援助国内恐怖分子，并没有明白提到美国。

第六，美国可能煽动中国国内暴动、内战或恐怖主义。中国三申五令反对外国支持台湾、西藏和新疆的“分裂分子”，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中国政府一贯的说辞了，但是这些声明反映出北京十分关切中国领土的完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一名研究人员把国内分裂分子与法轮功并列，它们与美国对中国构成的威胁是相等的。

第七，美国威胁要以航空母舰攻击中国。在过去十多年中，中国军事专家已经着手研究来自美国航母的威胁，以及研拟如何反制。作战研究分析已建议应如何运用中国兵力以对付美国航母的弱点，其他研究也列举中国应发展某些特定武器系统。中国反航母导弹即是一例。

我在检视解放军资讯与文献时还发现另一个重大差异，那就是中国准备使用它所谓的“警告打击”来增添声势。中国军事教科书中出现“打击增势”这个词语，军事圈内也在讨论。中国历史上虽然不用武力征服领土，它却基于政治动机发动武力：达成心理震撼、扭转危机情势，或建立既成事实。中国在 1950 年出乎众人意料在朝鲜介入，对抗美国及联合国部队；在 1962 年攻打印度；1969 年与苏联动武；1979 年发动惩越作战；因为中国军事领导人认为先发制人可以产生奇袭效果，有利于战局，也可以在更高层的政治谈判上先声夺人。中国在 1950 年介入韩战，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美国在军事上占极大优势——美国垄断核子武器、十万雄师可能北上跨鸭绿江入侵东北，航空母舰又部署在近处可以出动攻击。但是在 1950 年的中国领导人心目中，算盘不仅只在传统的军事平衡上。今天，美中之间最有可能爆发军事对抗的局面，可能也是出于相似的误解，以及中国领导人估计它若发动震撼打击不至于导

致冲突升高。

虽然大家很少公开谈，大多数处理中国问题的美国决策者和国防专家都有一个共识：中国领导人根深蒂固的猜疑可能会引发一场中美都不乐见的战争。1997 年至 2000 年担任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的谢淑丽（Susan Shirk）曾经警告说：“我们与中国非常有可能发生冲突，避免的可能性很低”，因为“国家愈是开发与繁荣，他们就觉得愈不安全、受到威胁。”她认为，美国处理中国崛起的方式，“不是增强它的责任感，就是撩起它的情绪。”其他中国问题专家也呼应这个观点。长期在中央情报局负责分析工作的苏葆立（Robert Suttinger），认为中国高级政治决策系统“不透明、不沟通、不信任、僵化官僚作风、倾向于迎合上意说话，并且战略上太教条化”。

若要执行警告打击，解放军需要杀手锏。中国官员非常不愿意和美国人谈论他们军方在研究杀手锏。当我向一位中国军方资深战略家提到它时，他正色告诉我，这个名词绝对不能讨论。然而，在读完中国现代军事战略家写的、都提到杀手锏的三本军事书籍和二十多篇论文之后，我终于拼凑起中国正在讨论、也正在兴建的这种武器的图象。

杀手锏武器比起它们要摧毁的武器，成本低廉太多。它们的开发过程总是严格保密。它们要用在战争的决定时刻，要在敌人有时间准备之前动手。对敌人要造成混淆、震撼、惊骇和感到被制伏的效应。2002 年美国国防部呈报给国会的中国军力报告指出，中国的战略强调“瘫痪具备高科技武器的敌人之能力的作战行动，包括在其发动时阻扰及拖延敌人行动之作战，以及集中全力侦察敌军威胁性最高的高科技武器之种类与地点的作战行动。”

虽然传说中杀手锏只是单一一个武器，今天的杀手锏则是多种的不对称武器。中国空军大校杨志波（音译）写说：“要打造杀手锏，中国必须先完成开发计划。这是一个艰钜、系统化的过程，不只是一、两种先进武器。这是所有军种都要用上的武器。它是全军、全地点，涉及陆、海、空系统。”

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强烈支持杀手锏计划，在他指示下，中国于 1990 年代展开计划。1999 年，他告诉军方领导人：“必须尽快掌握保卫国家主权与安全所需要的新杀手锏。”同年稍后，他又重申中国应该“尽快掌握几种新杀手锏，以保卫国家主权与安全”。2000 年，他说：“作为一个大国，在对抗全球霸主的斗争中，中国应该采购一些杀手锏武器。”同年，讨论到可能因台湾发生冲突时，他说：“必须要积极发展一些杀手锏武器和设备。”次年他又要求：“需要新的杀手锏来保卫我们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有位美国专家研判，北京一定设立一个正式的专案办公室主管这件事。

接下来的问题是：江泽民认为中国需要针对谁来保卫其主权？从他提到“对抗全球霸主的斗争”，答案呼之欲出，就是美国。从现代军事脉络看，整个杀手锏概念环绕着如何找出方

法利用美国弱点、削弱美国的实力。这正是为什么中国国防大学外国军事研究主任李志云（音译）编著一本书，罗列六十四位军中作家文章，详列美军种种弱点。这本书要阐述的主旨是美国不足畏，用杀手锏战略就可以击败它。

美国的阿基里斯之腱

中方认定的美国一大弱点就是它依赖高科技资讯系统。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积极研究美国重要的军事、经济、情报及基础设施的电脑系统防护与罩门。伍泽尔是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委员，他说："已出现强烈证据显示，中国正指示和执行针对美国的大规模网路间谍活动。"虽然中国一再否认这类攻击，解放军有十六个单位"专注网路渗透、网路间谍和电子作战"

二十一世纪头几年已显示中国其他网军以及这些间谍单位本事相当大。美国空军少将威廉·罗德（William Lord）把中国的行动定性为"国家级威胁"，指出中国已从五角大厦电脑网路"下载十至二十兆位元的资料"。《华盛顿邮报》2013 年报导，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Defense Science Board）的机密研究显示，网路入侵者已取得二十四种以上的美国武器设计资料，它们包括"爱国者导弹系统、神盾导弹防御系统、F／A－18 战斗机、V－22 鱼鹰（Ospre）倾转旋翼机，以及滨海作战船舰（Littoral Combat Ship)。《华盛顿邮报》又说："熟悉内情的资深军方及业界人士说，大多数是中国针对美国国防承包商及政府机构展开间课行动的结果。

最肆无忌惮的一系列网路攻击发生在 2003 年至 2005 年，对象是美国军方、政府和政府承包商的网址。它们攻击数以百计的政府电脑，美方将之统称为"骤雨"（Titan Rain)。《时代》杂志报导，网路入侵源自连结到广东省三个路由器的电脑系统，不过美国官员对此以及其他有关这一攻击的报导，仍不做详尽评论。

根据伍泽尔的说法，骤雨计划之后，解放军的一个单位——61398 单位——"就至少侵入 141 个组织的网路，包括企业公司、政府组织以及外国政府"。此外，一群号称"隐形山猫"（Hidden LynX）的中国黑客，也卷进源自中国的著名网路攻击行动。隐形山猫黑客攻击 Google 和和 Adobe 等科技公司、金融服务公司、国防承包商和政府机构。美国一家网路资安公司说，这群黑客"有情报猎人的坚持和耐心"，是"水坑式攻击（watering hole）技术的先驱"，可以"针对对象的供应商电脑下毒，然后等候中毒的电脑被安装，开始送回情报"。根据前任美国资深资安官员保罗·史特拉斯曼（Paul Strassmann）的说法，有 73 万台美国电脑遭到中国"僵尸"威染。所谓僵尸是一种植入电脑的恶意软体，黑客利用它可把电脑化为"奴隶"，在网路攻击时启动它，利用巨量资讯倾倒击垮一个网路或网址。

中国军事科学院孙柏林少将写说，美国太依赖“信息高速公路”，而它们容易遭到“电子隔离系统”（electronic incapacitation）攻击，电子系统、民航系统、交通网、海港、电视台、电信系统、电脑中心、工厂和企业都会受到阻扰或摧毁。北京系统工程研究所前任资深工程师张梦雄（Chang Menxiong 音译）在《二十一世纪武器和军队展望》中写说：太空卫星、空中预警暨电子作战飞机，以及地面指挥所的攻防，将成为重要的作战形式。”

中国发展杀手锏先从能够瘫痪侦察系统、陆基电子基础设施或美国航母的武器开始。它们包括电磁脉冲武器（electromagnetic pulse），可以复制核子弹爆炸的电磁效应，捣毁所有的电子仪器。近年来，中国已在老鼠、兔子、狗和猴子身上测试电磁脉冲。它也在研究高功率的微波武器，张梦雄说是要“摧毁敌人电子设备”。不妨想像一下，电脑病毒和释放电磁脉冲的武器把美国的电脑、手机和国内空中交通指挥中心，以及战场上的战斗机和精灵炸弹的指挥控制机制统统破坏掉后，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怎么打？

请看解放军官方报纸下面这段话：

有人或许认为信息时代不会再发生类似“珍珠港事变”的事情。可是，若是藉由……电磁脉冲武器对敌之指挥控制和通讯重要信息发动奇袭，就可视为二十一世纪的“珍珠港事变”……即使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拥有核子导弹和强大军力，也不能保证免疫……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像美国这样高度电脑化的开放社会极端脆弱，易受来自各方的电子攻击。这是因为美国经济，从银行到电话系统、从发电厂到钢铁厂，全都依赖电脑网路……一个国家经济上和科技上愈来愈强大时……它将愈来愈依赖现代信息系统……美国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经不起攻击。

中方认为美国另一个严重弱点是它依赖太空卫星。卫星有一部分依靠空中拍摄敌军阵地和监听无线电和电话通话来搜集情报。它们也被用来指引无人飞机、巡航导弹和其他导引武器。这就是为什么负责美军在中东军事行动的中央指挥部，可以设在佛罗里达州谭帕（Tampa）的原因，也是檀香山的美军太平洋指挥部，可以与跨一亿五百万平方英里海域的舰队及其他部队通讯联系的原因。2004 年，美国把十二个航母战斗群当中的七个派到中国附近海域，展现壮盛军威，但是若非头顶上太空中的通讯和情报卫星，每个战斗群不能相互通讯。

过去二十年，中国已打造一些杀手锏武器摧毁或使这些卫星失效，包括一种陆基激光，可把美国卫星弄瞎或炸掉。它也开始建造“寄生微型卫星”（Parasitic microsatellites）。顾名思义，这种小型设施可以攀附在美国卫星身上，或是瘫痪美国卫星，或是劫持它搜集的情报。中国其他微型卫星也可以透过电子干扰、启动电磁脉冲，或把卫星挤出轨道等方式做掉美国的卫星。

中国另外研发陆基反卫星导弹，直接把卫星从天空中击毁。2007 年，中国测试成功，用

这种武器摧毁一枚中国已失去作用的气象卫星。五角无楼一份报告说：“这项测试引起许多国家关切，它造成的废弃物云使所有太空国家的资产陷入危险，也对载人太空飞行构成危险。”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琼安·詹森一佛利斯（Joan Johnson-Freese）注意到，中国的测试“因动能冲击（kinetic impact）产生了三千多块废弃物，它们将在未来数十年内在相当拥挤的地球低轨轨道飘浮、飞行。这是不负责的行为。

中国反卫星测试还有令人困扰的另一面，就是它不透明。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在中方测试后表示：”中国并未解释这项武器测试的意向，它也没有表明未来是否还计划测试。ᄂ他又说：中国并没有说明这项测试“如何吻合它反对太空军事化的公开立场”。

这次测试最令人不安的或许是美国情报机关事先完全不知情。五角大楼在前三年呈给国会的中国军力报告中，国防部长年年都报告说，解放军“唯有”以“核武器”才能打下美国卫星。《华盛顿时报》报导，这次测试“触响警报”，曝露“重大战略罩门”，而且某些美国国防官员“说美国情报出现重大疏漏，不知道中国已有或正在发展其他可以瘫痪美国卫星的太空武器和能力；而美国的卫星处理约百分之九十的军方通讯，以及情报和导弹导引”。

中国继 2007 年测试后又进行后续测试，包括 2013 年测试陆地发射的反卫星导弹，美方官员指它伪装为太空探勘的火箭。同年稍后，中国军方又发射三枚可攻击美国卫星的卫星，美方官员形容它是中国“星际作战”计划的一部分，值得“美国国防严重关切”。解放军也发展一堆其他武器和干扰器，可扰乱或消灭卫星的通讯能力，它们可能包括激光、微波武器、粒子束武器（particle beam weapons）和电磁脉冲武器。

除了依赖卫星，美国军方另一个弱点是依赖漫长的补给线供应弹药、燃料和其他基本作战物资。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美国海军每天要用一千九百万加仑的汽油，所用弹药是韩战的二十倍。若无开放的海上航线，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海上航线极易遭受潜水艇、水雷、鱼雷和航母杀手导弹等不对称武器攻击，而这些武器中国全都有了。或许是因为它能够威胁美国的海上航线，中国的海军研究院（China’s Navy Research Institute）认为潜水艇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军舰。

中国也在研发杀手锏以对付美国的空中优势。美国军机配挂的 AGM-88 高速反辐射导弹（HARM），是用来保护这些军机的。美军在地对空导弹把他们击落以前，利用 HARM 以改装为无人驾驶、遥控、神风特攻队式的炸弹，而且配载更多油箱和炸药。北京也正在研发它号称的“神奇武器”，如战术激光武器，它可以瘫痪反舰导弹防御系统。中国日益增多的潜水艇也在配备苏联制的飑风（Shkval）火箭鱼雷。暴风火箭鱼雷射程 7500 码，快如闪电，时速 230 英里，可以击沉战斗群。美国目前还无具体方法可防御这种鱼雷。中国军方刊物《军事文摘》2001 年有一篇文章讨论“海上布雷、及时干扰和电子混淆、潜艇伏袭、以导引导弹集中突袭，

以及其他出其不意的奇袭”如何可以摧毁美军舰队。

简而言之，不论是和敌人陆、海、空哪个军种作战，五角大楼说，中国的“作战理论”是“摧毁敌人指挥系统；瘫痪敌人信息系统；摧毁敌人最先进的武器系统；瘫痪敌人支援（后勤）系统；不使敌人从技术优势增长其综合效能（synergies)”。用中国人的比喻来说，北京的战略就像武侠高手以点穴法击倒强敌。美国人比较熟悉的希腊神话也有类似的故事，即盖世英雄也有不堪一击的弱点。过去二十年，中国已在打造强弩，要找出美国的阿基里斯之腱。

2013 年某些鹰派在北京告诉我，他们没办法清楚估量美国对奥巴马总统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或“重返亚洲”战略究竟多么严肃看待。他们似乎担心中国是否可能误判，以及美国是否会对杀手锏计划反应过度，而建造更强大的军队来对付中国。中方人士说，美国如果按照目前计划继续裁减国防经费，要在未来十年削减一兆美元，它就不会有钱搞“再平衡”。我坦白告诉他们，美国是否会增加国防预算以对付中国，是很难预料的。

第八章　资本主义迷雾——阳奉阴违的经济战略

“顺手牵羊。”——三十六计

早期美国的经济战略

2005 年，一名中国投奔自由者，我姑且称她为“唐小姐”，为我们证实了中国马拉松策略的经济部分：与美国竞争、并超越美国成为领先全世界的经济大国。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至少是副部级以上）要到北京市区的中央党校接受战略训练。这群人包括未来的军方将领，完成课程是升迁所必要求的条件。课程包括研究古代历史教训。更重要的是，唐小姐叙述，老师采用至少六本有关美国如何在短短两百年内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专书之中文译本，学员要研究中国如何效法美国，而且步伐要更快。

她说，核心的思想来自于达尔文，尤其是有关美国政府以什么方法在 1840 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援企业，以超越德国和英国。课程告诉学员说，这是美国成就霸业的重要关键——中国若要超越美国，就必须善加学习。她说，这门课程检讨了约二十个案例，它们讨论中国领导人如何学习及运用美国不同产业许多公司的历史教训，尤其着重美国政府扮演的战略角色。

课堂上研究的美国战略包括保护国内市场、财务补助国内公司，与鼓励出口。课堂检讨美国执行反托拉斯措施以增强竞争的作法，这也是中国模仿美国的另一个例子。美国证券管

理制度吸引许多投资人注入资金，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大、最有效率的市场之所在。她又说，最大的教训就是政府扶植的产业扩大了美国市场的整体规模。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美国一部分透过补贴促进大企业增加市场。中国共产党干部学到美国偷窃自动化、渐进式的碾磨技术，一车又一车的小麦和燕麦经过此加工，制成面粉和麦片。她边笑边看着我，第一家采用从欧洲偷来的技术生产面粉之美国公司，就是我的本家成立的皮尔斯布雷公司（Pillsbury Company）。美国政府也协助安海瑟·布叙（Anheuser－Busch）啤酒公司以及可口可乐等公司在国外设厂。我晓得她说的有部分是事实。

课堂上教说，美国政府在 1900 年促成合并后，美国藉由新技术在造纸业上赶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同样的，在钢铁业方面，美国政府也在 1879 年协助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成为钢铁业第一个霸主。接下来，美国人又透过取得欧洲技术控制铜和铝的生产。1880 年代，美国更主宰了橡胶和石油业。固特异（B.F Goodrich）在美国政府协助下成为轮胎业大王。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人几乎完成他们从欧洲夺取世界领导地位的战略目标。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tric）在 1890 年代中期成立，就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它也是美国政府培植来抢夺德国西门子（Siemens）、德国电器（Allgeine Elektricitats，即 General electricity Company，简称 AEG）等公司地位。通用电气公司从西门子和德国电器剽窃点子，成立融资公司，接受它提供设备的电力公司以股份清偿债务。

故事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她所谓的第二波，从 1914 年至 1950 年，美国人主宰了汽车、电子和制药等新产业。美国政府对通用汽车特别亲善，协助它发展柴油火车头，使得欧洲所用的蒸汽火车头过时。她也说，美国政府支持五家美国石油公司赢过英国石油（British Petroleum）和荷兰皇家壳牌（Royal Dutch Shell）取得外国石油蕴藏。她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学到美国人是如何利用德国制药公司的专利技术生产阿斯匹灵、抗生素和麻醉药诺佛卡因（Novocain）。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政府对其大型企业援助的“第三波”集中在主宰航天工业和石化工业上。杜邦公司（Dupont）可能透过恫吓手法，从英国帝国化学公司（British l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取得聚合物的专利权。唐小姐也谈到美国政府在培植新制药产品的角色，例如，默克公司（Merck）在 1942 年首度行销量产的青霉素（即盘尼西林）。

我请问她，课堂上是否用过“马拉松”这个字眼。她说是的，而且我应该在中央党校书店找到《创新马拉松：从高科技公司学到的教训》（Innovation Marathon：Lessons from High-Technology Firms）的翻译本。果然是有，英文原版书在 1990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为玛丽安妮·吉利梅克（Marianne Glimek）和克劳蒂雅·博德·舒诺佛（Claudia

Bird Schoonover)。她说，另一本谈论马拉松概念的书，是《电脑战争：西方如何在后 IBM 世界得胜》(Computer Wars：How the West Can Win in a Post-IBM World)，作者是查尔斯·莫理斯（Charles R.Morris）和查尔斯·佛格森（Charles H.Ferguson）。

我再问，那么美国是否可以作为拯救苏联式国有企业的样板呢？她连声说不。除了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ority）*以外，美国并没有这类型的公司。她说，中国这方面策略的点子全都来自世界银行。我们的简短对话竟然谈了一个多小时。我笔记本写得密密麻麻。现在该去拜访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其他经济学家了。

*译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是美国联邦政府于 1933 年成立的公司，由联邦政府所有，旨在为受到经济大萧条冲击惨重的田纳西流域地区提供航行、洪水控制、发电、灌溉、经济发展的服务，利用联邦的专家与电力以刺激当地的经济发展。

从“打麻雀运动”到“四个现代化”

中国领导人在过去二十年让全世界相信，中国走向经济自由的道路，充满了私有财产权和自由市场。《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的封面夸赞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西方式的民主即将开花结果。中国自从 1978 年以来积极追求现代化，在世界银行及西方其他机构协助下，取得辉煌的成绩。中国一连三十多年经济几乎持续不断增长。尽管这段期间中偶有小起伏，中国经济增长率约为全球平均值的三倍。自从 2001 年以来，中国年度增长率平均为 10.1%。1980 年，中国的名目 GDP 约 700 亿美元。到了 2011 年，它已增加到超过七兆美元。1980 年经济仍落后的中国，现在号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95 家中国公司名列 2014 年《财星杂志》全球五百大企业榜单。其中五家更跻身前 50 名。而 2000 年时，一家也没有。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国、最大的能源使用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是世界第一。尽管努力抑制人口增长，它仍然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有十三亿五千万人。

说它是经济奇迹绝不为过。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厥功甚伟。媒体和政治评论员称赞中国朝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迈进，但其实事实远非如此。到 2014 年，中国仍有约一半经济掌握在政府手中，距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落地生根的神话，已经过了数十年。

根据绝大多数西方专家的说法，这要归因于温和的改革，以及愿意人为压抑人民币币值，才能保持低廉劳动力、低廉制造成本，以及削价与西方竞争。可是，加速中国增长最重要的因素根本不是改革，而是政府决心补贴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仍占中国 GDP 的百分之四十。这些国有企业——北京政府机关通常称之为“国家冠军”——是百年马拉松的重要功臣。尽管它们效率不彰，它们却成功地削价对付西方竞争者，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崛起。对强悍的重商主义如此支持，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战国时期各国亦以国家控制的经济做为战争的延

续。

中国的经济仍然很费解。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承认搞不清中国的经济制度究竟是怎么运作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能够宣称他们正往经济自由化迈进，却没有受人细加检查或反弹的原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和他的学生王宁在 2013 年提出警告:“我们对中国的市场改造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甚至,有许多报导根本与事实不符。”他们引述一些令人惊讶的例子，指出中国领导人隐瞒他们的策略，欺骗外国领导人他们正在追求更私有化的自由市场。其他学者也指出中国持续编造中国“朝向资本主义前进”的策略，意在助长西方一相情愿的想法。

中国在 1990 年代初期内部评估，发现其 GDP 将在 2020 年左右超过美国之后，赶紧在其他会议刻意淡化它的增长前景。为什么中国要隐瞒它三十年经济增长成就的战略元素呢？为什么要夸大朝向自由市场进展呢？答案很简单，以史为鉴的北京领导人深深知道，他们得藉由散播令人安心的讯息，并且隐瞒会启人疑窦的讯息，来消除对手的敌意。如果中国将内部评估 2020 年将会超过美国的消息敲锣打鼓地宣布，可能让霸主警觉而企图围堵。因此，面对外国人时，中国必须一口咬定它前途多舛、颠簸难行。

近年来，少数西方分析家已挑战中国领导人大力宣传的这个形象。他们看到中国采取赤裸裸的重商主义策略、补贴关键产业，并由政府指导收购外国天然资源和能源储藏的所有权，这是出于深怕全球石油及天然气的生产即将达到顶峰的恐惧心理。在他们想法里，在未来数十年无可避免，必会因天然资源而爆发战争。因此中国必须向海外购买资源、储存在国内，并且阻碍他国取得稀有资源。

许多中国战略家遵奉石油生产已达顶峰的理论：也就是能源供应很快就会下降，价格因而会飞涨。根据这个角度，世界就像围棋棋盘，必须力争铜矿、石油和锂等资源，而且不能让竞争对手抢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分析家的说法，反映出对中国地缘战略挑战的许多分析常见的焦虑。他写说：“面对全球能源供应短缺的挑战，未来中美之间无法避免意见不一致和冲突（尤其是在石油问题方面）。”王祥林（Wang Xianglin），音译）写说：“专家分析指出，中国将在 2015 年面临石油巅峰：也就是石油生产将由盛而衰。过了石油巅峰后，中国将面临一个巨大问题：石油、天然气的短缺加剧；石油消耗将愈来愈仰赖进口。”

外界还未因中国的积非成是而亮起警号，中国的假说法反而大多被接受。许多人认为毛泽东下令杀死所有麻雀的荒谬决策模式已经改弦更张，现在已被用来命令拥抱自由企业以及遵守国际规则的贸易政策。中国领导人晓得当年他们一自吹自擂就令苏联起了警惕之心而与中国疏远，导致莫斯科切断给中国的一切援助。他们要避免重蹈覆辙、冒犯西方，因为他们学到了教训，不能再犯杀光麻雀的运动。他们要设法让西方领导人相信，中国现在要像西方

一样。

麻雀和老鼠、苍蝇、蚊子并列“四大害”，毛泽东认为它们对中国的卫生以及经济发展构成威胁。1958 年的麻雀战役是大跃进运动的一部分，源自于毛泽东拚命想让中国的农村经济提升到二十世纪的水准。毛泽东和他的高级顾问认为，麻雀吃掉太多可以用来喂饱老百姓、促进人民公社和群众工业化的谷物，而它们正是提振中国经济、赶上西方水平所必需的东西。全国农民分散到各地捣毁雀巢、打破鸟蛋，敲锣打鼓驱赶麻雀。这项战役十分成功。到了 1959 年，麻雀在中国几近绝迹。

中国当局没有料想到的是，除了谷物，麻雀也吃各种昆虫。往后几年，少了麻雀吃虫，换成大量的蝗虫侵袭作物，再加上严重干旱，灾情一发不可收拾。1958 年至 1961 年期间，三千多万中国人死于饥荒。共产中国要提振经济以与西方匹敌的第一次重大实验，以惨败收场。

邓小平于 1978 年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想到中国在毛泽东治下的经济落后，他决心要走不同的经济路线。邓小平认为，没有强劲有力的民间部门，中国绝不能成为有高度竞争力的全球大国。他开始推动重大改革，逐步脱离传统的马列主义。这些改革归纳为“四个现代化”，专注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四大领域的革新。最重要的就是结合国家计划和市场力量，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今天，大多数外国人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专政体制已经改头换面，成为遵守国际规范的自由企业和贸易政策。由于许多国际金融家、学者和智库专家轻易信以为真，“中国将会愈来愈像西方”的说法就此流传。但是，如何仔细检视中国的经济，我们就能察觉另有玄机。

世界银行与邓小平的密谋

2001 年 10 月，五角大楼准许我兼差；我加入新成立的美中国会委员会（US-ChinaCongressional Commission），担任它的第一任“资深研究顾问”。委员会成立的宗旨是，要在联邦参议院争取更多议员支持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法案。我们的使命明订在成立此一委员会的法案中，它说：我们要设法确知中国的经济政策对美国国家安全有何影响。民主党议员特别怀疑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用意，以及主张自由市场人士经常说的“贸易必然会促使中国民主化”的说法。

委员会主席和我都听取中央情报局的简报，简报强调两点，不幸事后证明都大谬不然：第一，中国正朝自由市场经济前进，将会脱售所有的大型国有企业；第二，中国没有机会在经济上超越美国，即使真的超越——就说在 2100 年超越好了——届时中国也将是自由市场、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至少按照《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

所鼓吹、当时颇流行的“防止冲突的黄金弧形理论”（Golden Arches Theory of Conflic Prevention）确实会这样。佛里曼在他的著作《凌志汽车和橄榄树》（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提出这个理论，声称“国内都有麦当劳的两个国家，相互不会打仗，因为它们都有麦当劳。”

接下来我们要飞到北京，访问中国官员。

我们搭乘的波音 747 民航机几乎是空的，空中小姐神色也很紧张——这是 911 恐怖攻击事件后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美国人担心害怕是对的，但是他们担心的对象却错了。他们应该更担心我们正要飞去参访的国家。

中国在 1950 年代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它当时的人均 GDP 还不如欧洲和美国在 1820 年代的水平，当时欧、美还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即使到了 1975 年，中国的人均所得还排在全世界最贫穷之列。然而，短短几十年之内，中国的经济状况巨幅改善。中国的增长很快就爆增为美国的五倍。

2001 年，各方普遍认为中国经济两位数的增长率无法持续下去。我们收到的中央情报局机密简报，反映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做的评估。美国对中国经济的评估几乎全都悲观。大家都说，中国的劳动力既贫穷、教育程度又低。相对于它的人口规模，中国的本土天然资源不多。它依然深陷于过时、破产的马列主义意识型态当中。数十年来，共产中国没有几个创业家。政治官僚根本不懂现代商业行为或坚实的经济管理知识。一般认为百分之十以上的增长率不可能持续数十年之久。西方没有任何大国有过如此高的增长率，即使处于工业化巅峰的美国也不曾有过。一般认为更迟缓的年度增长率无可避免。中央情报局某位经济学者后来向我道歉：“我们的模型错了。”

今天，对于中国崛起的假设已经完全反转。没有一家严肃的金融机构会相信中国将长期小于美国的规模。根据许多著作的流行说法，中国的增长是经由“摸着石头过河”达成的；这是邓小平经常对外国访客讲的一句中国俗谚。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并没有一套全面的战略计划，只是边做边试验，幸运找到可行的方法。中国领导人经常用这句俗谚解释中国近乎神迹的经济崛起。

然而，这种见招拆招、随机应变的理论只是部分真相。事实上，它巧妙地化解掉批评，保护中国发展策略真正起源和目标之机密。

谈到达成全球经济霸权，邓小平借重道家哲学的“无为”精神，也就是“借力使力”。邓小平务实地体会到，在 1944 年布雷顿森林（Brettond Wood）所订定的二战之后全球经济秩序中，光靠马列主义教条是不够的。要赶上美国及其他高度开发国家，中国需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从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取得贷款。中国的这些企图，西方各国政治、政府和

企业领袖无不全力配合。

中国这样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会愿意接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吗？美国政府许多人不无疑虑。因此，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足足花了十五年的工夫，而且它签订的新会员入会协定规范最为详尽——比如，与前几年印度的入会协定相比形成强烈对比，后者没那么多严格要求。中国知道，“入世”可以带来极大好处。但是美国人会让它加入吗？中国在 2001 年“入世”时，同意接受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会员国政府不得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影响其国有企业。可是，中国并没有遵守承诺。中国所有的国企都为国家目标效力，而非反映市场力量；而且共产党也肆无忌惮指示国企做投资。假如某家中国矿业公司奉命在阿富汗或安哥拉开矿，以扩张中国的政治足迹，它即使亏本赔钱也必须全力以赴。

我称之为李小姐的中国投奔自由人士，从她接触的秘密会议搜集到一些详尽的实例，告诉我们从 1995 年至 2000 年，中国是如何造假以说服美国国会赋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地位，为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铺了路。李小姐揭露，中国领导人的策略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尽全力协助支持中方的人士，并掩盖泄露他们有重商主义经济策略的讯息。他们推理，如果美国国会发觉在可预见的将来——即使不是永久——休想有自由市场，就不会获得表决支持。他们发动一项宣传和间谍战，其精细程度没引起美国情报圈任何人怀疑。她详细说明中国如何研究美国的政治断层线，善加利用美国外交政策圈内的派系分歧，利用毛泽东在 1930 年代一篇分析政治歧异的旧文章做为参考指南。中国当时发出来的关键讯息是，逐步淘汰国有企业、陆续推出自由市场政策、不会操纵人民币汇率、不会累积巨大的贸易顺差，美国的创新和知识产权当然会受到尊重。以上全是世界贸易组织要求会员国必须遵守的规定。另外，在辩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中国倡议”（China Initiative）未能说服克林顿总统在交涉中附加条件，以影响两、三千名中国政治犯的命运。

最终，美国众议院在 2000 年 5 月 24 日，以 237 票赞成、197 票反对，表决通过美中贸易正常化。参议院在 9 月 19 日跟进，以 83 票对 15 票通过。

中国施展无为与借力使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向西方借技术开发股票和债券资本市场、共同基金产业、年金、主权基金、货币市场、引进外资、国际主义的中央银行、房屋贷款和信用卡，以及刚萌芽的汽车工业，这些全都得到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高盛（Goldman Sachs）等民营公司的积极参与指导。同时，共产党若没有故意视若无睹，也会公然批准和鼓励目无法纪的秘密活动去窃取技术和西方的知识产权。仿冒成为占中国 GDP 百分之八的重要经济活动。

林毅夫是中国高级经济顾问，2008 年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透过他的作品和演讲（有许多是英文），我们可以了解中国经济战略的出发点。他的可信度无懈可击。我 1971 年

在国立台湾大学研读两年时就听过他的大名，当时他当选学生代联会主席。十年后，他叛逃到中国大陆，进入北京大学取得政治经济学硕士，再到芝加哥大学深造并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林博士回中国后，是中国如何改造其苏联式国有企业的重要顾问。

林毅夫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描述十分惊人：邓小平说市场经济是中国竞争力计划的核心，这个说法长久以来过度简化中国繁复庞杂的战略。林毅夫就中国经济战略写了三本相当坦诚的专书，声称这些战略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中国古代历史，一是世界银行。这些论点至少得到其他一位叛逃者的证实。这位人士对世界银行的角色提供更多的细节，也说明美国的自由市场派人士如何吊诡地提供借镜，而中国利用它们来巩固其重商主义作法。林毅夫的观点，即中国是有大战略，和中国最权威的美国问题专家王缉思的观点南辕北辙。王缉思是牛津大学博士、某间位于北京、声誉卓著的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他和邓小平一样，经常主张中国没有大战略，过去三十年就这么跌跌撞撞地走过来。王缉思于 2011 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专文《中国追寻大战略》（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主张任何人坚称中国有战略就错了，有可能是他们别有用心的反华动机的产物。同样地，邓小平直到 1997 年过世之前对还对访客说，中国没有通盘的经济战略。

1983 年，世界银行总裁克劳森（A.W.Clausen）访问中国、拜会邓小平。他们两人秘密协商好，世界银行将派一组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经济，前瞻未来二十年，建议中国如何追上美国经济的方案。在这段期间里，世界银行对外发布少数报告，含糊的提到中国需要走上自由市场经济。私底下，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却提出不同的建议方案，它们说明中国如何能够超越美国。很显然，世界银行并没有建议隐瞒意图并假装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它是中国自己决定的欺敌战略。

1985 年，世银团队秘密地指出，中国可在 2050 年以前追上已开发国家。要达成此一目标，中国需要维持每年至少 5.5%的高度增长率。过去只有日本曾经像中国一样经济落后、却急起直追赶上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实例。世银建议，中国若采行某种策略，或许可以追上。没有其他国家尝试过，但有些国家试行过一部分办法。

世界银行指出，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中国若能做到生产力提升——特别是透过研发科技——再加上抑制人口成长，这个大胆的目标可以达成。世银私底下提出六点建议，但它没有向外界公布，这是因我银行做了政治上相当敏感的决定，支持中国的社会主义方法，而非诚心支持真正的市场经济。第一个建议是，在 1985 年之后 20 年，中国需要改变其出口组成，逐渐增加工业产品的比例，尤其是高科技产品。第二，世银警告中国领导人不要过度向外举债。第三，世银经济学家警告说，中国应该鼓励外人直接投资仅限于高科技和现代管理技术领域。第四，把外资和合资企业从经济特区推广到更多地方。第五，分期淘汰外贸公司，让

每一家国企自设外贸部门。第六，应该定期制订全国经济的长期架构。

到了 1990 年，世银派驻在外最大的参谋团队就在北京。中国没有对外透露世银的幕后角色，但是对这个国际机构的建议几乎是言听计从、照单全收。彼得•哈洛德（Peter Harrold）是世银驻北京首席经济学家，参与 1984 年研究甚深的华而诚是他的助手。多年后有位中国副部长告诉我，华而诚是中国经济奠基祖师之一，可是在中国经济学圈子外名气不大。我所认识的人，没有一个听过华而诚这号人物。*

＊译注：华而诚，台大经济系毕业，美国康乃尔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职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在世银任职期间自 1992 年至 1997 年担任世银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协助中国推动经济改革计划。2002 年至 2006 年在台湾世新大学客座，兼任经济系主任。

苏联崩溃之后，中国经济学家辩论是否该仿效俄罗斯和东欧的例子，把国有企业快速私有化、解除物价管制。虽然美国官员当时不知道，有些具改革意识的中国官员想遵循俄罗斯的私有化模式。中国再度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天安门事件之前已错失辩论，坐视中共两位领导人因改革派主张遭到罢黜。然后，美国决定不支持流亡巴黎的中国异议人士。克林顿总统显然根本不知道有这个辩论的存在：中国究竟该走向自由市场和私有财产，还是成立许多政府控制的公司，让它们从事偷窃技术、仿冒和搜集情报，以便胜过美国？

如果我们早知道，明智的话就该支持那些要走真正自由化道路的人士，但是比较强硬路线的声音，如日后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这一派胜出。周小川早早就与世界银行结盟，对中国的马拉松战略贡献很大。我们后来才知道，1991 年苏联崩溃后，有些有影响力的中国政治人物想走俄罗斯的改革模式。我们当时可以支持这一派人士，而反对周小川这一派。但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有此一秘密辩论。

周小川不打算进行私有化和政治改革。他和他在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中的盟友建议维持党对增进国企获利策略的控制。周小川替世界银行写了一份机密文件，详述他摒弃西式市场导向经济及俄国、东欧改革正面经验教训的计划。周小川和世银中国部门负责人哈洛德联手设计一套新策略，以改革中国低效率、组织混乱、经营散漫的国有企业。它们亏损累累，得靠政府控制的银行体系直接融资而存活。他们的整个构想就是保住恐龙，把它们改造为“国家冠军”，这是前人从来没试过的事。

经过仔细研究后，中方和世银经济学家决定不搞私有化和政治改革。他们共同决定，最稳定的经济成长道路是维持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及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的垄断。他们摒弃私有化有一部分理由是，他们估计中国工业国企总值为人民币两兆元，而全国人民总储蓄估计仅有一兆元，因此中国人民根本不可能投资、成为国企所有权人。中国因此不探取将苏联式国企

私有化的道路。农村也不会有私有财产。即使到了 2014 年，中国六亿农民也未拥有自己的土地。

茅于轼 2013 年获得美国卡图研究中心（Cato Institute）颁予 2012 年米尔顿·傅利曼促进自由奖（Milton Friedman Prize for Advancing Liberty）时，揭露这段辩论的部分内情。如果美国官员早知道温和的自由市场派和鹰派之间有这番冲突，或许华府会有不同的政策决定。

国营企业的成与败

1990 年代初期从事金融业的西方人士或许只能举出青岛啤酒是一家中国知名公司。今天，不少世界著名公司是中国公司，而且还是国有企业，譬如中国石油化工、中国银行、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以及华为。虽然许多国家都有国企，它们通常设计来动员经济资源提供给攸关国家经济福祉的产业，因为他们认为自由市场不能确实提供这些福祉。

中国把这个概念发挥得更极致，以南韩和日本的财团模式扩大组建国企。按照中国的国企模式，共产党设立国企并订定它的战略宗旨。其目标为促进国家利益，标准作法是为四个现代化之一服务。中共中央选派国企所有的主要经理人，许久经理人来自情报机关或解放军。随着国企向前发展，这种关系持续延伸。中国的国有银行偏爱国企，不太理睬私营企业。这些“国家冠军”有了雄厚的资金注入，被鼓励到海外购买技术及取得原料。种种的政府补贴固然造成效率不彰、滋长贪腐，却让中国公司面对西方对手时有极大的竞争优势。财星全球五百大企业英雄榜上将近一百家中国公司，几乎全都是国有企业。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这两个通常支持民间部门的国际机构，在面对中国时竟然完全改头换面，承认中国官方要求国企保护中国政府利益的规定。这已违反中国当初的承诺。世界银行甚至还在 1993 年发出一封密函警告说，如果国企不能改善、并转亏为盈，中国其他改革将付诸流水。世银的想法是将它们“法人化”，意即放松国家控制，让一些体质差的国企倒闭或解散，其他则可以藉由整并许多小型、亏损公司而成为少数几个大型、有盈余的公司。这是十年之后所谓“国家冠军’体系的开端。

世界银行建议中国进一步加深改革，中国也从善如流。世银建议成立类似自由市场中的共同基金的投资组合控股公司（portfoli holding company）。所有建议当中最令人震撼的一项是，应该成立证券交易所来出售国企的股份。（股市是民间公司交易的场所，不是政府机关套现的所在。）这项安排美其名为部分私有化。中国再度遵循躲在幕后的世银的蓝图。虽然美国、欧洲和日本在天安门事件后都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世银却悄悄地协助中国。中国另外亦接受世银建议，建立相等于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的制度。

从2003年起，中国官员开始讨论建立“国家冠军”。他们拟订一个秘密计划，要补贴五十家公司，期望它们在2010年以前能跻身财星杂志全球500大企业之列。他们达成了这个目标。在军火、发电、能源、资讯科技、民航和船运等战略产业的“国家冠军”得到中国共产党拨用土地、补贴能源、税负优待，以及以低于市场的利率得到国有银行融资（甚至不期望它们会还钱）的支持。

今天，国有企业或国家控制的部门占中国经济的份额十分巨大。资料显示，国有企业及由国企直接控制的实体占中国非农业GDP的四成以上。若再加上间接控制实体、城市集体和公众的城乡企业的贡献，公有及控制的中国GDP分额大约占全国经济的五成以上。如果想要说服旧霸主让他相信你要走向资本主义、你的中产阶级即将要求民主，这还真不是容易解释的一件事。

中国最大的五家银行掌握全国老百姓一半的存款。人口13亿5000万的中国，全国只有29家中央及地方政府拥有的银行、34家设在特别行政区的银行，以及2家私有银行，总共就是寥寥可数的65家。相形之下，美国约有9000家民间银行。到2013年底为止，中国的中央银行已累积约3兆6600亿美元的外汇存底。这笔巨大的数额约是中国整个GDP的百分之四十。

国企的表现从长期来看有褒有贬。大多数经济学者都认为，国企倾向于听从政治命令，不太看重市场需求。要他们随产品及服务需求有变而做调整，很难；而且相对于民间的竞争者，效率低落。他们经常搞裙带关系。他们的公司治理制度罕有透明化。

国家的干预造成国企营运效率不彰。若非西方协助，国企就会凋萎，甚至在竞争中输给中国民间创业家。国企仍然欣欣向荣是因为西方人救了它们。高盛、摩根斯坦利等西方公司协助国企改造、教导它们的经营主管如何遵循国际金融和会计准则。因此之故，国企能够透过公开发行上市，股票放到伦敦、纽约等全球证券交易所交易，另外也在上海、深圳和香港的交易所挂牌交易。

中国某些最著名的国有企业是西方投资银行家创立的。比如，中国移动即是将好几家经营不善的省级电信公司整并成功、再卖给国际基金经理人的一个案例。1997年上市，集到45亿美元以上，成就今天这家全球最大移动通讯公司。这家公司之大，苹果宣布将透过中国移动销售iphone那一天，股价竟然上涨近4%。

西方人也在中国企业家、投资者的教育工作上扮演启蒙角色。比如，中国挖角美、欧著名商学院负责人协助他们开发中国的企管硕士（MBA）课程。伦敦商学院和鹿特丹管理学院的前任院长现在任教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hina Europ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而杜克、哈佛的商学院跑到中国开班，招收企业领袖当学生。中国留学生到斯坦福和华顿商

学院拿到企管硕士学位后，进入美国创投基金或私募基金公司上班，不旋踵就被派回中国寻觅投资机会。

中国领导人虽然明白西方对国企的批评，但是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仍要继续依赖国企，有以下几个理由。第一、截至目前为止，国企在经济上相当成功；中国只花了一个世代时间就从菜篮子经济一跃为经济巨人。第二、中国的国企提供中国共产党持续主宰政治的正当性；党靠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旗可以号召群众。第三、中国领导人认为攸关中国经济及国家安全的重要工业，唯有在受到政府完全或大半掌控下才会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国家必须透过过半数股权保持发言权。第四、国企是维持党控制国家的重要机制，因为它们可以分配利益、庇荫追随者，确保正当性。第五、国企鼓励在中国本土创新，因此降低对外国技术的依赖，这是国家另一个目标。第六、中国领导人或许希望动作慢一点，以避免重蹈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惨痛经验——把国家资产贱卖给政治扈从者，造就一小撮富可敌国的寡头，经营着腐朽而毫无国际竞争力的的公司。

中国最近的“五年规划”包括一套发展重要战略性、高科技、新兴产业的“国家冠军”策略。中国已经开始藉由销售精密、中国设计的技术，进入国际市场。它所引起的惊惧更大于对国企经济势力的忧虑。例如，华为科技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电信公司之一，可能还和中国情报机关保持密切关系。长此以往，许多遍及全球的电信连结（包括连结美国公司、政府机构和军事部门的网路），可能都会用到华为的网路。在愈来愈全球化的世界，个中可能的威胁十分明显。中国间谍机关能够监听或把某些电信线路转移（reroute）吗？他们能利用这些网络窃取资讯吗？他们能在未来紧急状况下、制造“杀手按钮”，封锁关系重大的国际网路交通吗？基于这些原因，美、英等国政府不准华为产品进入他们国内。

中国也把资金部署到海外，以扩张它的国企。中国人甚至替企业之国际化取了一个名字：走出去。中国鼓吹人民币国际化，以取代美元作为全球准备货币。作为中国“走出去”策略的一部分，中国企业发起所谓“海外抄底”，以低价收购外国公司。既然背后有国有银行供应资金，又不需考量投资报酬率，国企有很大的机会买下它们的竞争对手。

位居中国经济决策核心是一个超级大机构“国务院发展及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它决定国家战略产业的政策、核定重大投资，以及国企的并购。发政委有决定所有消费者商品价格的大权，从威士忌到汽油，统统管得到。发改委是中国经济战略的神经中枢。

中国向国际市场大肆扩张之际，中国的竞争者有一件事十拿九稳不会错：那就是中国绝对不会照规则玩。根据美国政府最近一份报告，中国继续竖立许多非关税壁垒，以保护其产业不受外国竞争。这些壁垒包括：”国家交易、过度的国内补贴和囤积商品、歧视性课税、不合理的反倾销关税，以及拖延批准美国谷物的生物技研运用。”这一切统统违反世界贸易组织

的条约。

鸡鸣狗盗

中国占尽不守规矩的便宜。有一项研究指出，中国在钢铁、汽车零件、玻璃、造纸等四大重要工业，藉由增加补贴、提供税负优待、廉价土地和技术，很快就扩大其全球市场占有率——而这四大工业中国原先根本没有重大竞争优势，连劳动力都没有比较低廉。根据古典的自由市场经济学，这些作为都被认为是不合理、无效率，和高成本的。可是，结果却恰恰相反。中国在十年内超越了美国，成为世界最大造纸国家。中国玻璃生产量占全球生产量 30%以上，且出口更超过国内生产。中国在 2000 年从钢铁净输入国摇身一变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国和输出国，全球市占率有四成。2001 年之后，中国成为汽车零件最大的生产国和输出国之一。这不是劳动力低廉的缘故，因为在所有这些产业中，劳动力占成本不到一成；这也不是刻意压低人民币币值的缘故。用不着多说，中国如此漂亮地征服市占率，并没有引起注意，它也没有对外公开说明。

中国也大规模仿冒非中国制造的商品。这包括并未取得授权、或未得到允许就迳自生产、配销或使用的商品及其设计或关键技术。2002 年，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ABC News）估计，外国公司因中国的仿冒，每年损失高达 200 亿美元。有人认为数字还要更高。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前任公使衔参事汤玛斯•波姆（Thomas Boam）最近在美国全国制造业公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演讲，他声称中国的 GDP 有一到三成是靠盗版或仿冒产品来的。其他的估计也说，依据西方产品仿制的山寨商品现在占中国零售业业绩的 15%至 20%之间。在某些地方市场上，仿冒品高达九成。

美国政府的全国反情报执行处（Office of Na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Executive）最近的一份报告形容中国是“世界最猖獗、顽强的经济间谍”。中国搜集敏感的经济讯息（包括商业机密、有专利权的制程、商业计划、尖端技术，以及受到出口管制的商品），以支持其国内产业。它使用传统方法搜集资讯，也透过网路搜集资讯。中国利用后者恐怕堪称全球第一。

由于网路愈来愈重要，自从 2000 年以来中国使用的方法也精益求精。中国人非常擅长利用网路科技支援国内产业，利用网路从企业、政府、学术机关、研究单位及其他锁定的组织，窃取敏感的经济资讯。为了躲避侦测，他们利用快速演进的种种工具，如恶意软体、网路工具分享、骇客代理伺服器，透过第三或第四国传输网路作业等等。

美国企业界及资安专家曾经举报，有一堆网路入侵源自中国。不幸的是，在许多个案上，美国情报界无法证明谁是祸首。针对这种攻击造成多大损失的估算通常都不可靠，但是多少

还是可以对网路攻击的损失规模有个谱。钟东蕃是个工程师，他任职的美国公司涉及到 B-1 轰炸机、航天飞机和其他计划。他在 2010 年以替中国航空工业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罪名遭到判刑。当他被捕时，家里搜出约 25 万页敏感文件。他在 1979 年至 2006 年期间传递多少资讯给中国官员，无从查考。但是那 25 万页文件所含的全部资料，可以储存在不到一美元就买得到的一片 CD 里。

2005 年，两名投奔美国者揭露中国马拉松战略的经济部分。和白先生、绿小姐不一样的是，他们两人说法一致。中国大部分战略是拼凑混合，不是纯粹自由市场或资本主义战略，而是综合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人员的设计和对美国经济史扭曲的认识所出来的东西。这些规划人员与反自由市场的中国领导人结盟，击败主张市场导向经济政策改革的人士。他们旋即设计出混合的、重商主义战略，基本上将它掩饰了 30 年之久。鹰派又赢了。我们没有机会影响辩论，因为我们连对手是谁都不知道。

第九章　2049 年，当中国统治世界

“反客为主”——三十六计

有 20 多年之久，美国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军事力量，无人能望其项背，它的经济也遥遥领先群伦——到目前仍如此。全世界都在用美国电脑、唱美国流行歌、喝美国可乐、上美国连锁餐厅吃东西、到美国大学念书，还追踪关心美国总统大选。全球 70 亿人口大多无法想像一个不被美国的文化、军事和经济影响生活上的各个层面的世界。同样的，绝大多数美国人也不晓得，如果美国不再是领头的世界大国，这个世界会是什么面貌。

现在该是想一想的时候了。到了 2050 年，中国经济将比美国大很多——根据某些预估，或许有三倍大——当时的世界有可能是单极世界，中国一枝独秀，是全球领袖。其他剧本预测中国会和美国平起平坐，并列超级大国，还有人预测会是三极世界——中国、印度和美国三足鼎立。

所有这些剧本中都有一个共同因素：中国将是经济最强大的国家。美元将不再是头号货币，会让步给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合组的多元货币制度。中国的军事费用将超越美国。它将对其邻国及盟国享有美国数十年来习以为常的强劲影响力。而且，至少在某个程度上，中国将可以随自己的意向打造世界。

这个世界的形貌会是如何？受压迫的人民会更容易、还是更困难推翻专制独裁？我们呼吸的空气会更干净、还是会含更多二氧化碳？保护贸易、促进和平的体制会变强，还是会变

弱？

当然，有些问题无从回答。可是有一件事却很肯定；假设中国政府仍然延续它目前的政策倾向，继续推动相同的策略，坚守自毛泽东以来的价值观，那么依照中国形象所打造的世界，将和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世界大不相同。

2049 年中国带头的世界，若是由鹰派决定中国的政策，将会更糟。如果温和派和真正的改革派当家，在西方协助下，称霸的中国就不会那么穷凶极恶。我们如何能够影响中国在鹰派和温和派之间做抉择，将在最后一章讨论。如果我们不能强化真正的改革派，恐怕就会出现下述状况的世界。

一、中国价值将取代美国价值

美国社会高度推崇个人主义。我们美国是由托马斯·杰斐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个人主义者，以及拒绝作为大英帝国一部分的一群起义志士所缔造。他们是我们的英雄。我们的《人权法案》保护所有的美国人说出他们要讲的话、信仰他们选择的宗教，以及住家不受执法当局无理的搜索。所有的美国人都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方向，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然而，在中国，那里根本不存在美国式的个人权利。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刘禾指出，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于 1860 年代要把第一部国际法译成中

文时，发觉中文并没有 right 这个字词，因此他必须结合“权力”（power）和“利益”（benefit）两个字，创造一个新词“权利”，使用到今天。中国共产党所协助打造的社会是集体主义的社会，与 1949 年之前的文化没有太大的差别。两位对中国有深入研究的国际企业策略专家说：“在中国，做为一个人，就是做为更大的人类的附属品。”虽然中国宪法有多次提到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自由，实际上这些权利很少受到保障。

数十年来，中国政府不让自己的人民享有个人权利。国家一强，它甚至开始干预在国境之外中国公民的权利。纽约的中国人权运动人士温云超在联合国总部演讲后，他的手机、电邮和推特都遭到骇客侵袭,这显然是中国政府指使调度的攻击。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施洛德•布朗（Sherrod Brown）参议员问温云超，为什么他没像其他的中国抗议者被抓去坐牢，他回答说那是因为他人不在中国。此外，中国在 2009 年编列 65 亿 8000 万美元预算，展开“外宣工作”，即对海外进行宣传。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驻外新闻网，向各国宣传介绍中国的正面形象。

对外国人权团体的攻击稀松平常。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副会长路易莎·格雷夫（Louisa Greve）作证说，中国一再骇进人权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电脑系统。这些攻击的目的是要“破坏异议人士彼此的互信……提升成本、制造恐惧”。格雷夫认为这是“专制国家搞压迫手法延伸到国境之外的例子”。

问题在于这些压迫手法是否只是个案，还是中国将变本加厉把它变成常态。一旦中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强大到可以不甩美国及其盟国，中国官员就会利用网路攻击以骚扰言论不合北京胃口的任何人；中国境外的许多人，从亚洲到北美洲，都必须关注他们说了什么、以及他们是否将受到惩罚。

二、中国将“和谐化”网路上的异议人士

中国对付言论自由的一项武器就是对互联网进行内容检查。中国政府雇了 100 多万人从事网路内容检查工作。全世界极大多数互联网网民是中国人，但是因为中国官员监视及封锁对人权团体、外国传媒，以及其他许多政治、文化团体网站的连结，中国人民不能像自由世界网民那样接触到同样的互联网。“和谐化”其实就是遭到新闻检查的潜台词。

中国费尽心思要抹煞掉对天安门广场屠杀的记忆。2012 年 6 月，军事镇压 23 周年时，中国检查人员把中国境内互联网封锁，完全看不到有关六四事件的只字片语。三个活动分子申请准予举行纪念游行时，立刻遭到逮捕。网民贴出那张一名学生挡住坦克车队的经典照片，*但为了躲开检查，在照片上罩上黄色小鸭作为掩护，结果中国政府把“黄色小鸭”这个关键词也封杀了。中国检查大军无所不在，6 月 4 日被谑称为“互联网维修日”——当天肯定会当机。

＊译注：据传这位阻挡坦克车的人士叫做王维林，然而确切身分不明，且下落不详。

除了压制资讯，中国政府雇用亲政府的“博客大军”歌颂官方观点、抹黑异议人士和散布假消息。他们能以假乱真，搞得互联网网民难以分辨真相新闻或政府宣传。

千百年来，种种高压政权都会滥用他们对资讯的掌控。过去在国内实施新闻检查，和 2050 年时中国有能力在全球实施检查，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愈来愈有能力，不仅检查它的公民看得到的内容，也能检查其他许多国家公民看得见的内容。中国掠夺性的互联网作法过去局限在国内，但是这些伎俩愈来愈散布到国际上。中国控制互联网的创新手法，至少已有 11 个国家效法。

当然，中国或许绝不能制止《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报导中国的真实新闻。但是，和中国合作、以制止其人民接触到这类网站的国家，很可能会随着中国的实力及影响力上升而增多。例如，华为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ZTE）这两家中国大公司，是供应互联网和

电信硬体给中亚、东南亚、东欧和非洲许多国家的重量级厂商。这些国家和顾客——包括哈萨克、越南、白俄罗斯、衣索比亚和尚比亚——可能奉中国对互联网实施紧密的政治和技术控制为模范，并且也向中国购买这种技术。

三、中国将继续反对民主化

中国官员当然喜欢世界上多点专制国家、少些民主国家。自从 1955 年以来中国就高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禁止各国干预其他国家内政。只要中国实力持续增长，它保护独裁专制、亲善中国的政府，以及颠覆代议政府的能力，可能都会大幅增长。中国为推展其百年马拉松策略，也积极展开操纵新闻与资讯的工作。它那 65 亿 8000 万美元的“外宣工作”计划有一部分即明白支持专制形态的政府。北京已经多次正式支持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Robertt Mugabe），也不避讳公然支持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后者已经遭海牙国际法庭以战犯罪名起诉，他根本不敢出国旅行，深怕被引渡到海牙送审。

中国支撑专制国家的另一个方法就是提供战略贷款和投资。中国提供给开发中国家公司和政府的贷款，还超过世界银行。中国利用这种经济力量来推动它的全球政治诉求。它目前花费两兆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在非洲透过无条件贷款援助，以推动反西方的议程。根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报告,“这种无条件的援助——没有附加人权条款和财务担保……使得一大片开发中国家的天平倒向无可问责、更加贪腐的治理。”

以剑桥大学教授斯蒂芬·哈尔珀（Stefan Halper）的话来说，津巴布韦是中国在非洲的影响“最鲜明、最著名的例子之一”。中国是穆加贝对津巴布韦维持铁腕控制的关键后台，先提供武器给他，后又送给他互联网监视硬体及其他技术，帮助他掌控人民。联合国表决是否制裁穆加比时，中国予以否决。

中国的一项策略就是根据不干预内政原则，与非洲政府洽定“互惠协定”。中国政府对中国的商业伙伴虐待非洲人民视而不见，以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的话来说，就是“只谈生意、不涉政治”。因为不理睬国际标准，中国在非洲可能进一步弱化民主、助纣为虐。

中国把津巴布韦模式套用到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它支持叙利亚、乌兹别克、安哥拉、中非共和国、柬埔寨、苏丹、缅甸、委内瑞拉和伊朗的独裁政府。中国的经济规模一旦成为美国的三倍大，它破坏解决冲突、促进稳健治理的行动一定更有影响力。

当然，从现在到 2049 年之间，中国也有可能在国内外都舍专制而拥民主。但是我们可以乐观的理由实在不多。数十年来，西方许多学者曾预测中国走在接近自由民主的道路上：这些学者有不少人因为他们如此乐观的预测感到惭愧，不过仍有少许人不顾证据固执己见，坚持民主即将来到中国。毕竟一相情愿的想法，一向都很难打碎。

四、中国将与美国的敌人组成同盟

有一个很艰巨的事实，就是中国领导人视美国为全球斗争中的对手——他们决心一定要赢的对手。中国对两国关系持这种看法，说明了为什么中国一再协助美国的敌人削弱美国的实力，尤其是美国用在反恐战争的力量。2001 年，美国情报机关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协助塔利班／神学士，而塔利班庇护本拉登属下的恐怖分子。说明白点，中国两家主要的电信公司协助塔利班在喀布尔建立电话系统，此举在 911 事件后还在持续。

被追问这项在阿富汗兴建电话系统的新闻时，中国又玩每个教唆专制政府的人被逮到时的手法：它假装对报导所说的这两家所谓的民营公司的活动并不知情。但是这两家公司根本不是民营公司，北京也不是毫不知情。其中一家公司的创办人当中至少有一人是解放军军官，而它帮中国军方建立通讯网路。

中国和塔利班的关系绝不只是兴建电话系统那么简单。1998 年，塔利班得到中国政府其他援助，或许是因为塔利班把克林顿时代为摧毁阿富汗境内基地组织恐怖分子营地所发射却未爆的“战斧”（Tomahawk）巡航导弹秘密送给北京的缘故。对中国而言，这是天上掉下来的情报至宝。三年之后，911 恐怖攻击当天，一群中国官员在喀布尔与塔利班签署另一项经济与技术援助协定。这只是中国与塔利班达成的许多协定中的两项。

中国与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的合作并非完全间接。五角大楼在 2001 年 12 月所取得的情报报告就透露，911 攻击之后，中国供应武器给基地组织。塔利班和藏身其间的基地战士就在恐怖攻击后一个星期，收到一批中国制的地对空导弹。美军特种部队在 2002 年 5 月发现其中 30 枚导弹。难怪一位塔利班司令公开赞扬中国的援助，他对巴基斯坦一份乌尔都（Urdu）语文报纸说：“中国对塔利班伸出援助与合作之手。”

中国也支持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替塔利班效力的中国电信公司之一也涉及到违反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1999 年 5 月，透过联合国“石油换粮食”方案，它要求联合国准予出售光纤通讯系统给伊拉克。联合国两度否决中方申请之后，该公司不理会联合国，径自就交运器材设备。

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期间，我在五角大楼任职。当时美国一位资深国防官员向我证实，中方曾协助伊拉克建设一个光纤连接网络，改进伊拉克空防系统的整合。这些光纤缆线大多埋在地下，可以不受天候或盟军空中袭击的伤害。当此一军事援助的消息传出时，小布什总统承认这则报导很令人不安。他告诉记者说：“我们关切中国在伊拉克的行踪，我的政府正向中方发出适当的反应。是的，他们涉及到协助伊拉克发展会危及我方飞行员的系统，是让人很困扰的一件事。”

中方的回应是一概否认这些指控。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沈国放说：“这是谣言，是美、英轰炸伊拉克的借口。中国没有任何军人或平民在伊拉克工作。”事实上，这家中国公司在伊拉克设置办公室，伊拉克官员也到它们华南的公司拜访。伊拉克从 2000 年至 2001 年下了订单，而 2002 年伊拉克提交给联合国 12000 页有关其受禁的武器计划的档案，证实此一不法关系。三家中国公司供应光纤和通讯总机设备给伊拉克防空网。

2003 年底，伊拉克陆军某防空单位前任司令官承认，不仅中国电信专家、还有中国军官扮演重要角色，在同年 3 月美军入侵之前几个月，支援伊拉克军事部队。他说：“他们在 2002 年春天到达。他们受到侯赛因亲自欢迎。其中有些人蓄胡子、戴阿拉伯式头巾，以便外表长相更像我们。”根据这名伊拉克前任军官的说法，中国人开发一套高科技诱饵器，使美国及盟军战机投下的导引炸弹转向，经常打不中目标。他说：“中国制的器材每个只要 25 美元，非常有效。

中国还有一个流氓国家的好朋友，那就是国营的军火制造商中国“北方工业公司”（North Indutries Corporation，简称 NOR1NCO）。2002 年，北方工业公司被逮到销售特种钢材供应伊朗的导弹计划，次年遭到经济制裁。主司审查、履约及执行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宝拉·狄舒特（Paula DeSutter）在“中国联合安全评估委员会”（China Joint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作证时说：“中国政府没有采取行动制止北方工业公司的扩散行为。”她说：“中国政府虽声称它反对导弹扩散，它也禁止中国公司及企业从事违反它对美国承诺的移转，不幸，事实却相当不一样。”她又列举中国保证不出口导弹和危险物品给巴基斯坦等国家，可是每一次美国政府都证明中方要诈。

狄舒特也作证说，中国不负责任地出售建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技术。即使中国签署好几个核子不扩散协定，她说：“很明显，中国继续对巴基斯珀和和伊朗的核计划做出贡献。”此外，中国对伊朗等流氓国家的毒气瓦斯和化学武器计划也有所贡献。根据狄舒特的说法，“尽管是生物武器公约签署国，中国保有（生物武器）计划，违反这些义务”。中国就其政府的计划向全世界信誓旦旦，它声称绝未研究、制造或拥有生物武器，“根本不是事实”。

五、中国将出口空气污染末日

2013 年 1 月，一股“臭雾霾”笼罩北京。被谑称为“空气污染末日”（Airpocalypse）的雾霾持续好几个星期，在这段期间，北京市民和访客“能闻到、尝到污染，严重到甚至无法呼吸”。中国今天的崛起就像是服了类固醇的工业革命，只不过这一次中国人有能力可以毁掉大半个地球。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这么做。

一般预测，不仅中国的 GDP 很快就是美国的两倍，到了 2015 年，它所排放的危险废气

也将是美国的两倍。根据《经济学人》周刊的一项研究，“从 1990 年至 2050 年之间，（中国）从能源累积的排放量将达到约 5000 亿吨——大约等于全世界从工业革命开始至 1970 年的总排放量。”这种污染的结果每年将夺走数以千计的性命。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预测：“鉴于交通及工业的空气排放上升，每年全球（因空气污染而）早死的人估计将倍增为 360 万人，大多数将发生在中国和印度。”从中国的雾霾污染已笼罩日本部分地区多日。污染甚至跨越太平洋，占加州微粒子污染的 29%。当然，全球暖化是不受国界限制的。

中国排放量大的主因是它非常倚重煤，这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污染源之一。美国能源资讯局报导，中国烧的煤接近于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加总起来的数量。即使中国已宣布措施以改善其环境足迹，它的纪录显示问题恐将继续恶化。中国仍是补贴用煤的少数国家之一。石化燃料占中国商用主要能源总耗量的 75％，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仍将是中国主要的燃料。中国 2011 年的煤耗用量增加 9％之多，占全球煤耗量增加总值的 87％。

中国持续成长下去，污染问题只会更加恶化。若要减缓排放量，中国势必要严重牺牲其经济增长率，可是就其他所有政策目标而言，经济增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这一来，到了 2049 年，“中国的成功”将会是全世界都能“闻到、尝到，且因此窒息的”。

六、中国的增长策略将带来重大污染

若要保住执政权位，中国领导人晓得它需要快速增长。如果我们把目前的僵局往前推估 30 年，前景堪忧。自从 1980 年代以来，中国在长江沿岸兴建一万座石化工厂，在黄河沿岸也兴建了四千座石化工厂。由于这些工厂的存在，以及中国选择发展重于环保的政策，中国四成的河川已严重污染，而且两成的河川其水质已经毒到不能碰触，喝就更不用说了。中国至少 55％的地面水——中国的地面水原本就不多——是不能喝的。事实上，中国工厂把废水直接排入河川，每年造成约六万人早死。当然，由于国家控制住资讯，加上新闻检查铺天盖地，许多中国人甚至还不知道他们的饮用水可能害他们丢了性命。

中国的邻国已经感受到它不负责任、一味追求发展所造成的溢出效应。由于中国的水污染，中国极大比例的渔业已转向东海、南海和太平洋等主权有争端的海域。光是 2011 年，南韩海巡局就驱退非法进入南韩水域作业的 470 艘中国渔船。中国和越南、菲律宾、日本之间也经常发生类似的纠纷。这些争端极有可能导致武装冲突。

中国的邻国也有理由担心中国一窝蜂抢建水坝。中国计划在 2020 年之前将水力发电量扩增为三倍，这将使得中国许多河川化为细流。由于中国不承认共有水权，也不与邻国分享其水源运用的资讯，中国的邻国若不接受他们的水资源耗尽，就得和中国抗争，这一来恐怕会非常危险，会造成局势动荡不安。

中国如何管理它的水资源，不仅将会影响亚洲，也会影响全世界。科学家预测，到了 2050 年，全世界人口将增加到超过 90 亿人，而全球将近七成人口将住在城镇地区。对于废弃物和水的管理将会产生严重后果。听起来这像是纯粹的中国内政事务，其实不然。当中国成为美国三倍强的时候，这会是全球关切的问题。今天，有许多人呼吁中国境内应推行更大的环境保护运动。但是，它还未出现。

七、癌症村

中国空气和水源的污染所造成的人命代价，在工厂附近出现的癌症村是血淋淋的见证。这些工厂把废弃物、有毒化学品和其他有问题的物质倒进河川，戕害野生动物，污染水质，造成畸形婴儿，甚至毒死人。大部分是因为农村的标准非常不幸地落后于工业化国家的标准——中国只有 40%的法规跟得上国际标准——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所产生的癌症集中地已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

伤害不仅只限于中国沿河农村，癌症现在是北京老百姓第一名死亡原因。中国人罹癌率仍低于美国，但是中国若持续目前的路，这个排名不会持续太久。

中国一再提出，已开发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也出现污染问题。但至少有两件事使中国与众不同。第一，中国的工业革命规模非常大，因此实际与潜在的伤害都空前无比。中国很快就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它对石化燃料、有毒化学品和其他污染物的需求也将奇大无比。

第二，中国缺乏强大的公民社会可代表曝露在因中国快速发展所造成的致癌物及其他毒素下的人民。有个妇人住在癌症村，丈夫和儿子都被癌症夺走性命。她说：“我所要的只是呼吸新鲜空气、喝干净的水、种无污染的土地……但是我猜想这是奢望。”施洛德·布朗参议员说：“那里没有享有言论自由的媒体能够揭露问题”，甚至真相曝露后，“也没有自由的公民社会推动长期的改革”。

随着中国的国际贸易增长，它的耕作及食品加工作法也在国际上产生极大负面影响。中国更可恶的作法包括使用危险或已禁用的杀虫剂增加作物产量、以不安全的抗生素和荷尔蒙促进家禽和鱼类生长，以及利用非法的防腐剂美化半加工品的卖相。这些作法已导致东亚、欧盟、日本和美国到处禁止中国食品输入。

八、诚信崩坏，诡诈当道

谈到贸易和经济增长，美国输给中国，原因很简单：中国耍诈。它偷窃技术、暗助中国垄断，并且不公平地保护其国有企业不受外国竞争。数十年来，它打破现代国家处理跨国贸易、及对待国内外资的规则。中国照自己的游戏规则玩。当它力量愈大时，更多国家将被迫

也照它的规则玩。

中国之增长策略能成功仰赖一个核心元素，就是它经常以不法手段取得外国的科技。中国有许多仿冒品工厂，员工动辄一万至一万五千人。中国的国家工业政策目标造成鼓励窃取知识产权的效应，相当多的中国企业和政府单位都这么做。剽窃知识产权在中国的猖獗程度骇人听闻，有家软件公司在中国才卖出一套程式，竟接到三千万个更新要求。

中国骇客是剽窃的翘楚，他们经常入侵外国公司的电脑系统，把它们的智慧结晶转交中国业者，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知识产权掠夺者。中国人因此在技术阶梯上节节攀高。如此肆无忌惮的剽窃知识产权，光是美国每年营业损失就高达 1070 亿美元，就业机会减少 210 万个。未来，中国的经济更大，它的同盟分布愈广，就更难鼓励创新发明家进行投资研发，因为它的价值很容易就被无所不在的海盗给打垮。

除了强迫技术转移，中国还偏袒国有企业。它们掌控无数的经济部门，在下列七大重要策略工业更是主要角色：国防、发电、石油和天然气、电信、煤矿、航空及航运。

中国领导人可以从庞大的外汇存底中拨款补助国企，下令指挥，因此锁定外国市场将是稀松平常的事。从 1985 年至 2005 年，中国投入 3000 亿美元以支援国内最大的一些国有企业。这些国企能得到廉价资金，这是它们的国际竞争对手休想企及的优势，而它们也愈加积极增加对外投资。它们四处攻城掠地扩大市场、开发天然资源，及创造更先进的技术。

中国最善于创造不对称优势，提高进入市场的门槛。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认定，中国的外人投资法令是世界前二十大经济体中限制最严的。中国的反托辣斯政策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中国在 2007 年制订反垄断法，但是中国国企免受本法规范。这套法令主要针对试图购并中国本土企业的外资公司。再者，中国在反垄断法规定的“调查”过程采用许多有问题的伎俩，如警告公司不得聘请律师，以及施压他们，逼他们承认从事反竞争作法、违反了反垄断法。

中国政府用来阻挠公司进入市场的另一工具是新颁订的“自贸区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办法”。和美国“外人投资委员会”的作法不同，中国法令加上“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定”作为审查项目，可用来阻挡外资进入市场。外国公司在中国面临的困难不胜枚举，如明目张胆的禁止、外国所有权上限、雇用人数限制、一再重复要求检验以及政府审批许可时间拖得很久等等。因此，北京把外资公司冻结在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国门之外，即使它继续享有世界贸易组织所有会员国赋予它的最惠国待遇。

九、中国将日益破坏联合国及世界贸易组织

联合国一点也不完美，但本质上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会籍最普及的政治组织。它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论坛，任何国家都能来向其他全体国家提案讨论，让各国就卫生、劳动、电信、

金融、安全和贸易等议题协商合作。这个合作网络支持我们的国际政治秩序，但是多国参与这个联合国的主要优点，在中国主导的世界可能存活不下去。

2001 年，中国偕同几个亚洲国家成立一个希望能制衡北约组织的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ration Organization）。上海合作组织会员为中国、哈萨克、吉尔吉斯、俄罗斯、塔吉克和乌兹别克。它和北约组织都有签署的公约、选派常务秘书长、依据议题在区域首府设置中心，并且每年定期召开高峰会议。不过，上海合作组织超越北约组织，它不仅只谈安全合作，也有贸易、金融及法律事务合作的机制。

上海合作组织和北约组织最大的不同在于其会员国的性质不同。北约组织是二十八个民主国家的同盟。上海合作组织本质上是专制国家的组合。虽然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例如，民主的印度——有朝一日或许可正式成为会员国，把民主价值带进上海合作组织，但是由中国主导的另一未来似乎比较可能出现,因为中国将是经济与军事皆首屈一指的世界大国。

北京已在上海合作组织中扩大它的角色，比如掏钱帮助其他会员国。中国透过上海合作组织的商业理事会（Business Council）和开发基金《Development Fund）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贷款融资给其他会员国。上海合作组织也成立一个国际银行协会（Intenational Bank Association)，及一个学界顾问论坛，可检讨教育、卫生、文化、司法及立法的议题。中国外交部形容上海合作组织是“北京‘新安全观念’成功的典范”。上海合作组织会员国定期举行一系列联合军事演习，中国的官方传媒经常予以大篇幅报导。

到了 2050 年，如果印度从观察员升格我正式会员，上海合作组织的会员里将有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体。它的会员将握有破坏任何全球体系的经济影响力，它只要拒不参加、或不遵守其决定就行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上海合作组织会员支持的联合国就像没有美国的国际联盟一样，因为中国及其上海合作组织盟国占世界 GDP 的比重极大。某些专家甚至建议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一个贸易体系，并只用其会员国的货币交易。

和联合国一样，世界贸易组织也有地位不如从前之虞。原本是制订规则以推动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的这个机构，现在却陷入新兴市场的泥淖里。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有许多承诺，现在都刻意拖延兑现，而且迟迟不加强市场开放，这一来伤害了世界贸易组织。尽管耍这些伎俩，中国仍然在贸易谈判中要求已开发国家给予更多让步。

再过短短几十年，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将不再具有身为最大经济体的优势，这是他们可以推动标准及自由贸易原则之凭据。除非西方国家赶快说服中国接受这些原则，权力一转移恐怕就会造成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大倒退，这将伤害世界贸易组织和促进多边贸易的类似努力。

如果中国成功地削弱了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这将吻合它先将旧世界秩序“去正当化”、

再建立新世界秩序的目标。中国战国时代的故事显示，挑战者往往先指控旧霸主不尊重王室。它要呼吁其他国家舍弃旧霸主、支持挑战者，因为霸主不尊重王室，已失去号令天下的正当性。这不是一个一时三刻可以完成的工程。今天，崛起的挑战者必须先瓦解霸主的全球权威的正当性，才能成功。这表示中国必须先去除西方所建立的机构，如联合国及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当性。透过宣传当前的世界秩序已经逐渐崩坏的印象，挑战者才能扭转制度，以吻合它的修正主义模式。十、中国将为牟利扩散武器

多年来，中国出售导弹技术给流氓国家，这些流氓国家则开发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侵略邻国、武装恐怖分子，以及压榨本国人民。中国的顾客包括伊朗、利比亚和叙利亚。“导弹技术管制机制”（Missile Technology Regime）是国际间为防止这类国家取得与导弹有关之出口，而成立的出口管控协定。

1998 年，美国预备向中国提出一笔秘密交易，我相信它会乐于接受。（当时我和其他同事都很天真。）为了交换对导弹出口实施有效的管控，美国将“与中国扩大商业及科学的太空合作”，发给“全面暂停天安门广场事件禁运的总统令，涵盖未来所有的商用卫星之发射”，并且增加可由中国火箭代为发射的美国卫星之数量。

美国的提议很聪明，有些胡萝卜，但也暗藏机锋。由葛瑞·沙莫尔（Gary Samore）执笔的一份国安会备忘录外泄出来，那当中提到，藉由成为导弹技术管制机制会员，中国可以取得“政治声望，有能力影响未来导弹技术管制机制的决定，具体获得保障日后不会受到美国的导弹制裁，以及（身冯会员）可加速导弹技术管制机制所管控的美国军品输往中国之审批”。至于棍棒方面，同一份备忘录提到，美国将“向中方表明，若是导弹议题上没有进展，我们将不会增加发射配额。甚至危及到既有的（人造卫星发射）配额”。

中国对这项提案的反应，明白透露它的优先目标和意向：它谢绝美国的提议。中国对技术合作和政治声望没有兴趣，它只在乎出口武器给流氓国家。

中国的回应也让我们看清楚中国带头的世界会是什么模样。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休想要迟缓扩散，愈来愈强大的中国将会加速它们的扩散。孤立流氓国家的大梦也可以醒了，中国将增强它们的力量。中国也不会与美国及其盟国合作，它一有机会就会破坏与削弱他们，尤其是涉及到中国本身国家安全时。

即使中国加入导弹技术管制机制，也有理由怀疑它是否会遵守管制机制的规定。杰西·赫姆斯（Jesse Helms）参议员对中国在武器上的口是心非提出一份严正报告，它指出：“过去 2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扩散做出 15 次正式承诺：7 次有关核技术扩散、6 次有关导弹技术之转移，以及 1997 年中国加入生物武器公约时的两次承诺。”赫姆斯的助理制作一份图表，列举中国违背承诺、损害到美国国家利益的历次时间。这些违犯事项包括出售核武器

零组件给巴基斯坦和伊朗，以及将弹道导弹移转给巴基斯坦、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利比亚和北朝鲜。

2003 年 11 月，中国与相当广大的武器扩散网有牵扯的铁证浮出台面。利比亚政府交给西方官员一大堆文件，其中有详尽的中文使用手册，载明如何以传统炸药包上的可裂变材料，制作一颗一千磅、可制造核子爆炸的炸弹。媒体报导声称，这些文件显示，在初步提供设计资讯给巴基斯坦和利比亚之后，一连多年，中国核武器专家仍与巴基斯坦核子科学家密切合作。

为什么北京不停止将其武器和导弹出口给流氓国家呢？助理国务卿宝拉•狄舒特在 2006 年说，这反映中国政府若不是“没有能力”对付扩散，就是它根本“不愿”做。后者显然比较正确。中国的目标有一部分即是把武器扩散到专制、且经常反西方的政府，以减低美国这类大国的影响力。

小结

中国迄今并未就它企望的世界秩序提出宣言，但过去十年，两任国家主席都暗示过中国的意图。2005 年 9 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大会发表重要讲话，题目是《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他揭示“和谐世界”的概念，提到“让我们携手建设和平共荣的和谐世界”。八年之后，继任的习近平在他的演讲中只用五个字提供世界未来的线索——“发展最重要”，后来又说：“我们必须持续巩固物质与文化基础以实现中国梦”。（注 100）习近平定下根据中国价值和谐化世界的目标。

不摆在正确的前后脉络里，胡锦涛和习近平的话看来都没有害处。但是，本书第一章已经说明，中国的“和谐”概念摆在地缘政治里指的是单极称霸，本书第二章也已经说明，“中国梦”是中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经济、军事和文化皆独霸。

从《地心引力》谈起

2013 年有一部电影《地心引力》（Gravity），在其一开头珊卓•布拉克（Sandra Bullock）和乔治•克隆尼（George Clooney）所饰演的太空人收到休士顿任务控制中心传来的噩讯。俄国人已朝他们失去作用的卫星飞射导弹，爆炸已产生可能致命的碎片之连锁反应，它们正朝着美国人要展开的太空漫步冲过来。原本是修复哈伯太空望远镜的例行任务，现在变成为九死一生的挣扎。最后的结局，布拉克所扮演的女主角在人员已撤离的中国太空站找到一艘小太空船，平安返回地球。

后来有人批评片中有太多不实之处。评论说，由于表面张力，影片中布拉克的眼泪不会

飘离她的脸。她从哈伯太空望远镜前往中国太空站，中间在国际太空站小停，这段旅程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三套系统分别位于不同的轨道。而且事实上，布拉克应该穿戴成人尿片、不是机能内衣——这一点最多人评论。

但是这部电影还有其他议题值得斟酌。它们和剧情效果关系不大，却与百年马拉松却颇有关联。

第一，女主角绝对不会被允许进入，更不用说操作，中国的太空站。中国工程师设计他们的系统时，就刻意打造成不能与美国太空站结合。他们不要美、中在太空合作。

第二，俄国人从来不曾如同这部电影所述，朝自己的卫星发射飞弹。而中国人 2007 年倒真的摧毁了自家的一颗卫星。中国利用陆基反卫星武器，将一颗已失去作用的气象卫星炸出太空轨道（有朝一日。他们可以拿它来对付美国的卫星）。根据五角大厦楼报告，中国的试射“引起许多国家关切，产生的碎片可使所有太空国家的资产陷入险境，并且对人类太空飞行构成危险”。美国情报官员事先毫无警讯，不知道中方要发射飞弹，事实上美方也不断得到中方保证，宣称中国政府没有反卫星计划。中国现在不顾后果创造了太空史上迄今最大、最危险的太空废弃物。可是电影中的罪魁祸首却是俄国人。

剧中胡乱指鹿为马的实际效果是，中国人在《地心引力》这部电影中是英雄，而俄国人像是恶棍。《地心引力》的编剧努力扭曲太空史。可是，我们也不必那么惊讶：中国广大的人口是美国电影最大的潜在市场——好莱坞制片业的赚钱对象，中国人当然在电影里必须是正派角色。否则电影在中国肯定是禁演。

由于短视或是自私自利，西方菁英和意见塑造者再次为中国擦脂抹粉，提供观众光明的角度来看中国。当然，这正中中国人的下怀。

天秤已经倾斜？

中国在 2007 年摧毁自己一颗气象卫星，是一连串警讯的第一枪——刻意挑衅和敌意似乎意在测试美国及盟国的决心，以及国际规范能接受的范围——可是世界各国大多忽视、漠视或替它说情开脱。自从 2007 年以来，各种事件层出不穷、且益形嚣张。因此，东亚局势紧张升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点。

紧跟着反卫星测试之后，中国对美国及新上任的总统奥巴马的口气有了显著改变。2009 年 12 月，奥巴马总统亲赴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全球 192 个国家在此集会，研讨全球应付气候变迁的新政策。这次峰会显示中国官员公开的论调出现显著变化。他们展现出不必要的不礼貌，数度打断西方外交官的发言，对讨论没有提供建设性的意见。温家宝总理已经冷落其他政府首长，拒绝出席大多数的谈判。中国让观察家大为意外，竟然与其他开发中国家另行

订定协议，把原本盼望的承诺封杀、无法列入气候变迁协定草案，等于朝大会目标开了一枪。根据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说法，中国在大会闭幕前刻意安排一项会议，不邀奥巴马总统出席，以便封杀美国的倡议。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闻讯，做了不速之客，迳自闯入会场。

台湾长久以来即是美国和中国争执的重心之一，但是中国突然十分强硬在 2010 年 1 月抗议行之多年的对台军售——奥巴马政府核准 64 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引起对美、台关系的全面重新检讨，也对未来军售投入疑云。中国认为这项军售案“明显干预中国内政”，可谓是比北京过去的作法更强悍的反应。接下来，中国暂时停止和美国的军事互动，也对销售物资给台湾的几家美国公司实施制裁。美国政府向这个压力低头，决定压下出售先进的 F-16 战斗机给台湾的计划，此举招致国会议员的批评，议员指控政府是软脚虾、顶不住中方压力。后来，奥巴马政府又扩大美、中之间的军事交流。

中国之所以态度转为强悍，是因为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势”已决定性地转为对中国有利，而美国的相对衰落却快得超乎他扪原先预期。中国会有这种认知，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国使用比较全面的尺度来衡量综合国力。2008 年和 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源自华尔街，北京认为这是一个先兆。中国评论员认为美国的经济将会复原，但绝不会与原来一样。在未来的时代，全球经济领导权势必更加分散，减少依附美元。中国等到“势”转为有利才在国外强悍表现，这也反映中国遵守欲速则不达的战略要素，即使必须等上几十年也行。

2010 年出现中国重新评估的迹象。中共中央委员会一名外交事务专家向中国领导人提出四页的秘密报告。这份简报旨在回答“我国未来十年面对的最重要外交政策挑战是什么？”这个问题。根据美国政府取得的笔记，这位专家的回答是“如何管理美国衰落”。他提到几个战术可用来达成此一目标。如果正确的话，他的报告暗示中国可望在十年内经济超越美国。

认定美国衰落的另一个证据，在 2012 年出现：2011 年美国国防大学出版一本权威专书《权力的吊诡：在弱势时代的中、美战略节制》（The Paradox of Power：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straint in an Age of Vulnerability）：作者为龚培德（David C.Gompert）和菲力浦·桑德斯（Phillip C.Saunders）。这份美国政府的研究声称，军事平衡已偏向中国。中方的反应很有意思。中方翻译并发行这本书，向外国访客表示，他们不会接受政策节制的提议，但是钦佩这本书坦白承认美国军力相对衰退，而中国在核力量、网路攻击和太空武器上实力增长。中国官员告诉我，它的结论泄露天机。他们说，这本书显示美国政府已认知到中国在改变区域军事平衡上的成功，因而对中国的利益有利。许多中国政治和军事人物其实很讶异，美国竟然评估中国已经变得这么强。根据我 2012 年和 2013 年在北京听到的评论，我的结论是这份研究无意间提供证据给中国军官，他们原本已在辩论时机是否已经成熟，

可以利用军事均势对中倾斜的有利条件。

我听说，中国政府和军方许多人不相信这本书的主张——“美国没有胃口想要挫折中国崛起、以盟国和军力包围它，或启动中美冷战”。他们认为这种话怎么能相信，它倒像是刻意要诱骗中国大意轻敌。可是他们很欣赏两位作者评估军事均势已倾向中国。他们也很困惑，为什么美国政府自曝其短，发布美国衰退的证据，究竟是什么使得美国对“势”做出悲观的评估。我认为两位作者的说法只代表他们个人主张，他们不肯采信。

在几次会议中，我表示这本书只是两位作者个人的建言，不是美国政府官方政策的声明，却招致中国军官和学者的讪笑。他们笑说，他们知道其中一位作者是奥巴马总统国安会中国事务重要幕僚麦艾文（Evan Medeiros）的好朋友，两人经常联名发表文章。在中国眼里，另一位作者也非同小可：他曾经是美国全国情报总监丹尼斯·布莱尔（Dennis Blair）的副手；而布莱尔曾任美军太平洋总部总司令。中方深信这是一个讯息，代表权力平衡已向中国倾斜，“势”已经在变化。他们同意书中一个论点——在中国增进其核子报复能力之后，美国升高核战以吓阻中国进攻台湾的威胁“已经轻微、也将降低”。但是他们还是不解，美国为什么要公布如此负面的发现。

我们可以理解，美国和中国对如何解读权力平衡会有不同看法。毕竟两国是在不同的战略环境中运作，面对的威胁并不相同；因此他们在评估国力时不可能强调相同的因素。五角大楼净评估室主任安德鲁·马歇尔 1982 年撰文谈到美、苏两国对超强之间战略平衡的评估不同时，他说：

正确评估的战略平衡必须建立在一个重要项目之上，即我们对苏联人自己评估的战略平衡的最佳概算。但这不能只是美国式的标准估算然后再假设上略做调整而已……相反的，它应该是尽可能地以苏联式的规划去规划，再来进行评估，采用他们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剧本，以及他们衡量结果的判准和方法……苏式评估很可能对剧本和目标有不同的假设，重点放在不同变数上……进行不同的估算、采用不同的效率尺标，并且或许采用不同的评估过程和方法。结果是苏式评估可能和美式评估大不相同。

其次，除了大半出自主观解读得到结论之外，不同国家在权力平衡关系中的相对地位，可能只有在事后这些国家回头评估时才能完全理解。英国大政治家博林布鲁克勋爵（Lord Bolingbroke）曾经说过：

权力天秤转变的确切点……靠一般观察是感受不到的……位于天秤上升的一方不会立刻感觉到他们的实力，也不会有成功经验在日后给予他们的那份信心。那些对权力平衡变化念兹在兹的人，经常会从同样的偏见做出误判。他们继续害怕一个已经伤害不了他们的大国，或是继续低估一个已经跃升的强权。

某些美国学者果真反映了权力平衡评估的主观性，他们否认均势已经倾斜或是在未来可能向中国倾斜的说法。塔虎脱大学麦可•贝克莱（Michael Beckley）在 2011 年主张：“美国并未衰退；事实上比起 1991 年，它现在更富裕、更创新，军力更强过中国。”他说：“中国正在崛起，但还未赶上。”当然，这两种考量都关系到中、美双方对本身以及对对方实力的评估。

甚且，由于不同的国家对权力平衡有不同的评估，北京可能开始认为它早在美国承认之前就已经大幅领先了。在马拉松竞赛的最后几十年里，这可能造成相互的错误认知，很可能就导致战争。中国与邻国的紧张关系

眼看着马拉松胜利在望，中国人现在觉得比起以前更有空间耀武扬威，虽然同时也对他们的宏图大计保持节制。他们在国境四周还有更紧迫的当务之急。中国周围海域已经出现紧张局势，南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汶莱有领土纠纷，东与日本也不平静。

自从 2010 年以来，中国翻出尘封几百年的地图，想证明中国与东海、南海一些岛礁有历史渊源，因而提出领土主张。南海成为“热点”，2010 年 5 月与美国的高峰会议上，中国坚持对南沙群岛的权利主张，把富含能源和渔业资源的数万平方英里海洋纳入其专属经济区，并把领海推进到靠近越南和菲律宾海岸地区。

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表示美国愿意调停中国及其南方邻国之间的争端，这惹来中国愤怒反应。接下来几个月，中方不时骚扰越南和菲律宾船只。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Benigno S.Aquino III）把局势比拟为 1938 年捷克面临的危机：“什么时候你该说：‘够了就是够了’？世界必须说话了。大家必然记得，捷克割让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是想要平息希特勒以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反驳艾奎诺的说法“暴露业余政客本色”。

但是，中、日之间的紧张程度最高。某些中国作家认为日本人是“杂种民族”、是美国在亚洲的代理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残暴占领中国留下的仇恨，迄今犹未缓解。在东海，由日本群岛往西延伸的一系列岛礁成为小冲突的场所，很有可能演化为全面海战。

2010 年 9 月 7 日，中国一艘渔船在钓鱼台／尖阁群岛这个主权有争议的海域，和日本巡逻船发生冲撞。中国船长和船员被日本海上警视厅扣押，不顾中国政府强力反对，带回日本。中方阻挡一些稀土出口到日本以示不满，并且以涉嫌擅闯中国军事禁区之罪名，逮捕四名日本侨民。

两年后，我很惊讶听到六艘中国海监部队船只、分为两队，克服日本拦阻，闯进钓鱼台海域。在此之前，中方宣称其领海包括此一地区。我之所以惊讶是因为自此之后一连好几个月，中国海监船增加在钓鱼台／尖阁群岛附近的巡逻，有时候中国渔船在本地区作业长达数

星期，而且经常靠近到离钓鱼台／尖阁群岛十四英里以内。同时，当日本政府将钓鱼台／尖阁群岛地区几个私人所有的岛礁买下之后，中国各地爆发反日抗议。数千名抗议者包围北京日本大使馆，其余团体则在数十个中国城市抗议、示威。中国政府鼓励示威，广播称，“日本已侵犯中国权利，表达你的观点是很自然的事？”

2013 年 11 月 23 日，中国国防部宣布在东海设置防空识别区，逼使我们必须有所行动。固然日本、美国等国家过去都曾经宣布他们的防空识别区，中国不寻常的严格要求却很突兀，因为它要求进入识别区的飞机不仅要表明身分，提供飞行计划，还要与中国的防空识别区管理单位保持无线电联络。北京宣布后不久，我很高兴美国国防部长查克·海格（Chuck Hagel）批准两架 B-52 飞越防空识别区，以示美国不承认北京的要求。我向他建言，中方不会有反应的。

针对日本的抗议，中国外交部声明：“日方无权做不负责任的评论，以及对中国恶意指控。我们呼吁日方停止伤害中国领土主权的所有行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 2014 年 1 月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引起争议，因为他把中、日之间在东海的争议，拿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英关系做比拟。大家都晓得，尽管德、英两国经济关系密切，犹如今天的中、日两国，可是却在 1914 年爆发战争。

日本会如何回应中国在其西边水域日益上升的侵略性行为，将会是其马拉松战略的重要试金石。至少在过去二十年，北京将战国列强削弱敌国之鹰派的作法，施用在日本之上。中国在亚洲各地发动反日的妖魔化运动，包括针对日本国内民众宣传。它的宗旨始终一致：日本的鹰派阴谋策划恢复日本在 1930 年代的军国主义，因此必须把他们揪出来，不能让他们在政治上得势。

为了妖魔化日本，中国发出的讯息是，它认为日本的财富，以及日本身为美国在亚洲主要盟国的地位，是从二战不当得利的结果。伦敦政经学院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称这个现象是“有毒的、新形式的国家批准的反日民族主义”。“儒家文明圈”的国家应该接受中国天经地义的领导地位，不应该企图复活旧帝国，或与美国这样的外来霸权结盟。2013 年 8 月，针对中、日两国国民对彼此观感的一项调查，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争议。这项调查由中国的《中国日报》和日本的智库《言论 NPO》共同进行，向 1805 个日本人及 1540 个中国人调查他们对另一国家的观点。调查发现，九成以上的中国受访者对日本没有好感，相较于一年前的调查结果（62％）出奇的高。同样地，九成的日本受访者对中国没有好感，而一年前只有 84.3％。这是过去九年来每年调查敌意最高的一次。被问到为什么整体中、日敌意如此显著上升时，许多受访者表示，尖阁群岛／钓鱼台争端是原因：77.6％的中方受访者和 53.2％的日本受访者认为岛屿争端是他们相互仇视的主要原因。

其次一个最重要因素是历史恩怨：63.8％的中方受访人认为“日本对于侵华历史缺乏适切的道歉和忏悔”是他们对日本有负面观点的原因之一。或许最不祥的发现是，有 52.7％的中国受访者和 23.7％的日本受访者认为，他们相信中、日之间将来还会爆发军事冲突。

中国对日本日益强悍，颇有可能对中国想赢得马拉松的长期战略有反效果——步步为营、谋定而后动的中国领导人若还忌惮美国霸权的话，应该不太可能挑衅美国在东亚最亲近的盟友。中国若是与日本开战，也可做为对抗美国的秘密斗争中的一场代理入戮争——中国若能打击日本，将进一步削弱已经衰落的霸主。

2013 年，有一部分是针对中国在东亚日益蛮横之反应，美国和日本同意扩大他们的安全同盟，以便展现美国决心仍在本地区扮演主要角色。这项协议包括美国将派侦察机前往日本，预料将会在钓鱼台／尖阁群岛四周及整个系争岛礁地区海域巡逻。美国国务卿约翰·凯瑞（John Kerry）和国防部长查克·海格亲自前往东京签署这项协定。固然美国拒绝在争端中选边，海格重申奥巴马政府的保证：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的规定，日本若遭到攻击，美国有义务协助日本自卫，而它将包括钓鱼台／尖阁群岛。

日本领导人已公开讨论修订日本的和平主义宪法——禁止采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只准维持自卫所需的低度兵力。通常日本人回避不谈它，但是现在却坦率谈论和中国的战略竞争，以及中国在亚洲持续强悍的危险。中国对日本扩军的可能性，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德海军军备竞赛情势再现的可能性，反应非常激烈。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对日本建设军事力量并不是一直持负面观点。1970 年代中国鼓励日本将防卫费用从 GDP 的 1％提升到 3％。1978 年，邓小平告诉日本访问团，他“赞成日本自卫队强化”。中国当时要拉拢一个新盟友对抗苏联。然而，十年之后，中国对“势”的评估变了，1988 年，邓小平的国家安全顾问宦乡强烈批评日本。

中国对日本民主政治的稳定性有根深蒂固的怀疑。许多中国学者认为，今天日本许多右派人士“想要修宪以恢复旧帝国制度”。中国分析家经常批评日本政客到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神道庙殿，供奉 1867 年至 1951 年的日本阵亡英灵，其中包括二战期间的日本战犯。这些分析家写说，日本政客以参拜做为“精神动员，以便在中国进一步侵略扩张”。许多中国战略学者相信，日本军事力量增长必将成为“无法控制”。

日本军国主义在未来可能复活，令中国忧虑。何新或许是中国最著名的极端民族主义作家、也是李鹏总理的顾问。他在 1988 年预测，日本对资源掠夺性的需求，将会使它企图“殖民”中国。他说：“自从十九世纪以来，日本从来不曾放弃它长期以来的全球战略目标……同时，就整体战略布局而言，日本将完全瓜分及孤立中国。”

接下来，中国在 1995 年呼吁美国关闭琉球（冲绳）的美军基地，并且质疑在后冷战的

世界哪里还需要《美日安保条约》。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卢广业（Lu Guangye，音译）甚至警告说：“北约集团和日美军事同盟已经成为助纣伪虐的两只黑手。”

中共智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陆忠伟指出：“在亚洲外交史上，从来没有过强大的中国和强大的日本并存的先例。”中国社会科学院高恒也认为，美国的占领并没有消除日本的军国主义。他认为，甚至因为美国在占领期间希望利用日本对抗苏联、北朝鲜和中国，“它维持日本的整个国家机器和战争机器（不过改了名字）。”中国学者提到，日本“压制中国的领土政策，并且干预中国对南沙群岛和钓鱼台的主权。”所谓的“宫泽主义”（Miyazawa doctrine）即仿照“欧洲安全暨合作会议”（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在亚洲成立区域论坛、讨论亚洲安全议题，却被中国学者批评是围堵中国的烟雾弹。《纽约时报》于 1993 年报导，中国一名官员透露，中国军方要求在五年计划中增加国防预算，以便对付日本军事力量上升。

中国最迫切的关切是日本与美国合作开发反弹道飞弹防御系统。更进一步的中国评论亦强调日本取得核武和航空母舰的企图。另外，中国分析家声称日本已有“具备航空母舰功能”的运输舰。即使在核武议题上，某些中国分析家预测，未来的日本会像印度一样成为核子国家。丁邦泉在中国军事科学院刊物《世界军事趋势》撰文说：“毫无疑问，日本有能力制造核子弹……日本有办法避开国际监督，就核武器进行秘密研究。”美国误判中国对台湾的立场

2009 年，我的同僚和我仍然犯错，以为中国人的想法和我们美国人一样。我们对于中国对美国及其邻国的新侵略性有所误解，是因为它并不吻合我们既有的假设，也因为我们的中国线民一再向我们担保，一系列似乎显示中国愈来愈强悍的情节，并不是任何全盘计划的一部分。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毫不怀疑中国。毕竟，我对中国马拉松战略的了解是，并没有真正的急迫性要它赶着抵达终点，至少不是眼前当下。中国种种愈来愈强悍的行为似乎是随机出现的独立事件，美国为此辩论不休。中国的讯息是，没有全盘模式或战略把这些个别插曲连串起来。这个说法吻合早先的讯息：即中国并没有大战略。中国顶尖的美国事务专家王缉思就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章如此说。

我的同僚和我认为理所当然的是，中国会尽一切代价避免挑衅美国霸权，以及至少还要花二十年工夫，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才足以慑服美国。这一切意味着，中国最不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对其邻国和美国摆出侵略姿势，坏了大事。可是，在 2014 年，美国政府官员却告诉国会，中国已开始展现强悍的行为模式。为什么我们花这么久才明白这一点？

美国情报界和我没看到中国愈来愈强悍的迹象，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完全误判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表面立场放软的意义。自从 2000 年代胡锦涛上台开始，中国避免以武力威胁台湾，改为重用更加软性、更加间接的方式来影响台湾政府，其中大半是经济手段。中国以

这种方法已经打进台湾的朝野政党、企业领袖、媒体和百姓。据说，胡锦涛私底下向他的亲信顾问表示，“买下”台湾要比征服台湾来得容易、代价也较低。中国和台湾在 2009 年签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即 ECFA）将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现在两岸之间每周有将近 700 班飞机来往，而 2013 年到台湾的大陆游客达 280 万人次。甚且，北京採取直接行动笼络台湾企业菁英，许多人变成强烈支持两岸和解。亲中的台湾商人已买下台湾重要日报和电视台，因此使得北京可以影响传媒，也有其他人得到中资挹注。

一直要到 2013 年秋天到北京访问时，我才发觉我们错的多离谱，以及中国是如何迅速动员，以便在他们认为的美国衰退当中争上风。北京的天气晴朗而冷冽，但是早晨的交通和平常一样糟透了。在下了一星期的雨之后终于迎来好天气，上百万市民涌向城外。我不想迟到，错过未来两天在国宾酒店（位于美国大使馆之西七英里）与五位中国将领及六十位安全事务专家的会议。我提前一小时出发，选择经过天安门广场，经过政治局的秘密会议中心。犯了大错！长安大街堵得动弹不得的车阵至少有一英里长。司机叹气，我请他右转、沿着紫禁城的红墙走，然后左转取捷径往北走。。

我翻阅笔记，准备即将要参加的以中国话进行的当前军事力量均衡的讨论。我的辩论对手朱成虎将军是中国最著名的鹰派将领之一，他在 2005 年因为披露中国针对美国攻击，可以实施核子反击的剧本，而跃登全球新闻头条。这次会议的主题之一很合宜，就是未来的核子均势，以及武器控制的前景。另一位鹰派彭光谦少将，是中国经典教科书《战略论》的作者：他将讨论如何评估权力平衡。中国的法学教授们将阐述北京对南海的权利主张。

司机把我及时送到会场，我分发以中、英文写就的会议讲话稿，上面新盖官章，注明“经国防部长办公室准予发布”。这篇讲话旨在挑激两天会议期间的反应，我在之前参加三次中国军方会议时也用这套办法，即中国人所谓的“抛砖引玉”。这次会议是难得的机会可以获悉中国对未来 35 年马拉松要如何进行的权威性观点。有位中国投奔自由者曾经告诉过我关于百年马拉松的一个故事：战国时期的胜利就像一场长期、分为多个阶段的围棋赛。秦国历七代国王才赢得最后霸主地位。一场围棋通常约三百步，可分为布局、中盘、收官三阶段。这个投奔自由者说，2014 年的北京领导人认为他们仍处于中盘，这段期间中国的 GDP 已超越美国，但综合国力仍不如美国。

我到北京开会是奉了华府命令，任务是设法了解在对付中国想超越美国的马拉松战略下，美国政府应做好什么准备。中国军中及政府研究机构的专家是如何设想马拉松赛局？我在往后两天的许多对话都在探讨这些问题。

我错误地估计中国“韬光养晦”的策略将会持续到 2049 年。我过去认为，唯有到那时候，中国才会自认有资格担当世界领袖，宝剑出鞘，亮出它全球治理的计划。我没有预期到，

当权力平衡愈来愈不利美国而倾斜时，会有一个阶段性渐进作法。因此我发觉有个新剧本正在上演：即根据北京的估算，每当中、美势力平衡出现对中国有利的倾斜时，中国将变得更加坚定。

另一个我很慢才发现中国正在加速迈进的原因是，我误信中国的说法，认为它的大战略固定，旨在诱使别人松懈大意。中国的学者和官方强调他们的目标是至少在二十年内还保持战略上的耐心。许多美国学者从北京回国后告诉我，中国不认为在未来几十年里权力平衡将向中国倾斜。中国积极鼓吹这个观点。从 2009 年中期起，中国共产党党校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等智库即举办一系列内部会议，辩论美国相对衰落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对这些会议的评论是："比较温和的声音——那些认为并没有权力大转移的人士……在这些辩论中明显并未居于守势。换句话说，美国是否相对衰落、衰落程度多大这些问题（在这时候）并没有得到解答。"他又说："甚且，没有证据显示外交政策的核心决策团体在这一时期……接受权力分配已出现重大转移、或让中国有新机会推进其利益的说法。"

但是某些中国领导人得出结论：中国在百年马拉松中已经进展超前。学者和情报官员开始谈起中国起码超前十年，也有可能超越进度二十年。中国领导人如今在辩论是否该做个战术改变，立即冲刺达阵，结束这场马拉松较劲。

不过，中国的行动还是十分谨慎——尽量不使霸主察觉到中国的战略目标。每一件插曲都构成了中国外交政策上的得分；每一次中国侵略性的行为都产生巨大政治利益。虽然美国和中国的许多邻国都抱怨，中国根本没有因其行为付出代价。

每一插曲都是中国运用百年马拉松九大要素所得出的结果。我们在第二章已介绍如下：

一、诱敌骄矜自大，以攻其不备。

二、收买敌方股肱之臣，以为己用。

三、动心忍性，欲速则不达。

四、不择手段，为战略目的不惜窃取敌人的概念和技术。

五、军事力量不是赢得长期竞争最重要的因素。

六、霸权将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其地位。

七、慎察"势"的变化。

八、建立比较标准，以衡量自身与其他可能挑战者的优劣条件。

九、戒慎恐惧，以免遭合围或愚弄。

前瞻未来，美国应该做好准备面对一个越来越强硬的中国。北京将会推动在今天看来不

务实、难以相信的外交要求——而其他国家将向中国的压力退让。中国可能不透过军事征服追求它的利益，而是制造一种情势，让邻国觉得向中国让步是明智的，因为北京愈来愈有能力从金钱上惩罚它们。例如，中国可能要求印度关闭达赖喇嘛在达兰沙拉（Dharamsala）的流亡政府。北京也可能施压——或强迫——印度、欧盟和美国停止以财务援助西藏流亡人士——他们从 1959 年以来即提供这些支持。北京可能向华府施压，停止销售武器给台湾——这个问题长久以来让中国神经紧绷，而中国富国强兵之后不会再容忍它。另一个长期让中国人愤恨不平的是，数十年来为富含天然资源的周遭地区与邻国一直有领土纠纷。

中国也有可能能够迫使美国废除它和中国邻国签订的安全条约中与军事相关的条款。自从 1990 年代以来，北京强硬谴责这些协定，以及美国依照协定提供的军事销售，为它们贴上“冷战遗迹”的标签。中国一旦称霸，很可能就不只是谴责这些安排。当中国国力和好勇斗狠心理与日遽增时，反对中国侵略性的声音，如安倍晋三、阿基诺等人，势必愈来愈大声，也愈来愈危险。不幸的是，美国对此一挑战似乎没有什么感觉，甚至更无心去对抗它。

第十一章　美国需师法战国思想

“釜底抽薪”——三十六计

如果你是唯一一个知道比赛已经开始的人，你肯定很容易赢得竞赛。中国因此正走在即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的路上，从而建立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可是结局未必必然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许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战略也最高明的挑战者，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挑战者。

不久前，美国才刚击败另一个具有称霸全球野心的大国所构成的威胁。美国以一系列计划和战术，在两党支持下赢得冷战。类似的作法可以做为战略核心，来击败或者至少抑制中国过大的野心。对策之一是让美国的决策者大方承认中国的成就，接纳中国的智慧和战略，引为己用。虽然有些中国古代兵法的作用是以小搏大、以柔克刚，但中国的战略文化的确有许多卓见可套用在更广泛的国际关系上。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不必只能为德国人所用。本于相同精神，美国可以从战国时期汲取若干中国智慧，用来在中美交锋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

第一步、承认问题

北京领导人希望我们看到的中国并不是真实的中国。美国的政治和意见领袖必须睁大眼

睛、仔细辨别中国所传送给他们的“讯息”和事实真相之间的差异。孙子和孔子都认为必须辨识外表与实际。即使他是最大的拥护者之一，孙子也提醒大家莫落入聪明对手的骗局。孔子则主张“正名”最为重要，是正确战略的基础。简单讲，要知道敌人希望你相信他是什么性质；不接受表相。

相信中国的经济面临重重险阻，最后却发现中国的经济单单自 1997 年至 2007 年就成长为三倍，岂不是傻子？相信北京一再的保证，声称它将支持自由贸易、会取缔窃盗智慧财产，也会停止其操纵汇率作法，同样也愚不可及。相信中国领导人一再宣示中国要和美国建立伙伴关系，却看不到北京政府批准及鼓励将美国妖魔化，蠢得可以。相信它承诺会协助对付北韩和伊朗，事后才知道这两个政权都得到北京的支援，一样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如果美国想在百年马拉松中竞争，它对中国的想法必须彻底改变。这代表必须承认中国是竞争者、心存敌意。这代表要明白中国领导人是如何透过研究“势”、战国兵法，以及推翻霸主的策略在思考。这也代表要认识中国政府如何将这些想法化为行动。美国政府有一整套的政策和战略需要重新检视。

第二步、明确计算美国已经送出多少援助

每年美国纳税人缴的税金有一部分被用来协助中国崛起。这些援助大多十分低调，没受到媒体及大众注意。而这是刻意如此的。

2005 年，某位国务院官员在国会作证时透露许多美国人前所不知的对中援助方式。他谈到美国政府派许多劳工部专家到中国协助提升中国人的生产力。他说到财政部及货币监理局（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向中方提议协助它改进金融实务。他提到联邦航空署（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协助中国飞机制造商的情况。他也报告美国政府其他机构如何促进在中国的数百项科学研究计划。

听证会后，这位外交官把我拉到一边说话。他晓得我在中美关系上的背景，以及我身为国会幕僚人员的身分，他问我：“你能让国会取消每年如此听证报告吗？”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希望以后不再做听证报告。他说：“说得愈多，外界愈清楚，国会愈是批评中国，就会想要终止它。这样会使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倒退三十年。”

我们仍然没有整本帐搞清楚美国政府出资援助中国究竟有多少项目活动。美国不仅出钱出力壮大自己的头号对手，它甚至没有记录自己出了多少钱养虎为患。

要在马拉松中竞赛，国会应该立法规定所有部会机构每年报告他们援助中国的情况。明订并公布这些计划至少会有三个好处。第一，对美中关系保持着更审慎、怀疑之态度的美国人，将取得充分的资讯，以对抗大力推动援助中国的多数学者、分析家和政府菁英。第二，

认清美国援助中国的领域，可以让决策者更了解在哪方面有筹码可以左右北京的行为。第三，美国人可以利用这份清单反驳中国教科书的指控（见本书第五章）。它们声称自泰勒以降历任美国总统都想围堵及伤害中国。

第三步、精确评估竞争力

战国时期的许多故事都告诉我们，在择定战略之前要仔细衡量权力平衡。美国企业有一条不变的法则：“能衡量，才有改进”。个中涵义言简意赅：除非知道你需在哪里改进，否则无从改进。除非知道自己在哪方面落后，否则无从在竞赛中后来居上、领先竞争者。每一年中方会针对他们与美国的竞争力关系进行年度分析。为什么美国不这么做？

非营利组织“竞争力理事会”（Council of Competitiveness）成立于 1986 年，旨在提升美国的全球经济竞争力。它集合了企业执行长、大学校长、全国劳工组织负责人和著名研究机构于一堂。理事会刊物详细预估，至少直到 2017 年，美国的制造业竞争力将会如何下降，而中国却保持第一位，因为北京在制造业及工业上都保持大量的投资。

美国政府应该就美国竞争力进行类似但更加严谨的衡量。白宫应该每年向国会提出报告，包括美国与其主要竞争对手们的相对表现之趋势和预测。美国政府的许多部会，包括情报机关，都必须参加进来。报告不必涵盖其他所有国家，只要针对前十名竞争者做比较就行——就从中国先开始。

第四步、发展竞争策略

《战国策》经常描述领导人如何藉“改革”比竞争者更加速增长力量来竞争。要诀在于保持心智开放，承认策略需要改变而有所行动，然后实行新战术以获致渴望的结果。

肯特·休斯（Kent Hughes）也是伍德罗·威尔逊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美国及全球经济计划主任，也是竞争力理事会前任执行长。他把中国科技崛起所构成的威胁，拿来与 1957 苏联发射史泼特尼克人造卫星（Sputnik）做比较。他提出，虽然苏联发射卫星被视为是对美国科技及军事优势的挑战，它也刺激美国投资其科学及工业教育，以及民间部门的创新。中国的崛起尚未刺激类似强烈的的反应。休斯提出一系列维持竞争力的政策建议。它们包括美国公、民部门合作以提升竞争力；财政及金融改革；技术创新；建立终身学习文化；以及增加美国民间研发。纽约大学教授拉夫，葛莫利（Ralph Gomory）曾任 IBM 副总裁，他也建议藉由推动“美国实质的制造业复兴”，来对付中国“政府对土地、能源和科技的大量补贴，以及低成本或无成本的贷款”。中国委员会（China Commission）的派屈克·穆洛伊（PatrikMolloy）也阐述需要有新的国家竞争力战略，因为“整体而言，美国经济的优

势已经受到了长期的威胁，甚至我们的国家安全也岌岌可危。”

公共政策分析家罗伯特·艾金生（Robert Atkinson）和史蒂芬·伊泽尔（Stephen Ezell）则提出一个跨部会计画以加强美国竞争力，但是他们又担心由于两党都存私心、有政治考量，计画会受阻碍或遭到删除。他们向保守派提出警告：“右派几乎对美国全球军力优势有任何相对衰退的迹象都十分敏感，但是却奇怪的不注意美国经济地位的衰退将对其整体安全、特别是国防军备产生的负面影响。”对于左派人士，艾金生和伊泽尔也警告他们：“如果美国输了全球创新优势的竞赛，左派人士必须承认他们想促进社会正义的使命也无法有效达成。”

第五步、团结美国内部阵营

战国时代领导人试图保持盟国紧密结合，设法将同床异梦的同盟结合在共同目标下。不团结很危险。美国政府之内及之外，有许多人主张改革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但是他们派系林立，经常搞不清楚其实彼此同在一条船上。至少从 1995 年起，北京的中国学者就很喜欢告诉我，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的美国人是多么地囿于政治歧异、从来不能合作。

要等待希望见到中国内部发生改变的美国人携手合作已经太晚了。美国国内应该成立一个大同盟，以改变中国为共同使命，而且一相情愿以为美国可以协助中国改革的作法也该改弦更张了。这代表支持达赖喇嘛的美国人，应该和主张拨款强化五角大楼海空一体战计划的美国防务专家结盟。这代表人权团体应该与要求保护智慧财产權的美国企业界合作。这代表主张修改“一胎化政策”的反堕胎团体，必须与国会成立的民主促进组织建立共同目标。

第六步、建立反制联盟

中国扩张它对南中国海的权利主张、欺负菲律宾渔船、切断越南地震调查船缆线，最近又在东中国海设置防空识别区，种种行为都是别有用心的。中国希望能确保取得在本地区的天然资源，也希望恐吓其邻国，它们才会因为恐惧而不敢团结起来抵抗其野心。

无论一个人懂不懂围棋，他都晓得被一群敌人包围是危险的。中国天生就害怕其邻国成立这样一个同盟。因此，美国正应该鼓励蒙古、南韩、日本和菲律宾等国家去结盟。就算这样的同盟不会真正的成功，但仅仅是其可能的威胁性都足以暂缓、抑制北京的攻击性。中国晓得美国及其盟国过去如何围堵苏联。当美国增加援助，并且促进中国的邻国合作时，当中国感到孤立、在本地区毫无友人时，中国的鹰派将会受到内部指责。

第七步、保护政治异议人士

冷战最前线的许多战士是苏联和东欧的异议人士，他们拒绝向肆无忌惮的新闻检查、政治宣传、宗教迫害、经济奴役低头。他们的主帅是哈维尔、瓦文萨，和索尔仁尼琴这类人物。由于这些人的勇气、热情和原则，他们推翻了苏联和铁幕。但是他们并非孤军奋斗。从杜鲁门至里根历任总统皆支持他们的志业。当他们坐牢时，美国总统要求放人。当他们需要资金时，美国人拨款。

当他们自己国家查禁而需要言论自由的论坛时，美国人的印刷媒体、广播电台透过自由欧洲电台把他们的奋战和信念传播到家家户户。

今天的中国已增强对西藏佛教徒和维吾尔族穆斯林的迫害。在西藏，政府实施宵禁、逮捕抗议者、杀害无辜百姓，达赖喇嘛最近评说，中共把这个地区转变成“人间地狱”。在新疆，互联网和电话经常被切断。由于国家推动移民，新疆和西藏的汉人人口大增。

中国也迫害基督徒。外国人在中国要先出示护照才能参加教会做礼拜，是常有的事。为什么？因为中国是由无神论的共产党当家执政。北京政府希望中国人民不跟非经国家核准的教会有往来。许多专家估计中国有六千万至一亿基督徒，而且人数还在逐步上升。“对华援助协会”（China Aid）创办人兼会长傅希秋想倡导中国人民保卫他们的信仰和自由。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促进法律改革、赞助中国“家庭教会”、援助被捕坐牢的基督徒。他凸显一胎化政策的残暴，并且支持在中国的其他人权运动分子。最近，傅希秋因为协助盲人律师陈光诚在中国逃出软禁、平安抵达美国而名噪一时。

杨建利是经历 1989 年六四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中国异议人士,他在过去 25 年奔走努力、要求中国政府建立问责制度。他成立“公民力量”（Initiatives for China），一个要把中国国内支持民主的团体与全世界人权团体串联起来的组织。由于他的工作，他被中国政府抓去坐了五年牢，经过美国国会两院无异议一致决议，联合国也通过决议案，复经非营利组织奔走，他才恢复自由。他能够获释，证明外界声援异议人士会起很大作用。我们不妨想像一下，美国政府若是像援救杨建利出狱一样，积极去支持中国其他许多异议人士，他们将能发挥更大的效用。

国会众议员南西·裴洛西努力不懈地支持达赖喇嘛，小布希总统也支持傅希秋在中国争取宗教自由的努力。很遗憾的是，傅希秋说，他向奥巴马总统求助，奥巴马却置之不理。奥巴马总统没有把中国的人权表现和北京关切的事项，如贸易关系，绑在一起。奥巴马政府甚至没把人权议题列入“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是奥巴马和胡锦涛 2009 年 4 月宣布建立的机制。

美国政府不应该暗中破坏那些在对抗百年马拉松时可能最有力的盟友之努力。第八步、坚决面对反美的竞争行为

中国不只是针对美国发动网路间谍攻势的源头，它还是首要源头。根据某些估计，针对

美国的网路间谍行为有九成以上源自中国。中国黑客定期侵入美国企业和政府单位。受害人包括谷歌、博世艾伦咨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AT&T、美国总商会、Visa、Mastercard以及国防部、国务院、国土安全部和能源部。数十年来，只要是中国自己无法发明的技术、无法创造的知识产权，它就靠黑客去偷窃。美国知识产权窃取调查委员会（Commission one the Theft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由前任国家情报总监丹尼斯·布莱尔和前任驻北京大使洪博培（John Huntsman）领导。它提出的报告指出，美国智慧财产被偷使美国每年经济损失超过 3000 亿美元。

维吉尼亚州国会众议员法兰克·伍尔夫（Frank Wolf）长年致力于保护美国技术资产不受中国窃取，也努力促进中国的人权。体认到中国如何占美国开放及乐于分享资讯的便宜，他协助为这类资产建立少许低度的防护规定。伍尔夫在 2011 年联邦预算法中附加一项条款，禁止太空总署和白宫科技政策室在当年与中国进行任何共同的科学活动。

然而，在设法阻止中国窃取美国的技术知识的工作上，伍尔夫却是孤军奋斗。自从 2011年以后，他就没有办法促进通过类似的立法。由于“伍尔夫条款”成功地阻绝中国记者参访美国太空梭“奋进号”（Endavour）的发射，以及伍尔夫参加汤姆·蓝托斯人权委员会（Tom Lantos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的活动，关切中国的人权问题，他本人竟然成为中国网路攻击的受害人。

像伍尔夫这样强烈关切关键技术、军事机密和智慧财产遭窃，对美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他宣布 2014 年将从国会退休。如果美国还希望在百年马拉松中和中国竞争，它需要恢复伍尔夫的方案，并且设法扩大它们。

第九步、查缉并惩罚污染分子

美国和欧洲联手每年降低 6000 万吨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国每年却增加 5 亿吨以上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国环境问题最严重的证明——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乃 2013 年 1 月发生的“空气污染末日”，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的空气污染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之安全程度的 40 倍。但是即使“空气污染末日”也无法让中国改变它的环境政策。北京拒绝遵守任何国际协定，深怕协定会强迫它以对环保负责任的、长期永续增长的政策为优先。

要在中国推动环境保护有一个比较有效的作法，就是洪博培大使批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用推特把北京的污染程度公布。同样的，中国著名的环保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Public and Enviroment Affirs）(负责人马军，把中国的水、空气和固体废弃物污染情况绘制成地图，公布在网路上。

但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就只是唤醒民众的环保意识吗？美国应该从要求中国采取对环境

负责任的作法，进一步坚持中国要确切落实，即使这代表比起过去美国政府得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否则，中国就占尽经济上的竞争优势——华府限制美国企业以保护环境，中国却迳自全速出口其产品及污染。第十步、揭发贪污及新闻检查

中国政府最害怕的一样东西就是新闻自由。它晓得阳光是贪官污吏的消毒剂。它深怕中国人民若是晓得其领导人的贪渎、残暴以及欺瞒美国及民主盟国的历史之全部真相，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应。可是，美国政府为什么不更积极反对中国对其人民的新闻检查和宣传运动，这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译注：汤姆•蓝托斯是美国众议院资深的民主党籍议员，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位担任过美国众议院议员的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他从 1981 年当选以后就一直关切人权问题，他于 1983 年成立的的人权议员团（Human Rights Caucus）后来被改名为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

中国主要的新闻机构都是国家拥有。于是揭发贪渎的责任通常落在驻华外籍记者肩上。西方媒体大致都不负众望——揭露侵占公款、反腐官员遭受骚扰、国企管理不善、逃漏税、性丑闻、欺压外资企业、贿赂等等弊端。例如，2013 年仅仅几个月内，新闻记者安德鲁•杰可布（Andrew Jacobs）报导，中国官方以“寻衅滋事”罪名扣押一名中国记者，以及在四川省杀害无武装的西藏人。同样地，《纽约时报》驻上海特派记者张大卫（David Barboza）于 2012 年十月发出报导，指出温家宝总理家族有 27 亿美元资产取得方式颇有疑问。

但是北京政府用尽种种手段不让这些资讯流传到中国百姓耳朵里。2012 年，中国政府封锁彭博新闻，因为它刊载有关习近平家族财富状况的新闻。在中国工作的潜规则是：你可以报导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但若是开始批评共产党或其高级官员，你就会被驱逐出境。

中国领导人也对美国科技公司施压，要求它们对其在中国的网址进行新闻检查。互联网提供商及社群媒体公司若要在中国营运，得面临严峻现实：要不就是与中国政府的新闻检查配合，否则就是因政府封锁它们的网址，被迫退出中国市场。

对维基百科的创办人吉米•威尔斯（Jimmy Wales）而言，选择很简单。维基百科拒绝顺从中国政府限制资讯的要求。被谑称为“中国防火长城”已在许多场合封锁住维基百科。”威尔斯说，维基百科代表“资讯自由，若要我们妥协……岂不就发出非常错误的讯号：等于是宣告地球上没有人愿意说出：‘你知道吗？我们不会放弃的。’”

为什么美国政府没有支持维基百科的反抗？它应该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它不要来欺负维基百科、雅虎、脸书等美国公司和其他媒体。它也应该加强和中国人民的沟通——透过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的国语广播。冷战期间，自由欧洲电台是苏联新闻检查和宣传的沙漠中，反共异议人士难得的绿洲。没有理由自由亚洲电台不能在百年马拉松中扮演

同样的角色，但是它的预算至少需要增为三倍。

第十一步、支持民主改革派

美国在冷战期间的许多战略都派不上用场——至少目前还派不上用场。宣示新冷战正中中国鹰派下怀，他们挖空了心思就是要夸大来自美国的威胁。目前并没有全球意识型态大斗争，没有必要建立类似北约组织的反中同盟以围堵扩张中的帝国。但是冷战有一个教训美国有必要遵行，那就是恢复对中国境内支持民主及公民社会团体的支持。在谈到新冷战时，中国最担心的是，美国会恢复他们在冷战时期的计划，运用思想的力量从内部颠覆苏联。中国大部分鹰派相信这个颠覆中国的计划已经秘密付诸行动，就和 1947 年对付苏联一样如出一辙。中国至少有两本书宣称美国中央情报局领导此一计划。

前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兹（Robert Gates）曾经指出，1975 年的《赫尔辛基协定》振奋了苏联境内的支持民主团体，它“在我们赢得冷战上扮演关键角色”。中国鹰派似乎也认同他这个观点，他们经常撰文表示担心美国发动计划以影响易受摆布的未来中国文人领袖，而走向民主的多党选举和自由市场。2013 年 10 月，中国的鹰派透露另一项担忧——美国会物色一个戈尔巴乔夫型的中国领导人，他会终结一党专政。鹰派对中国自己的领导人之不信任，充分表露在 2013 年 10 月的 90 分钟录影带《较量无声》的论调里。中国鹰派深怕自己的文人领导人受到西方领导人洗脑，想要推动多党制以及民主政体。

罗援少将接受网路采访，描述美国中央情报局有一个方案是监视中国军方媒体，找出“鹰派”，再把这些人姓名提请中国高阶文人领导人注意，他们会将这些鹰派降职或惩处。罗援在访问中举出三个实例，甚至提名道姓径指我很高兴有这类动作。我不介意他提到我的姓名，但实际上美国并无这种方案。

事实真相是，美国或西方并没有这种颠覆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协同一致行动。每年花在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经费不到 5000 万美元。美国政府虽然有些经费并不充足的公民社会计划，它们并非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与实际需求的规模一比，它们太小了。至少有六个这类的计划源自冷战时期，由美国政府出钱，交给美国劳工联盟暨产业组织大会（AEL-CIO）、总商会及民主、共和两党等组织去经营。它们提供资金赞助中国境内相当多元的各式组织，以及流亡团体。

美国国务院应该赞助更多项目以促进中国依法治理及公民社会的发展，包括提供法律及技术协助、改革刑事法、改进司法裁判、培训村级民选官员，以及支持法官独立等。美国也应拨出更多经费支持选举观察团，并提供技术协助以起草地方选举规定，改进对预算及政府决策的监督。我们也需要增进独立的非政府组织能力的项目。

伴随着推动民主的倡议，美国也必须认真推动自由市场改革，而不是认定中国自然而然地会开放其经济。例如，国会透过民主基金会和国际民间企业中心（Center for Inte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拨款，支持设在北京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它在推动双边投资条约。这会缩减国有企业、包括“国家冠军”的优势。中国的血汗工厂也已经受到中国非政府组织及美国出资援助计划的关切。

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内部的辩论倒也不是一直不感兴趣或一无所知。1980 年代，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chultz）坚持中国要遵守国际反核子扩散的规范。美国协助在中国建立机构和培训人员，以扭转北京不愿加入核子不扩散条约的心态。参议员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形容中国是“在国际社会快速成为一头野象”的国家，要求除非中国改变它的不扩散政策和实际作为，应该扣住不给它贸易最惠国待遇。美国政府的交流计划结合民间的非政府组织，如麦克阿瑟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发起资助中国培养境内发展武器控制的能力之倡议。外国的压力和经费协助中国建立第一个出口管制系统，以监督及防止公司输出受禁制的技术。

很遗憾，近来美国又沦于消极。习近平在谈论遵守中国宪法时提起如何把“权力放进笼子”，引发热切辩论。法学教授张千帆领衔起草，征得 72 位学者联署上书。张千帆指出，中国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光是要落实这一句话就会严重限缩共产党当前的独裁角色。当习近平在制宪 30 周年庆上讲话，提起“宪法应该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之后，辩论更是持续不断。《纽约时报》2013 年 2 月 3 日一篇报导谈论划分党、国体制及深化市场改革，它说：“习近平近来有些谈话，包括有一次他强调需要执行宪法，已在推动改革人士之中点燃希望”。这正是北京鹰派最害怕的新闻。就这方面而言，美国应该是参与者，不应该袖手旁观。第十二步、密切观察中国鹰派和改革派之间的角力

今天，中国有一套对付美国的冷战战略，它仔细地监视华府各个不同派系——哪些人支持北京、哪些人怀疑北京，哪些人可以被操纵、哪些人已经看破马拉松战略。美国过去也长于此道。冷战期间，美国投资时间、技术和人力以打探苏共政治局各个委员的活动——哪些人主张与美国保持更和谐的关系，哪些人视美国为必须推翻的危险敌人。可是和对付苏联时不同，美国在面对中国时就施展不开了。

了解中国内部在关键问题上不同人物的不同立场，对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虽然马拉松战略进展神速，中国政府的思想还未僵化成一块铁板。固然强硬派占多数，但还是有些真诚主张改革及自由化的人士，他们希望中国能够以美国模式为标竿。他们的确存在，美国必须找出这些人并予以支持。问题在于美国情报机关还未投资资源，去找出这些真正的改

革派。他们和表里不一、假装有改革意愿的许多中国领导人并不相同。对情报界而言，辨别他们是极大的挑战。

挑战一直持续不断。1998 年，卡特主政时期，奥森伯格邀请我参加国家安全会议一项幕僚会议，讨论他为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所起草的备忘录。备忘录提出警告，认为我们对中国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差，“我们会遇上在伊朗方面同样重大的情报失败”，即伊朗国王在 1997 年遭到推翻。稍后几年，略有进步，但幅度不大。1996 年在国会作证时，曾在中情局服务 27 年、后出任驻北京大使的李洁明（James Lilley），指出挑战的艰巨：“2500 年前，中国的孙子就说过一句话，‘能而示之不能’。他们的预算、他们向苏联的军事采购、他们的技术转移、他们的力量投射，这些事他们全都秘而不宣。你想得知，唯一的方法是透过见不得光的情报搜集。但是，一如既往，到头来构成最基本差异的还是人。”前文已经提到，2001 年 8 月，也就是天安门广场屠杀的 12 年之后，李洁明向国会委员会表示，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晚了十年才从中国内部文件获悉，当时中国已经朝民主走了有多远、以及抗议者已经有多么接近将推翻共产党政府。这位前任大使说，如果他当时就知道，他会力谏老布什总统站在真正的改革派这一边坚定地干预，而不是受北京领导人之骗与他们站在同一边。

三个陷阱

中国的鹰派和改革派对于美国对中国邻邦的意图，有完全不同的判读。鹰派把美国的一举一动都当作是围棋盘上的动作，意在包围中国、抵销中国的威胁。近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举动莫过于奥巴马总统 2012 年 11 月访问缅甸，以及缅甸领导人在翌年春天访问美国。缅甸成了美、中在亚洲角力的中心。《纽约时报》在当年稍早指出：“美国在亚洲重新布局，而中国胆气大壮也以前所未见的规模投射其军事和经济力量，每一方都倾全力争取经济上陷于泥淖但战略地位重要的缅甸之好感。”

2013 年，我有机会到仰光美国大使馆拜访，见到最近刚出任大使的老朋友米德伟（Derek Mitchell），他是二十多年来第一位美国驻缅甸大使。米德伟和我 1996 年首度在国防部共事，他替国防部起草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东亚战略检讨”。更后来，米德伟是奥巴马总统重返亚洲战略的规划师之一。他离开五角大厦，并自愿担任此一兵家必争之地的大使，而他以推动缅甸人权为主要目标。

见了新大使，我请教他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分裂的看法。虽然中国鹰派分子视美、缅关系为迫在眉梢的危险，米德伟和我一致认为中国的改革派对美国向缅甸开放将会轻松以对，因为一旦缅甸的经济转好，无论是对美国还是中国都是好事。例如，中国为了它在能源方面的投资，尤其是在伊洛瓦底江盖一连串水坝，希望缅甸局势稳定。这和鹰派认为美国在包围中国的观点完全相反。美国政府应该了解并善加利用这个立场。

我很好奇想知道缅甸领导人是怎么看待中国的长期战略。他们是否像西方许多人一样，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的信徒，想在国际社会上和平崛起吗？

米德伟说，缅甸知识分子认同新加坡 89 岁的前任总理、亚洲最受尊重的领袖李光耀的观点。有新加坡奇迹之父美誉的李光耀，在西方普受尊敬；尼克松一度比拟他为丘吉尔、狄斯累利（Benjiamin Disraeli）和格莱史东（William Ewart Gladstone）*，克林顿、老布什等许多人更推崇他是高瞻远瞩的领导人。可是，奇怪的是，西方许多人却选择忽略他对中国的观点。

*译注：两位皆是十九世纪英国重要的政治家，皆多次担任首相。

有位缅甸官员指点我去仰光五星级的斯特瑞德酒店（Strand Hotel）的书局去找一本介绍李光耀观点的新书。这是大英帝国时期兴建的一栋维多利亚风格建筑物，现在则是作为西方帝国式微的遗迹兀立在那儿。

这本书的编者，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和布莱克维尔（Robert Blackwell）写说："关于中国崛起这个议题，李光耀毫无疑问比起外界任何观察家或分析家有更深入的了解。"我略览这本书，发现李光耀很清楚了解中国的长期战略，他对中国早已密切观察数十年之久，比起西方极大多数人都更早。

李光耀直率地说："中国意图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而且要被接纳为中国、不是西方的荣誉成员……在他们思想的核心是殖民化之前，也就是被欺压、羞辱之前的世界。"李光耀认为北京巧妙地驾驭中国人民的期望——1989 年天安门事件之后，设法使他们完全放弃原先的主张。他说："如果你认为中国将会发生某种要求民主的革命，你就错了……中国人民要的是中国复兴。"新书编者请教中国将如何成为第一号强国时，李光耀答说："他们最大优势不在军事势力，而在经济势力……他们的势力将只会增长，并且增长到超越美国的力量。"

李光耀似乎证实了马拉松战略的根本要素，虽然他认为中国要称霸还得等个数十年。他说："中国人认为如果他们坚守'和平崛起'的说法，只争取经济和科技的第一位，他们不会输。要（直接）挑战像美国这样强大、科技优越的大国，将夭折他们的和平崛起。中国走的是吻合党所制作的电视剧《大国崛起》的路线……我相信中国领导人已经明白，你若与美国军备竞赛，你会输。你会搞得自己破产。因此，必须避免它、头要低，保持微笑四、五十年。"

我自己没办法说得更清楚。但至少我有个知音了。

尽管两党一致，甚至举世同声称颂李光耀，他对中国宛如醍醐灌顶的预测却被西方许多中国专家所摒弃。原因之一是批评他的人有一相情愿的想法和错误的假设，以为中国将会崩溃或成为西方式的民主国家。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奉行韬光养晦、谦逊低调，低估它的增长前

景。第三个原因是对于短期的中国威胁有太多假警报。和李光耀一样，我关切的是中国到了2049年将会多么强大。我专注在长远的未来，而这代表我们还有时间去追求我前面提出的十二项对策。

通常一谈到中国，就有人煽动性地发出警告，声称中国迫在眉睫就要接管全球、它的军力也将称霸全球——两者在近期内都不可能发生。哈佛政治学者约瑟夫•奈伊（Joseph Nye）正确地警告大家："我们最大的危险是过度高估中国，而中国也高估了自己。中国一点儿都不及美国。因此，如此放大中国、而在美国制造恐惧，以及中国傲慢自大，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

假设中国持续嚣张跋扈且咄咄逼人，逼得本地区同病相怜的国家组成同盟，这长期而言有助于美国。拿破仑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敌人犯错时，千万别去阻止他。"不过，这并不是说美国就可以两手一摊，无所事事。

要与北京进行长期竞争意味着必须看清楚中国的野心，当中国的行为逾越一般通行的国际规范界限时就得批评它。我从中国战国时期汲取概念，主张这么做；我必须尊重中国战略思想的精深和创意。我在本章所列举的十二个步骤会激怒中国、产生摩擦，乃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我的同僚经常警告说，别去批评多刺的中国人。但是这种立场忽视了亚里斯多德的劝喻，他说："批评是我们很容易即可避免的东西，只要不说、不做，做一个没有立场的人就行了。"

北京要取代美国成为地缘政治主导大国的策略，需要有美国的善意和协助。当年美国逐步崛起、大英帝国式微，美国必须像彼时英国的作法一样。这正是为什么中国如此努力打造美国的认知。刘明福在《中国梦》一书中呼吁中国努力塑造美国人对中国的认知。他说，中国必须"不让美国成为撒旦，而成为天使"。另外四名鹰派也出了另一本书《新战国时代》，呼应他的主张。"这些人士及其他中国鹰派相信未来数十年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战争和领土征服，而是为经济、贸易条件、货币、资源和地缘政治组合斗争不已。

至少有三个知识陷阱可能让我们跌进去，而看不到问题的真正本质。第一个陷阱就是太早担心害怕中国威胁。中国还不至于像马丁•贾克（Martin Jacques）2012年著作的书名所称将要"统治世界"。中国还没有成长到像美军那样，能够建立起遍布全球的军事力量。人民币还未强大到足以取代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曾说，中国只是"部分大国"。五角大楼在其战略规划上已针对中国启动重大回应，却还招致批评者发表文章，指责"是谁批准准备和中国开战？"

第二个陷阱是误认它打算取代美国。虽然中方的战略仍是机密，我们已经有足够证据知道不是机密的部分。中国没有任何严肃的学者会主张希特勒、斯大林或东条英机的征服方法。

也没有任何鹰派作者曾经提出领土扩张或统一全球意识型态的战略。反倒是中国鹰派相当着迷于有关美国如何崛起为世界大国的书籍，如华伦·辛孟曼（Warren Zimmerman）大使的《第一次大胜：五个美国人如何使国家成为世界大国》（First Great Trimph：How Five Americans Made Their Country a World Power）。前文已经提到，中共党校开班教授美国以贸易和工业政策为工具、协助美国超越英国和德国的历史，此外，经典的鹰派教科书《战略学》称赞美国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甩开欧洲、在 1945 年建立当前全球秩序的技巧。

战国的战略经典相当吻合中国鹰派从美国崛起所学到的教训。除了我在本书第八章提到有关美国崛起的许多书籍之外，北京中共党校至少采用三本书来说明新兴的挑战者如何成功地、和平地说服旧霸主退出：一是安·欧德（Ann Orde）的《大不列颠的式微》（The Eclipse of Great Britain）、二是范亚伦（Aaron Friedburge）的《疲惫的巨人》（The Weary Titan）、三是相蓝欣的《重铸帝国东亚》（Recasting the Inperial East）。有位全国知名的中国学者甚至检视 1880 年至 1914 年美国外交史的关键时刻，以显示美国如何安抚及向英国保证，以便取代它成为世界首席大国。他钦佩美国人十分聪明地说服已经精疲力竭的英国安心地交出霸主的地位。

中国对美国战略的赞誉之词，通常会引用中国的战略观念，例如声称美国懂得造“势”、采用“无为”，并且会借力使力。中国把这些概念套用在美国身上，认定美国今天也在推动马拉松战略。

中国的战略以西方历史上的成功典范，以及精研中国古代帝国兴亡史作为基础。中国的战略不依赖僵硬的路线图、时间表，或蓝图。它要伺机而动，必要时会快如闪电。

第三个陷阱只和美国政府官员有关。美国民众不晓得过去四十年华府和北京之间秘密合作的程度。中国有很长一段历史支持美国的地下活动，也因此使得许多美国官员把中国视为当前及未来的伙伴。我们的地下合作史使得美国许多决策者错误地偏袒中国鹰派，这些人正是负责执行这些秘密合作的人。

第一步，即承认有中美马拉松竞赛的存在，或许是最难跨出的一步，但它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美国或许不能承认问题的存在，或许不肯面对中国不仅将超越我们、而且会在 2049 年之前增长为我们经济规模的两倍、三倍的长期剧本。那么，势所必然，中国就赢了。

谢辞

这本书是累积了五十年的研究而成的结晶。如果不是我被赋予了难得的机会，与 35 位中国“学者将军”进行讨论与辩论，这本书也不会诞生。他们大部分都曾经对中国的国家战略发表专书或论文。有些我甚至认识超过 20 多年了。而且他们都谨守誓言，保守国家秘密，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另一方面，他们都充满对学术的热情，也愿意与我们这些孔子说的“有朋自远方来”分享他们的思想观点。尽管我所有的结论他们都不同意，但他们的真知灼见是值得我参考的。在了解中国人提出的观念的脉络上，基辛格提供了直接的与间接的帮助。

大部分上述的中国将军都长期服务于顶尖的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里。他们包括：陈舟、高锐、黄硕风、李际军、李青山、刘劲松、刘庭华、刘源、罗援、糜振玉、潘俊峰、彭光谦、王普丰、吴春秋、吴如嵩、姚有志、姚云竹、张士平、赵小卓，与郑敏霞。

我同时也很感激以下七位任职于军事情报中心、都是前任军事专员的学者将军的建议与着作，他们是：Chen Xiaogong、Gong Xiaofu、Wang Naicheng、张沱生、Zhang Wutang、Zhao

Ning 与 Zhen Zhiya。北京国防大学的七位学者将军的建议与专书也令我获益匪浅：刘明福、刘亚洲、Pan Zhengqiang、王仲春、Yu Guohua、张召忠与朱成虎。南京军事科学院的院长 Zhai Yuqiu 少将三大册讨论古代兵法的著作发人深省。曾经于南京任教，目前是国务院咨询的教授时殷弘也是我的良师益友。时教授著述甚丰，骨鲠敢言，且不苟俗见，然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又谨守分际，尊重党与军方的纪律。

有几位重要情报来源，为了保护他们的身分，我用了假名或姑隐其姓名。

另外我还要感谢罗杰•艾姆士（Roger Ames）与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两位中国哲学专家，他们帮助我理解中国文化中“势”的概念。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室主任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这位传奇性人物也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是他给了我研究中国战略的机会)，并将我的观点分享给历届政府。

许多研究中国战略思维的西方学者也对本书功不可没：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我的看法，他们也不是彼此都相互同意。他们有：罗杰•艾姆士（Roger Ames)，Dennis Blasko，Dan Blumenthal，Anne Marie Brady，卜睿哲（Richard Bush)，成斌（Dean Cheng)，Thomas Christensen，Warren Cohen，John Culver，Robert Daly de Mots，
David Dorman, Elizabeth Economy, Andrew Erickson, Evan Feigenbaum, David Finkelstein, Rick Fisher, Rosemary Foot, ChristopherFord 范亚伦 （Aaron Friedberg） - Banning Garrett, John Garver, Bonnie Glaser, Paul Godwin,Carol Hamrin, Paul Heer, David Helvey, Charles Horner 江亿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 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 Roy Kamphausen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Stephanie Kleine- Ahlbrandt, David Lai 大卫•兰普顿（Michael Lampton） - Richard

Lawless, Deborah Lehr, Cheng Li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 ThomasMahnken, Mark Mancall 孟捷慕（James Mann）麦艾文（Evan Medeiros） Alice Miller,Frank Miller, James Mulvenon 黎安友（Andrew Nathan） 包道格（Douglas Paal）Robert Ross, Gilbert Rozman, Phil Saunders, Ralph Sawyer 施道安（Andrew Scobell）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James Shinn, Randy Shriver, Abram Shulslty Mark Stokes, Michael Swaine, Jay.Taylor, Ashley Tellis, Timothy Thomas, Drew Thompson 潭慎格（John Tkacik）Peter Tomsen, .Christopher Twomey, Jan Van Tol 林蔚（Arthur Waldron） Thomas Welch, Allen Whiting,Dennis Wilder 赖瑞·伍泽尔（Larry Wortzel）相兰欣（Lanxin Xiang）Michael Yahuda,Maochun Yu, and 张晓明（Xiaoming Zhang)。

我还得感谢本书才华洋溢的编辑 Paul Golob，他就像美国出版史上的传奇编辑 Mawell Perkings 一样，能够激励、鞭策、说服作者写出比他们原本预期还更好的书。我的代理 Keith Urbahn 与 Matt Latimer 从一开始就与我讨论本书的构想，我也深表感谢。在研究与编辑工作上，我得利于两位聪明的研究生的协助：Nick Bellomy 与 Ashley Frohwein 。Jon-Michael LaGray、Mark Hanson 三位研究生帮助我拟草稿。Henry Holt 出版社的编辑 Chris O’Connell 助最终稿的完成。

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可敬的创办人 Herman Kahn 教导我如何批判性、策略性的思考，并放宽眼界、看得更远。哈德逊研究所主席 Ken Weinsteinn 编了一本 Kann 先生 2006 六年著作的选集，阅读该书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历史的进展既有直线也有曲线，” Herman Kahn 如是说。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 Susan Pillsbury 她在与我结婚之前去过中国八次，本书的观点深受她对中国的观察的影响。1989 年 4 月，我在去北京采访天安门抗议学生的路上绕道到伦敦，我们在那里相遇。在当时，她就有预感北京领导人不会达到我们一相情愿的对民主化、自由贸易、与人权的期待。事后证明，她总是有先见之明。

2049百年马拉松：中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

作者　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

译者　林添贵

责任编辑　王家轩

国际版权　吴玲纬

行销　陈丽雯　苏莞婷

业务　李再星　陈玫潾　陈美燕　枂幸君

副总编辑　林秀梅

副总经理　陈滢如

编辑总监　刘丽真

总经理　陈逸瑛

发行人　冷玉云

出版　麦田出版

台北市104民生东路二段141号5楼

电话：（886）2－2500－7696传真：（886）2－2500－1966、2500－1967

发行　英属盖曼群岛商家庭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台北市民生东路二段141号2楼

客服服务专线：（886）2－2500－7718、2500－7719

24小时传真服务：（886）2－2500－1990、2500－1991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09：30－12：00、13：30－17：00

邮拨帐号：19863813户名；书虫股份有限公司

读者服务信箱E-mail：service@readingclub.com.tw

麦田网址　http:／／ryefield.com.tw

香港发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湾仔骆克道193号东超商业中心1楼

电话：（852）2508-6231传真：（852）2578-9337

E-mail：hkcite@biznetvigator.com

马新发行所　城邦（马新）出版集团【Cite（M）Sdn.Bhd.（45832U）】

11，Jalan 30D／146，Desa Tasik，

SungaiBeal，57000 KualaLumpur，Malaysia。

电话：（603）9056-3833传真：（603）9056-2833

封面设计　李东记
印刷　前进彩艺有限公司
2015 年 9 月　初版一刷 Printed in Taiwan。
定价：450 元
著作权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978-986-344-263-9
城邦读书花园
书店网址：www.cite.com.tw

「我寫這本書是為了說服美國官員與台灣領導人，公開承認我們嚴重錯估也低估了北京的野心。」

「中國夢」就是中國洗刷百年國恥、取代美國、稱霸全球的夢。早在尼克森與中國建交之前就在美國政府擔任中國情報蒐集要職，隨後為歷任美國政府提供中國問題諮詢分析，並曾擔任雷根政府的助理副國防部長的白邦瑞這麼說。

「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是《孫子兵法》的智慧結晶，也是中國贏取百年霸業的戰略指導。由於中國政府刻意隱瞞自身的實力與意圖，加上對美國官員、學者、企業、媒體的甘言利誘，西方世界一直對中國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誤認為中國遲早會民主化、中國嚮往美國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國遲早會融入國際社會秩序。然而，事實上，中國早從毛澤東時代就有一套通盤的戰略，計劃要在2049年，即中國建國一百年之前，取代美國，稱霸全世界。「摸著石頭過河」只是鄧小平的欺敵詭計。

百年馬拉松，究竟鹿死誰手？

本書作者白邦瑞自1969年進入CIA之後，就專責中國情勢分析。多年來他透過與中國叛逃至美國的間諜、異議人士的接觸，與中國軍方將領、戰略學者的討論，以及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國防部對中國的機密調查研究，逐漸驚覺美國與整個西方世界都受到中國刻意的愚弄，以致於中國在「韜光養晦」、「和平崛起」的煙幕下快速茁壯，並在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之後，逐步挑戰既有世界秩序。

「我和我的同僚長久以來對中國無知……我們正在輸掉比賽。事實上，我們根本不知道比賽已經開始了……」白邦瑞極力呼籲美國政府，趕快認清現實，對中國展開反制措施。否則，中國贏定了。

ISBN 978-986-344-263-9
00450
9789863442639
RP4003 定價450元 HK$150
cite 城邦
麥田出版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白邦瑞/美国五角大楼及哈德逊研究所顾问

五角大楼顾问白邦瑞致中国读者：我为党国立过功

［注：中美合作，是世界和平发展的主旋律，也是冷战结束，极权势力倒台的基础。只要美国不致力于同中国搞意识形态斗争，这个世界就会更加美好。中国是没有欲望进行侵略战争的，郑和都没干过的事情，现代中国更不会干，美国人应该认真理解中国。深海同志，在美国辛苦了，确实为党国立过功。］

【摘要】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政策研究室和哈德逊研究所高级顾问，曾经是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最器重的中国问题顾问。他研究中国几十年，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国内有不少人说他“反华”，对此他颇感委屈。

2 月 3 日，白邦瑞的新书《百年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出版开售，书中称中国早就憋着下一盘大棋，到 2049 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此书还披露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与中情局在阿富汗和安哥拉有过秘密合作，两国还有 10 亿美元的武器交易。出于种种原因，编辑加了个耸动的副题“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强的秘密战略”。对此他表示不喜欢。有中文书评称其宣扬中国威胁论，批判其杜撰中美大战。

白邦瑞觉得有必要做个澄清，亲自用中文写了这封致中国读者的公开信。洋洋洒洒数千言，主要介绍新书的意图，及其个人的中国立场。与其说是一篇严谨的学术分析，不如说是一段关于中美关系史的个人回忆录。白邦瑞作为中美建交的见证者以及五角大楼倚重的中国问题顾问，其观点立场在美国及其盟国日本，都颇具影响力。

读完此文，感觉全都拿错了剧本。我们仿佛看到了电视剧《潜伏》里的我党情报员余则成，可用三个短句总结：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为党国立过功；队长，别开枪，是我。

这是一个长期身在异国、心系组织的老地下党员的心声：

我的《百年马拉松》一书刚刚问世，借此机会，我把我的心里话与您，亲爱的读者，作一个坦诚的交流。

我的这本书，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材料汇总，均沿袭了我第二本书，即《中国对未来安全环境的辩论》——比较准确、完整地收集了中国一些相对权威、资深的学术研究机构和学者对美中关系，特别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文章、书的观点。

为了更好地把习主席关于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落到实处，我把双方的一些疑虑、困惑，甚至是误解，统统摆上桌面，加以分类，研究解决，而不是采取大而化之，一锅煮的方式。我认为，细化双方共同点，指出不同点，采取历史地、具有深远战略眼光地看待、摆平这些问题，是我们两国地缘政治与战略研究人员可以尽到的责任。

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要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主张中美两国不对抗，不冲突，互相尊重，实现双赢。我非常赞同习主席的这个主张。

但遗憾的是，中国的一些鹰派人物的观点，似乎与习主席的主张不那么合拍。我的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引用了中国鹰派的一些文章和书，来批评他们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相违背的观点。这样才能让美中关系更好沿着两国元首所达成的一致继续向前发展。

十多年前，我出版过另外一本书《中国对未来安全环境的辩论》。感谢中国新华出版社的朋友们，把我的那本书全文翻译出版。我希望这一次新华出版社的朋友们，也能够将我的这本书翻成中文，这样恐怕可以更好地减少误会、误判，大家一起努力，朝新型大国关系方向发展。

中国有个成语，叫“断章取义”。意思是说不顾全篇文章或谈话的内容，孤立地只取用其中的一段话或一句话的意思来下结论，与作者的文章原意不符。

为了防止我的书被一些缺乏美中两国关系发展史的知识、不明真相，又缺乏长远战略眼光的人士误读、误解、误判，我写了这篇短文，想比较完整、准确地对我这一本学术性探讨美中关系历史的书做一些说明，以期这本书能被客观、公正地 对待和解读。就像毛主席说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同时，我的这本书也是写给未来年轻一代研究学者的。因为他们对许多事情的真相缺乏了解，以至于有时候会在不正确的导向中做出错误的结论和判断。长时间的积累下来，一旦过了临界点，就有可能会使几十年来老一辈的领导人和战略研究人员辛辛苦苦经营培育的美中关系毁于一旦，也就很难实现习近平主席所倡导的那种双赢局面，甚至造成两败俱伤那种

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在书的第二章里，我专门谈到了对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些认识。习近平主席指出，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 见《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第一页，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回想当年，在中美接触的最初，毛主席曾让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就“中国联合美国，抗击苏联的威胁”提出建议。四位元帅经过调研，向毛主席递交了一份报告，其中特别引用了中国三国时代刘备和孙权联合起来反对曹操的故事和其他一些古代的战略思想。

毛主席一贯重视用《左氏春秋》《战国策》、《资治通鉴》这些史书所载的经验教训指导中国革命和外交工作。已故的《纽约时报》记者索尔兹伯里曾提到，毛主席在长征的时候都带着这些书。有报道提到，邓小平先生也常常将《资治通鉴》、《古文观止》放在案头，随时阅读。

尼克松总统为打开中国的大门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年青一代可能有所不知的是，尼克松总统反共的资历也非常老。毛主席就曾经说过他很喜欢尼克松，因为他是右派。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因为尼克松曾经有反共的历史，就否定他对美中两国关系所做的巨大历史贡献。

中国有句古话，吃水不忘掘井人。每每谈到美中关系，我们也非常感怀毛主席、周总理这两位老一辈的中国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这四位元帅当年不辱使命，向毛主席提出改善中美关系的建议。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周总理的助理熊向晖为中美关系在破冰之际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如果没有他们的战略眼光和大智慧，美中关系恐怕还会在黑暗中摸索很久。

上世纪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尼克松总统是否访华，访华是否会得罪当时的苏联、进而引起过激的反应，有着严重的分歧。有一派认为，最好与苏联搞缓和，集中精力尽快地解决头疼的越南问题，因此主张跟苏联打交道。而另一派认为，应该积极与中国打交道，来解决美国面临的困境。我是站在后面这一边的。

当时，我在联合国总部工作，有机会和许多苏联的高级外交官接触，了解到苏方对美中改善关系的一些基本态度和可能的反应。他们说，只要美中不在军事上合作，苏联就不会反应过度。我将这些情况很快写成报告给美国政府。我还收到了美国政府、基辛格对我所写报告的感谢信。其实，基辛格当时对美中接触顾虑重重，前怕狼后怕虎，生怕苏联反应过度，对与苏联搞缓和非常热衷。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书中详细引用了一些最近解密的文件，有名有姓，非常具体。这些解密文件的全文，不久要在我的网站上全文公布。现在不少人把基辛

格博士看作神，但历史毕竟是历史，是非曲直，自有评说。

不久前，我曾经访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中国博物馆有幸参观了中国的复兴之路的展览。这个展览当然也包括了美中关系的一些历史，有的内容使我感慨万千，有的内容让我吃惊不已。这些有关的内容在我的书中都有详细表述：

1、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是当年中国人提出的口号。在百年马拉松的比赛中，坚持按规则、按程序进行这场全球瞩目的比赛，我们不妨回顾一些历史事件，可能会有助于下一阶段的决赛。

2、1969 年 3 月，《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参议员肯尼迪要求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文章。为此，尼克松总统特别让前往北京的基辛格告诉中方，不要在他访华前邀请任何美国政治家访华，不要抢了他的头炷香。另外，参议员曼斯菲尔德也被告知，不要在尼克松访华前造访北京。

随后，基辛格在北京见到毛主席。中方希望和美国尽快建交。但基辛格及其助手态度消极，借口各种理由，搪塞中方，对我和我的老板、后来成为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伊克莱所提的几条建议起初都不认真对待。我和伊克莱所提的具体建议，核心是向中国提供一个一揽子的军事援助计划，包括提供早期预警系统。也就是说，一旦面临苏联的军事攻击，中国在几小时前就可以预先得知，可以把自己暴露在外的轰炸机很快转场，以避免损失。我们还建议美方在中国需要的时候，向中国提供一些军事装备。基辛格的助手，尤其是洛德对此反应强烈，质疑此举会违反美国宪法。1973 年 11 月 1 日，在向基辛格做汇报时，他们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我们的建议，而把建议的主要内容和核心部分都附在材料堆中。

3、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基辛格当年不拖延， 美中建交就不至于要拖到 1979 年。毛主席、周总理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就会亲眼见证美中建交这个伟大时刻……当时基辛格在北京，毛主席其实是间接地批评了他这种拖延的态度的，毛主席说“美国人是想站在我们的肩膀上” 。当然，后来布热津斯基和卡特总统还是和邓小平最终达成建交协议。可以说，如果不是基辛格拖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至少还会提早五年。

4、美中关系破冰之后，中国成功地化解了来自苏联的威胁，进入联合国，摆脱孤立，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公正地说，美国是做了几件好事的，对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做了一份贡献。这段历史，我在我的书中 63 页和 64 页有详细地叙述。

5、上世纪八十年代，伊克莱担任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我是他的帮办。为了帮助当时解放军的现代化，有效地抵御来自北方苏联的威胁和来自南方的越南在中越边境的军事活动，我们建议里根总统批准了一个一揽子的援助中国的计划：一是帮助中国建立一套生产大型炸弹的生产线；二是帮助中国海军生产几种新型鱼雷；三是帮助中国空军改善战斗机的火

控雷达系统。同时，我们还向解放军提供了几套当时他们最需要的 TPQ 炮兵雷达阵。所有的这些工作，我们加班加点，不辞辛苦，但是从来没有听到过一句表扬的话。前两年，伊克莱博士病逝前亲自对我说，我们两人在八十年代为中国解放军的现代化做了许多事，但好像从未受到任何称赞。好在历史就是历史，我们也不会多么计较。

6、今天，这些文件都解密了，我终于可以说一句自己表扬自己的话：我为美中关系最初解冻作了一个无名英雄。我和伊克莱副部长为解放军的现代化以及有效地抗御外来威胁做了不少事。如果中国方面有有关奖励制度的话，我应该得一个一吨重的大奖章。

7.这里还有一段插曲。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我们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花了 20 亿美金，向中国买了许多冲锋枪等常规武器，援助阿富汗游击队。这 20 亿美金是解放军对外军售的第一桶金。

8、上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我第一个提出与中国方面进行情报交流的建议，为解放军的现代化作了许多具体的工作。我曾多次去阿富汗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与当地反侵略的武装力量、领导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些官员进行了接触。在这些过程中，我所扮演的角色都是积极的、建设性的，为当时中国改善周边的安全环境实实在在地做了不少好事，进而使中国能安心地发展自己，为今天成为数一数二的强国。这些故事，在我的书中 72 页 75 页有着详细的叙述。

9、我在书中还提到，现在美国国内有相当一批人（当然不包括我在内），主张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遏制，甚至威慑，从而想把中国搞乱。他们甚至希望对中国进行先孤立、后瓜分，也就是李登辉说的“七块论”。我坚决反对这些人的荒唐想法。但这些人贼心不死，甚至要拉我下水，我坚决不从。如果按照这些人的荒唐想法，我们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几十年美中两国关系将付之东流。

10、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多次会晤，双方同意加强美中两国两军的关系，但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具体倡议、内涵的理解却不尽相同。因此，从学术、历史的角度来探讨美中两国的合作之道、公开透明地把一些双方的分歧都提出来，应该是有益的。我们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些持鹰派观点的人对美中两国、两军关系的发展有不同的意见，这其实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这里，我想说，我希望与他们继续保持交流。

11、我之所以提到中国的鹰派对美国持怀疑态度，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基辛格在他的《论中国》一书中，十分看不起中国的鹰派，书中多处批评刘明福将军。联想起基辛格在上世纪 70 年代拖延中美建交、过度担心苏联对中美接触的反应，等等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我觉得让刘明福将军这样的鹰派有说话和表达意见的机会并无什么不妥之处 。

12、上世纪 80 年代，里根总统批准了伊克莱和我的主张，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并没

有征求基辛格的意见。里根在白宫 8 年，就对外政策，只见过基辛格一次，谈的话题是中美洲的问题。这些在许多报章上都有报道。现在看起来，幸亏基辛格不在当时的决策圈里，否则又要重蹈美中建交的老路，一拖再拖，什么事也办不成。

13、今天中国取得的成功，说句心里话，也有我们美国的巨大贡献。

第一，在 1970 年代，在中国受到北方威胁之际，我们美国挺身而出，主持正义，没有让威胁和威慑中国的阴谋得逞。

第二，从 1970 年代开始，美国向中国提供了许多高技术方面的帮助，使中国的许多科技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任美国总统的科技顾问相继访华，中国的国家科委主任也先后访美。双方在核工业、航天技术、高级材料、化工、医疗等学科方面都有大量合作。

第三，从 1970 年代初期起，特别是 1980 年代至今，几十万的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大学深造，有的人取得了奖学金，学习科技、人文和其他学科。他们当中许多人学成回国，在各个领域都担当了学科带头人。这可能是美国对中国今天的成功作出的最大贡献之一。

第四，从 1980 年代初至今，这几十年来，美国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帮助也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陆海空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都与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交流。在人民解放军需要美军装备的时候，我们也总是给予满足。应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今天的现代化，美国是起了比较积极的作用的。虽然美中两国对解决国际安全事务方面有许多不同意见和主张，但坚持美中两军进行积极交往的决心没有变。我是积极推动这项工作的支持者。

第五，美中两国贸易受到两国人民和政府空前的支持。辽阔的美国国土是中国人民投资做生意的好地方。三亿多美国人的消费是中国众多厂家的巨大市场。同样，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是美国商家投资做买卖的好去处。中国巨大的旅游潜力也真是举世无双。

总之，中国人民在他们复兴道路和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我们美国人做了不少好事。但是很遗憾，这些好事并没有很好地在中国的历史书中体现出来。相比之下，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望厦条约等等倒是占了许多篇幅。对历史上一些负面的东西，应该是实事求是，既不夸大，也不必忽略。实际上，美国对中国从来没有领土野心。总之，我们要让年轻一代学会客观地看待美中关系史。

我在书中提到，中国公开的资料及舆论在不少地方抹黑我们，甚至提出从林肯总统时代一直至今，美国都想遏制中国。这与史实不符。再说美国没有领导八国联军，也没有去打鸦片战争，更没有参加火烧圆明园，那都是英国军队干的，账请不要算在我们头上。

这些不利于中美两国发展大国新型关系。毛主席曾经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我要在这里加上我自己的一句看法——这也是建立美中新型大国关系的首要问题。

14、在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掩卷深思，无限感慨。我从二十多岁起，致力于美中两国友好，为此出过许多具体的点子和建议，并推动付诸实施，我真诚地希望中国能够成功应对外来威胁。几十年过去了，我想，如果中国未来再次受到来自北方的威胁，美国政府和人民还会再次伸出援手。

15、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综合国力、军力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国防大学刘亚洲将军说，21 世纪的中美竞争就是“就是比赛谁发展成就更优，谁综合国力提升更快，就是决赛谁能够成为更好引领世界进步的‘冠军国家’”（见刘亚洲“中美世纪博弈：开辟世界历史新时代”第一页序言，刘明福《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北京 2010）。

16、“百年马拉松”这个词不是我的发明。刘明福将军在他的《中国梦》一书中，把马拉松比作中美竞赛，作了很详细精彩的叙述。习近平主席主持工作以后，把实现中国梦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作为头等大事。中国现在的态度非常谦虚，韬光养晦的战略及其升级版在延续，在发展。前不久，中国副总理汪洋访问芝加哥，对中美两国经济合作表示出了务实态度。也就是说，双方在马拉松的比赛中，也都要遵守规矩，按规则办事。

整整六十年前，毛主席在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 50 年吧，也许 75 年，75 年就是 15 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 毛主席认为，中国只有超过美国，才能对人类做出大贡献（见刘明福《中国梦》，第 9、10 页）。

下次如果有机会去北京，我要到毛主席纪念堂，向他老人家报告：“主席，你六十年前的预言很快就要应验了。中国没有用七十五年，只用了六十年多一点，就赶上了美国。恐怕不要多久就会超过美国了。”因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过计算，今年（2015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就会超过美国。我想不用多久，中国的军事力量也会赶超美国，届时，也许我还健在，也许还能见证这一天。

我相信，如果中国沿着习近平主席的复兴之路和中国梦的设想继续走下去，中国在 2049 年成为冠军国家问题不大。

我写这篇文章，只是从一个学者的身份和角度来谈谈新书出版后的感想。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进行交流，使美中关系真正成为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当然，我的书有错误在所难免，希望我能在中文版问世的时候进行较大的修改。

谢谢您阅读这篇文章。